

区域经济评论

REGIONAL ECONOMIC REVIEW

(2020年第1期,总第43期)

双月刊

学 术 顾 问 范恒山 程必定 洪银兴

编 委 会 主 任 金 碚 谷建全

编委会副主任 周 立 王承哲 李同新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任重 王一鸣 王承哲 史育龙 宁越敏

任晓莉 安虎森 孙久文 李同新 李国平

李海舰 李曦辉 杨开忠 杨继瑞 肖金成

谷建全 张可云 张占仓 张世贤 张军扩

陈 耀 金 碚 周 立 周金堂 赵 弘

郝寿义 秦尊文 高国力 崔民选 覃成林

喻新安 魏后凯

主 编 任晓莉 陈 耀

社 长 任晓莉

副 社 长 刘昱洋

主管单位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区域经济评论

(双月刊)

本刊特稿

- 1 探索建立全要素的区际利益平衡机制 范恒山
- 4 区域经济发展的守正与创新 赵 艾

笔谈

- 8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 陈 耀 张可云 陈晓东 廖元和 宋丙涛 黄 寰 王喜成

“十四五”规划研究专题

- 23 关于“十四五”规划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张占仓
- 32 “十四五”时期区域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罗仲伟 孟艳华

区域经济理论

- 39 演化经济地理学与区域发展 贺灿飞 李 伟
- 55 中西方商品经济发展路径的比较及选择
- 兼论中西方经济学之区别及其根源 冯彦明
- 63 区位市场设计理论及其应用 沈体雁 崔娜娜

区域经济政策

- 70 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及其评价研究 刘英奎 吴文军 李 媛
- 79 以软价值战略推动雄安新区创新发展 滕 泰

区域格局与产业发展

- 87 中国消费品制造业区域转移的特征研究 刘云中 何建武
- 95 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内部需求制约:制造业消费阶段变化的影响
杨 阔 汪艳莉
- 103 基于专业市场的西部欠发达地区追赶效应研究 高云虹 周 晴

城市经济研究

- 111 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 姜长云
- 117 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机理研究 安树伟 张晋晋
- 125 社会资本驱动城市创新发展 李雪伟 方 浩

区域开放与合作

- 134 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路径研究 曹允春 刘芳冰 罗 雨 赵 冰
- 145 航空航天产业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机理与路径研究 李艳华 严 丹
- 153 内陆城市空港经济发展的瓶颈与策略
——以洛阳空港区为例 肖若晨

主 管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主 办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编辑出版 区域经济评论杂志社

地 址 郑州市丰产路21号

邮 编 450002

电话/传真 0371-63690786

投稿邮箱 qyjpl@163.com

网 址 <http://qyjpl.cbpt.cnki.net/><http://qyhl.cbpt.cnki.net/>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广告发布登记证 郑金水广登字【2019】027号

国内订阅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发行 郑州市邮政局 邮发代号 36-44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外代号 BM5690

刊 号 ISSN2095-5766 CN41-1425/F

定 价 16元

REGIONAL ECONOMIC REVIEW 2020.1 *Bimonthly*

Explore and Establish the Total Factor Balance Mechanism of Inter-Regional Interests	<i>Fan Hengshan</i> (1)
The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Zhao Ai</i> (4)
Study on Some Important Issues in China's the 14th Five-Year Plan	<i>Zhang Zhancang</i> (23)
Regional Industrial Base Advanced and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eriod	<i>Luo Zhongwei Meng Yanhua</i> (32)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He Canfei Li Wei</i> (39)
Comparisons and Choices of Commod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Concurrently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and Origin in Economic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Feng YanMing</i> (55)
Location Market Design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Shen Tiyan Cui Nana</i> (63)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Environment	<i>Liu Yingkui Wu Wenjun Li Yuan</i> (70)
Promot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Xiong'an New Area with Soft Value Strategy	<i>Teng Tai</i> (79)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Transfer of Chinese Consumer Goods Manufacturing	<i>Liu Yunzhong He Jianwu</i> (87)
The Internal Demand Restric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pgrading: Impact of Consumption Stage Change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Yang Kuo Wang Yanli</i> (95)
Research on the Catch-up Effect of Underdeveloped Regions of Western China Based on Specialized Market	<i>Gao Yunhong Zhou Qing</i> (103)
Several Theoretical and Policy Issues on Fostering and Developing Modern Metropolitan Area	<i>Jiang Changyun</i> (111)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Function Promo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Metropolitan Area	<i>An Shuwei Zhang Jinjin</i> (117)
Social Capital Drives Urban Innovation	<i>Li Xuewei Fang Hao</i> (125)
Ope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Airport Economic Zone	<i>Cao Yunchun Liu Fangbing Luo Yu Zhao Bing</i> (134)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Improv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lity by Aerospace Industry	<i>Li Yanhua Yan Dan</i> (145)
The Bottleneck and strategies of Inland City Air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Take Luoyang Airport Area as An Example	<i>Xiao Ruochen</i> (153)

【本刊特稿】

探索建立全要素的区际利益平衡机制

范恒山

摘要:区际利益平衡机制是指基于公正原则、由一种或多种因素导致的地区间以一定形式体现的经济利益转移的制度安排或体制设计。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可以考虑在生态地区利益补偿、农产品产销利益补偿、资源高效利用调节、污染防治、人才利益补偿、特殊贡献地区利益平衡、违反市场公平竞争的利益调节、政策不公平调节、重大事件处理和财产补偿机制等10个方面建立利益平衡机制。同时把握新的技术与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全面推动数字化转型,强化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形成先进、融合、开放、绿色的数字软硬体系,使数字技术成为建立科学的区际利益平衡机制的强有力的支撑。

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区际利益平衡机制;数字技术与数字基础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1-0001-03 **收稿日期:**2019-12-16

作者简介:范恒山,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北京 10008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他也一再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因此要把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放在关键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几年来,全国上上下下按照这一要求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在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受损害的形势依然严峻。长江经济带要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仅靠上级指导推动、相关地区和企业自觉行动是不够的,必须建立一套体制机制来倒逼这项重大使命的落实,通过建立强有力的制度体系来约束和保障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事实上不只是长江经济带,整个国家都面临着需要按照新的发展理念形成严格缜密制度约束体系。而这个体系中的一个关键的内容,就是要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

我对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问题思考可以说是比较早的,2008年左右就有了一些想法。初衷是考虑如何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由此

萌发了要建立补偿机制或利益平衡机制的一些思想。比较系统的阐述是在2013年11月在长沙召开的“中国中部发展论坛”上我讲了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或利益补偿机制的重要性、基本原则、操作思路以及探索方向,这应该是国内第一次关于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或补偿机制的系统表达。从那个时候开始,各个方面积极努力,相关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我们看到,国家有关部门就粮食、生态等方面建立补偿机制问题发布了相关文件,由相关部门与地区推进的一些试点也稳步开展,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最重要的是,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更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了完善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利益补偿机制、健全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利益补偿机制等要求。应该说,这个意见充分地肯定和体现了我们这些年理论探索和实践运作的一些成果。从2008年左右着手思考这一问题,到现在中央专门制定文件提出相关要求,多年的努力终于付诸政策实践,这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情。伴随着这些年的

理论探索 and 实际调研,我对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与大家一起探讨。主要阐述如下3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的重大意义

什么是区际利益平衡机制?大体说,是指基于公正原则、由一种或多种因素导致的地区间以一定形式体现的经济利益转移的制度安排或体制设计。使用“利益平衡”这个词,其考虑一是这种平衡体现了行为的对称性,依据的是付出了应该有收获、得到了好处要给予回报、造成了破坏必须要承受相应的代价的原则,即两者之间应该相配相称,对等平衡。二是这种利益平衡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是经济利益的一种调整,不涉及行政、法律等方面的激励或惩罚。三是这种利益平衡不仅涉及补偿问题,也涉及处罚问题;不仅意味着交换,而且意味着共建;不仅体现对称,而且体现协调。事实上,补偿、处罚等都是手段,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才是建立利益平衡机制的目的。利益平衡机制这样一个概念,概括性更强,科学性更高。

为什么要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这一点是与其涉及的具体内容密切相联的,我在下面会谈到这些具体内容。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建立利益平衡机制涉及国家全局、战略大局,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其意义是多方面的,简要地说,一是有利于节约集约利用资源要素,提高经济效率;二是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三是有利于保障公平正义,全面调动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社会的创造力;四是有利于约束政府行为,推动实现规范决策和科学决策;五是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六是有利于完善治理构架,形成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大力推进区际利益平衡机制建设。

二、更为全面地推进区际利益平衡机制建设

我曾经在2013年“中国中部发展论坛”的主旨讲话中,着重讲述了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的思路,除生态环境、重要农产品、生产资料等3个重要方面外,还讲了有关排污权、碳排放权等的公平交

易问题。深入地思考一下,其实并不只是这几个方面,还涉及一些很重要的其他方面,也就是说建立平衡机制的具体内容还可以扩大延伸。把这些方面都解决好了,中国的很多问题也就相应解决了。包括上面提到的内容,我认为可以在以下10个方面建立利益平衡机制。

第一,生态地区利益平衡机制。探索建立毗邻地区、流域上下游地区的利益平衡机制,以促进生态修复保护和优化。

第二,农产品产销利益机制。当前主要讲的是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利益补偿机制,其实不只是粮食,还有棉花、其他特种农产品和稀有农产品等,这些农产品都需要建立区际间的补偿机制。重要农产品涉及国计民生,不能够随意提高销售价格。不能提价,如果又没有补偿,效益就上不去,发展也就必然缓慢,这对按照国家要求种植农产品的地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如果有适当的补偿,那些主产区就会增加收益,不仅会与其他地区实现同步发展、共奔现代化目标,也会提高生产的积极性。

第三,资源高效利用机制。涉及煤炭、石油、能源、特种矿产等。需要探索建立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一方面提高资源输出地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促进资源的节约与高效利用。

第四,污染防范机制。既涉及毗邻地带的污染排放问题,也涉及跨区域的污染产业转移问题,还有其他形式的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问题。在这方面要建立经济性的惩处机制、补偿机制。

第五,人才利益补偿机制。主要涉及相对落后地区人才向发达地区流动问题。人才可以自由流动,也应当自由流动。但人才的成长离不开相关地区的教育培养,而教育培养是有成本的。人才进入对于发达地区而言是锦上添花,而人才流失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则是釜底抽薪。基于协调发展的要求,应建立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招揽吸收人才的利益补偿机制。

第六,特殊贡献地区利益平衡机制。如革命老区、原苏区等,他们为新中国的成立或国家的发展都做出过特殊重要贡献和不同于一般地区的利益牺牲,应该建立适宜水平的利益平衡机制。如赣南原中央苏区,对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过重大贡献。但直到前些年发展都比较困难,贫困人口较多。基于此,中央量身制定了相关政策文件,其中不乏具有

补偿性质的内容,这些政策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快速发展和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探索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并在建立利益平衡机制时加以借鉴运用。

第七,违反市场公平竞争的利益调节机制。妨碍和破坏市场统一的各种垄断、保护和封锁等行为都应付出沉重的代价。

第八,政策不公平调节机制。需要对非特殊条件所限、与全局利益相悖制定的不公平政策的受损者给予适当形式的补偿,反过来说,需要对制定这些不公平政策的机构予以经济上的处罚。这有利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加快落后地区发展,也有利于推动政府部门精准和科学决策,减少决策和行为的随意性。

第九,重大事件处理机制。对非必要或非全局利益需要进行的重大活动所造成的企业关闭、正常生产活动中止等,应对相关主体进行适当的补偿。

第十,财产补偿机制。公民财产的形成并非完全取决于个人因素,而与政策环境和社会帮助密切相关。对财产的跨国转移应建立相应的给予国家和社会补偿的机制。

在这里还需要强调三点,一是对上面所涉及的有些因素要进一步做深入细致的研究,不能简单从事,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情况,平衡多种要求和考虑多元目标。二是实施利益平衡的主体、手段与方式可以根据不同情况来确定。例如,对危害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实施处罚的形式进行,而处罚的所得可以用来设立市场一体化发展基金。三是在当前的实际工作中,已经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利益平衡,包括转移支付、补贴等,应加强梳

理、归并和调整完善。

三、强化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对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的支撑

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以及依此形成的数字经济为建立全要素的区际利益平衡机制创造了有利条件。数字技术将使对相关信息的把握更加全面具体,对面临问题的了解更加深入细致,对实现目标的确立更加科学务实,对应对策略制定更加精准有效。要强化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形成先进、融合、开放、绿色的数字软硬体系。总之,要把握新的技术与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全面推动数字化转型,使数字技术成为建立科学的区际利益平衡机制的强有力的支撑。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们注意到,在20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强调了要在长江流域开展污染赔偿机制试点,要求联合制定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标准,探索建立跨区域固废危废处置补偿机制,这是一个可喜的思路,这对于解决长江经济带的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问题将起到重要作用。可以看作是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应由易到难、由简到繁,逐步深入地推进相关补偿机制建设,直到最终建立要素全面、设计科学的区际利益平衡机制。

(本文系作者在“第二届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论坛”上的主旨讲话整理稿。)

Explore and Establish the Total Factor Balance Mechanism of Inter-Regional Interests

Fan Hengshan

Abstract: The inter-regional interest balance mechanism refers to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r system desig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the transfer of economic benefits in a certain form in a region caused by one or more factors. In order to narrow the regional gap and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 inter-regional interest balance mechanism. We can consider establishing a balance of interests in ten aspects, such as compensation for the interests of ecological areas, compensation for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pollution prevention, compensation of talents benefits, balance of interests in special contribution areas, interest regulation against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unfair adjustment of policies, handling of major incidents and property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At the same time grasp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about by the new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we will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engthen region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advanced, integrated, open and green digital hard and soft systems, and make digital technology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cientific mechanism of inter-regional interest balance.

Key Word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gional Interest Balance Mechanism;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igital Foundation
(责任编辑:晓 力)

【本刊特稿】

区域经济发展的守正与创新

赵 艾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均衡发展,以及改革开放后的非均衡发展和协调发展三个阶段。近年来,中国在探索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形成了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为引领,以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为基础的区域发展格局。与此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即区域分化仍是困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新时期,对区域协调发展已经成型、可以制度化的理论和实践,要毫不含糊地坚持和巩固,即守正;根据新形势与新任务、新目标与新要求,新需求要与时俱进地进行完善与发展,即创新。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守正;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1-0004-04 **收稿日期:**2019-11-19

作者简介:赵艾,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域开放司(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部开发司原司长(北京 100081)。

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基本成型,党的十九大更是将区域协调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经济发展空间结构的深刻变化,面对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面对即将开始的“十四五”规划编制,区域协调发展该考虑什么、准备什么、做什么?是不容回避的必答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本文将从守正与创新的角度对新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谈点看法。

一、区域经济发展需秉持守正

所谓守正,就是坚持和巩固。对于党的十八大

以来,区域协调发展已经成型、可以制度化的理论和实践,“十四五”时期要毫不含糊地坚持和巩固。这是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的四梁八柱,是“承重墙”,不可撼动,动了可能会出大问题。

1. 守正的具体内容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推动中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区域协调发展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之一。党的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也进一步予以阐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引领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将其纳入国家七大战略之中。2018年11月,国家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

意见》，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新阶段。

新时代的区域发展，从空间格局看，已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五大战略构筑成的基本格局。从补短板角度看，要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并将其作为首要任务。从发展板块看，应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从城镇作用看，应坚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从内容丰富性看，将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加快边疆发展、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等内容纳入，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内涵，逐步形成了多层次的区域发展战略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已经取得重要进展和明显成效。对于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必须坚持和巩固。

二、区域经济发展需坚持创新

所谓创新，就是需要完善和发展的地方。就是在不动“承重墙”的情况下，根据形势与任务、目标与要求、需要与可能进行与时俱进的“装修”。非“承重墙”能打则打，能改则改，实在不行，可考虑根据需求和可能，搞点“加建”。当然了，“加建”部分不仅要与整体设计和整体风格协调，还要符合“物业”管理条例。总之，新时期要善于找到腾挪的空间，并适时、顺势、适当加以完善和发展。

1. 区域板块分化不断加深

找准创新，即需要完善和发展的地方，首先就是要找问题，坚持问题导向。而现阶段，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不平衡不充分，具体来讲，就是分化。

2013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区域发展也出现了新趋势、新变化。依靠创新驱动的东部沿海地区继续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且表现出了更强的韧劲和惯性；主要依赖投资拉动、资源驱动的部分内陆省份则经历了一轮较大幅度

的经济下滑，在南北方之间、四大板块之间、四大板块内部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现象。

2018年，区域分化格局进一步加剧，低速增长省份在北方蔓延扩大，东部整体增速出现下行，同时各板块内部的分化也在加深。首先是南北分化。从2013年开始，南方省份的总体增长速度开始超过北方省份，一直持续至今并且差距不断扩大，呈现出经济增长“南快北慢”和经济总量占比“南升北降”的分化格局。其次是四大板块分化。既存在板块之间的分化，也存在板块内部的分化，这使得目前区域分化状况更加复杂。具体表现为，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多年走不出困局，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领先优势弱化，东部地区经济增速放缓，中部地区经济增速相对较好。再者是国家重点战略分化。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点战略在区域间也出现了增速分化。京津冀增速放缓，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增速平稳。此外，还有“胡焕庸线”两侧分化。“胡焕庸线”西北半壁经济增速下滑压力增大。“胡焕庸线”西北半壁经济增速曾连续10年超过东南半壁，增长势头强劲，但2017年开始，西北半壁的经济增速低于东南半壁。就经济比重讲，东南半壁略有上升，西北半壁略有下降。

2. 解决区域分化问题的政策要求

解决上述分化问题，从政策角度看，需要梳理并完善现行分类管理的差别化区域政策，解决区域政策的碎片化问题，提高区域政策的互动性、互补性、协调性。

具体而言，一是梳理并完善经济功能区优惠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设立了一批不同类型的经济功能区，从早期的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放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到随后的保税港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国家在赋予其明确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均给予了相应的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的确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也必须要进行重新梳理，及时推进废、改、立。

二是梳理并完善主体功能区调控政策。自2005年以来，国家大力推进主体功能区规划建设。2010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按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

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以规范空间开发秩序,优化空间结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时期,要根据规划的执行落实情况及新情况、新问题,对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的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导向,以及财政、投资、人口、环境等方面的分类政策等进行梳理,发现问题、分析原因、予以整改。特别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差异施策、扬长避短、优化发展,适合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搞整齐划一的“一刀切”。

三是梳理并完善针对特殊类型区的援助政策。特殊类型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出“短板”和“弱项”,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集中体现。但同时也是区域协调发展、国家生态安全、能源资源安全、边疆稳定、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支撑。推动特殊类型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客观上需要完善相关政策,从差别化转向精准化,从面上覆盖转向点上发力,从依托大区域板块转向小区域范围,从行政区划线转向跨区整合,从以地理单元施策转向以经济单元扶持,增强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三、区域经济创新发展新思考

守正,坚持和巩固则可。创新,完善什么、发展什么,怎么完善、怎么发展,则需要认真研究。具体而言,新时期实现区域创新发展,需要着重注意以下3个方面。

1.持续加大改革力度,推动区域发展发生“化学反应”

改革改的就是依然制约或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从而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联动性、整体性,关键在深化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

具体而言,一是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必须坚决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清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市场壁垒,促进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决定、跨区域自主有序流动和高效公平配置。加快建立各区域间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

场体系。二是深化区域合作机制。2019年8月26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要研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问题。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充分发挥承载发展要素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完善空间治理,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三是创新区域互助机制。完善先进帮落后的对口支援制度,创新帮扶方式,加强教育、科技、人才等帮扶力度,增强后进地区自身发展的“造血功能”,促进对口支援从单方受益为主向双方受益转化。在省级统筹基础上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度,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互助共济。四是建立健全区际补偿机制。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全面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和纵向生态补偿机制。五是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增强土地管理的灵活性,不断扩大优势地区的发展空间。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有效转移支付。

2.进一步扩大开放,不断增强区域发展的联动效应

2019年11月5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将继续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并将制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国家战略,增强开放联动效应。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首先,区域发展要与更大范围的开放联动,在区域上优化对外开放的空间布局,既要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又要推进各区域面上的整体开放。其次,要与更宽领域的开放联动,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包括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等。再次,要与更深层次的开放联动,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具体包括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等制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将西北、东北地区的发展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密切联系,将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密切联系。在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基礎上,加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提升中国西部地区与东南亚地区的互联互通水平,加大对沿边地区的开放力度。

3.更加重视公平共享,推动区域发展产生“连锁感应”

区域协调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进各区域人民福祉,满足各区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具体而言,一是区域发展要与促进就业产生感应,健全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促进机制。二是区域发展要与办好教育产生感应,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三是区域发展要与完善全民社保体系产生感应,建立有利于健全统筹城乡、可持

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四是区域发展要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产生感应,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五是区域发展要与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产生感应,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六是区域发展要与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产生感应,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七是区域发展要与生态文明建设产生感应,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八是区域发展要与脱贫攻坚产生感应,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巩固成果,防止返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此外,共享,既是区域发展的理念,又是要求、任务和目标。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要高度重视区域发展的公平性,不仅要考虑区域整体的经济社会质量提升,更要注重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各区域的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参考文献

- [1]吴俊.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9(12).
- [2]贾若祥,张燕,王继源,等.我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总体思路[J].中国发展观察,2019(9).

The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Zhao Ai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stage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ag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made positive achievements in explor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formed a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 based on the western, northeastern,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led by major strategies such a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t the same time,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that is,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is still one of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that plague the curren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we must firmly uphold and consolidate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that have taken shape and can be institutionalized, that is "integrity". According to the new situation and new tasks, new goals and new requirements, we ne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to improve and develop the new needs, that is "innovation."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tegrity; Innovation

(责任编辑:齐 双)

【笔谈】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编者按: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带,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抓手。黄河流域省区如何借力国家战略支持,发挥后发优势,破解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协同难题,对于实现黄河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刊特邀国内知名专家对此进行研讨,以期为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1-0008-15 收稿日期:2019-11-15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思考要点

陈耀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郑州主持召开座谈会,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着眼,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以下简称“黄河战略”),这是新时代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完善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又一重大布局,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用系统保护和治理的思想、区域分类指导的思想和“一盘棋”调控的思想,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唱响新时代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黄河大合唱”。

一、充分认识“黄河战略”的重大意义

1.“黄河战略”是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全长5464公里,流经9

个省区,是我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江河,是重要的生态屏障。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始终在同黄河水旱灾害做斗争,迄今,防洪减灾和水沙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随着三江源等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的推进,上游水源涵养能力稳定提升,中游黄土高原蓄水保土能力显著增强,出现了“人进沙退”的治沙奇迹,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但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依然脆弱,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不仅存在“地上悬河”的安全威胁,而且流域水质受沿岸工农业污染状况尚未得到有效缓解。因此,加大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十分必要,实施“黄河战略”,与长江经济带一样共抓大保护,成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又一重大实践,无疑这是关系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之举。

2.“黄河战略”是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举措

黄河流域流经的地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18年流域沿线9个省区总人口4.2亿人,占全国人口的近1/3(30.3%);地区生产总值23.9万亿元,占全国的1/4强(26.5%)。黄河流域是我国能矿资源富集区,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资源丰富,是“北煤南运”的主战场,拥有稀土、钽铌铍等重要战略性资源,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和重化工基地,也是我国航空航天军工生产和发射地。黄河流域省份特别是黄淮海平原、汾渭平原、河套灌区也是我国农产品主产区,粮食和肉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3左右。实施“黄河战略”不仅有利于加快流域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有利于在当今国际复杂环境下培育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新引擎。

3.“黄河战略”是完善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棋局

黄河流域9省区集聚的人口较多,尤其是河南、山东、陕西等都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四川也是人口大省,黄河流经川西北),上中游的青海、甘肃、宁夏、川西、蒙西、陕北等均属于我国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面临贫困面广、贫困度深、贫困人口多、返贫率高的问题,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难啃的“硬骨头”。黄河上游地区又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集聚区,很多与革命老区、贫困地区、高寒山区等叠加,中下游地区也生活着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显然,实施“黄河战略”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维护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大家庭繁荣稳定;既有利于促进我国东西部之间协调发展,也考虑到了统筹南北方之间的均衡发展。“黄河战略”的提出,将使我国新时代的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更加完善,在四大板块的基础上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三群两带”新战略格局(所谓“三群”就是三大城市群: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所谓“两带”就是长江经济带和黄河生态带)。

二、推进“黄河战略”的科学思路

1.要用系统工程的思想,统筹推进流域生态保护和治理

大江大河流域的上中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流域地区的山水林田湖草构成完整的生态系统。因此,做好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

系统和环境修复治理,必须以系统工程的思想,强调保护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坚持流域生态空间一体化保护和环境污染协同治理,形成上游“中华水塔”稳固、中下游生态宜居的生态安全格局。同时,对于安全隐患突出的“地上悬河”区域、重化工污染严重以及农村面源污染的地区,要加大整治力度,实现黄河流域水质的大幅提升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改善。

2.要用区域分类指导的思想,科学谋划流域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与长江流域类似,黄河上中下游地区的发展也很不平衡,特别是黄河上中游有7个省区都是发展不充分的地区,同东部地区及长江流域相比存在明显差距,有些省区甚至是全国发展最困难的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滞后,内生动力不足;整个黄河流域对外开放程度较低,9省区进出口贸易仅占全国的12.3%;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5个处于这一流域。因此,实施“黄河战略”除了搞好大保护,还要解决流域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按照“分类指导、分区施策”的思路,针对不同类型的地区提出不同的发展策略。大体上,黄河流域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区,即生态涵养区、粮食主产区、城市化地区和贫困地区,对于三江源、祁连山等生态功能重要的地区,主要是保护生态,涵养水源,创造更多生态产品;对于河套灌区、汾渭平原等粮食主产区,重点是发展现代农业,把农产品质量提上去;对于区域中心城市,要集约集聚集中发展,提高单位空间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而对于贫困地区,重点是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全力改善民生和发展环境。整个流域地区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3.要用“一盘棋”调控的思想,有效建立流域整体联动利益共享机制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优越性,坚持用“一盘棋”调控的思想,建立和完善如下几个重要体系和机制:流域整体管理体系,河长制湖长制组织体系,水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控、共保共治、联合执法机制,跨区域管理多层次协调机制,流域地区产业分工合作和利益共享机制。特别需要及早建

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指挥中枢,可以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组建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和沿黄9省区共同参与的“黄河战略领导小组”。同时,建立由黄河流域9省区主要负责人组成的联席工作会议,定期召开高层论坛,落实中央政策,打破区域壁垒,推进区域联动、政令通行和深化合作。

三、抓好用好战略机遇的几点建议

对于沿黄9省区而言,国家实施“黄河战略”带来了难得的重大发展机遇,要有强烈的“机遇意识”,精准把握中央精神和政策要义,抓好用好落实好,为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出思路、亮实招、做贡献。

1. 抓好科学规划,突出创新驱动

实施“黄河战略”要有科学规划,目前作为顶层设计在国家规划纲要正在编制中,流域各地区要同时开展规划研究和科学论证。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其中首要的就是创新驱动发展。黄河流域在科技创新方面与长江经济带相比差距不小,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研发投入占全国的56.8%,专利授权量占全国的62%,共设立了上海张江、江苏苏南、武汉东湖、长株潭、重庆、成都等6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而黄河流域9省区的研发投入只占全国的23.7%,专利授权量仅占全国的24%,只有甘肃兰白、河南郑洛新、山东半岛3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推进科技创新不仅可以为流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提供技术支撑,更重要的是,可以加快流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更多适合流域绿色发展需要和未来新技术变革趋势的现代产业体系。为此,要不断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争取在黄河流域布局更多的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工程中心、检验检测中心等国家级研发平台,提升黄河流域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并通过各类创新平台和激励政策汇集高层次人才和创新资源。

2. 发挥中心城市优势,提高承载与引领带动能力

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依赖于沿岸中心城市,提升中心城市、城市群等优势地区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有利于高效利用资源,实现集约化发展。目前,郑州、济南、兰州等省会中心城市首位度不高,

作为中心城市的作用发挥得不够,使得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缺乏中心城市的引领和带动。因此,要支持黄河流域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构建以中心城市为内核引领都市圈乃至城市群,带动整个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重点发展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以青岛和济南为核心的山东半岛城市群、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城市群以及兰(州)西(宁)城市群和呼包鄂榆城市群。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沿黄重要城市的郑州,近些年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引领带动作用,经济和人口承载力有了大幅提升,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常住人口突破1000万人,人均GDP突破10万元,科创、开放、生态、市容面貌均有显著进展和提升,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中心城市范例。

3. 强化水资源高效利用和流域生态修复治理

与长江不同,黄河水资源总量不到长江的7%,人均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水资源利用粗放,尤其是农业用水效率不高,大水漫灌的传统耕作方式仍为主导,企业和城市居民用水的节水意识不强,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已高达80%,远超一般流域40%生态警戒线。黄河水资源量有限,流经的地区多为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和城乡居民生活也离不开水。因此,必须对流域水资源实行科学规划,合理规划沿岸人口、城市和产业的布局,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总原则,大力发展节水产业和技术,推进农业节水和社会节水行动,尤其是开展水资源保护利用、生态环境治理、粮食生产等方面的综合研究,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并辅之以经济和法律手段,切实推动全流域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根本转变。同时要开展对整个流域生态的全面修复和根本治理,对沿岸及支流污染严重的工矿企业坚决取缔,严格管控污染产业的转移,沿岸城市要下决心消除雾霾,让城乡居民吸收到新鲜的空气,用上清洁干净的水,看得见蓝天白云。

4. 抓紧脱贫攻坚,缩小发展差距,增强流域人民幸福感

由于历史、自然条件等原因,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上中游地区和下游滩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2014年以来沿黄河9省区1500多万人摆脱贫困,滩区居民迁建工程加快推进,百姓生活得到改善,但彻底摆脱贫困

仍须努力,要按照中央部署到2020年实现建档立卡贫困户整体脱贫,特别是解决好黄河流域人民关心的饮水安全、防洪安全、生态安全等问题,加快提升全流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并加快推进贫困区域的产业导入,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让黄河流域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5.开展传承黄河文化弘扬中华文明的铸魂工程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之根和魂。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分布有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黄河冲积形成的中原地带,是中华民族

的文化之源和血脉之根,经历了千百年改道、治理和疏导,形成了沃野千里的中原大地,产生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化。“黄河战略”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大力开展传承黄河文化,弘扬中华文明的铸魂工程和创新工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支撑力、凝聚力和向心力。

作者简介:陈耀,男,郑州师范学院国家中心城市研究院院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 100836)。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考

张可云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继“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后的第6个具有空间属性的国家发展战略,其完善了中国区域发展重大战略整体框架,为解决中国特定区域重大问题提供了新的战略支撑。这一重要谋划不仅为黄河流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也为解决当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实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

一、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黄河横贯中国的东中西三大战略区域,黄河流域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生态地位突出,同时又是国家脱贫攻坚、区域协调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关键区域。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多重重大战略意义。

第一,黄河流域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重大的战略地位。黄河流域是中国的“能源流域”,上游地区的水能资源、中游地区的煤炭资源以及下游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等都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黄河流域也是中国

的“粮食主产区”。在2018年全国粮食产量排名前10的省区中,河南和山东分别以6649万吨和5320万吨的产量位列第2位和第3位,其中山东还是中国蔬菜和水果产量第一大省,而内蒙古和四川也以较高的产量位列第8位和第9位。此外,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廊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系统,承担着防风固沙、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职能。

第二,黄河流域是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主战场。黄河上游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及中游的内蒙古和陕西等地属于欠发达地区,贫困人口较多、贫困程度较深、返贫率较高,尤其是青海、四川和甘肃藏区及甘肃的临夏州和四川的凉山州被列入“三州三区”深度贫困地区。截至2019年5月,上述6省区共有贫困县150个,占全国贫困县总数(485个)的30.9%,若再加上山西的16个贫困县及河南的14个贫困县,这一占比提高到37.1%。因此,黄河流域是中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之一。

第三,黄河流域是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区域。黄河流域横贯中国的东中西部,黄河绵延5464公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为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

发展战略的推进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黄河流域流经的9个省区中,除四川外全部位于北方地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南北经济发展差距有所扩大,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将有助于缓解南北经济空间失衡的现象。黄河流域内部经济发展呈“阶梯状”分布,具体表现为上游塌陷,中游崛起,下游发达,区域协调发展的提升空间较大。

第四,黄河流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起点和腹地。黄河流域的陕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经腹地甘肃向西北延伸通过新疆与欧洲相连。在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和商贸物流枢纽。在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方面,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内蒙古则是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之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向东北延伸,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协调;向南拓展,与长江经济带、长江三角洲地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粤港澳大湾区相对接,因此,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关系着“一带一路”建设进程的有效推进。

二、黄河流域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必须直面现有的突出问题,明确战略行动的具体导向。影响黄河流域发展的整体性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紧张。黄河流域西北地区的沙漠化问题严重,直接影响着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中国的沙漠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 and 东北的部分地区,其中包括黄河流域的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和陕西5个省区。黄土高原土质疏松贫瘠,终年缺少植被,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灾害频繁,给黄河流域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黄河大部分河道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流经的西北、华北两个地区严重缺水,人均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加之水资源利用粗放,农业用水低效,水资源过度开发,使得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协调水资源与生产生活的矛盾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二是黄河流域区域差距内部趋稳,外部拉大。2009—2018年间,流域内省区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但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这一差距逐渐趋

于稳定。2009年,黄河流域9省区中人均GDP最高的省区为内蒙古(40282元/人),最低的省区为甘肃(12872元/人),二者差距为27410元/人;2018年,黄河流域9省区中人均GDP最高的省区为山东(76267元/人),最低的省区依然为甘肃(31336元/人),二者差距为44931元。从极差增长率来看,2016年达到波谷,为-1.1%,近两年虽有所抬头(-0.2%和1.4%),但基本维持在0%上下。黄河流域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有明显下降,区域外部差距不断拉大。2009—2018年,黄河流域9省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比重由27.0%下降到26.08%,虽然在2012年有小幅上升,达到27.03%,但整体仍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2018年,黄河流域9省区的平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5.84%,低于全国整体水平(59.58%)3.7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黄河流域的“落后病”较为严重,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三是黄河流域面临多方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一方面,流域内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存在矛盾与冲突。黄河流域分布着众多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区,这些区域与贫困人口分布区高度重合;另一方面,流域内各省区在资源利用方面存在矛盾与冲突。以水土资源为例,黄河流域资源性缺水的事实使得人河争水、人河争地问题难以避免,且十分突出。此外,流域内各省区在利益协同方面存在矛盾与冲突。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省区发展水平不一,自然环境、经济结构、民族构成等存在较大差异,较发达省区与欠发达省区的利益取向有差异,协调难度较大。

四是黄河流域的产业转型升级面临较大压力。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长期在全国的经济排名中垫底或靠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不足,患有严重的“落后病”。同时,黄河流域作为中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耗水量较大,用水方式较为粗放,水资源利用率不高,这对农业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变提出了现实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偏重、环境承载力有限是黄河流域中下游省区普遍存在的问题,产业发展亟须转型升级。例如,山东省经济总量虽位于9省区之首,但“老化”苗头已经出现,资源利用效率不高,企业创新活力不足;山西、内蒙古的发展严重依赖煤炭资源,产业结构单一,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同样患有一定程度的“老化病”。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统筹安排。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关乎中国整体的“强起来”，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予以重视。

三、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方向与举措

建立现代化的黄河流域治理体系，是促进黄河流域发展的根本要求，要针对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精准施策。

第一，尽快编制和出台黄河流域发展规划和区域政策。重视和加强区域规划是避免区域经济冲突的需要，是规范和引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为重要原则，加快制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统筹谋划生态资源的空间布局 and 高质量发展路径，推动黄河流域形成上中下游协同，东中西互济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区域政策是确保区域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工具之一，应尽快明确包括“谁管”“管谁”“咋管”“管效”在内的四管问题。一方面，中央政府应尽快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协调好黄河流域9省区的利益关系，避免出现纷争；另一方面，9大省区应充分结合自身情况，联合流域内其他省区制定区域合作政策。应加快完善上中游欠发达省区落后地区开发政策，下游较发达省区应侧重研究区域创新发展政策。

第二，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力度，节约集约用水。一方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探索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全面考虑黄河河面、河里、河床，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的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问题，从防治水污染到治理水土流失，从黄河水体本身到与之相联系的山水林田湖草，注重生态建设和保护的整体性和全局观，确保黄河安澜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合理配置和节约集约利用水资源，不断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益。坚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改变粗放的用水方式，提高节水意识。

第三，加强黄河流域内外部区域合作，鼓励扩大开放。黄河流域省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需打破

行政区划界限，加强区域互动和合作，追求融合与联动发展。尽快协调好各省区的发展定位，避免产业同质化和恶性竞争；逐步打破要素流动壁垒，鼓励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各省区间充分流动。黄河流域应作为一个整体，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联通，充分挖掘和利用好黄河通道，加强与外部区域的密切联系和协同发展。同时，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发展机遇，提倡以陕西、四川、河南和山东为引领，充分利用自贸区发展优势，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形成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第四，重视并创新区际利益协同、补偿和共享机制。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协同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如处理好生态保护的长远利益与经济利益的眼前利益之间的关系，安排好各省区资源配置的利益倾斜等。为此，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健全黄河流域各省区的共同协商机制，积极搭建各方沟通平台，听取各方声音；二是推动建立黄河流域各省区间的多元化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义务，优化利益分配和补偿机制；三是鼓励下游较发达省区发挥优势带动作用，尝试为上中游欠发达省区提供对口支援，共享人才培养、职业培训和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助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第五，优化黄河流域产业空间布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力有较大差异，应严格遵循主体功能区的差异化发展思路，根据其地域特色和区域功能进行产业布局，避免产业同构现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农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应结合区域特色资源，形成合理分工，集约利用土地，培育和发展现代农业产业链，塑造高质量品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同时，着力解决黄河中下游省区的“老化病”。一方面，积极调整重型产业结构，为新兴产业腾挪空间；另一方面，提倡产业多元化发展，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作者简介：张可云，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治理现代化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陈晓东

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对黄河用得多保护得少，尤其是经历上游戍边屯垦、中游千年建都、下游平原地区常年大规模农业耕作，黄河流域的地表植被破坏严重、土地沙碱化加剧、水资源紧张等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仅从公元前602年有黄河决溢改道记载开始到1938年花园口决堤的2500多年间，黄河共决口1590次，较大的改道26次，“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成为黄河千百年来真实的写照，沿黄地区人民对宜居环境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皆因黄河水患一直难以实现。

一、黄河安澜是国家治理有效性的的重要标准

黄河中下游可谓沃野千里，中华民族在此居住繁衍生生不息。早在2000年前，中游的关中平原就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在唐代以前这里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最好的地方，有“天府”“陆海”之誉。黄河流域后来的巨变除环境气候原因之外，当时原著居民及百万之众的戍边开垦等开发活动是重要原因。

可以说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部治国史。在一个发源于黄河流域、有着数千年农业文明的大国，治理黄河是历朝历代安邦定国的应有之义。据《史记·河渠书》记载，夏商周三代对黄河治理主要目的在于防水患保农业，春秋战国高度重视兴修水利对富国强兵的作用，自秦汉开始历代帝王均重视兴修水利。汉武帝治理黄河，发挥着“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关键作用；宋金时期，多个政权统治者都极为重视治河，除以黄河为屏障外也“以水为兵”。到了元明清三代，由于迁都北京，重组了地域政治格局，以内河水运为先，赋予了黄河治理更丰富的政治内涵，保证漕运通畅成为其必有之义；而且清代对黄河治理无论是认知还是实践都

与明代有显著不同，不仅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干预力度，更将黄河治理提升至事关政权合法性、涉及国计民生的政治工程。

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均有大规模治理黄河的历史记载，当期及随后数十年间虽有收效，但其利难以泽被后世，治理的有效性也在持续衰减。所以，在中国数千年的农业时代国家治理水平下，为了取得连续的合意的黄河治理效果，不仅需要建立各种治理制度，还需要国家财政一直不断地投入，所以才有“盛世治河”一说；而且历史上各朝代的统治后期，黄河治理越发成为财政投入的无底洞和滋生腐败的温柔乡，因此黄河在历史上也长期处于治、淤、决、改的无解循环。当然，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宝贵治黄经验与智慧以及相关典籍记载，都是我们回看审视黄河流域的过去今生并据此判断其未来前进之方向的有利借鉴。

二、统筹治理是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

新中国建立70年，黄河安澜70载，这是当代中国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古老黄河与中华民族一起进入了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加大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维应突出体现为全域性、统筹性与协调性，必须通过一定时期按期达成主攻目标与分进合击的统筹谋划协调，来推进全流域的高质量发展进程。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流域繁衍生息，形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而所有这些生产生活行为都与“水”息息相关。在我国工业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对于黄河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已经接近甚至大大超出了流域的生态环境承载力。而在今后，无论是修复和保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屏障，实现全流域同步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将丰富的自然资源转换

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战略保障,都要高度依赖黄河水资源。黄河水资源也将成为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素。因此,水资源的合理利用自然也就成为统筹协调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的核心环节。黄河流域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一定要围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实现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黄河水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刚性约束因素,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大力推进农业节水,减少耗水工业,大力发展节水产业,大力推广应用节水技术,实施全社会节水行动,加快推动用水方式的节约集约化。

黄河问题,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实施全流域统筹兼顾、协调治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黄河流域的全域治理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要按照空间均衡原则,以流域和行政区域为单元建立健全黄河水资源管控体系。在把黄河流域水资源合理利用作为刚性约束的前提下,在统筹协调的基础上,实现保护优先、系统治理、综合预防、协同管控、区域统筹的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更加突出生态保护的优先地位,巩固生态安全屏障;要保护好黄河源头等一大批关键生态功能区,加快推进黄土高原的水土恢复与保持;在充分考虑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并重的三大灌区未来发展;优先发展清洁能源,推动城市群建设,推进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创新、发展及其在黄河流域的应用;加快实施山水林湖草城的系统治理,在充分考虑上中下游治理保护差异前提下,实现源头预防、用水管控、末端治理。实施重大水工程建设、河道整治、河势控制等措施。要加强自然水循环与社会水循环的协同管控,全面推进城乡生活及工业污水资源化的处理与利用。加强流域与区域的统筹治理,实现水资源供需、水污染产消、水沙产泄以及空间使用的协调与平衡,切实做到抓大保护、实施大治理。

三、人民共享是流域治理现代化的终极目标

黄河从西向东流经9个省区,千百年来的分分合合沉淀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其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路径也各有千秋,这与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

区域发展方式和路径的多样性相一致。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体现在速度上的突飞猛进,而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速度上的稳和水平上的高,即稳中求进;高速增长阶段主要表现为财富的迅速集聚,而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人民共享;高速增长阶段的各地区首先关注GDP的增长,而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多目标实现。基于这种治理目标和治理方式的变化,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态势也将发生深刻变化。9省区地理区位不同,资源禀赋各异,文化价值取向多样,发展路径自然也就各具特色。实现各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客观上具备了选择多种路径的可能,实践中更需要发挥各省区的比较优势,这样创造出来的各具特色的发展才是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

黄河流域各省区发展差距较大,经济增长水平差异也较大,在流域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各省区之间的挑战十分巨大。这就要求各省区在自身条件的基础上系统性地提升和创造自身的发展与竞争优势,走符合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以新的思维方式选择可行的发展战略,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的方式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才是黄河流域各省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义所在。

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必然是一项覆盖社会各个领域的伟大事业,实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广泛需要直至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永远都需要不断努力的持续过程,而这也正是高质量发展永无止境的原因。这种新动力机制的供给侧是创新引领,需求侧则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加快推进黄河流域各省区的体制机制改革,在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上,形成沿黄各省区实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的动力机制,使黄河流域真正成为生态宜居和人民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的美好大地。

作者简介:陈晓东,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竞争力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管理学博士(北京 100836)。

以创新思维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廖元和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大政方针。如何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伟大目标与任务?笔者认为应当遵循流域经济规律,以创新思维对这一千年大计进行研究和谋划。

流域经济的特点是流域经济规律的表现。流域经济的特点之一是水资源供需必须平衡,水是地球上一切植物和动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也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的物质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主要矛盾是水沙情势恶化,水土流失严重。黄河平均年输沙量16亿吨,其中有4亿吨沉积在下游河床。在1972年至1999年曾因泥沙淤积而使黄河断流1028天。要减少黄河中的泥沙,要防治水土流失就必须植树造林,而建设小绿洲、实行大保护就必须有水的供应保障。黄河流域是资源性缺水区域,黄河径流总量陕县点测得为430亿立方米,长江径流总量大通点测得为9293亿立方米,黄河径流量不到长江的二十分之一。华北和西北等广大地区,其耕地面积占全国的50%,而径流量仅占全国的10%。黄河的水资源既不能保障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能保障植树种草、改善生态环境的需要,这就必须从外部调水,将长江、淮河和黄河流域的水资源系统和供需平衡进行统一规划和谋划,南水北调工程就是统一规划和谋划的产物。

尽管南水北调工程有东、中、西三条线路,但西线调水入上游方案问题甚多,难以实施。钱正英院士认为三峡水库引江济黄有三大优势:一是水源充足,三峡水库年平均水量为4300多亿立方米,调水100亿—200亿立方米有保障;二是调水处高程145—175米,对长江水能开发影响不大;三是工程施工、管理、保护条件好。郭树言、李世忠、魏廷琿

在《从三峡水库小江引水工程研究》一文中对引江济黄工程做了专门论证。郭树言组织的长江技术经济学会提出了《三峡水库引水入渭济黄济华北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从三峡水库年调水135亿立方米,利用天然河道和输水隧洞、穿巴山、越秦岭、入渭河、经潼关、进黄河,增加水资源。

流域经济的特点之二是河流上中下游治理和生态保护必须统一和协调,干支流治理和生态保护必须统一和协调。就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而言,一是上中下游分居于不同的省区,必须改变“九龙治水”的局面;二是应防止“重干流、轻支流”的倾向;三是江河保持现状,岸上不断开发。

黄河上、中、下游的河道特性很不相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也不相同。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重点区域是中游途经的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是第四纪时期风力作用和流水侵蚀作用共同形成的,黄土遇水极易流失。黄河水少沙多,生态环境恶化不仅表现在干流上,而且表现在支流上。泾河、洛河、渭河流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区域。一遇暴雨,黄河支流的汾河、泾河、伊洛河、洛河、渭河等支流便洪水量猛增,挟带大量泥沙进入黄河干流,并对下游区域造成严重威胁。正像长江中游的湘江、资江、沅江、澧江的洪水一样。由于黄河流域的暴雨多集中在夏秋季,在空间上多集中于支流流域,强度大,坡降陡。因此,黄河流域的水患治理不仅应重视干流,而且要重视支流,要在主要支流上进一步建设大中型水利工程,拦蓄洪水与泥沙。在黄河支流未得到根本治理前,不宜在干流过度建设水电站。

流域经济的特点之三是保护和持续发挥江河的自然功能。这些自然功能包括引洪入海、灌溉、航运等。世界上的著名大河都是运输大通道。我国隋朝时期的大运河可直达开封,经开封沿黄河逆流而上到洛阳。唐宋时,洛阳、开封的经济繁荣与水运密切相关,黄河在隋唐时期也具有强大的航运

功能,但黄河的航运功能逐步丧失。在两千多年间,据史书记载,黄河决口泛滥达1500多次,大的改道就有26次。也就是说,黄河下游未形成固定的河道,黄河河道在华北平原摆荡,在河南、山东境内形成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威胁。

如何解决八百公里“地上悬河”的威胁?传统的做法是加高、加固两岸河堤而不改变河道,这本质上是属于“堵”,而不是“导”,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能否考虑采用“导”的新思路,修一条八百公里长的人工大运河,将“地上悬河”变成地下河,通过人工建立的固定河道引黄入海呢?当然,这并未从技术上进行可行性论证。本文的大胆设想仅是“导黄入海”的一个新思路,它仍需要进行专题研究和论证。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有过修建都江堰、开凿离堆导洪分流的成功先例,有过修建一千八百公里京杭大运河的壮举。今日中国的国力和时代背景,也有能力修建新的导黄入海大运河。

流域经济的特点之四在于流域经济是开放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形成的,但流域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是在政府主导和组织下实施并完成的。中国历史上的水患治理无不是在政府主导和组织下进行的。政府主导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相结合正是中国区域经济和流域经济的特征。

政府在对流域经济的管理中,至少有下列八大职能:一是制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规划和专项规划;二是制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三是组织重大专题研究和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四是组织并实施重大增水减沙工程、导黄入海工程;五是科学分配黄河流域有限的水资源;六是改革与创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管理体制;七是推动鼓励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科学研究与学术活动;八是组织并实施“市场失灵”的公益性生态保护项目。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应是绿色、生态、富裕。加快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是各省区的发展主题。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平均水平为58.52%,黄河流域除山东、内蒙古外,其他各省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甘肃则只有46.39%。从人均可支配收入看,全国平均水平是25973.8元,黄河流域也是除山东、内蒙古外,其他各省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工业企业主要效益指标看,全国每百元资产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为106元,除山东、河南外,其他各省区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效益主要指标偏低虽然与产业结构偏重型相关,但产业结构层次低、效益差也是客观事实。加快城市化进程应避免盲目扩大城市规模,而是应重点加速城乡一体化、发展一大批现代中小城镇,完善城市体系 and 功能。加快工业化进程应当调整现有产业结构,用工业化的成果改造、提升第一二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从发展趋势看,黄河流域的现代农业、现代旅游业、现代服务业以及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特色轻工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在中国历史上,黄河流域的发展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在新时代,黄河流域的振兴是必然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全面复兴的标志。

作者简介:廖元和,男,重庆工商大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400067)。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公共经济发展

宋丙涛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点燃了黄河流域各地发展的巨大热情,也掀起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问题的新高潮。研究者大都认为

黄河流域迎来了一次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振兴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但对这次机遇的性质的认知难免会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差异,本文仅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理论反思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与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精神一脉相承,也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互为表里。这些报告、讲话与决定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面临着新的任务,因此,应该有新的发展思路与改革措施。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表明,即使从全国范围来看,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充分调动市场力量与微观积极性,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各种经济总量,确保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高速增长;而是要转向增长质量的提高,关注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效,特别是要关注不同地区的均衡发展,与增长成果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均衡分配、推动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问题。

由于经济理论研究的滞后,现有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及以效用价值为基础的产权制度理论既没有充分论证资源的价值与分配机制,也没有充分认知劳动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导致了早期的改革措施中存在着收入分配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进而带来了严重的市场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均衡、不合理的问题。法国学者 Piketty 教授 2014 年出版的《21 世纪资本论》之所以迅速成为畅销书就是这个理论困境的反映,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日益遭到诟病且正在经历全面的批判也说明了学界正在进行理论反思。

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中,以国家财政论为核心的一部分新经济史研究者的努力与公共经济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给探讨如何弥补市场经济分配机制的弊端以新的启发。按照公共经济学的基本认知,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是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共同发展的产物,市场经济发展仅仅是私人经济发展的成功机制之一,但私人经济的发展成功不可能替代公共经济发展本身。而对于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而言,无论是人类共有的自然资源的消耗与开发,还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与提高,都是典型的公共经济问题,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推动的。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对高质量发展的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强调,都表明我们党已经认识到,公共经济的发展才是当下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方向。

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公共经济的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是经济发展进入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的标志。众所周知,早在 2010 年前后,我们已经进入了供过于求的新时代。尽管供过于求有着结构性错位的各种原因,但市场调节领域的基本到位与私人经济需求的基本满足仍是一个基本的现实。但市场经济的供过于求并不意味着所有领域的供过于求,特别是公共产品的供过于求。市场经济发展不均衡其实是公共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结果,相反,早期的工业化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恰恰是政府提供的各种发展型公共产品的产物。类似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尽管有认识到位的因素,但也离不开早期公共经济投资的支持,因此,即使是“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的黄河流域的市场经济发展也需要公共经济投资的支持,特别是已经认识到位、发展已经起步的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首先依赖于公共经济的发展。

然而,黄河流域的历史地理背景与生态环境现状也提醒我们,黄河流域的发展主要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而生态环境的保护属于典型的公共经济发展的内涵范围。当然,在这个五千多公里长的黄河两边,具体的生态背景与发展任务也并不完全一样。作为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与河湟地区的生态环境不仅相对脆弱,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共享的生态公共产品,因此主要的任务自然是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但对大多数的中下游地区,高质量的发展则意味着公共经济的完善性发展与基础设施的补充性投资。

事实上,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理论早就告诉我们,人民群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由外部的天灾人祸与内部的发展动机共同决定的。而从最新的公共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同样是由需求结构内在地决定的(宋丙涛,2015),但公共产品的消费却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在规律。即在生存型公共产品(比如国防)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以前,对发展型公共产品(比如市场)的需求很难出现。当然,对于那些自然条件较差或因为各种原因

曾在历史的进程中遭受了重大损失的欠发达地区,通过一定的外部援助来改变生存公共产品的供给,既是均衡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理论对外生的第一推动力的必然要求。因此,对整个黄河上游的贫困地区或不发达地区,建立东西部地区的援助关系或上下游之间的对接帮扶关系,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因此,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时,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的治理模式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现代化转型阶段,而且暗示我国将探索人际与人地和谐相处的文明新模式,而不再追求简单的市场经济总量增长。实际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国家治理的核心就是公共经济的运行,而公共经济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生存型与发展型两类。只有发展型公共产品才能带

来表现为GDP的市场经济的增长,没有生存型公共产品的充分供给,就不可能有发展型公共产品的供给。而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国家在环境保护与扶贫攻坚方面的努力其实正是在确保全体中国人的生存型公共产品的基本供应,正是在为发展型公共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总之,高质量发展主要是指公共经济的发展,黄河流域的公共经济的最大需求或短缺就是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因此,黄河流域的发展需要公共经济的优先发展,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就应该是上下游之间相互协作基础上的生态保护,黄河流域因地制宜的均衡发展就是在治理黄河前提下的社会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作者简介:宋丙涛,男,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开封 475004)。

同为母亲河 共抓大保护

黄 寰

华夏大地,北有黄河,南有长江,孕育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一江一河”均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2019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做主旨演讲,再次强调“中国有两大母亲河,一个叫长江,一个叫黄河。我们将在两河流域进一步科学布局”。

一、两河流域,事关千秋大计

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最早的地区,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和无数名胜古迹,是炎黄子孙共同的“根”。和黄河流域一起并称为“母亲河”的长江流域源远流长,其农耕资源丰富,是中国的“粮仓”,流域内的粮食产量占全国的一半。同

时,长江流域河流水系发达、适宜航运,串联了内河和沿海港口形成了巨大的运输网,是我国主要的运输河流。依托长江流域黄金水道的长江经济带更是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目前,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既是我国资源富集区,也是经济最集中的区域,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尤其关键。因此,推进“一江一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是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意,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举措。

二、量水而行,践行绿色发展

在推动长江经济带战略和黄河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放在压倒性位置,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坚持自然资

源合理开发和环境保护的耦合协调,在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上,将长江和黄河流域建设成为“生态优美、经济发展、区域协调”的黄金经济带。在此过程中要量水而行,分类施策,统筹谋划上中下游,共抓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重点保障流域安全,推进流域长治久安,持续改善流域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让“一江一河”成为人民的幸福河。发挥我国社会主义体制优势,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理念,将流域治理作为系统性全局性的工程进行整体性和协同性地顶层设计,尊重客观规律,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着力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推动长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更大步伐。

三、因地制宜,实施分类举措

由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自然物质条件方面存在较大的异质性,生态环境的治理重点也有所不同。

长江经济带涵盖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超过全国的40%,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地域单元,区内经济活动密集,但也正因为过度密集的粗放的经济活动,导致了长江流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水资源的污染问题成为制约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核心因素。因此,如何在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在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的基础上,推进长江流域水资源的保护是实现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同时,长江流域发展还面临着上中下游发展失调的问题,需要依托“黄金水道”推动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以生态和绿色发展为引领推动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相对于长江流域严峻的治污问题,黄河流域急需解决的是保土节水和治贫脱贫问题,如何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强化流域沙土治理实现水土保持,发展流域生态经济实现中上游地区治贫脱贫。黄河流域由于流经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下垫面土壤易被流水侵蚀造成水土流失,加之对流域耕地的过度开发,植被破坏严重,防沙固土能力下降。因此,对于黄河流域上游要以涵养

水源为重点,提升水源涵养能力,中游要保持水土,建设旱作梯田、淤地坝等多种方式相结合自然恢复,下游要进一步保护黄河三角洲。而且黄河流域水资源极为缺乏,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存在浪费现象,水资源上中下游协调分配问题严峻。另外,由于黄河中上游地区以发展传统农业为主,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贫困问题依然存在,而由此也演化出一些社会稳定问题,因此黄河流域中上游要坚决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将黄河流域生态资源转为经济发展资源,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真正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四、战略协同,实现江河共治

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两大国家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中国流域生态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进入了历史新阶段。长江经济带战略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战略各自立足于两大流域特点,以生态文明为纲,以推动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要,共同创建新时期流域生态文明标杆。

长江经济带战略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战略之间具有融合发展、协同推进的潜在机制,关键在于找到长江经济带战略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之间共同的战略支撑点,构建两大流域沿经城市跨区域协同生态治理体系,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完善和适时启动区域污染联防、联控、联治及应急预案机制。统一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意识,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优化流域生态、弘扬流域文明、振兴流域经济,为长江经济带战略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提供重要保障。

同时,长江经济带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要积极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进行协同融合,通过发挥战略顶层设计作用,发挥国家战略融合效应,共同推动我国环境保护和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黄震,男,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 610059),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872)。

要着力弥补黄河流域发展短板

王喜成

长期以来,由于自然、人为等多种因素,黄河流域的发展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我们既要有顶层设计、总体布局、重大举措,又要有重点、有抓手和分层次推进。当前,要针对突出问题,瞄准薄弱环节,着力在补短板上下功夫。

一、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黄河流域当前很突出的问题是:上游局部地区生态系统退化、水源涵养功能降低,中游水土流失严重,下游生态流量偏低,一些地方河口湿地萎缩,以及流域内工业、城镇生活和农业面源污染及尾矿库污染突出等。要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横下一条心,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通过制度、法治、治理等一系列措施,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和治理好生态环境。

强化环保制度建设。要按照生态环境保护“六项原则”和“五个体系”要求,进一步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形成一整套科学的体制机制。一要严格执行环境准入制度,从源头上杜绝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进一步深化资源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实行差别化电价、水价、地价政策,探索建立水源地保护生态补偿等制度。二要建立绿色生产总值核算应用体系,改进领导干部政绩评价标准,纳入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实施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三要健全统一监管、分工负责的监管体系,建立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和生态红线制度,把环境质量列为约束性指标,将各类经济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四要抓好已制定的湿地保护条例、黄河防汛条例的落实,积极开展黄河立法研究,坚持和完善“检察长+河长”等依法治河机制,持续开展“携手清四

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

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要坚持发展与绿色同行,把自然资本纳入社会总供给函数,探索建立自然资本有效定价的制度,形成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体制机制,实现自然资本的有度有序有效利用。要加快绿色创新,推进绿色科技的研发、推广和应用,促进生态产品与服务的投资、生产、贸易,推广绿色、智慧技术,运用信息化、循环低碳等手段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用生态潜能激发经济动能,使绿色发展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动力。要积极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加大绿色金融政策引导作用,引导资金流向节约资源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

抓住保护治理这一核心。既要注重“治”,大力整治部分流域和支流污染突出问题,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治理,推动河长制湖长制从“有名”到“有实”,全面改善干支流水质。更要注重“建”,在黄土丘陵沟壑区推进山洪沟治理和淤地坝建设,在河流上游和库区上游实施禁封治理,在黄河沿线建设生态廊道和湿地公园群,打造防护安全带、生态保护带、滨水景观带、旅游休闲带,让母亲河越来越健康美丽,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二、扭住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

黄河是我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河,流域省份人口达4.2亿人,占全国的30.3%。然而,当前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相对滞后,也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区域。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针对这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滞后,内生动力不足”的突出问题,狠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向结构要市场、向结构要动力、向结构要效益,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要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是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和重要支柱。黄

河流域各地要着力改变传统产业多新兴产业少、低端产业多高端产业少、资源型产业多高附加值产业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资本科技密集型产业少的状况,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新体系,为产业结构优化、实体经济壮大夯实根基。各省区要结合本地实际,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融合发展,提升原来产业的技术水平和能力,积极培育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的产业,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

要着力提升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是我们固有的优势和基础,各省区要通过绿色改造、智能改造、技术改造,促使传统产业“脱胎换骨”,这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和抓手。要通过这些改造,加快产业内部结构调整,推动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提高精准制造、敏捷制造能力,扩大高附加值的中高端产品比例,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形成新的优势。要强化传统产业的信息化、网络化和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新技术在企业研发、制造、管理、服务等全流程和全产业链的综合集成应用,通过信息化改造做精做强传统产业。

要紧盯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未来的立足点、制胜点,必须高度重视。各省区要通过创新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发展,特别是要通过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跨界融合创新,使创新创业形成燎原之势和新动能,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要把农业作为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保障。黄河流域各省区基本上都是传统农业省份,各省区要高度重视农业产业优化升级工作,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要把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和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一起来,发展节水、绿色农业,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要引导和推动更多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三、协同配合实施一体化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贯彻落实好这一精神,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实施一体化发展。

要协同防洪,保障黄河长治久安。黄河的最突出问题是洪水风险,既有上游形成的新悬河,更有下游的一系列问题,如“地上悬河”长达800公里,滩区长期存在防洪运用和经济发展矛盾,尤其是防洪短板突出,洪水预见期短、威胁大等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第一位的是要坚守黄河安澜这一底线,沿黄各省区要加强密切合作,加强与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密切合作,加强河道工程和标准化堤防建设,推进滩区居民迁建,实施滩区综合提升治理工程,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协同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黄河是典型的季节性河流,水资源总量不到长江的7%,人均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存在着比较突出的上中下游争水问题。因此,黄河水利委员会要科学调度,沿黄各省区要互相协作,按照这次中央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精神,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大力发展节水产业和技术,大力推进农业节水,实施全社会节水行动,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

要加强领导、协调行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经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实施这一战略,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建立组织推进的领导机制、职能部门的协同机制、沿黄各地的联动机制,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化协同推进,汇聚保护治理合力。要创新多种平台开展省际合作,加强与国家有关部门的对接,加强水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防治、联合执法,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作者简介:王喜成,男,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员(郑州 450002)。

(责任编辑:文 锐)

【“十四五”规划研究专题】

关于“十四五”规划的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

张占仓

摘要:“十四五”时期要充分发挥传统包容文化的优势,激励科技人才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制度与机制活力,持续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十四五”时期全国GDP增长速度保持年均6.0%的水平。在高端制造与智能制造领域集聚创新资源,致力于创新、创造、创业,在物联网、AI、航空航天等领域形成新的突破之势,增强中国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铁腕治污,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积极实施重大国家战略,特别是要加大力度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破解全国区域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难题。继续坚持开放发展的基本国策,促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实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关键词:“十四五”规划;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开放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1-0023-09 **收稿日期:**2019-11-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利益补偿机制研究”(18ZDA040)。

作者简介:张占仓,男,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专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郑州 450000)。

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家发展迈入新阶段。展望“十四五”时期,中国面临一系列新机遇、新挑战、新任务,需要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做出重要的调整与创新。

一、关于高质量发展与GDP增长速度问题

关于高质量发展与GDP增长速度问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关注高质量发展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战略目标。这种战略定位是党的十九大以后国民经济发展的主旋律,需要我们竭尽全力为之奋斗。因此,国家“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关键词就是

高质量发展,这要成为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在这种共识的支持下,国民经济运行的中心任务就是围绕高质量发展进行既符合各地实际又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实现历史性跃升,为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奠定基础。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各国科技创新进入活跃期。中国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领域快速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基于这样的科技创新基础,“十四五”时期,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要以更加包容开放的理念认真学习与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做法,调动和集中更多社会资源,加大研发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占GDP的比重要达到2.6%以上。充分发挥国家高学历、高层次人才数量巨大的优势,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高度重视各类创新人才,尤其是青年创新人才的创新主力军作

用,以多种方法鼓励各个领域35岁以下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发挥其创新创业对经济社会进步的代际促进作用和对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新服务的激发引导作用。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领域中形成更多的创新引领效应,在国际科技进步舞台上拥有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与标准制定权,稳步提高国家科技创新水平与科技实力。

当然,创新发展难度仍然非常大,在高端领域创新发展的难度更大。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使得各个领域的科技人员数量大幅增加。2018年,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全国研发人员总量为419万人/年,连续6年居全球第一位,已经到了孕育人才红利的黄金期。现在,无论是专业科研机构,还是大学或企业内部的科研部门,处在活跃创新期的35岁以下的青年创新人才数量充足,支持创新的资金、设备、实验室等均比较充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思路向全社会供给比较充裕的创新资源的条件已经具备,以创新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

2.关注GDP增长速度问题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全球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坚持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致力于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2018年,中国GDP达13.60万亿美元,为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达29.8%,居第一位(见表1)。同时,又要注意脚踏实地,时刻不要忘记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仍然把GDP增长速度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考核指标之一,进行科学理性的安排。系统考虑国民经济运行的整体特征,充分考虑中国在全球进一步提升影响力的需要,综合分析运用多种方法测算后,我们认为,“十四五”期间中国GDP增长速度拟定为年均增长6.0%较为科学可行。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10月期东亚太平洋经济半年报指出,全球需求疲软,导致出口和投资增长下滑,考验着东亚太平洋地区的韧性。预计该地区经济体2020年和2021年增速分别为5.7%和5.6%。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中国也应该有信心把“十四五”时期GDP年均增长速度设置在6.0%,这也是我们对稳定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责任担当。

表1 2018年GDP前十名的国家及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国家	GDP(万亿美元)	GDP占比(%)	GDP增量(万亿美元)	GDP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
美国	20.51	23.9	1.00	20.4
中国	13.60	15.9	1.46	29.8
日本	4.97	5.80	0.11	2.24
德国	4.00	4.66	0.31	6.30
英国	2.83	3.30	0.19	3.88
法国	2.77	3.23	0.18	3.67
印度	2.73	3.18	0.08	1.60
意大利	2.07	2.41	0.12	2.45
巴西	1.87	2.18	-0.18	-3.67
加拿大	1.71	1.99	0.06	1.22
合计	57.05	66.5	3.33	67.89

注:(1)本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相关资料,由作者整理而成。(2)2018年全球GDP总量85.79万亿美元。名义增长6.1%,实际增长3.7%。

3.妥善处理高质量发展与GDP增长速度的关系

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与GDP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并不矛盾,二者是一对相辅相成的要素统一体。从创新驱动的角度来分析,“十三五”期间,国家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社会研发投入不断创出新高。2018年,全国R&D经费支出19657亿元,比上年增长11.8%,占GDP的2.19%,投入总额居全球第二,增长速度居全球第一。中国授权发明

专利数量达到43.2万件,排名第二的美国是31.1万件,排名第三的日本是18.9万件,中国的比较优势明显。中国主要科技创新指标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一大批创新成果先后转化为生产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能,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58.5%。正是因为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才使得2018年全国万元GDP能耗比2017年下降了3.1%,而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107327元/人,比2017年提

高了6.6%,经济发展质量确实在稳步提高。

4.关注中国红利期的转变

人均工作时间的增加导致中国原有的人口红利减退,低端产业开始向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转移。但是,中国受高等教育人口规模快速扩大,在校本科生占全球的1/5,出国留学学生占全球的1/3以上,出国留学人员回国潮已持续5年,青年科技人才数量大幅增加,人才红利期日益显现。

华为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的成就为国内企业的科技创新树立了典范,也将激励更多有远大理想的企业学习与借鉴“华为之路”,在科技创新上迈出更大的步伐。以华为为引领的5G技术的普及以及5G普及拉动的物联网时代,将为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国内外客户与广大民众带来巨大的促进技术更新换代与经济升级发展的效应。与此同时,全球高度关注的AI、大数据、移动支付等重大技术创新领域,中国都具有比较充足的人才与技术积淀,发展状态比较活跃,未来也将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持续不断的新动能,全国各地越来越充满创新活力的高质量发展机理与机制正在孕育与形成,2020年我们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整体创新能力还将进一步提升。所以,对“十四五”时期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动力要有充分的自信。

按照这种分析与研判,“十四五”时期的高质量发展是一种既高度重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切实提高国民经济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的发展,也是一种立足于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情,需要保持适当较快发展速度的发展。这样的发展状态既不同于以前的发展,因为我们把高质量发展纳入了主体思路,也将为以后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探索切实可行的路子,有利于逐步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二、关于高端制造与智能制造问题

关于高端制造与智能制造问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制造业新的历史方位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时提出了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重要论述,形成了“三个转变”的理论架构,这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为中国制造业创新发展提出了新目标。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调研时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是中国发展的本钱,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把中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搞上去,推动中国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扎扎实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为我们指明了制造业发展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发展制造业,把这个实体经济的基础巩固好。实体经济是中国发展的本钱,本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丢的,必须始终不渝地紧紧攥在手中。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搞上去,才有利于构筑未来发展的战略优势,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2.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

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伴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推进,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有大量工业产品产量占全球产量的50%以上。制造业产品是中国出口产品中对全球影响最大的产品,很多国家普通民众的吃、住、行等消费品都与中国的制造业密切相关。正是因为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在很多领域都形成了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制造业体系,才使得国家在应对国际形势变幻时表现出比较淡定的大气和非常有自信的底气。在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高度重视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的基本依托,也是进一步提升国家工业综合实力的标志。只有通过持续的科技创新,扎扎实实地推动制造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并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促进中国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才能够更加有底气,以先进制造业支撑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才能够更加稳固。

3.把实体经济搞上去

实体经济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部门或行业,典型的有机制造、纺织加工、建筑安装、石化冶炼等,

是以物质生产为主的经济,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中国发展的本钱。既然是本钱,就必须有所保障,而且无论如何不能弱化。因为弱化,或者丢掉,就意味着国民经济的弱化。国内外大量事实证明,无论一个大国国民经济水平提高到何种程度,如果弱化实体经济或放弃实体经济,就意味着偏离了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将给国家的发展、特别是给老百姓的就业、提升收入水平造成损失。与实体经济对应的虚拟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也很重要,也需要重视并适度发展。但是,虚拟经济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是为促进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生产要素支撑的,绝不可以把一个大的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完全寄托于虚拟经济,“脱实向虚”是一个大国经济畸形发展的表现,不少国家近些年经济发展困难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在“脱实向虚”的道路上走得太快太远,以至于忘记了经济发展的初心,给本国老百姓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因此,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明确要求,把实体经济搞上去,对未来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影响深远。

4. 高度重视高端制造与智能制造的技术创新与集成

高端制造、智能制造领域的创新发展是“十四五”时期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关键。近些年,随着国家重大装备研发计划的推进,已经在高端制造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在航空航天装备、深海装备、核动力装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等方面逐步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进一步创新的重点是通过自主创新掌握各个领域更多核心技术与发明专利,在医疗装备、检测装备、数字制造装备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共同为未来高端制造业发展提供新技术、新基础零部件、新材料等支持。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是未来制造业发展的制高点和突破口,有实力的国家都在想方设法抢占技术制高点与国际标准的话语权。借鉴国际上促进智能制造发展的经验,一般都采取重大项目联合攻关的组织方式。2015年以来,中国已经组织实施了一批智能制造项目,“十四五”时期需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部署更多的智能制造重大项目,调动社会各个方面的创新资源,共同破解技术创新与管理难题,推动智能制造快速发展,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先进制造业支撑。

三、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问题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问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认清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迫切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一系列创新理论,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十四五”时期中国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基本遵循。面对环境整治的繁重任务,我们要切实认清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迫切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产生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成为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发展全局的高度,以实际行动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急,切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铁腕治污,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过去多年高速发展积累的环境污染问题解决起来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生态环境治理稍有松懈就有可能出现反复。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是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因此,“十四五”时期,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切实让生态环境日益向好。

2.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阐明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科学道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如果处理妥当就可以形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实践证明,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地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从哲

学层面分析,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而是要坚持在经济发展中重视环境保护、在保护环境追求经济发展,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

3.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绿色发展就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近期的重点是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有效循环链接。按照有关规定,要加快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三条红线。对突破红线的行为,坚决依法整治。加快形成绿色生活方式,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通过大众化的宣传与普及,增强全社会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通过公众生活方式绿色革命,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把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梦想转化为广大民众的自觉行动。

4.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从哲学原理上分析,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从系统论的思想出发,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规律性,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个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中、下游,进行整体规划,分类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增强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能力,维护生态系统动态平衡。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大江大河全流域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主动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继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快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地区综合治理,扩大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全面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逐步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5.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针对中国处在污染防治攻坚期的现实,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逐步从当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的铁腕治污走向依法治污,让生态环境保护变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四、关于重大国家战略实施问题

关于重大国家战略实施问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关注重大国家战略体系形成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至此,重大国家战略体系已比较明朗,初步形成了涉及全国重要区域的体系。按照目前已经明确的工作部署,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4个重大国家战略均已完成顶层设计并出台实施方案,“十四五”期间,这些重大国家战略需要持续推进,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刚刚纳入重大国家战略体系,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要求,尽快完成顶层设计与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以便进入实施推进阶段。

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带,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加强黄河治理保护,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积极支持沿黄各省份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好黄河流域人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关心的防洪安全、饮水安全、生态安全等问题,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宁,天下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黄河流域仍存在

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如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发展质量有待提高等。这些问题,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所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配合,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2.做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

黄河流域横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4个大的地貌单元,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9个省(区),流域面积79.5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国土面积的8.3%。截至2018年年底,黄河流域9个省(区)总人口为4.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0.3%;GDP达23.9万亿元,占全国GDP的26.5%。在中国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全局性和战略性地位。

黄河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要充分考虑上、中、下游的差异。其中,河口镇以上为黄河上游,河道长3472千米,流域面积42.8万平方千米,要以三江源、祁连山、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等为重点,实施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工程,提升水源涵养能力,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河口镇至桃花峪为中游,河道长1206千米,流域面积34.4万平方千米,是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形成泥沙特征最为明显的河段,需要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并用,突出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桃花峪以下为下游,河道长786千米,流域面积只有2.3万平方千米,是全球著名的地上河,部分河段还有二级悬河,每年汛期河道防洪是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下游虽然没有发生重大洪涝灾害,但是,无论是大堤内部仍然居住的居民,还是沿线防洪形势,都依然存在比较大的灾害威胁,进一步加强治理的任务仍然繁重。入海口的黄河三角洲需要做好湿地保护工作,提高生物多样性。

沿黄各省份要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三江源、祁连山等生态功能重要的地区,主要是保护生态,涵养水源,创造更多新的生态产品。河套灌区、汾渭平原等粮食主产区要发展现代农业,努力提升农产品质量,巩固粮食生产基地的地位。兰州、银川、西安、郑州、济南等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要做好集约发展规划,提高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进一步提升经济发

展水平,努力推动区域均衡发展。沿黄各省份的贫困地区要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沿黄各省份要充分利用紧邻“陆上丝绸之路”的区位优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土壤,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条件的区域要打造内陆开放高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惠民生。同时,要从战略高度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整理与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集国内外思想智慧建立黄河学研究架构,以更加科学的方法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3.保障黄河安澜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这是其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梳理黄河治理的基本经验,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通过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完善水沙调控机制,解决分头管理问题,实施河道和滩区综合提升治理工程,减缓黄河下游泥沙淤积,持续加固沿黄下游堤坝工程,确保黄河下游沿岸安全。针对沿黄地区水资源缺乏的实际情况,积极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沿黄地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大力发展节水产业和技术,通过政策引导推进农业节水,实施全社会节水行动,让黄河成为造福沿岸人民的幸福河。

五、关于开放发展问题

关于开放发展问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继续坚持开放发展的理念不动摇

实践证明,开放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支撑之一,是国家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谋划发展所要面对的时代潮流。面对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浪潮,特别是已经开始普及的5G通信技术及其带来的互联网

升级、物联网普及、AI快速发展之势,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深度展开,世界各国之间经济文化日益融合,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动,各个国家之间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2019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更加开放的逻辑思维,以法治化的方法,强力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开放发展的理念不动摇,以更加包容的胸襟,在开放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再创高质量开放发展的辉煌!

2. 加大共建“一带一路”的力度

自从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牢牢把握互联互通这个关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得到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首届高峰论坛提出的合作成果顺利落实,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一带一路”倡议同联合国、东盟、非盟、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发展和合作规划对接,同沿线各国的发展战略或战略规划框架契合,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做出了新贡献,成为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有效载体。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一带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将使参与国贸易增长2.8%—9.7%、全球贸易增长1.7%—6.2%、全球收入增加0.7%—2.9%。“一带一路”倡议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事实证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4月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重要讲话精神的要求,面向未来,我们要聚焦重点,深耕细作,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

方向不断前进。

3.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上探索新路子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以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开放创新等为主要内容,为全国其他地区创造可复制推广的经验与做法。2013年9月至2019年8月,中国已分多批次批准了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1个自由贸易港,初步形成了“1+3+7+1+6”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格局,呈现出区域协调、陆海统筹的开放态势,推动形成了中国新一轮全面开放发展的战略态势。2019年1—6月,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1%,进一步说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科学性和促进全国开放发展的可行性。“十四五”期间,中国需要发挥各地优势,持续探索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推动开放发展的新路子、新方法,为推动高质量开放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新支撑。

4. 从长计议,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发表题为《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世界既充满机遇,也存在挑战。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这种判断,说明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与重塑不可避免。

按照理论分析,当一个新崛起大国GDP达到守成大国60%时,两者之间的竞争博弈就不可避免。2016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GDP的比例超过60%的敏感点,所以中美博弈就全面爆发。中国和平崛起与美国竭力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持续博弈将会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过程,我们需要做好长期进行复杂较量的各种准备。在实际运作中,既不能与之过度博弈,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也不能在原则问题上随意让步,要有充分的耐心与韧性理性应对。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我们只有从长计议,一心一意谋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能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稳定前行,不断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新高度。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延续了下滑趋势,规模较2017年下降了13.0%,但中国实现了逆势增长,继续稳居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实际利用外资1350亿美元,增长3.0%。2019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7.2%,展现出对外资的强大吸引力,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继续坚持开放发展的信心。“十四五”时期,中国与美国等国家之间的发展博弈压力仍然会比较大。但是,只要冷静应对、智慧应对、积极应对,我们完全有信心在博弈中更加坚定地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崛起的发展之路。

六、初步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1.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关键词

“十四五”时期,中国需要围绕高质量发展,部署国家战略资源,充分利用人才红利黄金期的机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让R&D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2.6%以上,进一步激发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集中力量破解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技术难点,在物联网、AI、航空航天等领域形成一批对未来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高科技成果,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的新动能,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时,妥善处理高质量发展与保持GDP较快增长速度的关系,牢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坚守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时刻不忘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专心致志谋划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议“十四五”时期全国GDP年均增长速度拟定为6.0%,继续保持国民经济比较活跃的发展状态,进一步彰显大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韧性。

2. 高度重视高端制造与智能制造

充分利用中国工业体系完整、综合实力持续增长的优势,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人才数量巨大、创新资源越来越丰富的人才红利,从一线技术创新做起,围绕数字化与智能化主题思路,全面加强自主创新,凝聚一代人的创新智慧,集中力量攻克高端制造与智能制造的一系列技术难题,形成一批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创新产品,稳步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逐步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全面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继续坚持铁腕治污

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十四五”时期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污染防治,全面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从一点一滴做起,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进与提升上下硬功夫,在绿色技术研发上集聚创新资源,形成更多的突破性技术,并推广应用,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取得重大进展,以更好的生态环境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全球生态保护贡献中国的智慧与力量。

4. 有序推动重大国家战略实施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十四五”时期要以更大的力量推动重大国家战略实施。特别是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要科学规划,有序启动。针对黄河流域的特殊情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5. 坚定不移在高水平开放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开放发展的理念不动摇,并且坚持主动开放、有序开放、持续扩大开放,以更加包容的胸怀支持全球多元化发展、包容性增长。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法制化的力量为扩大开放保驾护航。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按照《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所提出的要求,为所有合法投资者提供宽松和谐的营商环境。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自由贸易港建设等一系列高水平开放举措实施,以开放赢得更多发展空间,以开放获得更多发展机遇,以开放促进中国与全球的深度融合,以开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力量。

参考文献

- [1]张占仓.中国经济将在克服困难中稳定前行[N].中国经济时报,2019-03-01.
- [2]郭克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趋势与“十四五”时期政

- 策思路[J].中国工业经济,2019(7).
- [3]郭占恒.“十四五”规划的里程碑意义和重大趋势[J].浙江经济,2019(9).
- [4]迟福林.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J].行政管理改革,2017(12).
- [5]武卫政,赵永新,余建斌,等.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把握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述评之二[N].人民日报,2019-02-18.
- [6]张伟.中美贸易战的演变历程、经济影响及政策博弈[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5).
- [7]范恒山.把握战略机遇 推动高质量发展[J].区域经济评论,2018(3).
- [8]钱津.新中国经济建设70年的道路与成就[J].区域经济评论,2019(5).
- [9]陈伟雄,杨婷.中国区域经济发展70年演进的历程及其走向[J].区域经济评论,2019(5).
- [10]周武英.世行:今年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速或放缓至5.8%[N].经济参考报,2019-10-12.
- [11]余森杰.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对外贸易奇迹:成就与路径[J].国际贸易,2018(12).
- [12]金碚.以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焕发区域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机理[J].区域经济评论,2019(1).
- [13]张占仓.以包容文化滋润开放发展[N].中州学刊,2018(9).
- [14]张占仓.绿色生活从我做起[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12-04.
- [15]牛建强,姬明明.源远流长:黄河文化概说[N].黄河报,2017-07-11.
- [16]张金良,刘生云,暴入超,等.黄河下游滩区生态治理模式与效果评价——“黄河下游滩区生态再造与治理研究”之五[J].人民黄河,2018(11).

Study on Some Important Issues in China's the 14th Five-Year Plan

Zhang Zhancang

Abstrac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inclusive culture, encourag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to make innovations and start businesses, energize 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s through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continue to implement the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national GDP growth rate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should be maintained at an average annual rate of 6.0%. Gather innovation resources in high-end manufacturing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ommit to innovation, cre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make new breakthroughs in internet of things, AI, aerospace and other fields, and enhance China's cor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world. We will put into practice the concept that clear waters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the golden mountains of wealth, adhere to an iron hand in pollution control, and promot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We will actively implement major national strategies, in particular, step up efforts to promot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address the problem of uneven and inadequate regional development across the country. We will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basic state policy of open development, promote open development at a higher level, increase the overall strength of the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and meet the people's demand for a better life.

Key Words: The 14th Five-Year Pla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cological Protection; Open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张 子)

【“十四五”规划研究专题】

“十四五”时期区域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罗 仲 伟 孟 艳 华

摘 要:全面、系统地阐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时空规定性,对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通过对新时代背景下区域产业特征与发展态势的揭示和论证,发现传统区域产业发展理念和实践受到严峻挑战。“十四五”时期,应当在充分认识地区现实比较优势和地区潜在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历史形成的区域产业结构和存量资源现状以及调整要求,着眼于跨区域产业协同和产业融合来布局、实施区域高级化的产业基础和现代化的产业链,甚至再造区域产业基础和产业链。由此,应积极构建“十四五”时期区域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基本思路,并针对地市一级政府,围绕区域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基础;产业链;区域产业治理;“十四五”区域产业规划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1-0032-07 **收稿日期:**2019-10-11

作者简介:罗仲伟,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

财经政法大学和北京源大智库兼职教授(北京 100836)。

孟艳华,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北京 100836)。

2019年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提出“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重要方针。2019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企业时,再次强调“中国必须搞实体经济,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自力更生是我们奋斗的基点”,为各地市区域产业治理,以及“十四五”时期和未来更长一段时期的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指出了努力方向、提出了工作遵循。对此,要在深刻理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同时,通过紧密结合本区域的产业发展实情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立足实体经济打好产业攻坚战,大幅提升区域的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加快构建以新兴产业为核心、跨区域产业创新为导向的开放式区域先进制造业生态系统,释放经济发展潜力,激活经济发展动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内涵

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时空规定性,是贯彻落实中央重要方针、实现产业发展目标的前提。

产业基础是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支撑,既包括提供基本生产资料的产业部门,也包括提供产业底层结构的产业要素。就工业而言,传统工业底层结构要素包括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技术和基础动力,即工业“五基”^①;现代意义上的底层结构要素还包括基础软件。中央强调的产业基础能力,是指上述基本支撑对产业形成和发展的保障程度和推动力度。产业基础能力无论对产业发展质量、发展潜力和可持续性,还是对产业链、价值链的控制都具有决定性影响。产业基础高级化

应当是产业基础能力高度化、产业基础结构合理化和产业基础质量巩固化的统一。其中,能力高度化意味着建立和实现全流程、全要素、高技术、高效益、高保障产业体系的过程;结构合理化意味着产业内和产业间以及底层结构要素间呈现关系协调、比例恰当、技术集约、组织顺畅和运转安全的动态优化、适配过程;质量巩固化意味着生产活动中要素效率和组织效率以及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附加值稳定提高的过程。产业基础高级化是中央的新提法,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背景下,对产业基础能力、产业基础结构和产业基础质量发展方向的判断。

产业链是指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联系和时空布局关系而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形态,通常可以从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等4个维度予以考察。产业链涵盖产品生产或服务提供的全过程,包括动力提供、原材料生产、技术研发、中间品制造、终端产品制造乃至流通和消费等环节,是产业组织、生产过程和价值实现的统一。产业链现代化是产业现代化内涵的延伸、细化,其实质是用当代科学技术和先进产业组织方式武装、改造产业链,使产业链具备高端链接能力、自主可控能力和领先于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水平。从产业链维度看,产业链现代化体现在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增值、企业链上下游分工的有序协同、供需链连接性的效率与安全均衡、空间链区域布局的集聚与扩散协调。从产业链运转形式看,产业链现代化体现在产业链韧性、产业链协同和产业链网络化3个方面。产业链韧性指通过企业链中纵向、横向各类企业的转型升级,不断提高整个产业链的技术经济水平,或重构产业链,使其得以在高端方向适应更宽的市场范围、应对更复杂的市场不确定性。产业链协同指通过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的优化配置和提升,使产业链在纵向上下游各环节和横向多种功能互补间实现效率提升和成本优化。产业链网络化指产业关联形态从线性链条式向立体网络式转变的高级化过程,即产业链向产业网转化。产业网内同类和不同产业组织之间形成交错、多维、泛连的立体网络结构,将不同主体组织所拥有的互补资源、知识和能力整合起来,一方面,通过协同效应和融合效应大大提高产业组织绩效,将外部交易成本内部化和最小化,从而降低产品和

服务的单位成本;另一方面,无论是产业网内的节点组织还是产业网本身,都具备了相当程度的柔性和适应性。

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都是动态的、与时俱进的概念。当前中央提出的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既是与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格局相呼应的产业持续升级和进化过程,也是与新时代中国产业体系迈上新台阶、跨入新阶段要求相适应的产业不断完善和优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并非是一场速决战,而是积时累日的持久战。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要求高度一致,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转换和质量提高的目标和要求高度一致。总之,“十四五”时期,面对全球产业新的竞争格局,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优化提升至至关重要。“十四五”时期及未来更长的一段时期,中国都要将持续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作为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指导方针,这对中国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中建立坚实而稳定的发展基础,全面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根本性转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因此,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既是中国当前积极应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国际经贸摩擦以及经济下行压力,摆脱经济高质量发展困境的正确方针和现实需要,也是长期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持续增强经济内生发展动力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二、“十四五”时期的区域产业特征与发展态势

对于以地级市为核心的区域经济而言,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除受到本区域地理空间的制约外,还与历史形成的区域内原有产业基础及区域内外产业关联密切相关。由一系列重大技术创新构成的通用目的技术集群推动的新工业革命,改变着工业经济条件下的产业分工格局和市场需求态势,传统涵义上的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被打破,产业演进、升级的内容和路径被打破,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限被打破,地域的物理空间重要性正逐步消失。“十四五”时期,伴随时间紧缩和空间跨越,以及人们在时空中的关系“重置”现象,区域产

业特征与发展态势必然发生具有整体突破性意义的重大变化,进而深刻影响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内容和表现形式,影响区域经济的时空结构和运转方式。

1.“十四五”时期区域产业的五大特征与趋势

第一,产业区域集聚效应增强。主要表现为围绕新技术快速渗透、扩散和转换的产业要素,尤其是创新创业要素进一步以多样化、集成化、互促化的方式集聚,持续推动具有强烈指向性的产业活动向特定的空间区域集中,进而产生显著的区域产业促进效果,甚至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产业协同和产业融合的都市极化作用增强。例如,美国继20世纪70年代形成举世瞩目的硅谷IT产业创新要素集聚及产业极化效应之后,近年来又先后出现硅巷、硅滩、硅山等特定产业要素及产业发展都市极化现象,值得高度关注。

第二,产业区域开放效应增强。主要表现为技术手段丰富化、技术运用快捷化、技术成果溢出化、技术效益辐射化推动下的跨区域产业活动日益频繁和跨区域产业联系日趋紧密,产业资源、要素和创新成果跨区域流动加速、跨区域共享加强、跨区域整合加深,促使区域产业开放式创新不断深化,区域产业配套半径大幅度扩展,产业链、产业网跨区域延伸。在更大的地理时空中展开产业布局变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联系深化等产业活动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也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产业界、学术界的研究都更加热衷于聚焦大湾区、大流域、城市群、都市圈的重要原因。

第三,跨区域产业融合和产业协同活动频繁。数字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跨越传统产业边界的融合与协同。数字智能正在颠覆人们对产业的认知,打破传统的产业分工,改变产业运行和演化的条件。产业间的渗透融合、整合融合和产业内的重组融合、交叉融合在打破传统产业的知识边界、技术边界、业务边界、市场边界、运作边界的同时,也在打破传统的区域边界。跨区域产业融合已经成为当今产业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如服务型制造的大量实践已经凸显出突破传统地理区域视野的特性。未来,着眼于更大地理时空的产业区域开放,无疑对跨区域产业协同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数字智能技术也为在更高、更宽层面实现跨区域产业协同提供了丰富、高效的手段。可以预

见,“十四五”时期及未来更长的时期,跨区域产业融合和产业协同必将成为区域产业发展的主题。

第四,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在发生变化。不断强化、深化的跨区域产业融合和产业协同,驱动产业在更为开放、广阔的区域时空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层面重组、适配,以获得、放大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经济、共享经济和赋能经济。产业动态性增强,一方面推动产业空间活动日趋活跃、多样,使得区域性产业迁移和产业嵌入现象并存,区域产业升级、转换和更替的周期缩短,区域产业结构呈相对不稳定态势;另一方面也促使产业结构的区域表现形式和升级、转换路径发生深刻变化。

第五,区域产业基础设施的内容和提供方式发生变化。作为产业基础的基础,区域产业基础设施内容不断扩展。在如动力、通信、交通、物流、环保等传统工业经济基础设施之上,叠加新生的数字智能经济基础设施,如云计算平台、大数据共享中心、高速泛在信息网络、量子通信平台、区块链服务网等。在产业基础设施提供方式方面,一是供给的技术性变革,如分布式能源和动力、5G通信、智能立体交通、网络互联互通等;二是供给的组织性改变,如不同性质的供给主体以及供给组织、制度的创新,跨区域产业基础设施的分工合作、管理协同等;三是供给的空间形态变化,强调跨区域的产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互补。

2.“十四五”时期区域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首先,“十四五”时期区域产业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区域产业治理本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在中国特定发展阶段提出的新问题,至今并没有能够破题。在上述区域产业特征与发展态势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的背景下,需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高度上全面认识、概括区域产业治理,不断增强区域产业治理意识,明确区域产业治理的核心关键和主要目标,探索区域产业治理的重点任务和基本路径。其次,“十四五”时期,在区域产业特征与发展态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传统区域产业发展理念和实践必然受到严峻挑战。例如,建立在传统产业分工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的区域现代产业体系概念将受到质疑。所谓的区域产业一体化似乎正在成为不合时宜的概念和实践。此时,就需要拓

展区域经济和区域产业的观察视野和思考层级,从更加开放、广阔的地理空间范围去重新考虑区域产业问题。例如,就区域产业基础和区域产业链而言,在工业领域,区域产业基础高级化就不能理解为要在本区域内致力于形成独立、完整的“六基”工业底层结构要素体系,具有完备的区域支柱产业、主导产业支撑保障能力。区域产业链现代化也不能理解为追求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的区域性完整连接、整体协同和高效安全。产业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更不能理解为是要形成自我配套、自成体系的区域产业基础和产业链。反之,应当在充分认识地区现实比较优势和地区潜在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历史形成的区域产业结构和存量资源现状以及调整要求,着眼于跨区域产业协同和产业融合来布局、实施区域高级化的产业基础和现代化的产业链,甚至再造区域产业基础和产业链。具体来说,一方面,明确在更为开放、广阔的地理空间范围内,本区域能够提供何种生产资料产业部门和产业底层结构要素,能够在哪些产业链环节为“四链”完整、高效和安全做出贡献,并按照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要求,通过持续的资源投入不断提升这些产业领域的水平,强化这些产业领域的能力,形成、巩固本区域在更为开放、广阔的地理空间范围参与产业活动的集聚极化优势和新比较优势。另一方面,结合本区域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和调整要求,主动借助和积极参与跨区域产业协同和产业融合,以获取本区域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基础要素支撑,同时深化、强化区域间“四链”的互连、互促和互动关系,形成通过区域内外产业协同、融合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区域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的良性发展机制。

三、“十四五”时期区域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基本思路

“十四五”时期区域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基本思路,就是要牢牢把握新时期区域产业特征与发展态势变动所提供的重大机遇,紧紧扣住区域产业结构和存量资源现状以及调整要求,在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指导下,积极主动融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甚至如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这样更大地理空间范围的产业布局中。

在此期间,既要继续发挥、放大本区域产业现实比较优势,挖掘、释放本区域产业潜在竞争优势,在更为开放、广阔的地理区域空间中,使本区域产业成为产业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产业网中广泛连接的枢纽节点;又要不断深化、强化跨区域产业联系,结合本区域原有传统支柱产业升级和调整的要求,以及培育新主导产业的发展实际,充分利用更大地理空间范围内的产业基础资源,构建更为紧密的区域间产业链乃至产业网互连、互动关系,形成跨区域产业新分工条件下的区域产业新格局。

为此,对地市一级政府而言,“十四五”期间,在继续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贯彻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针的指导下,需要在新高度重新思考区域产业发展的战略和策略,按照对区域经济和区域产业发展的新认识,及时调整区域经济中的产业定位,立足动态精准、多样多元、融合共享、能力提升和长期培育的发展思路,着力于实现跨区域产业分工新格局下的区域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进而形成产业创新导向、能力自强化指引的开放式区域产业生态系统。在以上基本思路指导下,结合前面关于产业基础和产业链以及区域产业特征与发展态势的分析,仅就地市一级区域在“十四五”时期如何围绕制造业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出若干初步思考。

1. 坚定信念,坚定不移地发展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伟大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中国经济建立在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基础上,制造业充满活力、竞争力,中国经济欣欣向荣、兴旺发达。制造业是中国的立国之基、兴国之本,过去和今天如此,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仍然如此。因此,各主要地市要在新观察视野和思考层级下积极探索“十四五”时期区域产业演变和发展规律,始终聚焦于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驱动的制造业发展,建立和强化高度融入“中国制造”和“大区域制造”的本地高级化产业基础和现代化产业链,使脱胎换骨的本地先进制造业成为“中国制造”和“大区域制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产业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若干关键环节、枢纽节点,为实现制造强国和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做出不可或缺的本地贡献。与此同时,应积极探索制造业与其他产业融合的方

法和路径,率先走出构建产业创新化导向、能力自强化指引、分工融合化驱动的开放式区域制造业生态系统新路。

2.坚定立场,坚持不懈地加大区域产业对外开放的力度

不断扩大区域产业的对外开放是满足地市级区域经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以传统的眼光审视区域物理空间,无论是有利的地理区位,还是相对不利的地理区位,都并不意味着本区域就只能关起门来搞自成体系、自主可控的区域经济和“区域一体化”的制造业。现实实践中,已经有相当多的地市深陷完善产业体系的重重困境,区域产业一体化思路指导下的“谋大招强”已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对此,“十四五”时期,各地市应当充分因应新时代空间跨越和时间紧缩的社会发展趋势,在更大范围的地理空间上以更为开阔的发展思路,全面厘清本地的区域内外产业关系,重新定位本区域的产业地位,把握好重构区域内外产业关系的时机,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加大对外开放步伐,通过强化跨区域产业协同和产业融合,形成区域内外目标制造业相互连接、相互联动、相互促进的新型区域产业发展格局和运转机制,进而推动区域产业基础再造,加快产业链现代化步伐,在更大范围引领、吸引区域外各类强大产业资源和产业项目进入。

3.坚定信心,积极探索转换区域产业发展形式的新路径

将产业顶层设计的视点、思路从完善区域产业体系,追求区域产业一体化转移到跨区域产业协同和产业融合上。按照上述基本思路,分析把握本区域所具备的现实产业基础和产业链状况,依托区域工业基础、传统制造能力和知识存量,以及产业集群发展成果,挖掘与区域外部通过产业协同和产业融合获取产业资源的潜力,规划和选择区域新兴产业培育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例如,在工业方面,改革开放40多年来,温州形成了以块状经济集群发展为基本特征的11大优势特色制造业。近年来,温州在改造提升这些传统产业的同时,致力于培育发展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旨在通过培育新动能,加快实体经济振兴,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推动温州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轨道。但是从温州重点培育发展的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具体内容来看,与现有优势特色制造业有相当程度的

重合,或者说,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过在指示、引导着这些传统优势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方向,也表明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有相当部分内容要依托于传统优势制造业。这就需要在“十四五”时期,在战略层面和全局层面全面梳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优势制造业的关系,以及现有产业能力和资源存量与引入产业能力和资源增量的关系,重新认识相关产业转换、升级、引入或替代的不同要求,依照新的跨区域产业分工思路进行温州区域产业顶层设计,以跨区域产业协同和产业融合为前提条件,分门别类规划不同产业的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方式、路径和重点。例如,可以复杂产品系统制造业、连续流程技术制造业、高度模块化产品制造业、前沿技术推动型制造业和品牌主导型制造业等类型分析产业基础和产业链特征,思考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不同路径。

4.坚定导向,持之以恒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中国大多数区域产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现有优势特色产业都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内生涌现、成长起来的。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市经济发展的珍贵遗产和基本经验。“十四五”时期,政府要继续将完善、优化市场环境放在优先地位,将打破区域间市场壁垒和垄断,形成市场化产业资源集聚和开放格局,以及培育跨区域产业分工中关键环节、重点领域的市场解决机制作为重点工作。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市场选择下的区域产业活动日益频繁、多样,跨区域产业转换、替代周期缩短,新产业、新产业形态和新产业组织方式不断涌现,对此,要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产业创新行为,为市场化的产业演变和发展创造条件。此外,在重大技术供给领域要打破现实瓶颈,弥补薄弱环节,处理好市场引导和政府主导的关系。技术创新活动和科技成果转化活动要持之以恒地依靠市场机制,而对那些风险高、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需长期技术攻关,且在现行条件下难以突破,或者突破成本过高且市场主体无力承担的重大关键技术,由政府集中资源通过借助企业或其他市场主体实现重点突破和应用牵引,然后再经由市场机制进一步发挥其对相关产业活动的关联效应和带动作用。

5.坚定引领,锲而不舍地实施抓“小”战略

技术变革、新工业革命是引致经济和社会结构

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小微企业作为市场群体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公众制造和社会化创新显示出强大的市场适应性和独特的生命力。自主性、独立性、灵活性不断增强的中小微企业群体,正逐渐成长为促进区域新兴产业发展、推动区域产业组织创新的主要力量。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正是在千千万万中小企业如大浪淘沙般的创业创新实践中积累、沉淀和体现的。“十四五”时期,在推动开放式区域制造业生态系统形成过程中,要不断巩固和放大中小企业的创业创新优势,紧密结合区域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现代化规划,既要继续强化现有中小企业自我转型的历史命题,又要不断优化创新创业的市场环境,使更多新型中小企业得以涌现。各地市应当积极培育多元多样、敏锐活跃、不断升级的时代型中小企业群体,打造一批功能全面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样板。此外,还要重视培育宽视野、高技能的技术工人队伍,形成生生不息、生机勃勃的各类产业人才成长机制和企业事业传承机制。

四、“十四五”时期区域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对于地市一级政府而言,“十四五”时期,实现区域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可以从以下6个方面发力。

1.选好主题,抓主要关系

全面分析把握三大可能性,一是本区域成为跨区域产业协同和产业融合动力源或枢纽极的可能性;二是本区域产业基础通过资源整合和共享实现跨区域产业基础互补与增强的可能性;三是本区域产业通过强化产业韧性和产业协同成为跨区域四链关键环节或关键网络节点的可能性。此外,要高度关注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融合发展的关系,依托区域内外资源,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新兴数字化产业培育有机结合起来。

2.选好主业,抓主要产业

坚持聚焦有限产业领域进行区域产业顶层设计,围绕更大层面和更高层级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要求,规划和选择新兴产业培育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持续提高区域间和区域内产业基础能力、基础结构和基础质量与主要产业的匹配性,持续增强主要产业与区域外相关产业的连接性、互动性、互促性。

3.选好主体,抓主要载体

坚持以应用研究与成果转化为主攻方向,构建、做强面向跨区域产业的产业基础平台和网络,通过创新产业联盟等制度性合作方式形成各类资源集聚共享、创新研发协同与成果转化扩散载体,瞄准高端化目标,突出“高精尖缺”导向,突破一批“卡脖子”短板技术,加速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坚持协同创新,积极推动区域内区域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建立共性技术平台,促进创新链、资金链和政策链深度适配,打造“政产学研资”紧密合作的产业创新生态。

4.选好主角,抓主要企业

一是坚持示范带动、创新引领的方针,鼓励本区域企业融入更为广阔的地理区域,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跨区域生产经营活动,鼓励跨区域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通过资源整合、运营协同和利益共享形成空间跨区域、横向跨产业、纵向跨链端的利益共同体组织。二是坚持扶持中小企业,在推动形成区域产业生态系统过程中,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上,精准培育一批以“专精特新”为突出优势的“隐形冠军”型中小企业,并使之成长为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的表现典范。三是坚持广泛延揽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把握人才团队与区域产业调整方向的契合性,选准人才团队与平台、网络匹配的方向和路径,完善基于能力水平的综合性复合人才职业化等级台阶设计,为高技能人才指明成长路径。

5.选好主事,抓主要工作

围绕上述主题、主业、主角和主体,一方面要发挥政府的制度化优势,在区域产业顶层设计指导下,采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分类分阶段,最大限度地调动区域产业资源,并突破一批重点项目,以快速弥补区域产业关键短板,增强区域产业自主能力和跨区域服务能力。另一方面要强化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优势,通过精准、配套、功能普惠的区域产业政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优良环境,使市场机制能够更为有效地激发区域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6.选好主策,抓主要措施

重点强调区域产业政策措施的针对性、一致性和长期性。针对性,即要切实充分把握区域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及产生机理,政策指向精准有效,定

向实施推动,同时把政策落实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重视政策绩效,增加政策的透明度,落实政策的后评估。一致性,一是指动态一致性,即一项政策措施不仅在制定的初期是有效的,而且在制定以后的实施过程中也是有效的;二是指空间一致性,即针对解决同一问题的多类多项政策具有指向同一性、效能协调性,不致相互矛盾,甚至效能相抵。长期性,即相关的产业政策效果很难在当期显现,需要多期甚至长期的稳定性坚持。围绕区域产业发展,各级政府及各部门已经出台不少相关政策措施,要对这些现行产业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分门别类地采用合适的方法进行全面政策评估,以检视、评价政策实施效果,进而深入总结区域产业的发展经验与教训。例如,首先,可将现行产业政策分为“先行先试”政策、“一刀切”政策和“一次性推开”政策三类分别予以评估。然后,按照区域产业顶层设计调整、修正和完善原有政策,制定新的政策。关于区域产业政策,至少还需要注意以下3个要点:一是政策的体系化,保持政策的普适性、一致性和长

期性;二是政策的协同保障,包括与产业导向相关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等,这方面需要各部门统筹协调,保证政策配套、实施有效;三是做好政策引导,注重产业政策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持续引导更多区域内外资源向重点产业方向聚集,而不再是简单化的补贴、奖励,一次性的激励、扶持。

注释

①《中国制造2025》中的提法是工业“四基”,不包括基础动力。笔者认为,动力同样是工业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在当代世界能源革命的大背景下,动力的重要性在基础意义上甚至要大于其他“四基”。

参考文献

- [1]李晓华,周维富,邓洲,等.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策略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2]吕铁.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趋向与路径[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18).

Regional Industrial Base Advanced and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 Daring the 14th Five-Year Period

Luo Zhongwei Meng Yanhua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expound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time-space stipulation of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founda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industrial foundation capability and the level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Through the reveal and demonstration of regional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ituation under the new era, we found that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regional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faced severe challenges. Daring the 14th Five-Year Period, on the basis of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region actu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potenti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closely combin the resources of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tock status and adjustment requirements, we should lay out and implement the high-grade industrial base and modernized industrial chain by focusing on the cross-regional industrial synergy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or even recreate the regional industry base and industrial chain. Therefore, we should actively construct the basic idea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foundation upgrading and industrial chain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regional industrial foundation upgrading and industrial chain modernization aiming at prefecture-level governments.

Key Words: Industrial Foundation; Industrial Chain; Regional Industrial Governance; Regional Industrial Plan of the 14th Five-Year

(责任编辑:齐 双)

演化经济地理学与区域发展*

贺灿飞 李伟

摘要:区域发展可以看作一个新产业不断出现而旧产业不断消亡的过程。研究经济地理学经典区域发展理论可以发现,经典区域发展理论没有从过程维度揭示区域产业变迁。演化经济地理学则综合广义达尔文主义、路径依赖和复杂系统理论,建立新研究框架,探讨了区域产业演化路径和区域新发展路径的形成。演化经济地理学的主流叙述强调了区域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性,后来不断细化了区域产业演化路径,并指出不同类型地区具有不同区域产业演化路径。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重点关注区域新发展路径的形成,指出区域新发展路径的形成是涉及一个内生与外生力量、多元主体参与、知识与非知识互动和制度变革的多主体,多要素和跨尺度过程。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深入企业组织层面理解后发国家与落后地区的路径升级以及未来预期对区域产业演化路径的影响。

关键词:演化经济地理学;区域发展;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依赖;路径创造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1-0039-16 **收稿日期:**2019-11-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球—地方互动与区域产业重构”(4173127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经济地理”(41425001)。

作者简介:贺灿飞,男,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李伟,男,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联合培养博士后(北京 100038)。

一、引言

区域发展一直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们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基于不同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与理论基础,探讨了区域经济收敛与发散、区域不平衡发展、区域产业集聚与竞争力和全球化背景下区域企业价值链升级等问题(Martin and Sunley, 1996; Dawkins, 2003)。近十多年来,经济地理学引入了演化转向,形成了演化经济地理学(Boschma and Frenken, 2006),基于过程思维提出了一系列新研究主题,如区域产业演化路径、区域新发展路径的形成机制、区域协同演化和区域韧性等

(Boschma and Frenken, 2018)。

在理论层面,区域经济收敛与发散和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主要揭示长期区域经济关系,但并没有深入到产业层面去理解区域发展和区域经济关系。区域产业集聚与区域产业集群理论从产业层面揭示区域竞争力提升。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则从企业层面理解全球领导型企业与后发国家企业在价值链上的关系。在这些理论中,区域发展大体是指区域现有产业增长与区域现有企业在价值位置上的提升。但是区域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新产业不断出现,而旧产业不断消亡的过程。以上理论没有从过程视角来讨论区域产业演化路径,没有深入挖掘过去产业活动如何影响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演化经济地理学对这些理论问题展开

了讨论,并关注不同地区之间的协同演化。

演化经济地理学主要基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区域产业发展实践。中国区域发展既有一定的普遍性,又存在一定的特殊性。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区域产业实践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许多共通之外,又存在诸多差异。因此,我们既要吸收和借鉴演化经济地理学的主流理论,又要在坚持演化经济地理学基本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区域产业实践,剖析演化经济地理学存在的理论漏洞、忽视与不足,推动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发展。

二、区域发展理论及其局限性

主流经济学主要关注区域经济收敛与发散。理论上,主流经济学内部不同学派往往基于不同假设,得出不同结论,有时甚至相互矛盾(Dawkins, 2003)。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构建一种市场会自发纠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世界观,即要素自由流动会导致区域经济收敛。国际贸易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都推断出区域人均收入水平将在长期内趋于一致,尽管其实现机制并不完全一致。国际贸易理论多运用比较静态的方法,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推导出自由贸易将导致两国相对工资水平与相对利率趋于一致。若要素可自由流动,则地区间的真实工资与真实利率也将一致。新古典增长理论则运用动态模型方法,指出不同封闭经济体尽管初始条件有差异,但由于资本报酬递减,会导致地区间增长率的条件收敛,并最终在长期内导致收入水平的绝对收敛。总体而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多从供给侧要素出发,推导出区域经济收敛。

另外一些理论则展现区域经济发散的景观。如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指出循环累积因果和规模报酬递增将导致区域经济发散。具体而言,发达地区较大的总需求会导致更多的总生产,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资本不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经济一轮又一轮的循环累积因果,发达地区总需求和总供给都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最终,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趋于发散。这时市场不会自发缩小区域差距,政府干预才能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此外,区域内生增长理论,强调规模效应、集聚经济、干中学、知识溢出效

应、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等,区域经济发展将呈现“马太效应”,区域经济不但不收敛,反而差异不断扩大。

在经济地理学中,20世纪60年代末期,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兴起,提出了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旨在阐述资本主义条件下区域经济体系的增长与衰退。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认为,区域经济体系的收敛与分散是伪问题,因为从长时段来看,资本出于不断增值目的会在地区之间不断来回流动,就像坐在跷跷板上一样(Martin and Sunley, 1996),导致地区之间增长与衰退的循环往复以及周期性的产业重构。资本出于增值目的会大量涌入盈利率更高的地区,资本涌入地经济快速增长,资本退出地经济相对衰退。随着资本在涌入地不断积累,盈利率不断下降,这时资本会再次回到上一轮的退出地,因为上一轮资本退出导致劳动力与土地价格下降,这反而为下一轮资本盈利提供了条件。因此,从长时段来看,为了实现最大资本积累,资本会在地区之间不断来回流动,不同地区会在增长与衰退之间不断进行角色转换(Harvey, 1982; Smith, 1984)。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不仅关注资本空间过程,还关注劳动力空间过程及其与资本积累与区域不平衡发展之间的关系。Massey(1984)研究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的劳动力空间重构,指出旧有劳动地域分工表现为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不同地区尽管产业结构不同,但都布局有企业总部、研发机构和生产车间,分布在各地区的不同产业的企业总部和研发机构都开始向特定地区汇集,而生产车间留在了边缘地区,形成了新的劳动地域分工。实现最大资本积累同样是劳动力(总部人员、研发人员和生产人员)空间重构的根本原因,这一过程强化了区域不平衡发展。因为经过劳动力空间重构,更多利润留在了总部与研究机构所在地,而生产型地区所留的利润变少(Massey, 1984)。可见,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更多地从资本的空间过程和劳动力的空间重构角度理解区域不平衡发展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迅速,稳定的经济环境为福特式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法国调节学派分析了在福特主义下由大生产和大消费构成的积累模式如何与由货币制度、劳资关系、竞争形式、国家干预和国际经济体系构成的调节模式相适应(Lipietz, 1987)。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国家经

常遭遇社会骚乱、汇率浮动、石油价格波动和国际债务危机,并且出现了市场饱和、消费者需求多样化等新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快速变动的外部市场环境使得僵化的福特式生产不再适用,而要求出现一种能够快速应对市场变化的新型生产组织模式,即弹性专业化生产(Piore and Sabel, 1984)。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在美国和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以福特主义生产为特点的地区陷入衰落,而一些以后福特主义为特点的地区开始快速兴起(Scott, 2000)。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地理学对产业集群或新产业区展开了大量研究,探究其对地区产业竞争力提升和创新的影响,关注地方的特定制度、社会基础与文化因素如何与产业集群网络式的生产组织形式相适应,从而灵活应对快速变动的市场(Amin and Robins, 1990)。一些过于宏大的分析工具,如货币制度、竞争形式、国家干预和国际经济体系这类宏大调节模式逐步被摒弃。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常变动的市场环境,企业家需要灵活调整劳动力、资本投入、工资、价格、上下游产品供应量以及产品设计等。产业集群网络式的生产组织模式与这些新需求相适应(Amin and Robins, 1990)。在网络式的生产组织中,企业等经济主体往往需要及时共享信息,共同解决问题,共担风险,加强合作与互惠等,这时正式合约不再重要,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因素开始突显其重要性(Gertler, 1992)。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因素往往是地方性的,需要在较长时间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互动中形成。经济地理学还研究其他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如地方风俗习惯、行为规范和法律法规等(Amin, 1999)。总之,经济地理学的制度与文化转向基于非经济因素理解区域发展,强调了地方尺度特定制度、社会基础与文化因素与产业集群网络式的生产组织模式相结合,可以更好地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快速变动的市场环境。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经济地理学开始将知识、学习和创新看作是区域竞争力的源泉,形成了区域创新系统和学习型区域等理论。这些理论也多受经济地理学制度与文化转向的影响,强调信任和紧密的社会联系会将创新主体粘连在一起,这有助于降低创新不确定性,促进区域内隐性知识传播和集体学习(Morgan, 1997)。经济地理学的加利福尼亚学派将

交易成本概念应用到新产业区研究中。在企业层面,企业在权衡内外部交易成本后会采取垂直分散化生产组织方式。在地区层面,大量处于同一产业领域的生产商和销售商保持地理临近,有助于应对市场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Scott, 1986; Scott, 1988; Storper and Walker, 1989; Storper, 1995)。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地理学认识到新区域主义的不足,开始将全球力量纳入区域发展研究,形成了全球—地方联系视角(贺灿飞和毛熙彦, 2015)。最初,一些超级全球化论者认为,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进步,资本将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游牧”,搜寻成本最低或收益最大地点。区位变得不再重要,地理将走向终结(Castells and Henderson, 1987; O'Brien, 1992)。然而,新区域主义者却认为地方独特的制度、社会与文化要素仍将吸引经济要素向特定地区汇集,导致持久的地理发展不平衡(Amin and Thrift, 1992; Dicken, Peck and Tickell, 1997; Shachar, 1997; Storper, 1997; Swyngedouw, 1997; Amin and Thrift, 1995)。在与全球化论者的争论中,经济地理学者逐步认识到全球化和地方化实际上是并行不悖的过程,经济活动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水平展开,另一方面在特定地区得到深化(Swyngedouw, 1997)。新区域主义的不足在于其仅从区域内部寻找区域竞争力的源泉,却忽视了全球化力量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实际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内部力量与区域外部力量相互交织共同推动区域发展。因此,只有全面考察全球力量、地方力量及其复杂互动关系才能更好地认识区域发展。这一时期,区域发展仍然主要体现为产业集群发展,只是研究视角由新区域主义向全球—地方联系视角转变。

21世纪初,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全球价值链与全球生产网络不断形成且日益深化,经济地理学开始关注地区企业价值链升级等问题(Coe, Dicken and Hess, 2008)。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盛行,国家力量下降和国家边界打开,在跨国公司主导下,全球范围内不同地方微观经济主体直接联系在一起(Dicken and Malmberg, 2001)。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开始由区域产业集群转变为全球生产网络及其价值链。在分析方法上,经济地理学摒弃了全球—地方联系的分析方法,采取了立体网络化的研究方法(贺灿飞和毛熙

彦,2015)。经济地理学试图对全球范围内不同地方的微观行为主体、制度及其复杂关系做全景展示,从而细致描绘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地区企业价值链升级(Sunley,2008)。例如,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基于特定行业,展示后发国家企业与全球领导型企业实现战略耦合的多种方式,不同战略耦合方式决定了后发国家企业能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多少价值,直接关系到区域发展(Yeung,2016)。这一时期,区域发展基本等同于地区企业价值链升级,即后发国家企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从跨国公司手中夺取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在理论层面,经典区域发展理论未触及区域产业演化的历史轨迹,未能提供有效分析工具,以研究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以及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的形成。主流经济学虽然强调区域要按比较优势发展产业,但要素禀赋较为相似的地区往往可以形成迥异的产业演化路径,主流经济学对这类问题无法提供较为详尽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多在较为抽象的层面上探讨资本在空间上的矛盾运动,实际上很少涉及具体产业发展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地理学的制度与文化转向考察了非经济因素对区域产业集群增长的影响。全球—地方联系视角突出了外部联系对增强产业集群活力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地理学开始在企业层面考察跨国公司与后发地区企业之间的关系,区域发展基本等同于后发地区企业在全价值链中位置的攀升。就区域发展而言,制度、文化和关系转向的共同点在于,其都将区域发展看作是现有产业或现有企业的增长,却忽视了区域发展还包括新产业进入和旧产业退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创造性破坏”过程,新经济活动不断出现而旧经济活动不断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发展是一个新产业不断出现而旧产业不断消亡的动态过程,这是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肇始。经济地理学要分析区域产业演化的历史轨迹,挖掘区域现有产业发展路径如何规制或约束着新产业的产生空间,探索区域产业演化中的非线性变化。

三、演化经济地理学与区域产业演化

1. 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地理学开始将演

化经济学相关概念引入到研究中(刘志高和尹贻梅,2006;刘志高和崔岳春,2008;刘志高、崔岳春和李敏,2009)。近十多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经历了快速发展(Boschma and Frenken,2006;Martin and Sunley,2006)。尽管演化经济地理学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理论框架,但具有一个共识,即区域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会伴随着新奇(novelty)的产生,新企业、新产业和新网络的不断形成、成长、成熟与衰退,以及整个区域经济体系的不断演化(贺灿飞等,2014;贺灿飞,2018a;贺灿飞,2018b)。演化经济地理学主要引入三方面理论来认识这一动态过程。不同理论均有适用于动态分析的概念工具(Boschma and Martin,2010)。第一,引入广义达尔文主义变异、选择与遗传的研究框架(Essletzbichler et al.,2010)。“新奇”是推动经济变迁的根本动力。“新奇”的产生依赖于企业惯例的多样化,更优的企业惯例被市场选择出来,并得到遗传、复制与推广。在众多“新奇”的形式中,新熊彼特主义主要关注技术创新。第二,引入路径依赖理论(Martin and Sunley,2006)。路径依赖理论从历史维度理解经济变迁。在一定初始条件下,规模报酬递增或主体间正向外部性会强化特定发展路径,甚至导致发展路径的锁定。在一定条件下,经济系统也会产生路径分叉,或者形成新的发展路径。第三,引入复杂系统理论来分析区域经济演化(Martin and Sunley,2007)。区域经济是一个开放的、远离均衡态的复杂适应系统,关注这一复杂适应系统的涌现性、自组织、非线性变化以及适应性调整等。

近几年来,一些研究提出广义达尔文主义变异、选择与遗传的研究框架不能涵盖完整的演化过程,因此需要借鉴演化理论的最新发展,即演化发育生物学和发育系统理论,来拓展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框架(Martin and Sunley,2015)。还有一些研究出于对纳尔逊和温特以企业为中心的研究传统的不满,提出要将地理政治经济学与演化方法融合起来(MacKinnon et al.,2009;Pike et al.,2016),发掘国家及其他结构性力量对区域产业演化路径的影响。总体而言,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来源与研究视角的多样性有助于形成更有力的分析工具,不同研究视角或理论来源往往在研究目标、研究主题、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具体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

较大差异,这又可能导致演化经济地理学难以形成较为统一的理论框架。

2. 区域产业演化:一个过程性解释

演化经济地理学将区域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过程,并且引入许多适用于动态分析的概念工具来理解这一动态过程。在认识论层面,研究提出要为区域发展提供一种过程性而不仅仅是机制性解释(Boschma and Frenken, 2006; Yeung 2019)。过程性解释侧重于分析以前状态X如何导致了当前状态Y的发生,而机制性解释多着眼于当前状态X如何影响当前状态Y。实际上,即使是当前状态X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Martin, 2010)。最初,演化经济地理学引入了路径依赖与锁定等概念来拓展人们对区域产业演化的认识,提出了路径依赖模型(Martin and Sunley, 2006)。该模型主要分为4个阶段:(1)由于某个历史偶然事件或随机事件,新企业布局于某个地区;(2)在示范效应和集聚经济等机制作用下,新产业快速发展,新发展路径形成;(3)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区域产业份额保持相对稳定,形成路径锁定;(4)路径解锁,不可预测、非预期的外部冲击导致产业衰退与消失。早期的路径依赖模型主要强调路径依赖与锁定的形成机制,如示范效应、知识溢出和规模报酬递增等。随着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学者们认识到四阶段路径模型存在一定问题(Martin, 2010; Henning; Stam and Wenting, 2013)。例如,其将新发展路径的形成归因于历史偶然事件或随机事件,而未看到新产业往往从旧产业中分化而来,何种新产业得以形成往往受制于区域知识、技术与能力;将路径锁定说成是产业份额保持稳定,这实际上回到了均衡思维而非演化思维;仅将外生冲击看作路径解锁的原因,而忽视其他形式的路径解锁。

随着演化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如技术关联、相关多样化分化以及区域协同演化思想等的发展,学者提出了新过程模型,以理解区域产业演化(Martin, 2010)。最初,区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定技术与产业结构及其相应的知识基础与能力;企业等经济主体在一定知识、技术与能力条件制约下形成新产业,创造新发展路径;在规模报酬递增和集聚外部性等机制作用下,新发展路径不断强化;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区域既可能形成路径固化,也可能对以往发展路径进行不断的适应性调

整,从而形成路径依赖式产业演化。就前者而言,区域产业往往固化到原有技术轨道上,形成固化了的网络联系与制度安排。如果没有较强的外生冲击,区域往往缺乏内生动力来更新现有知识、技术与能力,因而无法启动新一轮的路径转换。就后者而言,区域制度与产业进行持续性、渐进式的适应性调整,从而形成路径依赖的产业演化。在制度层面,大的制度突变往往较为困难,但区域可通过层叠、转换与重组等形式不断对制度做微小调整,从而为路径依赖式新产业、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一定空间。从长期来看,区域就形成了路径依赖式的产业演化。

四、演化经济地理学对区域产业演化路径的研究

1. 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依赖性

演化经济地理学对区域产业演化路径做了许多理论与实证研究。路径依赖不再是指由偶然因素和集聚外部性所确定的产业发展轨道,而是指在技术关联影响下,区域不断进行相关多样化。20世纪80年代演化经济学的新熊彼特主义学派开始兴起,将知识与技术置于分析的核心位置,探究了技术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Dosi and Giovani, 1988; Dosi and Nelson, 1994)。在企业组织层面,研究者十分关心企业组织在创新过程中的知识学习与搜索,发现企业组织的知识学习与搜索受认知距离制约,认知距离太远不利于新知识的搜索与学习(Stuart and Podolny, 1996; Nooteboom, 2000; Breschi, Lissoni and Malerba, 2003);认知距离太近则无法学习到新知识。演化经济地理学提出了认知邻近概念,即企业组织在创新过程中倾向于以自身掌握知识为原点展开对相邻知识领域的搜索(Boschma, 2005)。领域较为邻近的知识更容易重组,形成渐进式创新,而领域相距较远知识难以重组,但一旦重组即可能形成突破性技术创新(Solheim, Boschma and Herstad, 2018)。

在产业层面,演化经济地理学基于微观层面上的企业衍生来认识产业分化过程。Klepper(2007)从企业微观层面考察了1895—1966年美国底特律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发现新企业继承了在位企业的某些“基因”并不断从在位企业中衍生出来,从而

形成了底特律汽车产业集群。美国许多其他产业集群的形成都是在位企业不断衍生的结果(Klepper, 2009)。演化经济地理学者进一步提出,在产业层面,新产业同样是从在位产业中分化出来的(Boschma, 2015),这一分化过程是一个相关多样化分化过程(Frenken、van Oort and Verburg, 2007a; Neffke et al., 2011),即现在产业基于自身知识与技术分化出新产业,二者存在较强技术关联(Boschma et al. 2012b)。技术关联是指两种产业使用的知识与技术较为相似。

在区域层面,区域产业演化表现为路径依赖特性(Neffke, Henning and Boschma, 2011)。传统上,研究认为大都市地区存在多样化知识、技术与产业,不同类型知识与技术重组有利于创新和经济增长(Jacobs, 1969)。演化经济地理学提出,尽管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存在各类知识,但认知距离较远的知识并不容易重组,导致了不相关多样化分化相对较少(Frenken et al., 2007a)。基于相关多样化分化原理,区域现有存量知识与技术为未来新产业的产生划定了可能性空间,与现有产业存在较弱技术关联的新产业往往难以形成(Boschma et al., 2012b)。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产业演化是路径依赖的。许多研究实证研究了国家、区域与城市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性。Hidalgo等(2007)通过考察世界各国出口产品演化发现,各国新出口的产品与现有出口产业在“产品空间”上的距离较短,往往存在某种关联性。Boschma等(2013)基于西班牙1988—2008年的出口数据发现,新出口产品与区域现有出口产品使用相似的技术能力。在中国,与本地产业具有较高技术关联的产业更容易进入该区域,而与本地产业技术关联较低产业更容易从该区域退出(He、Yan and Rigby, 2018)。中国出口产品演化同样具有路径依赖性(贺灿飞、董瑶和周沂, 2016)。不仅仅是城市产业演化具有路径依赖性,城市技术演化同样具有路径依赖性(Colombelli、Krafft and Quatraro, 2014; Rigby, 2015)。

总体而言,当前区域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理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以企业为基本分析单元,将中观层面上的区域产业演化路径看作是微观层面上企业行为的结果。第二,将知识与技术逻辑置于主导地位,知识与技术逻辑决定了区域产业演化路径。第三,认为区域内现有产业内生分化出新产

业。第四,多基于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产业实践,这些国家的新产业往往处于科技前沿。这些特点决定了区域产业路径依赖理论既存在一定合理性,又存在诸多缺陷。

2. 区域产业演化路径突破

技术关联、相关多样化分化与路径依赖这一主流叙述存在诸多局限(Isaksen and Tripp, 2017; Tripp, Grillitsch and Isaksen, 2017)。这一主流叙述强调了区域现有产业可以内生分化出新产业,并且二者存在较强技术关联(Boschma et al., 2012a; Frenken and Boschma, 2007)。这种情况多发生于经济较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实际上并不具备内生产业分化能力(Isaksen and Tripp, 2016; Barzotto et al., 2019; Isaksen, 2015)。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一方面开始借鉴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将区域类型进行了细化;另一方面则提出了更多概念来详细刻画不同类型地区的区域产业演化路径。

就区域产业演化路径而言,最初研究围绕路径依赖的反面展开(Zhu、He and Zhou, 2017),提出了路径突破的概念,即新产业与区域现有产业没有较强技术关联(贺灿飞, 2018a)。然而,这种二分法依然无法全面概括不同类型地区的区域产业演化路径。因此,学者们做了进一步细化,提出了路径延伸(path extension)、路径革新(path modernization)、路径分化(path branching)、路径移植(path importation)、路径多样化(path diversification)和路径突破(path creation)等概念(Grillitsch、Asheim and Tripp, 2018; Isaksen、Tödtling and Tripp, 2018)。路径延伸是指现有产业通过渐进式技术创新而发展。路径革新是指现有产业通过重大技术创新或组织变革来实现发展。路径延伸与路径革新主要针对现有产业增长。路径分化是指演化经济地理学主流叙述中的相关多样化,将其称为路径更新(path renewal)。路径分化或路径更新涉及新产业的产生。路径移植是指将现有产业从一个地区移植到另一个地区,且另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与该产业并没有较强的技术关联,这种现象可以发生于发达国家核心与边缘地区之间,也可以发生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路径多样化是指不相关知识进行重组产生新产业,即演化经济地理学主流叙述中的不相关多样化分化。路径突破是指由重大技术突破或科学发现所引发的新产业

(Grillitsch et al., 2018)。实际上,不同学者在使用路径突破这一概念时往往各有偏向,有些是为了突出新产业与区域现有产业没有较强技术关联,有些是指不相关多样化分化,有些则强调重大技术突破或科学发现所引发的新产业。

3. 不同类型地区的产业演化路径

演化经济地理学借鉴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对区域类型进行细分,研究了不同区域创新系统在区域产业演化路径方面的差异,以及不同创新系统如何实现路径更新与路径突破,从而完成自身转型(Isaksen and Tripp, 2014)。区域创新系统可以分为三类,即(1)组织厚度高且多样化的地区,如大都市区或经济核心区;(2)组织厚度高且专业化地区,如老工业地区或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3)组织厚度较低的地区,如落后地区(Tödtling and Tripp, 2005)。不同类型地区在产业多样化水平、创新活力与创新类型、大学与研发机构数量、专业化服务机构以及社会资本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这些特点决定了不同类型地区具有不同的产业演化路径(Isaksen and Tripp, 2014)。一般认为,组织厚度高且多样化的地区具备内生产业分化能力,可以不断实现路径更新与路径突破。组织厚度高且多样化的地区具有多种类型的产业集群、企业 R&D 投入高、知识吸收能力强、高等院校云集、地区内部知识溢出多、桥梁型与纽带型社会齐备、推动企业创新与发展的制度较为完善,因而可以不断地进行相关多样化分化,并实现路径突破。组织厚度高且专业化地区推动路径更新的内生动力相对较弱,其往往不断延伸现有产业发展路径。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往往具备发展较为成熟的产业,其技术演化路径较为明确。科研院所、培训机构与信息服务机构等可以提供专业化服务。纽带型社会资本有利于本地现有知识传播。这些在一定时间内会产生正向锁定效应,从而推动现有产业发展路径的不断延伸。但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正向锁定效应会变为负向锁定效应。组织厚度较低的地区产业基础薄弱,企业吸收能力弱,仅有极少量的过程创新与产品创新,区域内知识流动少,相关知识生产与服务机构缺乏,纽带型社会资本抑制新知识、新观点的传播。因此,落后地区几乎不具备内生产业分化能力,难以实现路径更新与路径突破,其往往只能被动延伸现有产业发展路径,并且具有极高的风险陷

入负向锁定与路径耗竭(path exhaustion)(Isaksen, 2015)。这类地区发展往往需要借助外部力量,通过植入新产业来实现发展。

总体而言,随着对相关多样化理论的批判,演化经济地理学在诸多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一,突破了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的二分法,提出了更多区域产业演化模式。第二,相关多样化理论继承了纳尔逊和温特以企业为核心的分析传统,而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的新理论则包含了更多经济主体,并转向了更加整体主义的制度分析传统。第三,相关多样化理论更强调知识、技术与技能等对区域产业路径依赖的作用,但区域创新系统方法将区域内部资产进行了泛化,还包括更为抽象的能力、制度以及社会资本等因素。第四,早期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主要研究区域产业演化为何具有路径依赖性,然后开始关注如何推动新产业发展路径的形成,尤其是落后地区以及专业化地区如何实现路径更新与路径突破。

五、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

意识到技术关联、相关多样化与城市产业分化这一主流叙述的局限性,一些研究开始借鉴地理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全球生产网络以及可持续性转型等相关理论来研究区域新发展路径,将多种经济主体纳入分析框架、进一步细化新发展路径的形成过程、关注不同尺度上的制度与政策因素对演化路径的影响。

1. 外生力量与跨尺度分析

演化经济地理学将区域产业演化看作是一个内生的产业分化过程,新产业从现有产业中分化出来,并且二者存在较强技术关联(Boschma et al., 2012a)。对发达国家核心地区而言,这种认识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发达国家核心地区占据科技与产业前沿,前面是科技与产业的无人区。新科技与新产业的出现是从零到一的跨越。新知识、新科技与新产业往往建立在已有知识、科技与产业基础之上,导致新技术与新产业发展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点。然而,发达国家外围地区以及后发国家往往不具备较强的内生产业分化能力(Tripp, Grillitsch and Isaksen, 2018)。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落后地区的产业演化可以受到非本地力量的影响,被动或

主动地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当前,演化经济地理学越来越关注外生力量对区域产业演化路径的影响,研究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第一,一些学者研究外生力量是否能够推动区域路径突破(Zhu et al., 2017; Neffke et al., 2018; Elekes、Boschma and Lengyel, 2019);第二,另外一些学者研究如何才能将外生力量与区域内部力量组织起来从而推动新发展路径的形成,尤其是落后地区 and 专业化地区发展路径的更新与突破(Isaksen and Trippel, 2017; Barzotto et al. 2019; Chaminade et al., 2019)。就分析方法而言,研究普遍采用了跨尺度分析方法(Essletzbichler, 2012; Hassink、Isaksen and Trippel, 2019)。

许多实证研究探讨外部力量对区域路径突破的作用。Zhu等(2017)基于中国的产品出口数据研究,发现增强外部联系有利于中国区域发展突破路径。Neffke等(2018)基于1994—2010年瑞典的就业数据,比较了本地初创企业与在位企业、本地企业与非本地企业对区域能力结构变迁的影响,发现非本地的创业型企业是区域能力结构变迁的主要推动者,而本地在位企业倾向于增强区域现有发展路径(Neffke et al., 2018)。Elekes等(2019)基于匈牙利2000—2009年的数据分析了区域非相关多样化的推动主体,同样发现外资企业为区域创造了全新发展路径(Elekes et al., 2019)。这些研究结果都说明企业家精神并非仅存在于区域内部,有时外部经济主体反而更有可能发现新机会和引进新产品。一些研究关注外部知识、技术关联与创新的关系,发现外部知识更多地推动关联性技术创新而对不相关性的技术创新作用不大(Migueluez and Moreno, 2018)。总体而言,许多实证研究证实了外部力量对区域路径突破的作用。然而,这些研究没有说明外部力量是如何被引进的、引进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条件、其如何与区域内部力量相互作用而形成新产业的发展路径。因此,许多研究将外部力量进行细化,研究了外部力量对不同类型地区新发展路径形成的影响,尤其关注外部力量对落后地区与专业化地区路径更新与突破的影响。

研究还探讨了外部力量对不同地区新发展路径形成的影响。Trippel等(2018)指出在形成新产业发展路径时,组织厚度高且产业多样化的地区、组织厚度高但产业专业化的地区和产业发展薄弱地

区对外部资源的需求程度、对外部知识的吸引与吸收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外部资源的获取可以分为两类:第一,进入本地的外部经济主体,如FDI、归国技术型企业家、R&D机构等;第二,本地外部连接,如市场联系、跨国并购、亲朋好友、贸易展览等。不同类型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对外部资源需求、吸引与吸收能力不同,因而在创造新发展路径时需要制定差异化的政策(Trippel et al., 2018)。例如,落后地区往往最需要外部知识,但对外部知识的吸引与吸收能力却相对较弱。此时,只有外生力量与国家力量共同发力才能植入新产业,推动新发展路径的形成(Isaksen and Trippel, 2017)。研究还比较了专业化地区的路径突破与路径更新。专业化地区要实现路径突破,就要在本地能力的基础上从区域外部引入不相关领域的新知识和新技术。然而,本地企业在与外部组织机构建立有效联系时存在诸多困难。政府将不同地区拥有不同知识的组织机构联系与组织起来就至关重要。没有国家层面的牵线搭桥就难以形成新网络、输入新知识,这时专业化地区只能进行路径更新或路径延伸(Chaminade et al., 2019)。由此可见,不论是在专业化地区还是落后地区,外部力量往往无法单独发挥作用。在外围地区外部力量需要与国家政策相配合才能植入新产业;在专业化地区,只有国家力量才能将区域内部资源与区域外部资源联系、组织与协调起来,从而实现路径突破。因此,在理解区域新发展路径的形成时,仅仅关注外部力量是不充分的,还要考虑存在于不同尺度的多个经济主体及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互动。

2. 多元主体与系统能动性

演化经济地理学继承了纳尔逊和温特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将关注重点放在企业(Nelson and Winter, 1982)。区域层面的新发展路径是微观层面企业行为的结果。这种简化的描述忽略了区域新发展路径形成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的作用及其集体行动,如不同层级的政府、大学与研究机构、商业协会与贸易组织等(MacKinnon et al., 2009; Pike et al., 2009; Pike et al., 2016)。一些研究探讨了区域新发展路径形成过程中高层级政府跨区协调作用以及大学与研究机构的衍生作用等。例如, Dawley等考察了1980—2010年英国东北部落后地区海上风力发电产业的形成,发现不同层级的政府

和政策制定者对这一产业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本身就不像发达地区那样具备内生的产业分化能力,因此更需要关注政府及其他经济主体的作用(Dawley, 2014; Dawley et al., 2015)。MacKinnon 等(2018b)对比了德国、英国和挪威海上风力发电产业的形成与发展,认为要推动新产业的形成往往需要将不同地区的资源连接与组织起来,更高层级的政府就至关重要(MacKinnon et al., 2018)。

一些研究进一步将不同经济主体置于区域创新系统中,分析不同新产业发展路径所需要的企业个体能动性、与系统整体能动性(Isaksen et al., 2018)。区域创新系统既可能是新发展路径形成的推动者,也可能是阻碍者。例如,一些运行良好的区域创新系统可能不断推动渐进式创新,从而强化现有产业发展路径。从动态视角看,这不利于路径突破式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从长期来看,区域创新系统需要不断转型,而转型成功既需要企业个体层面的能动性,又需要系统整体层面的能动性,否则可能产生系统失灵问题(Nelson et al., 2018)。在系统层面,不同经济主体需要参与其中,提升系统能力。新的系统能力形成往往需要新机构的建立,如共享实验室、共同培训机构、产业与贸易协会等。一些研究分析了不同区域发展路径所依托的个体能动性与系统能动性(Isaksen et al., 2019)。区域发展路径分为路径延伸、路径升级、路径分化和路径突破,前两者往往涉及现有产业竞争力的增强,只不过路径延伸强调渐进创新,而路径升级强调现有产业的重大技术与组织创新。路径分化与路径突破则包含新产业的产生,前者是相关多样化,而后者是跟本地没有较强关联的全新产品。总体而言,从路径延伸、路径升级、路径分化到路径突破,对个体能动性的要求不断提高,系统转变强度也不断提高。例如,就路径延伸而言,企业个体仅需要沿着原有技术轨道进行渐进创新,系统保持相对稳定即可。而就路径突破式新产业的产生而言,企业个体需要取得突破性技术创新,并将创新成果成功商业化。在系统层面,这一过程往往涉及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并伴随着新机构的形成、新生产组织模式的出现、新制度安排以及政策工具的使用等(Isaksen et al., 2019)。当然,以上这些还仅仅是一些概念框架,演化经济地理学急需展开

扎实的实证研究,挖掘企业、大学、协会以及政府等在不同形式新发展路径形成中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看到,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仍然存在许多缺陷。例如,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在分析区域新发展路径的形成时仍然围绕知识过程,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认识到新发展路径的形成不仅涉及知识过程,还涉及一系列非知识过程。

3. 知识过程与非知识过程

根据演化经济地理学的主流叙述,受制于认知邻近,企业更容易搜索和学习到关联性知识与技术,或者企业更容易将关联性知识进行重新组合,从而形成新产业(Frenken, Van Oort and Verburg, 2007b)。这一主流叙述实际上没有对新产业的形成过程进行细致的描述,尤其是忽视了新产业形成过程中的非知识过程。在现实世界中,许多地区都拥有某种知识、技术、能力与产业,但并非所有地区都会分化出同样的关联性产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技术关联仅仅是新产业发展路径形成的必要条件。或者,知识过程仅仅是新产业发展路径形成的一个环节,其他环节同样非常重要(Gustafsson et al., 2016)。许多研究借鉴转型理论与技术创新系统理论详细刻画了区域新发展路径的形成过程(Binz, Truffer and Coenen, 2016, MacKinnon et al., 2019)。当然,这些过程不一定遵循特定次序,也有可能平行推进。Binz 等(2016)提出新发展路径的形成涉及四个过程。第一,新知识生产与新技术产生。这一过程往往涉及企业、大学以及研发机构等,并且相关合作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可能都位于区域外部。第二,利基市场建构。新产品投放市场后,消费者并不熟悉,不一定具备市场竞争力。因此,在一定时期内提供保护性空间至关重要。这时企业家需要游说政府,要求给予一定时间的补贴或税收减免。如果出口到国外,则可能需要一定时期的出口退税等政策。第三,投资动员。新产品形成初期,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充满较大不确定性。一般性商业银行出于风险考虑往往不会提供贷款。企业从不同地区获得天使投资、风险投资、政府基金与示范项目资助就尤为重要。第四,产品与技术合规化。从社会学意义上看,新产品需要符合人们的价值观、风俗与习惯,并且需要符合当地制度规定。例如,许多地区人们具有较强的生态化与绿色化理念,一些不符合生态化与绿色化理念的产业往

往无法形成(Binz et al., 2016)。总之,在区域新发展路径形成过程中,知识生产过程是其中重要一环,但知识不应该被放在绝对的优先位置,其他非知识过程同样重要(刘志高和张薇,2018)。不论是知识创造、利基市场构建,还是投资动员,各个环节所依托的关键资源并非一定存在于区域内部,而可能广泛存在于其他地区。因此,关键是要将不同地区的优势资源整合与锚定起来。

4. 制度变迁与国家调节

制度影响区域产业演化路径和区域新发展路径(Hassink、Klaerding and Marques, 2014, Martin and Sunley, 2015)。演化经济地理学最初主要关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区域产业演化路径的影响。例如, Boschma and Capone(2015)探讨了自由型市场制度与协调型市场制度对区域产业分化的影响,发现自由型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更有利于区域进行不相关多样化分化,而协调型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会更多地推动相关多样化分化。Cortinovis等(2017)比较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区域产业分化的影响,发现非正式制度对区域产业分化更为重要,在非正式制度中连接型社会资本比纽带型社会资本更能促进非相关多样化分化。此类研究将制度看作是固定不变的,没有考虑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变迁与区域产业的协同演化(Gong and Hassink, 2019)。

近年来,一些研究提出不同新发展路径需要不同形式的制度变迁,不同制度变迁模式的推动主体并不相同(Evenhuis, 2017a; Evenhuis, 2017b; Hu and Yang, 2019)。一些研究将制度变迁分为制度层叠(layer)、制度转换(conversion)、制度漂流(drift)、制度替换(displacement)和制度移除(dismantling)等。制度层叠可以分为两类,即制度增厚(thicken)和正向制度叠加(positive layer)。路径延伸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制度增厚。在落后地区或能动性较为缺乏的专业化地区,现有互惠共同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引入有助于强化原有产业发展路径的新制度。区域原有制度体系得以强化,原有产业发展路径不断延伸。路径移植需要正向制度叠加。在制度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制度模糊性较强的地区,一些企业家会尝试性地移植外部新产业。如果新产业拥有一定的利基市场,会不断地从各个方面重新定义制度体系。相关制度安排不断叠加到已有制

度基础之上,保障移植产业逐步成长,不断发展壮大。现有制度体系是路径更新的温床。不论现有制度体系多么完善或者多么僵化,机会主义者总可以利用现有制度体系创造出新的生产可能性空间。机会主义者既可以在现有制度体系下基于本地资产进行相关多样化,也可以将外部资源引入本地,并在本地制度体系下形成良性运转,从而更新现有产业发展路径。

路径枯竭与制度漂流往往相伴而行。外部经济与制度环境不断变化,若本地经济主体不随之动态调整,不主动改变其过去赖以生存的制度体系,那么区域将逐步衰退,陷入路径枯竭。原有制度名存实亡,随波逐流,最终沦为空制度。经济落后地区如此,变革能力弱的僵化地区同样如此。路径突破与制度移除相生相伴,都需要“造反者”。“造反者”既可以是推动突破性技术形成与应用的企业家,也可以是不断追求变革、不断砸烂旧制度的改革者。一方面,新突破性技术会产生新型产业发展形态,新型产业发展形态需要系统性地移除现有制度并系统性地重建新制度;另一方面,改革者的重大制度变革会为重大路径突破提供可能性空间。许多研究都突出国家调节在路径突破型新产业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MacKinnon et al., 2019)。不同形式的新产业发展路径往往需要不同形式的制度变革。路径依赖型新产业可以在现有制度体系下形成,路径突破型新产业的发展需要较大的制度移除与制度重建,即产业与制度共同演化,并且其往往涉及国家调节作用。路径植入式新产业的培育、发展与壮大往往需要持续的正向激励,这时不断地叠加相关制度安排就至关重要。

以上这些论述关注区域内部不同新产业发展路径形成与不同制度变迁模式的协同关系,没有对不同地区产业与制度的协同演化作跨尺度分析(Gong and Hassink, 2019)。Hassink等(2019)提出产业与制度的协同演化是一个跨尺度过程,全球尺度或其他地区产业与制度变化可以通过一系列途径与本地产业和制度调整耦合在一起。因此,经济地理学需要在更高尺度关注同一经济过程中,不同地区之间产业与制度的协同演化。在研究产业与制度的跨尺度协同演化时,需要关注层级、向度和势能差。尽管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但有时局部变化的影响仅能限于层级内部而无法迅速改变层

级结构。例如地区某产业发展无法改变国家科技体制。不同地区之间尽管存在着产业与制度的协同演化,但势能较大地区的变化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势能差高与势能差大致相同地区的产业与制度协同演化可能具有不同形式。总体而言,就制度变迁与新产业发展路径形成之间的关系,当前仍以理论研究为主,急需开展大规模实证研究。

六、结论与展望

区域发展一直是经济地理学及相关学科关注的重点问题。经济学关注区域经济收敛与发散。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看来,区域经济收敛与发散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不平衡发展与周期性区域产业重构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属性。20世纪80年代后,新区主义关注文化、信任和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对产业集群和区域创新的影响。随后,一些研究跳出就区域论区域的窠臼,开始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地方联系与区域发展的关系。近年来,这些研究将全球价值链理论引入地理学研究之中,形成了全球生产网络理论,重点关注了全球领导型企业与后发地区企业的战略耦合。21世纪以来,演化经济地理学兴起,从动态视角出发,将知识与技术置于分析核心位置,试图揭示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与区域新发展路径的形成规律。

第一,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区域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性。最初研究关注技术关联的作用,认为区域会演化出与本地具有较强技术关联的新产业。随后研究强调地区特定经济活动及支撑这些经济活动的制度框架会为新产业的产生划定空间。其次,研究关注到路径依赖无法全面概括区域产业演化,进而提出了路径突破、路径更新、路径移植和路径延伸等概念。不同类型地区,如发达地区、专业化地区和落后地区,往往表现出不同的演化路径。

第二,演化经济地理学探讨区域新发展路径。研究注意到技术关联、相关多样化分化与区域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这一主流叙述存在较多缺陷。因此,利用外部资源与建立外部联系成为推动落后地区与专业化地区路径突破与路径更新的重要途径。然而,外部力量往往无法单独发挥作用,更高层级政府能将不同地区资源组织与动员起来。因此,区域新发展路径形成还是一个多主体参与的过

程。此外,区域新发展路径的形成也不仅仅是一个知识过程,还涉及利基市场构建、大规模投资动员和产品与技术合规化等过程。这些过程同样涉及多类经济主体,并且可以跨越多个尺度。

第三,制度影响新发展路径,不同形式的新发展路径往往需要不同形式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型新产业可以在现有制度体系下生成,路径突破型新产业需要较大的制度移除与制度重建。路径植入式新产业的培育、发展与壮大往往需要持续的正向激励,这时不断叠加相关制度安排就至关重要。路径延伸过程往往伴随着制度增厚。除关注区域层面的制度与产业共同演化外,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还是一个跨尺度过程。不同地区之间制度与产业实际上处于同一经济过程之中,其往往存在跨尺度协同演化。

演化经济地理学在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第一,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通过路径更新或路径突破来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但对后发国家来说现有产业竞争力(路径升级)提升同样重要。演化经济地理学需关注后发国家的创新型企业,需要借鉴管理学与组织理论来研究企业组织及其学习过程。演化经济学将企业组织打开,强调后发国家企业在战略意志与支撑技术学习的组织系统形成耦合的条件下,持续性地投入自己有限但日益增长的战略性资源,从而开拓市场空间,获得成功(Feng, 2019)。演化经济地理学同样需要关注企业组织系统以及多尺度因素对这些组织系统带来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演化经济地理学并不知道企业组织是如何学习与提升技术的。

第二,演化经济地理学需要区分生产能力与技术开发能力。当前,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外部力量对区域路径突破的影响,但是通过路径移植而获得的新产业可能仅仅提高了区域生产能力,却并不一定带来技术开发能力(路风,2018)。例如,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建立有时只能带来生产能力,却带不来技术开发能力。技术开发能力只能存在于企业内部,外部知识只能经企业组织吸收才能转化为有效知识。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需要研究本地创新型企业如何绕开全球价值链,在自己的开发平台上吸收外部知识,从而创造出新发展路径。

第三,不仅是区域过去累积的资产影响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对未来的预期同样会影响现在的决策

(Grillitsch and Sotarauta,2019)。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需要开展更多地实证研究,来阐述未来预期在推动新发展路径形成时与路径依赖性产业演化有何不同。

参考文献

- [1] AMIN A.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99(23).
- [2] AMIN A, K Robins. The Re-emergence of Regional Economies? The Mythical Geography of Flexible Accumulation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1990(8).
- [3] AMIN, A. ,N. Thrift. Neo - Marshallian Nodes in Global Network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92(16).
- [4] AMIN A , N Thrift. Globalisation, Institutional Thickness and the Local Economy. In: Healey P., Cameron S., Davoui I., Graham S., Madani-Pour A. (eds) [M]. Managing Cities:The New Urban Context,1995.
- [5] BARZOTTO, M., C. CORRADINI, F. M. FAI, S. LABORY, P. R. Tomlinson Enhancing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in Lagging Regions: An Extra-regional Collaborative Approach to RIS3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2019(12).
- [6] BINZ C, B TRUFFER , L. COENEN. Path Creation as a Process of Resource Alignment and Anchoring: Industry Formation for On-Site Water Recycling in Beijing [J]. Economic Geography,2016(92).
- [7] BOSCHMA R. Proximity and Innovation: A Critical Assessment [J]. Regional Studies,2005(39).
- [8] BOSCHMA R. Do Spinoff Dynamics or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Drive Industry Clustering? A Reappraisal of Steven Klepper' s Work [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2015(24).
- [9] BOSCHMAN R, G CAPONE. Institutions and Diversification: Related Versus Unrelated Diversification in a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Framework [J]. Research Policy,2015(44).
- [10] BOSCHMA R, K FRENKE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In: G. L. Clark, M. P. Feldman, M. S. Gertler, D. Wójcik (eds) [M]. The New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1] BOSCHMA R, K FRENKEN, H. BATHELT, M. FELDMAN., D. KOGLER.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and Regional Branching. In: BATHELT, H., M. FELDMAN., D. KOGLER (eds) [M]. Beyond Territory. Dynamic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Creation, Diffusion and Innovation,2012,Londen;Routledge.
- [12] BOSCHMA R , R MARTIN. The Aims and Scop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In R. Boschma , R. Martin (eds) [M].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2010. Cheltenham;Edward Elgar.
- [13] BOSCHMA R, A MINODO , M. NAVARRO. The Emergence of New Industries at the Regional Level In Spain: A Proximity Approach Based on Product Relatedness [J]. Economic Geography,2013(89).
- [14] BOSCHMA R A , K. FRENKEN. Why is Economic Geography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6(6).
- [15] BRESCHI S, F LISSONI, F. MALERBA. Knowledge-relatedness in Firm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 [J]. Research Policy,2003(32).
- [16] CASTELLS M , J HENDERSON.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87.
- [17] CHAMINADE C, M BELLANDI, M. PLECHERO , E. SANTINI. Understanding Processes of Path Renewal and Creation in Thick Specialized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J]. Evidence from Two Textile Districts in Italy and Sweden.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19(27).
- [18] COE, N. M., P. DICKEN , M. HES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alizing the Potential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8(8).
- [19] COLOMBELLI A, J. KRAFFT , F. QUATRARO. The Emergence of New Technology-based Sectors in European Regions: A Proximity-based Analysis of Nanotechnology [J]. Research Policy,2014(43).
- [20] CORTINOVIS N, J. XIAO, R. BOSCHMA , F. G. VAN OORT. Quality of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as Drivers of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 in Europe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7(6).
- [21] DAWKINS C J.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Conceptual Foundations, Classic Work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J].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2003(18).
- [22] DAWLEY S.. Creating New Paths? Offshore Wind, Policy Activism, and Peripheral Region Development [J]. Economic Geography,2014(90).
- [23] DAWLEY S, D MACKINNON, A CUMBERS, APIKE.. Policy Activism and Regional Path Creation: The

- Promotion of Offshore Wind in North East England and Scotland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5(8).
- [24] DICKEN P , A MALMBERG. Firms In Territories: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J]. *Economic geography*, 2001 (77).
- [25] DICKEN P, J PECK , A. TICKELL. Unpacking The Global. In: LEE, R., WILLS, J. (Eds) [M]. *Geographies of economies*, 1997, London: Arnold Publishers.
- [26] DOSI G, C. FREEMAN, R. NELSON.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M]. London: Francis Pinter, 1988.
- [27] DOSI G , R R NELSON. An Introduction To Evolutionary Theories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994(4).
- [28] ELEKES Z, R BOSCHMA , B LENGYEL. Foreign-owned Firms As Agents of Structural Change In Regions [J]. *Regional Studies*, 2019(53).
- [29] ESSLETZBICHLER J.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 and Path Creation: A Multi-scalar Approach to Energy Transition in the UK [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2(20).
- [30] ESSLETZBICHLER J, D L. RIGBY, R BOSCHMA, R. MARTIN. Generalized Darwinism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In: BOSCHMA, R., MARTIN, R. (eds) [M].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31] EVENHUIS E.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ities And Regions: A Path Dependency Approach.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7 (10).
- [32] EVENHUIS E.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ing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Adaptation. [J]. *Geography Compass*, 2017 (11).
- [33] FENG K.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 Schumpeterian Perspective o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19.
- [34] FRENKEN, K., F. VAN OORT , T. VERBURG. Relate Variety, Unrelated Varie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J]. *Regional Studies*, 2007a(41).
- [35] FRENKEN K , F VAN OORT , T. VERBURG. Related Variety, Unrelated Varie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Regional Studies*, 2007b(41).
- [36] GERTLER M S. Flexibility Revisited: Districts, Nation-states, And The Forces of Production. [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92(3).
- [37] GONG H, R HASSINK. Co-evolution In Contemporary Economic Geography: Towar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J]. *Regional Studies*, 2019(53).
- [38] GRILLITSCH M, B ASHEIM , M. TRIPPL. Unrelated Knowledge Combinations: The Unexplored Potential For Regional Industrial Path Development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8 (11).
- [39] GRILLITSCH M , M SOTARUTA. Trinity of Change Agency,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hs And Opportunity Spaces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9, (Online).
- [40] GUSTAFSSON R, M Jääskeläinen, M. MAULA , J. UOTILA. Emergence Of Industries: A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6(18).
- [41]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42] HASSINK R, A ISAKSEN , M. TRIPPL. Toward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New Regional Industrial Path Development [J]. *Regional Studies*, 2019 (11).
- [43] HASSINK R, C KLAERDING, P. MARQUES. Advancing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by Engaged Pluralism [J]. *Regional Studies*, 2014 (48).
- [44] HE C, Y YAN , D RIGBY. Regional Industrial Evolution In China [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18(97).
- [45] HENNING M, E STAM , R WENTING. Path Dependence Research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acophony or Knowledge Accumulation? [J]. *Regional Studies*, 2013 (47).
- [46] HIDALGO C A, B KLINGER, A. L. BARABASI , R. HAUSMANN. The Product Space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J]. *Science*, 2007(317).
- [47] HU X , C YA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Divergent Economic Resilience: Path Development of Two Resource-depleted Cities In China [J]. *Urban Studies*, 2019 (16).
- [48] ISAKSEN 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in Regions: Trapped in Path Extens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5(15).
- [49] ISAKSEN A, S-E JAKOBSEN, R. Njøs , R. NORMANN. Region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Resulting From Individual and System Agency [J].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9(32).
- [50] ISAKSEN A, F Tödtling , M. TRIPPL. Innovation Policies for Regional Structural Change: Combining

- Actor-Based and System-Based Strategies. In: A. Isaksen, R. Martin, M. Trippl. Cham (eds) [M]. New Avenues for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 Theoretical Advances, Empirical Cases and Policy Lessons, 2018,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51] ISAKSEN A, M TRIPPL. Regional Industrial Path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onceptual Analysis. Papers in Innovation Studies. CIRCLE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4 (17), Lund University. http://wp.circle.lu.se/upload/CIRCLE/working_papers/201417_Isaksen_Trippl.pdf.
- [52] ISAKSEN A, M TRIPPL., Path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onceptual Analysis. In: PARRILLI D., D. RUNE., A. RODRIGUEZ-POSE. (eds) [M]. Innovation Drivers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Strategies, 2016, London: Routledge.
- [53] ISAKSEN A, M TRIPPL., Exogenously Led and Policy-Supported New Path Development in Peripheral Regions: Analytical and Synthetic Routes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7(93).
- [54] JACOBS J.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 [55] KLEPPER S. Disagreements, Spinoffs, and the Evolution of Detroit as the Capital of the US Automobile Industry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7 (53).
- [56] KLEPPER S. Spinoffs: A review and synthesis [J].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2009 (6).
- [57] LIPIETZ, A. Mirages and miracles [M]. London: Verso, 1987.
- [58] MACKINNON D, A CUMBERS, A PIKE, K. BIRCH, R. MCMASTER. Evolu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Institutions, Political Economy, and Adaptation [J]. Economic geography, 2009(85).
- [59] MACKINNON D, S DAWLEY, A PIKE, A. CUMBERS. Rethinking Path Creation: A Geographical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2).
- [60] MACKINNON D, S DAWLEY, M. STEEN, M.-P. MENZEL, A. KARLSEN, P SOMMER, G. H. HANSEN, H. E. NORMANN. Path Creatio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the Offshore Wind Sector [J]. Progress in Planning, 2019(130).
- [61] MARTIN R. Roepke Lecture in Economic Geography—Rethinking Regional Path Dependence: Beyond Lock-in to Evolution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0(86).
- [62] MARTIN R, P SUNLEY. Paul Krugman's Geographical Economic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A Critical Assessment [J]. Economic geography, 1996(72).
- [63] MARTIN R, P SUNLEY. 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6).
- [64] MARTIN R, P SUNLEY. Complexity thinking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7(7).
- [65] MARTIN R, P SUNLEY. Towards a Developmental Turn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J]. Regional Studies, 2015(49).
- [66] MASSEY D.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M]. UK: Psychology Press, 1984.
- [67] MIGUELEZ E, R MORENO. Relatedness, External Linkages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in Europe [J]. Regional Studies, 2018 (52).
- [68] MORGAN K. The Learning Region: Institutions,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Renewal [J]. Regional Studies, 1997(31).
- [69] NEFFKE F., M. HARTOG, R. BOSCHMA, M. HENNING. Agents of Structural Change: The Role of Firms and Entrepreneurs in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8(94).
- [70] NEFFKE F, M HENNING, R. BOSCHMA. How Do Regions Diversify over Time? Industry Related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Growth Paths in Regions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1(87).
- [71] NELSON R R, G DOSI, C E. HELFAT A PYKA, P. P SAVIOTTI, K LEE, S G Winter, K Dopfer, F Malerba [M]. Moder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 overvie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72] NELSON R. R., S. G. WINTER.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M].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73] NOOTEBOOM B. Learning by Interaction: Absorptive Capacity, Cognitive Distance and Governanc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2000 (4).
- [74] O' BORIEN, R. Glob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the End of Geography [M]. London: Pinter, 1992.
- [75] PIKE A, K BIRCH, A. CUMBERS, D. MACKINNON, R. MCMASTER. A Geograph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Evolu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J]. Economic

- Geography, 2009(85).
- [76] PIKE A, D MACKINNON, A. CUMBERS, S. DAWLEY, R. MCMASTER. Doing Evolu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92).
- [77] PIORE M J, C F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M]. Basic books, 1984.
- [78] RIGBY D L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and Knowledge Space: Entry and Exit of US Cities from Patent Classes [J]. Regional Studies, 2015 (49).
- [79] SCOTT A Economic Geography: The Great Half-century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24).
- [80] SCOTT A J.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The Rise of the Orange County Complex, 1955 - 1984 [J]. Urban Geography, 1986(7).
- [81] SCOTT, A. J. New Industrial Spaces: Flexible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M]. London: Pion, 1988.
- [82] SHACHAR A.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Urban Dynamics. In: MOULAERT, F., A. Scott (eds) [M]. Cities, Enterprises and Society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 1997, London: Pinter.
- [83] SMITH N.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Oxford: Blackwell, 1984.
- [84] SOLHEIM M C, R BOSCHMA, S. HERSTAD. Related Variety, Unrelated Variety and the Novelty Content of Firm Innovation in Urban and Non-urban Locations. Utrecht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uman Geography and Spatial Planning, Group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http://econ.geo.uu.nl/peeg/peeg1836.pdf>.
- [85] STORPER M. The Resurgence of Regional Economies, Ten Years Later the Region as a Nexus of Untraded Interdependencies [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1995(2).
- [86] STORPER M. Territories, Flows, and Hierarchi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 COX, K (ed) [M].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Reasserting the Power of the Local, 1997,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87] STORPER M, R WALKER. The Capitalist Imperative: Territory,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Growth [M]. Oxford: Blackwell, 1989.
- [88] STUART T E, J M PODOLNY. Local Search and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17).
- [89] SUNLEY P.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A Partial Understanding or a New Paradigm? [J]. Economic Geography, 2008(84).
- [90] SWYNGEDOUW E. Neither global nor local: "Gloc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In: COX, K (ed) [M].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Reasserting the power of the local, 1997, New York: Guilford.
- [91] TöDTLING F, M. TRIPPL. One Size Fits All?: Towards a Differentiated Regional Innovation Policy Approach [J]. Research Policy, 2005(34).
- [92] TRIPPL, M., M. GRILLITSCH, A. ISAKSEN. Exogenous Source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hange: Attraction and Absorption of Non-local Knowledge for New Path Development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8(5).
- [93] TRIPPL M, M GRILLITSCH, A. ISAKSEN. Exogenous source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hange: Attraction and absorption of non-local knowledge for new path development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8(42).
- [94] YEUNG H W-C Strategic Coupling: East Asia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 [95] YEUNG H W-C Rethinking mechanism and process in the geographical analysis of uneven development [J].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2019 (3).
- [96] ZHU S, C HE, Y ZHOU. How to Jump Further and Catch up? Path-breaking in an Uneven Industry Space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7(17).
- [97] 贺灿飞. 区域产业发展演化: 路径依赖还是路径创造? [J]. 地理研究, 2018a(37).
- [98] 贺灿飞. 演化经济地理研究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b.
- [99] 贺灿飞, 董瑶, 周沂. 中国对外贸易产品空间路径演化 [J]. 地理学报, 2016 (71).
- [100] 贺灿飞, 郭琪, 马妍, 等. 西方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 [J]. 地理学报, 2014(69).
- [101] 贺灿飞, 毛熙彦. 尺度重构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研究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34).
- [102] 刘志高, 崔岳春. 演化经济地理学: 21 世纪的经济地理学 [J]. 社会科学战线, 2008(8).
- [103] 刘志高, 崔岳春, 李敏. 演化经济地理学: 新范式还是“新瓶装旧酒”? [J].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 2009(1).
- [104] 刘志高, 尹贻梅. 演化经济地理学: 当代西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新方向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6(1).
- [105] 刘志高, 张薇. 中国大都市区高新技术产业分叉过程及

动力机制——以武汉生物产业为例[J]. 地理研究, [106]路风.产品开发平台[J]. 管理世界,2018 (34). 2018(37).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He Canfei Li Wei

Abstract: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a dynamic process with the entry of new industries and the exit of existing industries. After briefly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their lack of a dynamic understanding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hang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ain development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EEG), which is based on General Darwinism, path dependence and complexity system theor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currently EEG theory mainly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reg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industries. Early mainstream EEG studies reveal the path dependence of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n, other development path, such as path creation, path renewal and path extension and path exhaustion has been identified and there is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how different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vary in their development path. The emergence of new industries has been considered to be a process involving multi-actors in multi-level spac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industries from four dimensions, namely the extra-regional forces, multi-actors and their system agency, knowledge and non-knowledge process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al change. Last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EEG should pay much more attention to the way on which firm organizational-level factors and future expectation shap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regions.

Key Words: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Regional Development; Regional Industrial Evolution; Path Dependence; Path Creation

(责任编辑:晓 力)

中西方商品经济发展路径的比较及选择

——兼论中西方经济学之区别及其根源

冯彦明

摘要: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是以安贫乐道为目的和思想基础,国家统一管理,农民分散经营,商业规范发展;而西方则是以唯利是图为目的和思想基础,以商业自由发展为手段,庄园主(资本家)分散经营,通过政治联盟(国家和国家联盟),对内圈地掠夺,对外征服侵略。中国历史上发展的思想前提是安贫乐道以及国与家共同发展和富裕,西方发展的思想前提是唯利是图以及奴隶主、贵族阶层和新兴资产阶级个人发家致富。由此所决定,中国的经济学是国家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西方的经济学是家庭理财学和发财致富学。因此,带来了中西方经济发展的不同结果。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走以人为本、积极创新和共享共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关键词:商品经济;小农经济;新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1-0055-08 **收稿日期:**2019-07-09

作者简介:冯彦明,男,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北京产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北京 100081)。

中国历史上商业发展很早,还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期间不乏高度繁荣的发展时期,但中国并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产生西方式的工业革命。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出现新动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绽露新曙光之际,仍然有人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认识,迷恋西方的物质文明,盲信西方的自由平等。那么,如何认识中西方历史上走过的路?中国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该如何定义商品经济?本文试图结合这些问题,从对比的角度,挖掘和分析中西方(主要是中国和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及其深层原因,说明商品经济的两面性及其管理的必要性,进而提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之路,为实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一、历史上中西方商品经济发展的路径比较

商品交换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商品经济作为一种为交换而生产的经济形态,更是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从历史上看,中国实行了一种看似矛盾实则必然的经济形式:商品交换出现很早但商品经济形成很晚、个人(家庭)间的商品交换非常偶然但社会总的商品交换规模很大、官府几乎都是非生产性消费但同时又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行限制。这一自然经济与商业贸易并存的特点成为中国有别于西方纯粹商业化的独特的经济发展之路。

1.历史上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在商朝时已经

拥有了很大的疆域。虽然在之后的各个时期由于诸侯割据或其他原因,疆域面积时大时小,但稳定而统一的政治一直未变。特别是秦朝时统一了文字、度量衡和货币,更大大便利了交换。政治的相对稳定和国家管理的相对统一,在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的同时,也为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和贯彻统治者的思想打下了基础。中国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就带有这种明显的中国特色。

根据记载和考证,中国历史上的商业大体上分为三类:一类是盐铁和奢侈品交易。这类商品交易从产品的生产、运输到交易、消费都主要被官府所控制,特别是奢侈品,主要供官府和小部分富家消费,不会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商品经济形态。第二类是手工业品交易。交易的手工业品既有供民间生活和生产所需的普通用品,也有供官府享受和军队所需的专用物资。虽然这类交易的规模比较大,但除部分被官营外,大部分是分散和零星交易,不足以形成独立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第三类是农副产品交易。这应该是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与民众生产和生活相关度最高的商品交易,但这类交易的主要目的是调剂余缺,为买而卖,不同于商品经济形态中的为卖而买、贱买贵卖。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商品交换很早,但除官有、官营、官控的小部分商品生产和交换外,与社会生产密切相关的大部分商品生产和交换仍然处于偶然阶段,并没有、也不会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商品经济。

从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及特点来看。中国封建社会有两个基本的经济单位,这就是地主和农民。一家一户的农民把农业与手工业紧密地结合起来,“以耕助织”的生产形式一直延续;地主阶级虽然从农民那里剥削产品,但剥削来的产品也主要是用于自身消费,对外出售和交换的部分所占比例不大,而且出售和交换也不以财富积累为目的。这就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个人偶然但集体必然的商品贸易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户出售和交换商品是为买而卖,即为了需要(满足消费)而不得不出售自己的产品。甚至农户发展手工业的原因也是如此:因为需要铁制农具、木制家具、棉织衣服,所以在农忙之余学会了铁匠、木匠、纺纱织布做衣服等。当然,在这些商品交换中,也有一类是为了获利而出售的,如食盐,但这是

由官方垄断的,并不会对自然经济产生冲击。由此,由于农民数量多,是市场的主体,因而无论何种商品交换,都不足以对自然经济产生致命性冲击。即使是手工业生产者,虽然其已经带有商品生产的成分,但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下,他们的主要目的也是解决基本的生活,获取利润的动机并不强烈。此外,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就是官府及其附属机构,如军队、监狱等。从社会生产过程来看,这几乎是一个纯消费的群体,同时又是利用国家政权收取租税、盘剥农民的群体。但实际上,他们搜刮、盘剥来的财富除部分用于军队外,大部分也用于消费。虽然有官营的工商业,其规模相对来说也比较大,但他们相对独立,既没有成为占绝对比重的经济成分,也不会对占绝对地位的小农经济产生冲击。

有人认为,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不发达,或者说没有发展起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的抑制。其实,“抑制”一词并不准确,“限制”规范”可能比较恰当。从现实来看,中国一直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确实与历代统治者所采取的限制和规范措施密不可分。不过,对商品交换的限制和规范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的认识进步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早期的统治者并不歧视商业,而且还采取措施支持商业发展。如一批治国大夫都出身于商贾大户,并在执政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措施。

现实中真正开始限制商业发展并提出相关的规范政策是战国时期的李悝,但这也不能说是其一时兴起,更不能简单认为这是错误的决策。实际上,由于当时商业过度繁荣,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数富商和贵族手里,而其他行业发展极度萧条,再加上诸侯纷争,为了实现国富民强,作为魏文侯和魏武侯宰相的李悝才率先提出“尽地力之教”,认为田地的收成和为此付出的劳动成正比,“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不仅如此,李悝看到商人贱买贵卖农民的余粮,遇到灾荒之年粮价上涨,丰收之年粮价下跌,虽然谷贱则伤农,但谷贵则对士民工商也不利,于是提出实行“平籴法”,这样不管丰年还是歉收之年都能保持粮价平稳,既保护了农民利益,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也兼顾了

士民工商的利益。由此可见,李悝的观点和政策重点不在抑制商业,而是规范商业发展。

真正从理论上阐述规范商业发展的是战国末期的荀子。荀子不仅充分肯定了商业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有无的作用,而且提出了管理商业的具体方法。他指出,要“使宾旅安而货财通”,反对“苟关市之征以难其事”,要“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即要监督和管理各类商品的价格,不使投机商贩有机可乘,对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以致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正常运转者,要给予惩罚。

荀子作为大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为历朝历代所接受,从此中国形成了限制和规范商业发展的思想和一系列政策措施,如西汉时期对工商业限制的“算缗”“告缗”,北魏至唐朝的“均田制”,唐以后官营手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与垄断,元朝对工商业的掠夺,明朝垄断矿山经营和限制民间海外贸易,清朝“海禁”等。

正是由于官府的一系列措施,在规范商业发展的同时也限制了贫富分化的程度和速度,也因此把资本主义经济消灭在了萌芽状态。中国历史上虽有土地兼并和剥夺,但不仅没有出现西方的“羊吃人”运动,也没有发生侵外、特别是以掠夺农奴和财富为目的的侵略,更没有出现过“殖民”运动,因此,既未形成由土地集中造成的资本主义的大土地经营者资本家和大量的脱离了土地的所谓“自由民”,也没有形成大量外来的奴隶充当苦力,土生土长的自耕农和佃农始终是土地的主要经营者。

2.历史上西方的经济发展路径

与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虽然西方国家也曾经历过自然经济阶段,但这一阶段持续时间很短,西方国家走出的是一条自发而野蛮的纯粹商业化之路。这条道路在理论上从最初对所谓的“经济”实则是家庭财富增加的探索开始,到最后成为各种各样的探讨国家、公司、个人(家庭)如何发财的“经济学说”,在现实中则是从家庭(庄园)如何管理和实现物质财富增加开始,其间虽然也经历了初期的重农贬商,但物质利益的驱动使之很快发展到商业至上(重商主义)的国家主义。虽然随着重农学派的出现和商品经济形态的确立,新兴的资产阶级“剽窃”东方文化,标榜个人自由、市场竞争和平等博爱,但实际上他们无不利用“国家”的“合法”干预和

支持,对内圈地掠夺,对外侵略扩张,其目的也都是增加资产阶级的财富。

公元14世纪,西欧各国商品经济活跃,诱发了封建贵族对商品交换媒介—金银—的渴求。对金钱和利润的追求成为商业活动的原动力,这种商业冲动有别于满足基本需求的互通有无的简单交换,商业出现革命性的变化,这带动欧洲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的巨变。

商业发展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重要原因。在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占统治地位时,以其为基础的欧洲分封制度是稳固的,但在城市和工商业发展造成庄园经济解体后,封建割据分裂状态就成为社会经济障碍了。市场秩序的建立和维护、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是贸易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这种保障一般由政治单位提供,因此而支出的费用是贸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范围超过了传统社会中基本的政治经济组织—庄园的管辖范围。贸易的发展要求政治单位在更大的地区规定、保护和实施所有权。商人的活动要求提供更大范围的保护,国王和贵族面对巨额的商业利益,也意识到更大规模的组织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由此,传统的政治单位面临着抉择:或者是将他们各自分割的特权扩大到相邻的庄园,和其他庄园联合行使这一权利,打破封闭的庄园对市场的分割;或者是放弃他们传统的政治特权,拱手让给其他竞争者。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不断发展的贸易使市场联合成一个整体,分割的特权越来越需要改进,市场希望成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政治单位,实现规模优化。在这种不可避免战争、阴谋和动荡中,各国国王与城市结成同盟,削弱封建主的实力,消除分裂,实现政治、经济、军事的集中统一,陆续建立起中央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

商业发展是圈地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为了实现追求财富的目标,新兴的商业资本家利用国家政权“合法”地改变着社会的生产关系。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要达到市场的深度开拓就必须使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都变成仰求于市场的消费者,小生产者必须与生产资料分离。为了完成这个根本性转变,同时也为了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以血与火的剥夺方式实现的。近代农业制度变革最早从荷兰开始,但真正的农业制度革命发生在英国:不论是把圈起来的地变为牧场还是

耕地,都意味着把中世纪农民分散耕种的小块土地集中起来,形成大片土地。土地的所有权重新被界定,原先按照习惯法世袭拥有份地的佃农彻底丧失了对土地的支配权,而地主实际上成为这些大地产的主人。英国的圈地运动意味着资本主义从其产生开始就是建立在血腥的剥夺基础上的。

发展商业,攫取物质财富,也是西方国家对外扩张和新航路开辟的根本原因。早在公元前6世纪—公元1世纪中叶的古罗马共和时期,罗马人就实行对外扩张,逐渐形成了横跨欧亚非的强大国家。对外扩张发展使罗马商业十分发达,各种奢侈品源源不断从各地输入,军事征服使贵族获得大量土地和大批奴隶。公元前3世纪以后,使用奴隶的庄园普遍建立起来,并不断排挤小农经济。农民破产后沦为农业雇工,或转为手工业,大部分则成为城市游民。公元1—2世纪罗马帝国奴隶制达到鼎盛,2世纪以后罗马对外扩张达到极限,奴隶来源逐渐枯竭,奴隶制庄园开始难以为继。14世纪之后,西欧国家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诱发的封建贵族对贵金属的渴求成为西欧国家开辟新航路的原始动因,新航路的开辟不仅标志着西欧国家对外扩张达到新的高潮,更预示着商业成为战争的主要原因。在重商主义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为世界财富的总量是既定的,国际市场是有限的,贸易就是常年的战争,谁在贸易中占据垄断地位,谁就可以充当战争与和平的裁判者。

二、中西方商品经济路径的基础比较

中国和西欧国家都曾经对发展商品经济出现过异议,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异议转化为了政策,为历朝历代所采用,成为限制和规范商品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而西欧的异议则是昙花一现,很快被商品经济的大潮所淹没,化为由“血和肮脏的东西”组成的洪流中曾经有过的一股青烟,西欧国家很快走上了发展商品经济之路,并成就了从大英帝国到超级美国三百余年的辉煌。

1. 不同的思想基础

中国很早就建立了统一的、人口众多且疆域广阔的国家,并基于国家管理而形成了独特的圣人学说——儒道思想。虽然在其后的社会发展演变和朝代变更过程中,统治者“为我所用”地对这些思想

进行取舍和修正,但以其为基础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精髓一直未变。

在儒家看来,人生的目的不为利,国家的目的也不为利。《大学》上讲,人生的过程在学习(修道),人生的目的在“止于至善”,而要达到“至善”,就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家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根本区别,是中国“经世济民”的经济学与西方“家庭理财”的经济学之根本区别,也是决定中国发展道路与西方发展道路之不同的根源。

从现实来看,中国社会各生产主体践行着“知足常乐”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思想准则。如中国最早的商业资本家范蠡因“欠受尊名,……乃归相印”而弃官经商,“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坚持薄利多销,“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孔子的门徒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货”,一生都和商业分不开。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子贡列传,“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与中国文化倡导的观念大相径庭,西欧国家崇尚的是重商主义文化,践行的是物质至上和唯利是图的哲学观念。重商主义最初是作为国家政策出现的,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一些人试图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和阐述,从而形成了重商主义学说。重商主义认为,金银也即货币是财富的主要或唯一形态,国家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金银。财富的源泉有两个:一是金银矿的开采;二是发展对外贸易。由于开采金银矿有条件限制,没有金银矿的国家或地区无法以开矿方式获取财富,因此,获取财富的最主要方式是发展对外贸易。通过对外贸易的方式,一国可以迅速地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财富。

2. 不同的制度基础

应该说,大多数国家都是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商品经济的。不过,自然经济在各国的制度基础不同,由此也决定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方式不同。中国是从“公天下”转向“家天下”后的自然经济,其

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交换自然而然受到了“家”的控制和干预；而西方则是从“公天下”转向了“私天下”的自然经济，其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交换由分散的个体庄园决定，而庄园内严格的等级区分决定了财富增值成为其唯一目的，其所谓的“经济思想”自然就不比中国的“天下观”，而成为家庭的财富观，其所从事的经济活动自然就失去了“义”的约束，而成为“利”的奴隶。

中国很早就是大一统的国家。这种“大一统”的显著特点被称为“家天下”，也就是说，在从原始的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是从“公天下”转变成了“家天下”，帝王把国家政权据为己有，把国家财产当成了一家私产，世代相袭。到了西周时期，进一步提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口号，把天下的土地、臣民都当成君王一家的私产。这种“家天下”一直延续，即使到了封建社会也没有改变。在这样一种制度下，虽然有君臣、上下的等级之分，特别是有的统治者把奴隶或农奴看成“会说话的工具”，但总体来看，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鱼儿离不开水”，统治者把自己比作舟船和鱼，把百姓比作水，反映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必然。由此所决定，中国的思想家都是以“人”为基础、以国家（治国）为目标，因此，中国的经济学是关于“经世济民”的学说。

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欧国家在从原始的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过程中，形成了按氏族或部落划分而成的一个个独立的单位——庄园。从公元5世纪（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1500年）的1000年间，是西欧封建社会形成、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史称“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就是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奴隶社会内部开始产生封建的生产关系，由于日耳曼人对罗马的征服而加速发展起来。大约经历了400年的时间，到公元9—10世纪，最终形成了以封建庄园为典型形态的西欧封建制度。在一个国家里，虽然皇帝、国王、公爵等为最高领主，其他大贵族以向其宣誓效忠来换取封地——采邑，从而成为最高领主的附庸——附属领主，但这些附属领主各自不仅可以拥有从属于自己的附庸和封土内的土地所有权，而且在王权衰落后又逐步取得了王权在地方的权力并将其转化为同封土一并世袭的私人权利，其中包括行政、司法、税收、铸币等权力。如此便构成了西欧完整的

封建等级体系。这样一个等级体系可以包括多个层次，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由三个自由民阶层组成，最高等级是执政的哲学家，中间等级是战士，最低等级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但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不仅奴隶不属于上述三个等级，即奴隶不是国家的公民，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且第三个等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也没有思考和参与政治的能力，只能专门从事经济活动，为其他阶级提供生活资料。

由此可以看出，欧洲的庄园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也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作为这样一个无论从人口还是从地理范围来讲都是非常小的实体单位，再加上其界限分明的阶层划分，政治的合理性“毋庸置疑”，庄园主的地位无人可撼，精神需求也只是庄园主自己的事情，庄园的基本问题就只有产出——物质产出了。因为奴隶也好，农奴也罢，都是以“会说话的工具”而存在的，他们“没有”精神需求，唯有“砖瓦精神”。因此，西方的“经济（学）”源于家庭（庄园），施于家庭（庄园），专于物产。到了凯恩斯时期，虽然出现了“国家”，因而出现了国家管理的需要，但由于路径依赖，他们仍然是用家庭（庄园）管理的微观眼光和视角来看国家、看宏观。正是由此所决定，西欧的思想家以庄园（资本家）为基础、以领主（资本家阶层）发家致富为目标。他们对国家的关心是出于利用国家服务自己的目的，而不同于中国“有国才有家”的理念。因此，西方的经济学是关于资本家物质“财富增长”的学说。

3. 不同的生产关系

中国在封建社会实行的是家天下。既然天下一家，就应不分彼此，也就不需要通过等价交换来互通有无。事实上，在最高统治者与地主、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的是进贡与接贡、交租与收租的关系，而非商品交换关系。但是，由于有消费的不足，特别是一些刚性消费品如食盐等，这就出现了为买而卖的商品交易。而且，与西欧封建庄园不同，中国封建庄园主要是地主式经济，而不是领主式经济。中国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相分离，没有西欧领主在庄园内的行政、司法等特权，中国庄园多搞代役租，佃户和租户也没有西欧那样强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相对自由的身份使偶然的商品交换成为可能。同时，由于家庭农业同家庭手工业、饲养业结合形成的独立的生产和消费单位，一

个农奴家庭一年之中要从事与生活需要相关的各项生产活动,如种植、饲养、采桑、纺织、缝衣甚至打制农具。这种农工结合、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的特点使得除生活必需的食盐、医药等物品需要通过交换获得外,其他几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由于有着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庭,也就有着规模庞大的交换需求,这就形成了个人偶然且数量有限与社会必然且规模庞大的商品交换。

西欧实行的是私天下,基本的经济单位和主体是庄园,国家只是由数量众多且彼此独立的庄园主通过契约组成的联盟。各庄园内部等级分明,如《查理大帝庄园敕令》规定了庄园的封建等级和管理,以及所有权与统治权合一的特性。在庄园中,总负责的管理人是管家,协助管家的有称作侍从的庄头、马夫、收税员,有称为执事人员的看林人、守库人等。庄园劳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超经济强制力,庄园领主既是庄园的所有者,又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庄园的多数居民是农奴,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未经领主许可不得离开。这就形成了庄园内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由于有着多个独立的庄园,彼此之间的交换就成为可能。而交换的结果必然是多胜劣汰,而为了保持多胜而避免劣汰,对内强化剥削、对外扩张掠夺就成为现实。

三、商品经济的两面性与不同路径前景分析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西方商品经济发展路径之不同,是由不同的思想基础(认识)以及与这种认识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上层建筑)所决定的,换句话说,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这一矛盾运动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而生产力是认识自然(也包括人类自身、人类社会)、利用自然的能力。在这里,恰恰是由于对商品经济两面性的认识不同,决定了中西方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成就了中西方不同的发展路径。

当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路径不同,而在于路径结果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对结果的判断就又成为了关键。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民族的圣人就提出了“施诸己而不愿,勿施于人”。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实践和反省,特别是经过了野蛮和杀戮,直到1987年,担任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主席

的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才认识到“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并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即便如此,这一定义直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才取得共识。

实际上,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是时间上的可持续,也包括空间概念,即空间上的可持续。所谓时间上的可持续,就是实现过去、现在、未来的可持续,即过去的所作所为不影响现在和未来,特别是现在的所作所为不能影响未来。所谓空间上的可持续,就是实现我、你、他的共赢,也就是实现三赢。

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再来评判中西方商品经济的功过是非。不可否认,商品经济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但同样我们也必须承认的是,就像人有善恶两面一样,商品经济也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人需要通过教育和法治而抑恶扬善,商品经济也需要通过政策措施而进行规范。

关于商品经济的消极方面,西方早期的思想家早有发现和提醒。如柏拉图认为,在雅典的民主制下,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引起了阶级分化,造成了贫穷、腐化、堕落和不安定,所以,财富与贫穷是社会上的两大罪恶,财富是奢侈放纵的父母,贫穷是卑鄙龌龊的双亲。这种由富人和穷人组成的国家永无太平之日。

正是由于看到了这种缺陷,中国的古圣先贤和统治者们提出并实施了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思想和举措,这些思想和举措也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这些思想和举措在被历代统治者所利用,成为维护其统治工具的同时,客观上影响甚至限制了经济的发展,但这既不意味着古圣先贤不懂商品经济的积极之处,也不意味着商品经济一无是处,更不是说古圣先贤要全盘否定商品经济。

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商品经济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同时存在,积极之处不加控制就会变成消极:商品经济一旦无限度地发展起来,就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把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打上商品的烙印,标上价值的尺码,从而在出现货币拜物教的基础上,不仅使货币转化为资本,也使人失去了“以人

为本”的心态和状态,成为了货币和资本的奴隶,成为经济动物。西方早期的商品生产者虽然不一定看到商品经济的优势,但肯定看到了自身的优势,即掌握和拥有资源,从而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顺势而为”“自由发展”,客观上发挥了商品经济调动包括人在内的资源的积极作用;而中国则是真正看到了商品经济“恶”的一面,通过“克己复礼”,在规范和引导人性、限制人性恶的一面发挥作用的同时,规范和引导经济向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小农经济具有规模狭小、经营分散、经营方式保守、生产条件简陋、无力扩大再生产以及排斥进步因素、抗灾能力弱等缺点。这种评价可能反映了一定的现实,但未必是正确的。一是,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形成占统治地位的小农生产,能不能不形成?这一问题历史已作了最好的回答,显然是不能用西方经济学惯用的“假设”或现在的思维来臆测和判断的。二是,小农生产就不能通过协作而扩大规模?中国文化中并不缺乏协作的内容,小农之间的协作事实上也并不少,只不过是没形成资本主义的大农场,这是中国“人本”文化区别于西方“物本”文化的结果。三是,一个国家或社会是否可能只存在“大农场”?与此相关联,小农之“小”可否类同于现代的小企业?社会是否可能只存在大企业?这显然也无须回答。

当然,必须明确,我们这里并不是为自然经济辩护,而是要为管理商品经济作证。自然经济作为一种存续了两千多年的经济形式,早已翻过自己光辉的一页,剩下的就是任人评说。而中国发展商品经济显然需要管理,否则就会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重犯资本主义的错误。

四、中国商品经济的出路选择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提供了表面上看来平等的机会,但并没有提供平等发展的实质性条件;中国过去的“家天下”表面上亲似一家,实则亲疏远近相差万里。当代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私天下”和封建社会“家天下”的否定,完全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更高层次的“公天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中国对“公天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高度概括,是“以人为本”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具体诠释。因此,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之路就概括为以人为本、积极创新、共享共赢。

1. 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说商品交换是一次“惊险的跳跃”,不仅反映了商品交换的严酷,更提醒了我们商品生产的本质——只有为更多的人服务,只有满足更多人的需要,商品交换和生产才能成功。

以人为本,首先意味着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二者的统一构成以人为本的完整内容。同时,由于人类生活的世界是由自然、人、社会三个部分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人不仅不能离开自然和社会而存在,而且必须以自然和社会为条件,因此,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性和谐发展。因此,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既不是以哪一部分人为本,也不是简单地把人看成世界的主宰,而是把人类看成一个整体,同时把人类这一整体放在自然界之中,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 积极创新

抓创新首先要抓教育。因为所有的创新归根结底是人的“创新”,是人的变化——人的进步和人的能力提高。由于人不可能事事都经过实践,人们在直接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增长才能、提高认识水平会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在现代社会,人的能力的提高更多地是通过接受间接经验,即受教育而取得的,因此,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

抓创新要注意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因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本来就是人类的两面,本来就是互为条件,离开任何一个方面,或者说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造成科学的畸形发展,而畸形发展的科学显然就不再是真正的科学,不再是为人类共同利益服务的科学。西方把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当成了战争的工具就是很好的证明。

抓创新特别要注意抓体制机制创新,要调整一切不适应创新、不利于创新的生产关系和规章制度,最大限度地释放创新活力。

3. 共享共赢

中华文化是“大”文化,“大”的具体体现就是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华文化是“德”文化,所谓“施人为功、归己为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中华文化是“和”文化,《国语·郑语》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此即阴阳和合而生万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在刺激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就包括结构不平衡问题,如居民收入的行业、地区、城乡、贫富差距,垄断企业与中小企业发展的差距,企业收入分配的大股东与小股民、高管与职工的差距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也是中国实现国内协调和共享、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保障。

国际共享既是中国文化“平天下”“济天下”的体现,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成为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重要条件和驱动力。实现国际共享,就要注意学会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过程中,一要善于学习,真正了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能道听途说,不能人云亦云,不能想当然。二要注意把文化与个

人、把中华文化与封建统治区别开来。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奋斗智慧的总结,是中华民族仍然屹立、并将继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法宝,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冯彦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引擎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19(1).
- [3]侯辉.荀子重农思想探析[J].农业考古,2013(1).
- [4]孙自铎.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展与思考[M].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
- [5]高德步.世界经济通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6]姚开建.经济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7]伊拉莎白·拉蒙德.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M].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8]A.E.门罗.早期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选集[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9]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Comparisons and Choices of Commod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Concurrently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and Origin in Economic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Feng YanMing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based on the goals and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unified state management, decentralized farmer management, and commercial normative development; while in the west, the purpose an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profit-making is the means of commercial development, the manor (capitalist) decentralized operations, plundering the inner enclosure and conquering aggression externally through political alliances (states and national alliances). The ideological premise of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is safe and easy, and the common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state and the family. The ideological premise of western development is to be profitable and to become wealthy by slave owners, aristocrats, and emerging bourgeois individuals. As a result, China's economics is national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western economics is home finance and wealth-making. Therefore, it has brought about different result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o take the people-oriented, actively innovate and share the win-win road of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ommodity Economy;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ople-oriented

(责任编辑:晓 力)

区位市场设计理论及其应用*

沈体雁 崔娜娜

摘要:古典区位论、近代区位论、现代区位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及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等都将区位视为一个被动的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这是传统区位选择理论的破缺。基于双边匹配的区位市场设计理论将区位视为一个利益主体,将企业区位选择看作企业与区位(地方政府或开发区管委会)之间为了获得土地及其相应资源而进行的合作博弈。基于区位市场设计理论的工业用地市场设计将企业区位选择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双边匹配,将厂商选址与工业用地出让有机结合,将单边盲目搜寻变为双边有效匹配,将各地分散市场变成全国集合交易,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关键词:双边匹配理论;市场设计;工业用地;企业区位选择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1-0063-07 **收稿日期:**2019-09-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双边匹配理论的企业区位配置模型与区位市场设计”(7147300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产业集群地图系统(CCM)建设与应用研究”(17ZDA05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产业集聚演进与新动能培育发展研究”(71733001)。

作者简介:沈体雁,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崔娜娜,女,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讲师(北京 100044)。

企业区位选择的理论经历了从古典区位论、近代区位论到现代区位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演变过程,但这些理论忽略了区位的主动性,仅将区位看作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而非利益主体。企业区位选择是企业单向收集信息并进行选择的过程,而较少关注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具有某种利益结构的区位或地方之间的策略行为或交易规则。企业区位选择问题本质上是开发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一对多双边匹配问题,是企业的区位选址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策略行为,是企业为了获得土地资源而和地方政府进行的合作博弈。

传统经济学多研究以价格为中心的市场机制和制度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价格机制可以实现市场的供需平衡,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机制面临价格不能实现资源

有效配置的难题,例如,考虑到社会保障和公平问题,公立学校录取学生不能以缴纳学费的高低来决定。但在这种情况下,分配仍需继续。如何才能得到有效的分配结果? Roth 和 Shapley 从市场设计、匹配算法的角度解决了这一问题,基于双边匹配理论的市场设计已被应用于解决医学生就业、学校招生和肾脏交换等双边问题。本文将双边匹配引入企业区位选择中,提出基于双边匹配的区位市场设计理论。

一、传统区位选择理论的破缺

企业在区位选择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原材料成本、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等因素,还要考虑地方的产业集聚程度、营商环境、消费者偏好等因素。传

统的区位选择理论从关注成本、追求利润等视角对企业区位选择进行了解释,然而,企业区位选择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决策过程,当前中国工业企业投资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传统区位选择理论对于实际问题的无能为力。

1.传统区位选择理论忽略了区位的主动性

企业区位选择模型是区位理论的核心(Beckmann, 1999)。在古典区位论中,区位是一个被选择的空間载体。古典区位论关注的重点是单个经济组织在一定的地域空间中如何通过选择优势区位来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以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为代表。这里的区位只不过是与成本密切相关的因子而已,如新鲜蔬菜、不便运输的果品会选择离城市较近但租金较高的区位,即杜能圈的第一圈——自由式农业圈;工业企业(工厂)的最佳区位点就是综合成本最低点。区位选择的主体是单一企业,且单向收集信息。

近代区位论从关注成本转向追求利润,但此时区位仍是一个被选择的空間载体,最多只是作为某种市场潜能的体现,而不是对企业具有某种选择和分类作用的市场参与者。近代区位论以霍特林的空间竞争理论以及克里斯塔勒和廖什(Losch, 1940)的中心地理论为代表,尝试建立一般均衡的空间分析框架,即不再从单个企业的利益角度寻找最佳区位,而是从总体均衡的角度揭示整个系统的配置问题(黄以柱, 2013)。杜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廖什等人的模型被艾萨德整合为一般区位论的统一框架,区位问题可以被表述为:厂商在权衡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时,做出的任何成本最小化或利

润最大化的决策。

现代区位论是为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区位选择的复杂性而出现的各种区位理论的集合。现代区位论的主要学派包括运输区位论学派、市场学派、成本—市场学派、行为学派等,每种学派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仍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将区位作为某种市场参与者,将企业与区位之间的双向选择及其实现稳定匹配的可能性作为区位选择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

新经济地理学基于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等假设下的一般均衡框架,从劳动力流动、联系效应和异质性企业等角度研究企业区位的选择及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等,但是仍然不能回答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核心、外围地区之间的策略行为对区位选择结果的影响等问题,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与博弈论相结合无疑是区位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

2.对传统区位选择理论的评述

从企业区位选择理论的发展沿革来看,古典区位论、近代区位论、现代区位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等(见表1)现有企业区位选择模型(即单边区位理论)仅把区位当作某种空间单元,区位及其相关联的原材料商、市场、政府、其他利益相关者、运输成本、收入等因子均是被其占有者——企业单向收集信息并进行选择的。传统区位选择理论没有把区位当成一个利益主体,较少关注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具有某种利益结构的区位之间的策略行为或交易规则,仅把区位当作某种空间单元而纳入理论分析。

上述各种区位理论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区位及其所承载的原材料商、市场、政府、其他利益相关者并不仅仅被动地被选择,同时也是区位空间所

表1 区位理论的主要流派

	古典区位论	近代区位论	现代区位论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起源时间	19世纪20年代	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50年代	20世纪90年代
代表理论	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	中心地理论、市场区位论	运输区位论、成本—市场学派、行为学派等	贸易与经济活动区位
代表人物	Thünen, Webber	Christaller, Losch, Perroux	Isard	Krugman
考虑因素	成本最小化	利润最大化、市场最优	区位优势	规模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随机性
研究方法	单一因素/静态分析/局部均衡	多重因素/一般均衡	非经济因素/动态均衡	非线性静态数学模型
选择主体	单一企业	多个企业	多个企业	多个企业
选择方向	单边	单边	单边	单边
区位角色	空间载体	空间载体、市场潜能	空间载体	空间载体
区位市场	地租市场	城市服务的市场区、工业企业销售的市场区	运费市场、利润市场、满意度市场、政府政策市场等	工业区位市场、办公区位市场、零售区位市场

资料来源:齐子翔,于瀚辰:《区位选择、双边匹配与化解产能过剩的机制设计》,《改革》2015年第9期。

有者或代理人主动寻求符合其利益诉求的土地开发者(企业)的过程。因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区位选择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企业与企业之间,特别是位于价值链上下游的关联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本地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策略性行为。区位空间的代理人(通常为政府)与区位空间的占有者(通常为企业)作为具有不同利益目标的代理人主体,其选择偏好因素应当同时被纳入区位选择模型中,而这正是现有区位选择理论的破缺之处。

二、重构区位选择理论——区位市场设计理论

针对传统区位选择理论存在的破缺,Roth和Shapley的稳定配置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为企业与区位之间匹配及交易机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本文将Roth和Shapley的双边匹配理论引入区位选择理论中,将企业区位选择视为企业和区位之间的双边匹配,提出了区位市场设计理论的定义、科学问题、理论假设、与传统区位选择理论的区别、双边匹配算法等。

1. 双边匹配理论

市场的重要功能是促成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易。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由于市场参与者之间没有办法形成稳定配对,市场交易最终无法实现或者交易效率低下。通过设计某种交易规则和市场机制,如建立集中的中央撮合平台,可以将市场参与者匹配起来,从而促成交易的完成。对这项市场功能进行系统化研究的就是双边匹配理论。

双边匹配理论开源于1962年美国布朗大学的学者Gale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Shapley的论文,文中研究了学生入学匹配和婚姻匹配的问题,开创性地研究了稳定匹配的存在性、最优稳定匹配、递延接受算法和匹配问题的线性规划等,为双边匹配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最早明确公开提出双边匹配概念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Roth,他在1985年发表的论文中明确界定了双边和双边匹配的概念,即双边是指事先被指定好的两个互不相交的集合,双边匹配是指在这些市场中双边代理人的匹配,并分析了双边匹配的现实案例。尽管他们的研究是各自独立完成的,但Shapley的基础性理论和Roth的实践性调查完美结合,产生了一个繁荣的研究领

域,改善了许多市场的表现。2012年,Roth和Shapley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鼓励他们在稳定配置理论及市场设计实践上所做的贡献。

按照匹配主体数量的不同,双边匹配可分为一对一、多对一和多对多等3种类型。其中,一对一的双边匹配属于最简单的双边匹配,如婚姻匹配;多对一匹配往往是机构和个体的匹配,如大学招生、企业和求职者的匹配;多对多的匹配则研究难度较大,相关研究鲜少涉及。双边匹配理论最早被用在国外婚姻匹配的研究上,随后被Roth应用到医学实习生和医院的匹配上,以及学生的入学匹配问题、器官移植问题等。目前双边匹配理论被应用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如劳动力市场中人与组织的匹配、电子商务领域中买家和卖家的匹配等问题。

2. 区位市场设计理论的定义、科学问题

区位市场设计理论将双边匹配理论引入企业区位选择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领域,将区位看作市场参与者,将企业区位选择看作企业与区位之间为了获得土地及其相应资源而进行的合作博弈,主要解决以下几个科学问题:一是企业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和区位之间能否形成稳定配对、能否达成交易;二是如何使稳定配对的结果不受个别市场参与者策略行为的干扰;三是如何通过市场机制与交易规则的设计促进企业与区位的稳定配对以及各具特色的地方产业集群。

区位市场设计理论使用集中清算的双边匹配机制,本质上是用中央计划者代替分散的个体决策,参与区位市场的个体只需明确自身偏好序,即仅关注自身的需求,而不必陷入真实市场的信息搜寻、讨价还价等细节中,参与者给出明确的偏好序之后,由中央匹配中心集中运行一个类似分散决策的程序决定最终匹配结果,其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区位市场设计理论为传统区位选择理论长期不涉及的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策略性行为、交易规则、搜寻成本和交易的稳定性等问题打开了一扇窗户,为地理空间相关的市场设计提供了新的经验知识,具有独特的科学意义和理论价值。

3. 理论假设

作为市场设计领域的先驱,Roth总结了在市场设计中的经验和教训,并归纳了市场良好运行所必需的条件。区位市场设计作为市场设计中的一个应用分支,要使区位市场设计运行良好,同样需满足市场

设计中的基本条件(Roth,2008;李宝良等,2012)。

第一,区位市场必须有足够的厚度,即必须能够吸引足够多的潜在交易者进入区位市场交易,这样区位市场才是稠密的。第二,克服区位市场厚度不够所导致的区位市场拥挤,允许区位市场参与者在充分考虑各种可能的交易机会后选择自己满意的交易,这个条件可以通过提供足够的时间或者使交易尽快完成来满足。第三,保证参与区位市场交易比场外交易更加可靠、安全,并且尽可能简单,不会因策略性行为的干扰而导致福利减少。

4.与传统区位选择理论的区别

传统区位选择理论大多局限在区位主体如何根据现有条件投资设厂,仅仅把区位当作某种空间载体,而非某种利益主体,忽略了地区主体为招商引资与潜在对手开展积极的区位竞争。因此,传统区位选择理论是单边的。原有的区位市场或空间市场是一个分散性的市场,集合性的价格机制很难发挥作用,这是因为由于空间范围和空间距离的限制,企业与其投资目的地、地方政府与其目标招商企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且解决的只是一个局部性的区域经济问题,追求区位选择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而区位市场设计理论是双边的,区位不再是简单的空间载体,而是需要与之博弈的重要市场参与者,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地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均存在策略互动,解决的是一个全局性的宏观经济问题。现有的区位市场设计使用的是双边匹配的集中清算机制,这种清算机制解决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信息表达更充分,出让机制优于价格机制,追求匹配规则的设计和匹配的稳定性。区位市场设计理论与传统区位选择理论的区别见表2。

5.双边匹配算法

本文以企业区位选择为例,介绍双边匹配算法。企业选址一般集中在开发区,开发区管委会是实质上的政府意志代理人,而进驻开发区的企业成为最大受让群体。因此,企业区位选择问题本质上是开发区(development zones)和企业(companies)的一对多双边匹配问题。

第一,基本主体定义。在开发区和

表2 区位市场设计理论与传统区位选择理论的区别

主要区别	传统区位选择理论	区位市场设计理论
选择主体	企业	企业、地区
选择方向	单边(n 对1)	双边(n 对 m)
区位角色	空间载体	利益主体
策略互动	不明显	明显
市场特征	分散性市场	集合交易
空间尺度	局部性	全局性
信息表达	信息不对称	信息充分
选择机制	价格机制	双边匹配
追求目标	利益主体的最大化	规则的设计,匹配的稳定性

企业的双边匹配模型中,存在两类主体集合,即企业集合 $C=\{C_1, C_2, \dots, C_n\}$ 和开发区集合 $Z=\{Z_1, Z_2, \dots, Z_n\}$,每个企业 C_i 试图进驻一个开发区,每个开发区 Z_j 试图招商 q_j 个企业。假设:任一企业 C_i 对可接受的开发区有完全的、可传递的、严格的偏好序;任一开发区 Z_j 对可接受的企业也有完全的、可传递的、严格的偏好序,即不存在两个同样好的选择。匹配算法将企业和开发区都视为实体 E (Entity),全体企业和开发区构成的集合称为实体全集 ES。匹配结果为 $C \times Z$ 的一个子集 M , M 中的每个元素是一个企业和一个开发区的匹配对,在 M 中每个企业只出现不超过1次,每个开发区出现不超过 q_j 次。需说明的是,企业区位选择的偏好序,是根据企业对开发区地理位置、产业集群规模、基础设施水平、优惠政策、市场潜力等因素的综合评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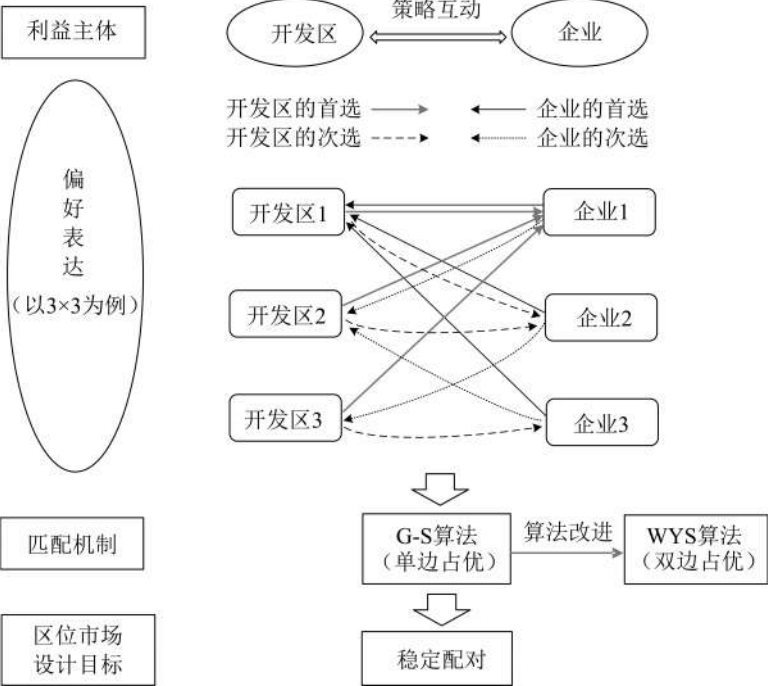


图1 区位市场设计理论框架图

到的;开发区招商引资的偏好排序,是根据开发区对企业的注册资本、纳税额、所属行业、就业带动情况、污染物排放水平、规划要求等因素的综合评价得到的。

第二,传统双边匹配G—S算法。G—S算法是双边匹配理论的核心,该算法包含两大定理,即稳定配对的存在性以及匹配的稳定性与最优解。该算法能从任何偏好排序清单开始产生一个稳定的匹配,匹配步骤最多经过 n^2-2n+2 个。匹配的一方主体向另一方主体提出要约,另一方主体对自己接到的要约进行考虑,然后“抓住”自己青睐的,拒绝其他的。这里的“抓住”就是延迟接受,而不是立即接受,因此G—S算法又称延迟—接受算法。要约被拒绝后,一方主体才可以向另一方的其他主体发出新的要约。

将G—S算法应用到区位市场设计理论中,步骤描述如下。步骤1:每个开发区向其偏好序最高的企业发出招商匹配邀请,收到至少一个邀请的企业从这些邀请的开发区中选择其最喜欢的,拒绝其他开发区;步骤2:被拒绝的开发区向其下一个偏好的企业提出匹配邀请,收到至少一个邀请的企业从这些邀请的开发区和上轮其最喜欢的开发区中选择其最喜欢的,拒绝其他开发区……步骤K,上轮被拒绝的开发区向其偏好序列中下一个最喜欢的企业提出匹配邀请,收到至少一个邀请的企业从这些邀请的开发区和上轮其最喜欢的开发区中选择其最喜欢的,拒绝其他开发区……终止:如果所有的企业只收到一个邀请,则算法终止。匹配结果才可以执行。

为了便于理解,本文进一步简化,以图1中3个开发区和3个企业的双边匹配为例进行分析。假设:开发区对企业的偏好序为,开发区1:企业1>企业2>企业3,开发区2:企业1>企业2>企业3,开发区3:企业1>企业3>企业2;企业对开发区的偏好序为,企业1:开发区1>开发区2>开发区3,企业2:开发区1>开发区3>开发区2,企业3:开发区1>开发区2>开发区3。按照G—S算法,则匹配结果是:开发区1—企业1,开发区2—企业2,开发区3—企业3。

第三,可调整个体优先级WYS算法。传统的G—S算法主要存在以下3个问题:一是单边占优,

即率先发出申请的一方总体效用优于被动接受申请的一方;二是缺乏最低保障,可能导致部分参与者效用极低;三是调控空间不够灵活,G—S算法最多产生两个稳定匹配结果,即两个单边占优的结果,而无法细致调节每一个参与主体的优先顺序(Roth,2008;王彦博等,2018)。为了更好地解决单边占优问题、最低保障问题和提供灵活调控个体优先级的机制,本文提出了新的WYS算法。

该算法维护一个无序集合L和一个有序队列T:L在初始时包含全集ES中的所有实体,初始时为空,然后启动第一轮外层循环;循环过程中会不断调用Apply函数,每次调用Apply函数都意味着某个实体向另一个实体发出了匹配申请;在Apply执行过程中有可能解除某些暂时的匹配,被解除匹配的实体会被放入T中,下一轮循环优先让T中的实体发出申请。算法框架见图2(王彦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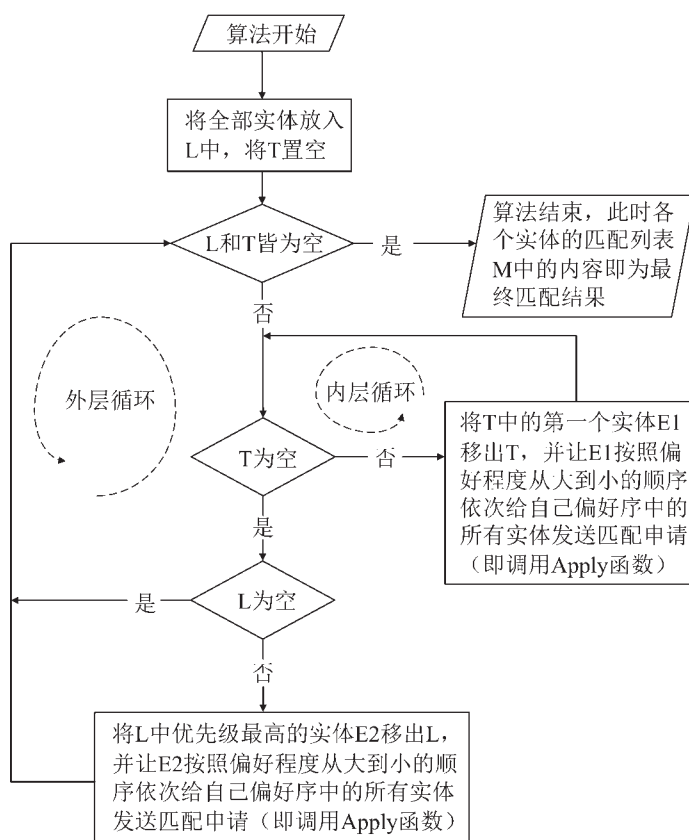


图2 WYS算法框架

等,2018)。

三、区位市场设计理论的应用领域

区位市场设计理论考虑了区位的主动性,将区位视为市场主体之一,具有较为广泛的应用领域和

前景,尤其可应用在中国工业用地市场中企业选址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匹配上,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中国工业用地出让中存在的分散决策、信息不对称、搜寻成本高等问题。

1.中国工业用地市场设计

目前,中国工业企业区位选择和工业用地市场面临很多问题,一方面,对地方政府而言,出现招商目标过于集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企业区位选择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等困难。工业用地市场具有分散性、垄断性、策略性行为等特征,是一个典型的双边匹配市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政府为了推进招商引资,大量、廉价地出让工业用地,尽管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也造成了低水平重复建设、土地资源浪费等问题。为改善这一局面,国土部门推出了市场化出让、最低限价、规定建设指标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但效果不理想。为推进工业用地市场化,2006年以来国土部门规定工业用地逐步向市场化方向转变,即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但是工业用地市场存在明显的市场失灵,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分散决策。工业企业和地方政府各自从市场中搜寻潜在匹配对象,经过反复考察协商后确定自己的匹配对象。二是市场总体规模巨大。

大量工业企业的生产建设并不依赖于特定区位,其在全国范围内有广阔的选址空间。三是局部垄断,全局竞争。虽然各个地方政府垄断本地供给,在全国超大地域范围内形成了众多局部卖方市场,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工业企业的高流动性又使得工业用地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四是信息不对称。在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现象频发。五是竞争过度。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诉求强烈,对于龙头企业、优质项目招商往往不惜代价,形成白热化的引资竞争。六是搜寻成本过高。无论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还是工业企业选择区位,都缺乏系统性的信息获取渠道。工业用地市场的上述特点恰好切合双边匹配机制的适用场景,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工业用地市场的双边本质,设计出符合其市场特性的双边匹配机制来帮助市场达成稳定匹配。

为解决这一问题,引入双边匹配机制,将区位市场设计理论应用到工业用地市场设计中,即将区位视为市场主体,将工业用地出让视为企业与区位之间的双边匹配,将区位及其所承载的地方政府的选择偏好因素纳入工业企业区位选择模型中,通过集中计算的双边匹配出让机制进行匹配。其出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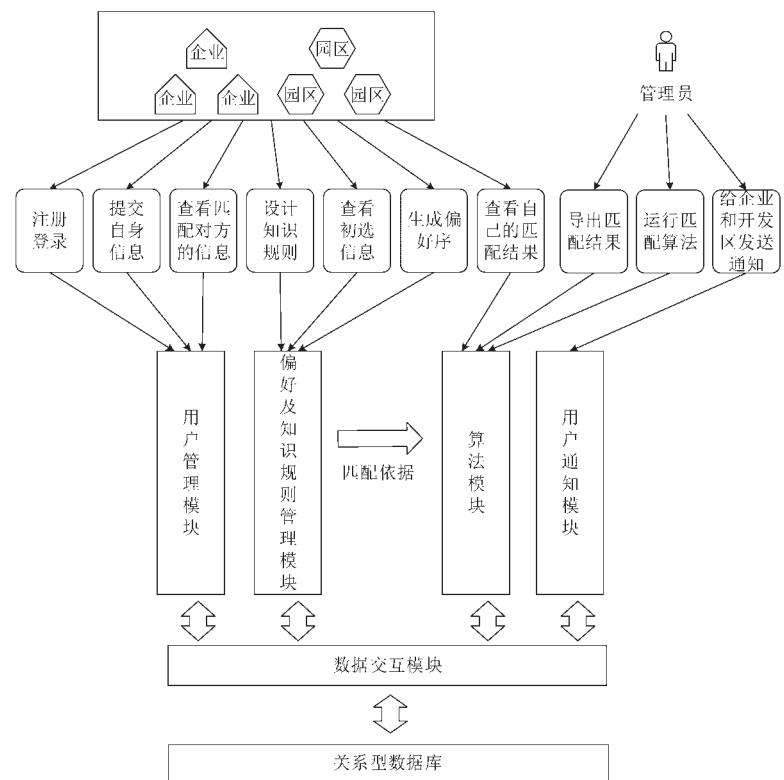


图3 企业与开发区双边匹配架构

流程包括:企业和开发区的信息上传与信息披露、填写匹配要求、确认候选名单、线下沟通谈判、确定偏好序、管理结构调整优先级,以及运行匹配算法并生成匹配结果等7个步骤。为此,本文建议将工业用地出让由分散化决策的价格机制逐步改变为集中清算的双边匹配机制。建立一个基于Web的服务平台,企业和开发区均可在平台上注册登录、填写偏好序,由管理员负责运行匹配算法,完成匹配流程(见图3)。

2.其他领域的应用

除工业用地市场领域外,区位市场设计理论还可以应用在公共租赁住房的匹配、充电桩和新能源汽车的匹配、学区的匹配等方面。

以公租房为例,解决好公租房配置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在公租房分配中,价格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需要建立良好的分配体系。现实生活中,在公租房分配中,大多数城市以随机摇号方式给出选房优先序,这种分配方式效率高,但导致弃号现象屡屡发生。究其原因,轮候人的偏好没有很好地被表达出来。公租房的分配表面上看是公租房和轮候人的双边匹配,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房屋区位和轮候人的双边匹配。因为区位是房屋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轮候人选择的不仅仅是公租房,更重要的是公租房所在的区位及区位上附属的学校、公园、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因此,可将区位市场设计理论引入公租房的配租分配中,用轮候人的偏好取代价格,并作为公租房达到有效匹配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 [1] BECKMANN M J. Lectures on Location Theory [M].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1999.
- [2] LOSCH. 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 [M]. Jena: Fischer, 1940.
- [3] 黄以柱.经济地理学简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3.
- [4] GALE D, SHAPLEY L. College Admiss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Marriage[J]. 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 1962(1).
- [5] ROTH A E. Common and Conflicting Interests in Two-Sided Matching Market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85(1).
- [6] YASHIVE. Labor Search and Matching in Macroeconomic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7(8).
- [7] 赵希男, 温馨, 贾建锋. 组织中人岗匹配的测算模型及应用[J]. 工业工程与管理, 2008(2).
- [8] JUNG J J, JO G S. Brokerage Between Buyer and Seller Agents Using Constraint Satisfaction Problem Models[J].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2000(4).
- [9] 徐晓辉, 陈剑. 关于产品电子商务匹配度的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00(4).
- [10] SORENSEN M. How Smart is Smart Money? A Two-Sided Matching Model of Venture Capital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7(6).
- [11] Roth A. E.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Market Design? [J]. Innovations: Technology, Governance, Globalization, 2008(1).
- [12] 李宝良, 郭其友. 稳定配置与市场设计: 合作博弈理论的扩展与应用——201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夏普利和罗思主要经济理论贡献述评[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2(11).
- [13] 王彦博, 于瀚辰, 沈体雁. 可调整个体优先级的双边匹配算法[J].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18(11).
- [14] 邓红平, 罗俊. 不完全信息下公共租赁住房匹配机制——基于偏好表达策略的实验研究[J]. 经济研究, 2016(10).

Location Market Design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Shen Tiyan Cui Nana

Abstract: Classical location theory, early modern location theory, modern location theory,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 and new-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 all regard location as a passive space carrier of economic activities, which is the weakness of traditional location theory. Based on bilateral matching, the location market design theory regards location as a stakeholder, and regards the location choice of the enterprises as the cooperative game between the enterprise and the location (local government or development zone management committee) in order to obtain land and its corresponding resources. The industrial land market design based on the location market design theory will match the location choice of enterprises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investment promotion, combine the location of the manufacturer with the transfer of industrial land, and transform the blind search on one side into a bilateral effective match, and turn the scattered market into a national collective transaction, which can reduc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improv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Key Words: Bilateral Matching Theory; Market Design; Industrial Land; Location Choice of the Enterprises

(责任编辑:张子)

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及其评价研究^①

刘英奎 吴文军 李媛

摘要:营商环境建设与营商环境评价是近年来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一些国际组织、政府部门、投资促进与学术研究机构已开始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实践。结合国内外开展营商环境评价时间较早、评价指标体系较完善、影响较大的两大机构——世界银行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营商环境评价实践,就营商环境建设意义、研究方法、评价指标体系及中国营商环境建设成就与不足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简要评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可为各地区、各行业开展营商环境评价提供启发和借鉴,并为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世界银行;中国贸促会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1-0070-09 **收稿日期:**2019-11-19

作者简介:刘英奎,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研究院国际投资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032)。

吴文军,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研究院国际投资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32)。

李媛,女,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研究院国际投资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32)。

当前,世界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国际经贸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上升,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和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攻关期,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营商环境面临巨大挑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不断推出力度空前的政策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记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按照扩大开放的需要修改完善法律法规,在行政许可、市场监管等方面规范各级政府行为,清理废除妨碍公平竞争、扭曲市场的不合理规定、补贴和做法,公平对待所有企业和经营者,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李克强总理也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就是竞争力”,强调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竞争力、释放国内市场巨大潜力。这些重要指示既对中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营商环境建设指明了方向。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的统一部署,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营商环境建设工作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中国营商环境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营造国际一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仍然任重道远,还要付出艰苦努力。

从不同角度出发,可以建立不同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一般认为,当今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别竞争力评价标准主要有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但以营商环境评价命名、在国内影响较大、较成体系且经过多年较大规模实践验证的营商环境评价,主要有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促会)的营商环境调研报告。

一、世界银行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评价

1.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方法

世界银行是最早开展对各国营商环境评价的

国际组织之一,自2003年起即开始对世界主要经济体进行营商环境调研、评价和排名并发布研究报告,目前已覆盖全球190个主要经济体。世界银行评价已成为各国营商环境优劣的重要参考,也成为引导各国营商环境建设的风向标。

经过十几年的探索、整理和归纳,世界银行建立了一套已被广泛认可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10个重要指标构成,分别是开办企业、申请建筑许可、获得电力供应、注册财产、获得信贷、投资者保护、缴纳税款、跨境贸易、合同执行和办理破产等。同时,该指标体系也在进行动态调整,近期又增加“营商环境便利度”指标。

2.世界银行中国营商环境评价结果

根据世界银行的评估,中国近年来营商环境建设取得巨大成就,2018年在190个经济体中位列第46位,较2017年年度的第78位上升了32位;2019年度中国营商环境总体评价为77.9分,比2018年上升4.26分,排名也由2018年的全球第46位,再次提升15位,位列31位,为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发布以来中国最好名次。中国已连续两年位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是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唯一一个进入2019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10大最佳改革者名单的经济体。

3.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特点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是世界银行设计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简明扼要,可量化,比如将开办企业指标分解为办理程序、办理时间、办理费用和开办有限责任公司所需最低注册资本金等4个二级指标,通过指标测评可以将复杂的定性分析定量化,极大地简化和便利了营商环境评价工作的开展;二是世界银行通过自身强大的国际组织品牌效应和全球工作网络,十几年持之以恒地对各国营商环境进行评价,这一不懈努力对于推动各国开展营商环境评价,促进各国营商环境优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环境评价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其评价指标设计较为单一。营商环境涉及内容广泛,领域众多:从时间跨度上看,包括企业设立、生产、经营到撤销的各个环节;从具体内容上看,包括涉企法律法规政策以及政府管理、服务的方方面面,10项指标难以全面覆盖;二是在评价城市样本量较少,比如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评价仅监测

北京、上海两个城市,上海的权重为55%,北京的权重为45%。实际上,京沪地区的营商环境在国内属于一流水平,与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北京、上海的营商环境不仅难以代表中西部地区,甚至无法代表东部地区的整体水平。三是从测评结果看,世界银行的评价也与中国营商环境建设状况存在一定偏差,比如在2016年、2017年两个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力度较大的年份,世界银行的评价排名却停滞不前,中国都是第78位;而到了2018年突然前进32名,取得了第46位的好成绩,2019年在上年基础上,再次前进15名,世界排名第31位。我们在为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难免也对其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全面性、准确性、严谨性产生了一定疑虑。

二、中国贸促会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评价

1.中国贸促会营商环境评价方法

中国贸促会是最早组织开展全国性营商环境调研和评价的部委机构之一,在中国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建设及营商环境大规模企业评价方面开国内先河。自2016年起,中国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部、贸促会研究院即开始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在参照借鉴国内外营商环境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包括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基础上,建立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经过四五年的反复论证、补充、完善和实践验证,目前已建立起由12个一级指标及51个二级指标组成的一套较完整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12个一级指标包括基础设施环境、生活服务环境、政策政务环境、社会信用环境、公平竞争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科技创新环境、人力资源环境、金融服务环境、财税服务环境、口岸服务环境以及企业设立和退出环境。每个指标取值范围为1—5分,分值越高,评价越高。

2.中国贸促会的中国营商环境评价结果

根据中国贸促会中国营商环境企业问卷调查,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总体评价良好,超九成受访企业(90.5%)认为中国营商环境为较满意及以上,九成以上企业(91.6%)认为近3年营商环境获得改善,受访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为4.3分。

表1 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及其权重设置

一级指标及权重	二级指标及权重		
基础设施环境(1/12)	交通运输(1/5) 水电气供应(1/5)	网络通信(1/5) 城市规划和建设(1/5)	环保设施(1/5)
生活服务环境(1/12)	居住条件(0.16) 教育水平(0.17)	医疗卫生(0.17) 环境保护(0.17)	文体设施(0.16) 社会治安(0.17)
政策政务环境(1/12)	政策稳定性(1/7) 政策透明度(1/7) 政策执行力度(1/7)	政策公平性(1/7) 政府服务效率(1/7) 政策协同性(1/7)	官员廉洁程度(1/7)
社会信用环境(1/12)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建设(1/4) 社会信用度(1/4)	失信惩戒、守信奖励机制建设(1/4) 征信体系建设(1/4)	
公平竞争环境(1/12)	市场监管(1/4) 政府采购(1/4)	行政垄断治理(1/4) 市场准入(1/4)	
知识产权保护环境(1/12)	知识产权维权成本(1/5)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5) 知识产权管理与公共服务(1/5)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1/5) 知识产权案件办结率(1/5)	
科技创新环境(1/12)	研发抵扣政策实施(1/5) 产学研结合(1/5)	知识产权抵押(1/5) 创业孵化服务(1/5)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1/5)
人力资源环境(1/12)	熟练劳动力的可获得性(1/4) 外向型人才的可获得性(1/4)	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可获得性(1/4) 创新创业人才资源可得性(1/4)	
金融服务环境(1/12)	融资便利性(2/5)	融资渠道多元化(2/5)	利润汇出自由度(1/5)
财税服务环境(1/12)	财税执法规范性(1/2)	申退税办理时间(1/2)	
口岸服务环境(1/12)	货物通关(1/3)	检验检疫(1/3)	人员出入境(1/3)
企业设立和退出环境(1/12)	土地获取(1/3)	环保手续(1/3)	破产手续办理(1/3)

动态看,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企业评价分值比2018年明显提升。2018年中国营商环境总体评价为4.17分,2019年为4.3分,2019年比2018年评分提升3.12%;2018年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为较满意以上企业占87.5%,2019年为90.5%,提升3个百分点。

3.中国贸促会营商环境评价特点

相比于世界银行,中国贸促会的中国营商环境评价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内容比较全面,既包括硬环境指标,也包括软环境指标;既有量化指标,也有定性指标,基本涵盖了中国营商环境主要方面。二是遵循问题导向原则,针对当前营商环境建设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设置测评指标,比如,设置了公平竞争环境指标、科技创新环境指标、人力资源环境指标、生活环境指标等,反映企业呼声,发挥代言工商作用。三是调研地域覆盖范围广泛,具有全国意义,2016年、2018年、2019年三年每年企业问卷调查省(市、区)均超过20个,覆盖了中国3/4以上的行政区划;四是企业样本量大,2016年、2018年、2019年三年回收企业有效调查问卷分别超过4300份、3900份、5400份,样本企业的地域、行业 and 所有制代表性强,客观反映企业呼声和中国营商环境现状。五是

从近几年中国贸促会营商环境评价结果看,总体评价良好但也存在一定问题与不足,每年略有进步但各个指标评价优劣并不平衡,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比较客观公正。

三、营商环境优劣的验证标准

营商环境优劣评价,除专业机构和专家学者的测评外,最重要的考量验证标准有两个:一是企业投资数据;二是企业经营业绩。

1.企业投资状况是验证营商环境优劣的晴雨表
一个国家或地区营商环境好坏,企业最有发言权,企业投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企业投资活跃地区往往也是营商环境优良地区,各国、各地区莫能例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商投资实践,就是最好例证。40多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体制机制改革的渐次推进,中国吸收外资规模日益扩大。1983—2018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9.16亿美元上升到1349.7亿美元,35年间增长了约146倍,年均增速高达15.33%。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从1983年的638家上升到2018年的60533家,增长了93.88倍,年均增速13.89%。尤其是在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利好政策鼓舞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在短期内出现井喷,从1991年的12978家迅速增加至1993年的83437家,涨幅高达542.91%^②。近几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持续下滑,2017年急剧下降23%,2018年又进一步下降13%,2019年新兴市场资本流入减少400亿美元。在全球投资持续低迷且国际引资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中国外商投资却逆势飞扬。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0871家,实际使用外资6832.1亿元,同比增长6.5%(折合1007.8亿美元,同比增长2.9%)。^③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另一方面更得益于各级政府不断深化改革并同步提升服务质量与效率,持续优化软硬件营商环境。

2.企业经营业绩是检验营商环境优劣的试金石
检验营商环境的好坏,另一重要验证指标是企业经营业绩,盈利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盈利的营商环境评价再高也难以得到企业的认可。因此,好的营商环境应该是企业能够盈利和可持续发展的营商环境。中国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为企业盈利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反过来,企业盈利状况的良好,也验证了中国营商环境的优良。

中国贸促会调查报告显示:企业盈利状况良好,九成以上实现营收正增长。根据贸促会调查数据,2019年,15.8%的企业营收增幅在10%以上,收益表现很好;35.9%的企业营收增幅在5%—10%,收益较好;收益一般(营收增幅为1%—5%)的企业占38.5%。整体来看,半数以上(51.7%)企业收益状况维持在较好及以上,营收正增长占比为90.2%,企业运营状况良好。与2018年相比,2019年近五年收益持续上涨的企业占比略有上升,由2018年的30.6%上升至2019年的31.2%,提高了0.6%;持续下降的企业占比有所下降,由2018年的9.7%降至2019年的8.6%,下降了1.1%。2019年在小范围内波动的企业占比与2018年持平,均为54%,大范围波动企业占比较2018年略有上升(提高了0.01%)。总体而言,2019年企业投资收益状况比2018年有所改善。

在华外资企业盈利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协会的数据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评价更具说服力。《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18年白皮书》认为,日本在

华企业盈利预期情况在过去10年稳定增长,由59.6%上升到70.3%;在华日企投资意愿近三年连续呈现恢复性增长趋势。中国美国商会组织的美资企业调查表明,高达90%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2018年全年在华投资与营业状况良好,其中69%的受访企业表示盈利,21%的受访企业收支平衡。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19年会员调查显示,中国业务利润率高于总体业务利润率的受访企业占比从2019年的38%提高至46%,中国依然是美国企业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四、中国营商环境的建设成就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市场开放,营商环境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1.政策政务环境持续优化

中国贸促会问卷调查显示,2019年,近九成企业对政策政务环境评价为较满意及以上。

一是出台首个国家级优化营商环境行政法规。2019年7月1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委研究起草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征求意见稿)》;10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这是中国正式制定的首个国家级优化营商环境行政法规,通过把近年来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经验、做法上升到法规制度,使其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从而在制度层面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保障和支撑。

二是“放管服”改革扩围提效。首先,政府放权力度进一步加大。2019年3月6日,国务院决定取消25项行政许可事项,下放6项行政许可事项的管理层级。2019年6月25日,李克强总理要求,2019年要把工业生产许可证种类再压减一半以上,中央层面再取消下放50项以上行政许可。其次,商事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2019年2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对外发布了《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要求2019年底前全国所有市县一般登记、抵押登记业务办理时间力争分别压缩至10个、5个工作日以内。2019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开办时间实现了由2018年平均20天压缩至8.5天以内的目标,同时全国71.79万户企业通过简易注销程序退出市场^④。

三是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主体功能建设初步完成。国务院公布《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要求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截至2019年7月,作为实现全国“一网通办”总枢纽的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主体功能建设已完成并开始试运行,初步具备统一的身份认证、事项管理、电子证照、电子印章、数据共享等能力。目前,全国32个省级政府和40余个国务院部门全部建设了自己的政务服务平台,并初步实现了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的全面对接^⑤。

四是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落地实施。首先,对小微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2019年3月17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之前为3万元),免征增值税;放宽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并加大优惠力度;小规模纳税人缴纳的部分地方税种可实行减半征收;扩展初创科技型企业优惠政策适用范围。其次,深化增值税改革,继续推进实质性减税。2019年3月2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自2019年4月1日起将16%和10%两档税率分别降至13%和9%;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进项税额加计抵减;扩大可抵扣进项税范围。再次,配合相关部门,积极研究制定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进一步减轻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1709亿元,其中减税10387亿元;小微企业普惠性政策减税1164亿元^⑥。

2. 对外开放再上新台阶

2019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亮点频现,力度空前。

一是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逐渐缩短。2019年6月3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短,清单条目由48条减至40条,压减比例为16.7%。同日,两部门又发布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清单条目由45条减至37条,压缩比例为17.8%。同时,两部门还发布了《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19年版)》,鼓励外资在现代农业、先进制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外资准入负面清

单是中国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基本依据,负面清单越来越短、开放领域越来越多,说明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为各国投资者创造了更多发展机遇,营造了更优营商环境。

二是自贸试验区扩围升级成为对外开放新高地。2019年8月6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8月2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6个自贸试验区,将中国自贸试验区扩大至18个,形成了“1+3+7+1+6”、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自贸试验区的扩围升级,有利于推广可复制制度创新成果,持续优化外商在华投资环境。在近6年形成的自贸试验区202项制度创新成果得到复制推广,其中,投资便利化制度创新成果有81项,贸易便利化64项,金融开放创新23项,事中事后监管34项。

三是金融业市场准入限制显著放宽。2019年5月1日,中国银保监会公布银行保险业对外开放12条新措施;7月20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宣布了金融开放“新11条”,涉及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信用评级等多个领域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开放步伐不断加快。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也取得重要进展。2019年3月1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MSCI)决定,将现有大盘A股在MSCI全球基准指数中的纳入因子由5%提高至20%;4月22日,上交所与日本交易所集团签署了中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互通协议;6月17日,中国证监会与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正式启动沪伦通。这些开放政策将进一步促进中国资本市场逐渐成熟,并为企业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

3.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果显著

2019年,中国社会信用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失信惩戒力度不断加大,社会信用环境日趋优化。

一是第一次从全国层面推出信用监管政策性文件。2019年,中国建立健全信用法律法规体系步伐明显加快。2019年7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完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标识,整合形成完整的市场主体信用记录。

二是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征信系统。2019

年,央行在企业征信备案通道关闭三年后首次重启。目前,中国已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征信系统,累计收录9.9亿自然人、2591万户企业和其他组织的有关信息,个人和企业信用报告日均查询量分别达550万次和30万次^⑦。

三是失信惩戒力度不断加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综合运用了经济、法律、道德、科技和行政等手段,通过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和信用惩戒机制化解执行难问题,“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格局不断完善。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国税务机关累计公布税收违法“黑名单”案件7282件,同比增长161.85%,新增纳入“黑名单”的走逃(失联)案件222件^⑧。

4. 通关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根据2019年贸促会企业问卷调查数据,口岸服务环境评价高达4.48分,在12个一级指标中居首位,较满意及以上企业占比均超九成。

一是进一步简化通关手续,优化流程。2018年,机构改革进一步促进口岸部门职能优化,海关与检验检疫业务全面融合,实现了申报单证、作业系统、风险研判、指令下达和现场执法的“五统一”。改革后,原报关、报检共229个申报项目合并精简至105个。进出口单证进一步简化,需要监管的证件由86种减少到46种;在46种证件中,除4个证件有保密特殊需要,不能联网外,其他42种都已经实现了联网核查,自动比对。

二是口岸收费进一步降低。推进进出口环节收费公示,实行口岸收费明码标价;透明阳光的收费价格倒逼经营服务企业收费合理化;压减收费项目,降低部分收费标准,港口经营服务型收费项目由15项压减到11项,货物港务费、港口设施保安费的汇率标准分别下调了15%和20%。

三是“单一窗口”建设取得新进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与25个部委系统对接和信息共享,上线运行68个部门之间的联网合作项目为企业提供的服务事项达到495项,业务覆盖了全国所有口岸,基本上满足了企业的“一站式”作业要求;主要业务应用中货物申报已经达到了100%,舱单申报和运输工具申报达到90%。

5. 知识产权保护全面加强

近年来,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一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近年

来,中国组建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组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完善了版权管理体制,不仅实现了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的集中统一管理,也实现了对商标、专利的综合执法,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体系和机构设置更加完善。

二是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明显加强。2019年上半年,全国地方人民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15万余件,同比上升约80%;审结侵犯知识产权罪一审案件2000余件,同比上升约23%^⑨。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成效得到国内外普遍认可。美国商会发布的2019年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认为,中国在网络销售环境改善、药品专利执法等方面成绩尤其突出;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19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585家受访在华欧盟企业约六成认为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保护力度明显加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道路非同寻常,中国已成为全球知识产权体系的领导者。

6. 社会治安环境改善明显

2019年,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行动改善社会治安环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显著,共打掉涉黑组织1292个、恶势力犯罪集团5593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9270起,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7.7%,八类严重暴力案件同比下降13.8%,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明显增强^⑩。对“套路贷”新型黑恶势力犯罪的打击也取得明显成绩,截至2019年2月26日,共打掉“套路贷”团伙1664个,共破获诈骗、敲诈勒索、虚假诉讼等案件2162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6349名,查获涉案资产35.3亿余元^⑪。

7. 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力度增强

一是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2019年,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的8000亿多元的传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涉及交通领域的建设资金就达到约7000亿元^⑫。企业债规模突破7000亿元,多项企业债用于地下管廊、高速公路等基建项目。

二是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速。2019年,中国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努力提升跨区域和全球范围信息交互的效率和水平。截至2019年5月,全国建成437万个4G基站,4G用户超过12亿,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7.8GB^⑬。2019年6月6日,工信部正式

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中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五、中国营商环境建设的问题与不足

我们的调研发现,中国营商环境仍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与不足。

1.部分地区政策制定、执行的科学性、精准性有待提升

一些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不强、服务能力较弱;信息孤岛、项目申报重复提交材料等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政府审批权限下放仍然较为滞后;一些地区政策制定、实施主观性、随意性较强,经常存在低效、反复、僵化和“一刀切”“一波热”“政策烂尾”等问题,没有结合本地特殊情况进行政策细化、调整、完善,更没有从政策的全生命周期进行系统考量,伤害了部分企业经营发展积极性。

个别地区政策目标存在功利化导向,注重企业落户和纳税,而不注重在当地形成产业能力、培育产业集群,这种目标导向容易导致政府应有职能的弱化和资源的错配;不重视招商后提高服务质量,甚至不兑现承诺政策,导致政府失信,影响政府形象。

个别地区政策执行效果不理想,“最多跑一次”流于口号;“文山会海”依旧存在,文件质量和执行难以到位;一些政府项目的申报没有实行信息化,即便已经实行网络申报的事项,却仍要提交纸质版材料,且需多次上报、重复上报。

2.企业综合经营成本居高不下

根据中国贸促会2019年企业问卷调查,企业认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是成本提高和市场竞争激烈,占比分别高达76.9%和74.2%。

就企业成本负担而言,一是企业税费负担较重。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测算,中国企业税负水平比高收入国家平均值高出近29.73个百分点,比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出28.85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6.84个百分点^⑧。二是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2019年中国贸促会企业问卷数据显示,2019年人工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27.64%,人工成本年均上涨幅度达9.5%,其中,服务行业上涨最快,达11.83%。三是物流运输成本偏高。目前,中国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高出全球平均水

平5%左右,占GDP的比例不仅高出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一倍左右,且高于印度、巴西等其他金砖国家。四是能源价格较高,占企业经营成本比重较大。

3.人力资源数量、结构、素质均存在不足

一是高素质劳动力数量、素质不足。中国庞大的人口总量和产业高端化需求相比,数量仍然不足,集中表现为高素质人才数量与高质量经济发展需求不匹配和人力资本综合效率与产业升级需求不匹配。二是劳动力资源闲置、错配问题明显。一方面,产业迁移方向与人口流动方向逆向矛盾,劳动力资源继续流向沿海地区和主要城市,而工业等重要产业向低成本的中西部地区和县乡镇转移,劳动力人口不足问题较为普遍。另一方面,高中低不同档次劳动力需求全部存在缺口,劳动者能力与企业需求、劳动者需求与企业福利之间存在错配,招工不足、人员流失、就业不足并存。中国人力资本综合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较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高素质人才的缺乏制约了本地高端产业承接能力和本地产业高端化升级进程。

4.企业融资困难仍未缓解

中国贸促会问卷数据显示,2019年金融服务环境总体评价较低(4.133分),在12个一级指标中排倒数第二。根据中国贸促会2019年企业问卷调查,个人投资者为企业接受投资的主要来源,金融机构的融资服务与企业需求存在严重不匹配。

一是企业融资存在国企与民企、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差别待遇。一般来说,国企融资容易,民企融资较难,而且民企融资通常承担的是无限责任,需提供抵押担保后才能拿到贷款,加重了民企融资难、成本高问题。

二是融资成本和融资门槛较高。目前内地融资成本比香港高出一半左右;银行贷款通常为一年期,但企业投资往往是长期的,企业常常需要通过短期银行拆借、民间借贷等方式再融资来归还银行贷款并支付利息,这样显著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在融资评估方面,一般不同银行对应不同的评估公司,企业只要换银行贷款,就需要重新评估抵押物,价值两三百万元的评估值需要一万左右的评估费用,再次增加了企业成本。在放贷时间方面,银行从贷款审批、授信到发放通常需要花费3—4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导致中小民营企业较易错过最佳扩大

规模时期。

5. 一些地区产业配套保障能力不足

一是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仍存短板。随着城市功能升级、产业逐级下沉、需求发生变化等,原有传统基础设施仍有较大的改进提升空间。一些中西部地区三线城市还没有高铁、动车直达,飞机航线也难以覆盖,缺少快速便利的交通方式;部分港口配套设施较落后,集运能力不足;部分公路设计难以满足运输需求,道路拥堵问题较严重;一些产业园区位置偏远,水、电、网、物流服务不健全,部分管路、网线承载能力不足,服务稳定性较差,影响企业正常生产运营;一些工业园区离市区较远且不通地铁,公交车间隔时间长且有时间限制,准点率也有较大波动。

二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急需提升。在一些地区数据处理、信息采集、网络传输等建设刚刚起步,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三是本地化产业配套能力有待加强。一些地区当地无法提供企业所需生产设备和原材料,企业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从外地购买,不仅增加了物流成本,也影响了生产进度。

四是生活配套政策与设施不足。一些地区,企业员工子女就学困难,员工住宿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一些园区规划不健全,卫生(医院)、金融(银行)、酒店、体育文化等公共服务、生活配套不完善,造成职工生活不便。

六、优化中国营商环境的对策建议

针对中国营商环境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 进一步提升政府服务效率和技能,优化政策环境

进一步提升基层工作人员服务意识、服务技能;针对部门之间存在的“信息孤岛”、业务重叠或相互推诿等问题,要加强信息共享,完善协调沟通机制,减少企业办事环节,切实做到企业信息一次填报、各部门各环节共享。

加强政策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政策制定科学性、系统性、精准性,避免政策主观盲目,把政策实施效果作为评判政府工作的重要依据。同时,杜绝一拥而上地出台政策和“一刀切”地执行政策,充分

考虑政策调整的社会影响,给企业留出政策缓冲过渡的时间与空间。

2. 切实缓解企业成本压力

积极进行财税政策创新,探索税率结构改革,深入开展对税率种类、构成、比例研究,降低税负标准和企业税费压力。结合企业经营情况,制定相对灵活的社保缴费标准,降低社保费用。

从各环节提高电力能源保障效率,降低收费水平,多方合力解决物流运输成本过高问题,帮助企业降低劳动力、能源和物流等成本。

3. 大力培育人力资本优势

一是坚持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并重。一方面,持续保持高等教育的规模增长和质量提升,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体系结构,壮大高等教育规模,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要加强多元化、多层次、多主体的社会化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突出政府在职业教育中的引导和服务作用,鼓励多方建设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通过培训基金、专项经费、企业入校、定向培养、在岗培训等不同手段,做好人才保障支撑。

二是多措并举缓解劳动力缺口。提高劳动力人口与产业劳动需求的梯度满足度,提升高技术劳动力就业数量,保障一般劳动力就业基数,扩容灵活就业人口数量,形成多层次的劳动力就业队伍;要适度放宽高层次和急需人才引进政策,形成外部人才引进补充机制。

4. 合力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一是提高金融普惠能力。一方面,要建立产融对接机制,建立企业融资联席会议制度、组织银企对接、金融机构推介洽谈会等活动,搭建银企对接平台。另一方面,要增强金融领域的普惠导向,扩展金融服务领域,延伸金融服务触角,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保障,提升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能力。

二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首先,要加快企业征信体系建设,促进央行、税务、工商、海关、司法等部门信息互联互通,打造企业征信大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作为评判企业融资资质和违约风险考量基础。其次,要规范和优化业务流程,严格规范担保、评估、登记、审计等中介机构服务收费,对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要建立互认互信制度,减少企业重复评估成本。

5.进一步提升产业配套能力

一是加大基础设施短板建设力度。积极发展大容量地面公共交通,加快调度中心、停车场、充电桩以及旧城改造建设;加快完善道路物流运输网络系统,提升道路网络密度,提高产业园区道路网络连通性和可达性;加强产业园区供水、污水、雨水、燃气、供热、通信等各类管网建设、改造和检查。

二是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道路、桥梁、运输、管网、楼宇的信息化改造提升,实现基础设施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建设基础设施智能管控平台,提高管理能效。加快部署建设完备的国际通信设施,加快5G、IPv6、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宽带接入能力、网络服务质量和应用水平。

三是提高产业配套能力。转变招商引资理念,从单个企业引进转向产业链整体布局培育,形成专业化产业集群,提升产业链综合供给能力;完善产业集群布局空间规划,对既有零散分布的企业进行重新规划调整;突出地方特色,从区位、资源、市场等多角度研究适合本地发展的产业集群,切忌盲目跟风建设所谓的高大上产业集群。

四是系统完善生活配套建设。首先,要在产业集聚区规划层面做好生活保障,增加生活配套设施投入力度,提高生活配套满足率和生活设置配套比例。其次,要将户籍办理、子女入学、医疗救助、配套住宅、长租公寓、通勤交通等员工急需问题作为营商环境改进的重点考核指标,切实解决企业后顾

之忧。再次,加强文体中心、安全应急中心、心理援助中心、信息服务中心等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员工就业安居归属感和幸福感。

注释

①本文部分数据、素材引自中国贸促会重大科研项目《2016—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调研报告》。朱凌燕、俞海燕、史冬立、谢睿哲、孙扬、张红阳等同志对该报告也做出巨大贡献,一并致谢! ②来源于商务部统计数据。③《商务部通报2019年前9月全国吸收外资情况》,商务部网站, www.mofcom.gov.cn, 2019-10-17。④《我国上半年日均新设企业1.94万户 同比增长7.1%》—新华网, www.xinhuanet.com, 2019-07-05。⑤《“一网通办”和“一网通管”建设进入关键节点》,《经济参考报》, 2019-07-11。⑥《2万亿减税降费目标已实现近六成 全年减税降费规模可能超预期》,《中国经济周刊》, 2019-08-01。⑦《中国已建立全球规模最大征信系统 将扩大征信行业对外开放》,中国新闻网, www.Chinanews.com, 2019-06-14。⑧《上半年全国累计公布税收违法“黑名单”案件7282件》,新华网, www.xinhuanet.com, 2019-07-23。⑨《保护知识产权 中国赢得赞誉》,《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9-07-31。⑩《全国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组织1292个 恶势力犯罪集团5593个》,《经济日报》, 2019-01-28。⑪《全国公安机关打掉“套路贷”团伙1664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16349名》,新华网, www.xinhuanet.com, 2019-02-26。⑫《补短板加力 稳投资下半场火热开局》,《经济参考报》, 2019-07-12。⑬《MWC19上海大咖发声:数字经济占中国GDP超1/3》,《扬子晚报》, 2019-06-27。⑭《中国税负有多重? 三年需减5.6万亿》。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9600609726046165&wfr=spider&for=pc>。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Environment

Liu Yingkui Wu Wenjun Li Yuan

Abstract: Building a conduc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to evaluate business environments have drawn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Certa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trade councils as well as research institutes have already delved into the theoretical formulat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assess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wo frameworks proposed by the World Bank and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two of th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more widely recognized agencies. Working with these two frameworks, the article seeks to unpack the significance of building a conduc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assess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evaluative models, and analyze China's accomplishment and areas for improvement in building its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paper hopes to offer prescriptive policies,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as well as an effective evaluative framework for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sections of the economy in China.

Key Words: Business Environment; Framework to Evaluate Business Environments; Word Bank; CCPIT.

(责任编辑:晓 力)

以软价值战略推动雄安新区创新发展

滕泰

摘要:雄安新区的设立是基于不同以往的产业背景、城市发展背景、改革背景和更深层次的时代背景,折射了工业化后期、城市化后期和市场化改革后期阶段的新经济特点,以及未来产业结构、城市发展模式的变革方向。因此,在当前的软价值时代,雄安新区应有新的城市发展定位和产业定位。基于软价值理论及其创造和实现规律,雄安新区需要准确把握未来新经济发展的软性特征,打造符合创新发展的良好软环境、聚集软资源和软产业、充分运用弹性就业等新模式吸引创新型人才,探索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之路以及软价值时代的社会管理模式,以软价值战略推动自身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新经济;雄安新区;软价值战略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1-0079-08 **收稿日期:**2019—11—15

作者简介:滕泰,男,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北京 100140)。

一、雄安新区设立的四个特殊背景

同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经济特区相比,雄安新区的设立有着不同以往的产业背景、城市发展背景、改革背景和时代背景。

1.雄安新区设立的产业背景:工业化后期阶段

成立于1992年的浦东新区,是依托长三角地区和上海的产业基础,在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区域经济发展典范。上海和长三角地区是中国传统的工业聚集区,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具备一定的人才、技术和设备基础。在项目投资需要国家严格审批的制度下,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的工业产能受到抑制。1992年浦东新区设立之后,国家赋予其更多的投资自主权,典型的如“总投资2亿元以下的项目,上海可以自行审批;可在中央额定的额度范围内自行发行股票和债券”等5类项目的审批权和5个方面的资金筹措权,极大地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使上海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

不仅成为长三角地区的资金和项目聚集地,更吸引了全国乃至全球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增长奇迹。

而现在,中国已经用短短4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近300年的三次工业化革命历程,目前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传统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会不可逆转地下降,雄安新区快速工业化的增长“快车”已经机遇不在。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8年底,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为29.6%,服务业占比为52.20%(见表1)。而同期德国、日本的制造业占比是20%,美国的制造业占比只有11.2%,英国制造业占GDP比重则在10%以下(见图1)。

表1 2018年中国的产业结构

GDP	三次产业占比(%)	各产业占比(%)
100%	第一产业 6.08	—
	第二产业 41.11	制造业 29.6
	第三产业 52.20	房地产 6.82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表示没有详细分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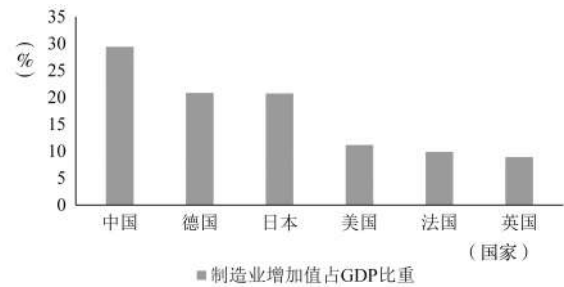


图1 2018年部分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大体相当于美国1970年的产业结构。当时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61.22%(中国2018年为52.16%),第二产业占比为35.24%(中国2018年为40.65%),第一产业占比为3.54%(中国2018年为7.19%)(见图2)。从长期趋势来看,未来中国产业结构很可能也会像上述发达国家一样呈现“二八现象”:即传统制造业的比重会下降到25%以下,甚至向20%比重趋近,上述工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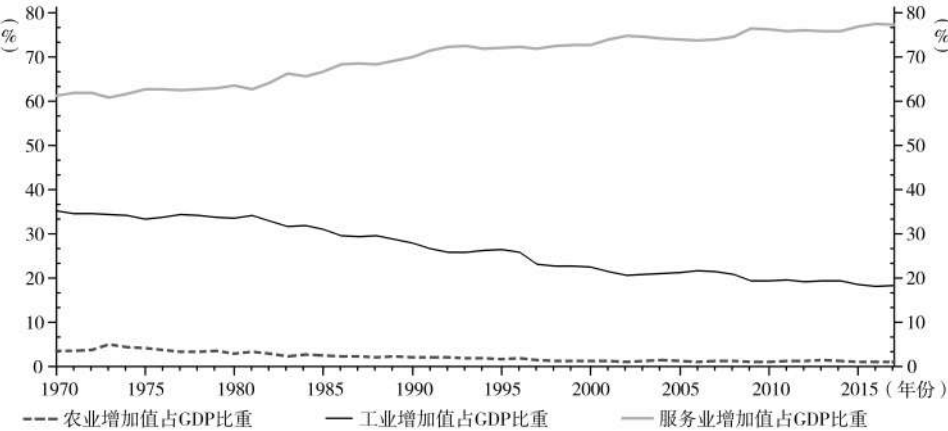


图2 美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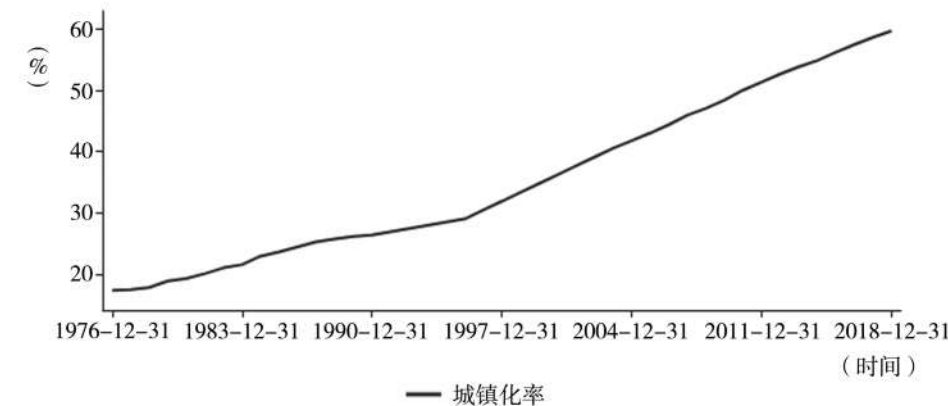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的城镇化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化后期不可逆转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表明,雄安新区的发展不能依托于传统制造业,而必须寻求工业化后期的新兴产业。

2.雄安新区设立的城市发展背景:城镇化后期

从城镇化水平来看,雄安新区设立的背景与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显著不同。1980年深圳特区正式设立时,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9.39%,1993年上海浦东新区设立时,中国城镇化率也仅达到了27.99%(见图3)。而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9.6%,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江苏、浙江等东部省(市)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70%,中国整体城镇化速度正在放缓。从发达国家城镇化率的平均水平来看,未来长期中国城镇化还有10%的发展空间。那些跟前期快速城镇化相关的产业链,比如房地产、钢铁、水泥、建筑建材、装饰装潢等几十个产业,已经过了历史最佳发展时期。因此,与快速城镇化尤其是与房地产产业链相关的产业,也

不能成为雄安新区的核心增长动力。

3.雄安新区设立的政策背景: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与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相比,雄安新区的设立面临的另一个不同的外部条件是改革开放背景。

1980年设立深圳特区,打开了中国经济面向世界的第一扇窗口。深圳特区能够成功,率先推进市场化是关键。在当时全国普遍执行计划经济制度的情况下,深圳率先开始尝试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如最先尝试劳动合同制,最先试点土地使用权拍卖,实行15%所得税,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引入国外资本,在全国普遍实行严格外汇管制的背景

下,率先尝试建立外汇调剂中心,给予出口企业更大的外汇管理和使用权限等。同时,在对外开放方面,由于毗邻香港,深圳在引入转口贸易与加工贸易上具备极大便利,推动了深圳的贸易和加工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当前,中国粗线条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除部分能源、原材料和涉及民生的商品如药品等还存在价格管制外,产品市场大部分实现市场化,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虽不及产品市场,但相关领域的改革也进入了攻坚阶段,粗线条的改革红利已经递减。不仅如此,从2015年以来中国贸易顺差平均每年减少500亿美元,预计未来五到十年,中国贸易顺差仍将逐年递减,在2030年前后基本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在贸易顺差向贸易平衡的长期转变过程中,净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将持续降低。同时,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已经全面融入国际市场,对外贸易经营权已经全面放开。在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也不再适合雄安新区。

4.雄安新区设立的时代背景:软价值时代

除产业背景、城市发展背景、改革开放背景外,雄安新区设立还有更深层次的新时代背景。

一个时代的标志有多个维度,但最重要的是财富创造源泉的变化以及与其相伴随的时代特征。从财富源泉角度定义,所谓农业,实际上是以地球表层土壤为财富源泉,利用动植物繁殖的规律来创造财富,总量受到地表环境和动植物生长周期的限制。所谓工业,是运用物理、化学规律加工地球资源来创造财富和价值,财富总量也日益受到资源供给和有限需求的限制。当大部分人已经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转为医疗、教育、养老等精神需要时,基本物质产品在总消费中的占比越来越低,而人们对于知识、文化娱乐、信息、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民主法治等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却是永无止境的。自然资源在价值创造中所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小,而人类的创造性思维创造的价值占比越来越大,人类进入了新的财富时代——软价值时代。

所谓软价值,是指以人类创造性思维活动和技能性劳动为源泉的知识价值、信息价值、文化价值、金融价值、服务价值以及附着在物质财富上的品牌等非物质价值。例如,软件业基本不消耗地球资源,主要价值来自人的创造性思维;芯片作为其硬

件基础,消耗的地球资源只是少量的硅,在芯片的整个价值中也只占有很少的比重;文化娱乐产业也是这样,需要消耗的地球资源并不多,主要是靠主创人员的创造性思维和技能性活动。在软价值时代,价值的创造规律、城市承载的产业、配套的环境、城市发展的核心资源以及社会组织模式都会发生变化,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软性特点。

二、软价值时代雄安新区的战略定位

雄安新区不同以往的设立背景,也决定了其在软价值时代应该形成新的、独特的城市发展定位和产业定位。

1.雄安新区的城市发展定位:新经济城市

城市发展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城市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见图4)。城市发展的1.0阶段,是农村经济的行政和交换中心。在农村经济中,城市是围绕集市和政府形成的生活和行政中心。这个阶段是由土地、港口、矿产、水源等自然资源吸引的人口聚集,带动产业发展,推动城市兴起。比如上海的临港优势,是上海对外开放的最初推动力。

城市发展的2.0阶段是工业城市。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钢铁之都匹兹堡都曾典型的工业城市。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东北地区的很多城市、西北的很多制造业重镇也是依托某些制造业而兴起。在这个阶段,城市成为制造业的聚集地,承载了制造业配套的仓储、物流、交通枢纽等功能。比如,东莞的电子加工业,推动东莞实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房地产主要是厂房、办公楼、宿舍等工业社区,加上公寓、综合商场等生活社区,房地产为生产服务的同时,本身也和制造业一起成为支柱产业。因工业兴起的城市也容易因工业而衰落,一旦这个产业不行了,这个城市的活力就很难再重振昔日的雄风。例如中国部分资源密集型传统工业城市,产业结构单一,一旦相关传统产业衰落或煤炭、矿产等资源濒临枯竭,城市可持续发展就会受阻。

数据显示,2013年之前,大城市的经济增速和人口聚集效应都落后于小城市,但2013年之后,中国大城市开始反超小城市,这标志着城市发展已经开始从以工业为主导的城市2.0阶段,向以创新为主导的城市3.0阶段转型。传统单纯依靠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发展的模式难以持续,大城市和小城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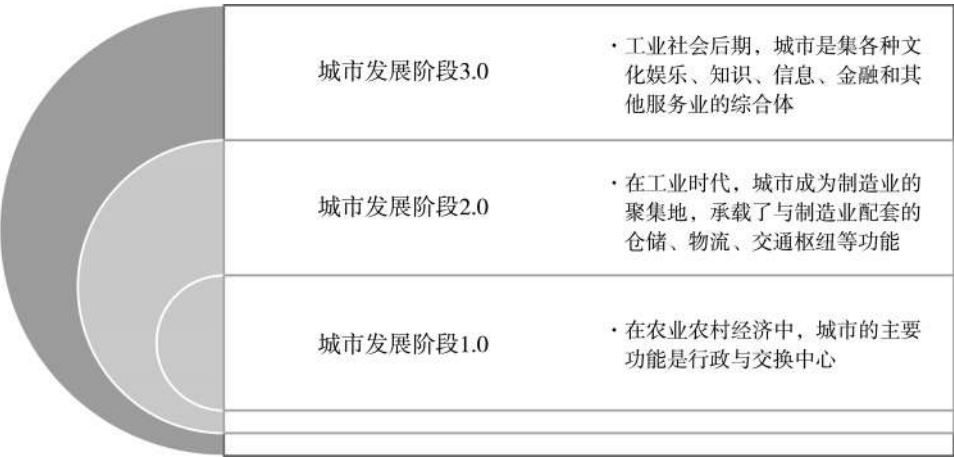


图4 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

核心驱动力开始逐渐趋同。新经济城市创新发展的模式，与农业和工业城市不同，是创新引领下的人才和产业聚集，通过新经济来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从而推动城市的发展。房地产则成为人才、产业和城市的纽带，发挥助力城市发展的功能。

与传统的工业城市不同，雄安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土地资源丰富、人口密度低，没有既有产业或发展模式的制约，再开发成本低，其转型的压力不大，但雄安新区要完成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不能再走硬资源拉动和土地财政的工业城市发展模式，需要确立符合新时代发展趋势的城市发展定位——新经济城市。

2. 雄安新区的产业定位：软产业

在工业时代，城市发展主要有两大支柱产业：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房地产业。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城市的经济增长、税收和就业都离不开这两大支柱。在软价值时代，传统产业的支撑力明显下降，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紧张、就业岗位缩水等问题将越来越多，需要寻找新的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支柱产业，比如软产业。软产业可以定义为以软投入和软价值为主体的产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需要更多的高端制造业产品、知识教育产品、文化娱乐产品、信息传媒产品、金融产品以及商业零售和养老健康等高端服务产品，这些产品的创造，大部分并不消耗自然资源，而是靠人的创造性思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对新时期社会基本需求特征的前瞻性把握。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固然离不开高质量的住房和制造业产品，但即便在制造业的价值中，类似于研发、设计、品牌等“软价值”也已经逐渐成

为制造业产品的价值主体，比如无论是一件品牌服装，还是一件饮料、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其中的硬价值占比都越来越低、软价值占比越来越高，传统制造业如果不能继续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传统手段维持生存，那么就只能通过“软价值创造”寻求发展。

例如，类似于品牌服装、智能手机、营养品、名牌化妆品、创新药物等产业，产品的软价值占比已经超过产品价值总量的50%，这样的制造业我们称之为软性制造。从全球经验来看，不仅苹果、华为公司的电子产品通过软性制造成为明星商品，IBM、戴尔等传统制造业公司，也正通过软价值创造，向“软性制造”转型，成为制造业中的新贵族。

软性制造可以用“商品软价值系数”（商品中软价值占比）（见图5）来衡量，商品软价值系数越高则分数越高，说明企业的软性制造程度越高。例如饲料这样的简单硬财富生产，几乎没有软资源投入，软价值系数较低；一般的汽车制造、房地产等制造业，随着软投入的增加，软价值系数不断提高；品牌服装、iPhone、营养品等商品，软价值系数已经超过50，基本属于软性制造。而创新药物研制的软价值系数高达80，是典型的软性制造模式。

再比如文化娱乐产业需要消耗的地球资源并不多，主要是靠主创人员的创造性思维和技能性活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票房总额超过70亿美元，为拍这部电影所需要的服装、道具、布景，其生产只需要消耗很少量的地球资源，真正创造价值的是作者、编剧和导演的创造性思维，演员们的精湛演技，以及全球数以亿计的哈利·波特迷的热情参与和传播。

像科研、教育、咨询、会议这样的知识产业，也主要是依靠人们的头脑、智慧在创造财富，那些全球顶级制药公司最大的财富，并不是生产药品的车间，而是顶级科学家的头脑和研发团队的开发能力；对于麦肯锡、罗兰贝格这样的咨询公司来说，固定资产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能网罗到多少行业内的专家来加入自己的咨询机构；同样，也没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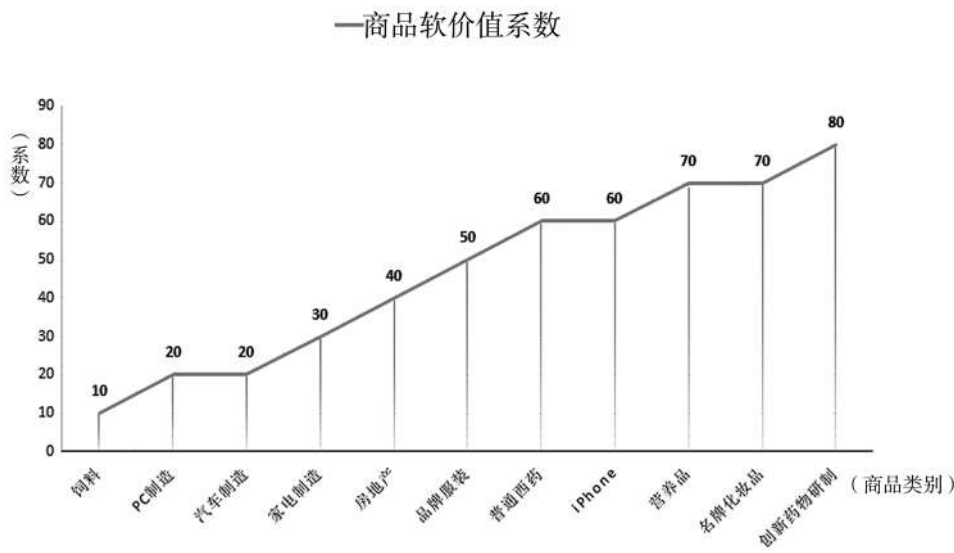


图5 商品的软价值系数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计算得出。

会用有多少大楼、占多少亩地来评价一所大学的实力,重要的是拥有多少知名专家学者、科学院院士。金融行业更是如此,信用和信用创造能力,比金融机构有多少资本金更重要。没有任何实物担保和国家支持的比特币,就因为率先掌握了区块链技术,能够用技术保证这种电子货币的信用不被滥用,就能在全球掀起自主货币发行的新潮流。靠智慧创造财富是未来新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自然会形成一系列新的发展规律。

在这些时代背景下,雄安新区必须走出一条市场化条件下,符合工业化后期、城镇化后期和市场化改革后期阶段新特点的新经济之路。雄安产业选择有两个软产业方向:一个是在工业化后期,沿着5G、AI、新能源、新材料等新技术创新的方向,雄安新区的发展面临着新技术创新带来的产业革命爆发阶段,有着广阔的空间;另一个是在城镇化后期,沿着美好生活需要方向,在传统房地产业受控的背景下,新型知识产业、文化娱乐产业、信息传媒产业、新金融产业、新零售和健康养老等高端服务业等,正在蓬勃兴起,为雄安新区经济发展打开了良好的发展前景。

三、软产业的价值创造和实现规律

靠智慧创造财富的软产业,与传统采掘、制造、建筑业的价值创造规律可能完全不同。雄安的创新发展以软产业为支撑,首先需要把握软产业的价值

创造和实现规律。软产业的价值创造过程,可以用软价值方程来描述:

$$V=C \cdot N^m$$

其中 V 是软价值, C 是有效创意, N 是流量, m 是体验。

1.有效创意(C)

对于研发、设计、品牌、创作而言,由于其财富的源泉是人们的创造性思维,而创造性思维的不确定性特征,决定了大部分投入

可能都是无效投入,只有少部分的投入才能算作有效投入。

有效创意有三个特点:第一,必须与这个产品所在的参照系高度吻合。不论是什么产品在创作之前,首先得分析它所处的参照系。第二,要投入大量的创造性思维。凡·高在创作画作时充满了激情,有时候甚至达到了自虐的程度,尽管他的作品在生前无人理解,但其中所蕴含的对生活的渴望最终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同样地,知识产业要做好教育、咨询、会议等软产品,也必须投入创造性的思维活动。第三,找准共振群体。所有的软价值最终都是满足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产品必须满足人们的心理感受,引起共鸣,才能够实现价值。

在接受无效投入,同时把握有效投入的规律之后,方可形成可持续的产品开发战略。例如,IBM和华为实施的集成产品开发(IPD)^①机制,推动企业形成了可持续的多元产品创新能力。与之相适应的,企业需要形成符合软价值创造规律的新管理理念、新组织构架和新激励机制。例如,由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罗夫提出,被谷歌引入并发扬光大的目标与关键成果法(OKR)^②管理方式,是适应软价值创造的成功管理案例;而苹果、耐克等公司中,生产部门为研发部门服务的组织架构,则是适应软价值创造的先进组织模式。

2.认知群体与流量(N)

成功的软价值创造,能够不断发酵膨胀,必须有一定的流量。对很多传统产业而言,市场不是创

造出来的,客户是客观存在的,而对于很多新经济和软产业而言,流量是要靠新供给自身创造出来的。新供给是指能够持续创造新需求、形成新市场的一种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或管理模式。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而一旦苹果手机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正如乔布斯所言,苹果公司“重新发明了手机”。苹果智能手机不仅使人们重新认识了手机,同时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新时代的企业家需要通过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创新,用新供给创造并引领新需求。

做大产品的流量,有时必须创造流量,有时也可以从其他领域导入流量。例如著名的芯片制造企业英特尔专门成立了合作基金,只要供应商采用英特尔的商标,英特尔将会分摊电脑厂商的广告成本,凭借这种与惠普、戴尔、联想等知名厂商的流量嫁接的策略,“Intel Inside”变得家喻户晓。在软产业尤其是软性制造中,一家企业可以在没有实物产品的情况下,先形成庞大的认知群体流量,然后再导出流量到新产品或服务上,比如小米公司的创业模式就是形成千万粉丝群,再把这些流量导出到新产品上。

3. 体验与认知弹性(m)

一件产品引发消费者心理感受变化的程度越大,软价值受主观认知影响越大,它创造软价值的能力就越强,这件产品的体验感越好;反之,一件产品引发消费者心理感受变化的程度越小,软价值受主观认知影响也就越小,它创造软价值的能力就越弱,这件产品的体验感也就越普通。软价值的创造不仅在于产品和服务的本身,消费者的体验和认知弹性也是价值创造的主要部分,且体验的软价值创造能力是在指数级别,是引起心理满足的强度、宽度、深度以及反馈度。

例如2018年,宜家推出第一款开源模块化家居系统,鼓励用户自行设计配件。这个系列就像苹果系统,大家可以将自己的设计放到产品的开放系统中,让消费者不仅参与产品使用评价和传播,更进一步参与到设计等环节。

4. 软价值实现的新规律

软价值大部分时候都并非通过直接售卖产品实现,而常常是非对称实现,比如阳光免费,星光收费,从门户网站、社交平台、支付软件到搜索引擎,几乎都是这样。软价值通常是分段实现的,先有公

共价值,再有盈利模式,从亚马逊、京东、微博、微信到滴滴打车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产品或者是服务,有几千万人愿意免费使用,这个公司的市值可能就值几百亿美元;如果有几亿人愿意免费的使用,这个公司的资本市场市值可能就值几千亿美元。软价值的实现总是立体和弯曲的,如同《哈利·波特》,从一本书到电影,到大型游乐园和衍生商品,每一次弯曲的价值实现,都会造成价值成几何级数的增长,最终形成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业链。软价值也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微软、Facebook、苹果、腾讯、阿里巴巴等软企业巨头的实体价值相对于资本市场价值而言都很小,其价值都是通过资本市场实现的。

四、以软价值战略推动雄安新区创新发展

把握了新经济的软性特征,掌握了软价值的创造和实现的新规律,在未来的规划和发展中,雄安新区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应践行高起点、高标准和高质量建设,以软价值战略推动创新发展。软价值战略,主要包括软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良好的软环境为主导的创业和营商环境,以软就业为依托的人才流动机制,作为新时代全球财富创造和分配的主导要素的软资源,以及适应软价值时代的产权、融资、收入分配等社会管理机制。

1. 为软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软环境

发展传统制造业需要的是丰富的自然资源、便利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而工业社会后期,随着软产业的比重提高,软环境建设变得越来越重要。软环境是指培育软产业、创造软价值所需要的非物质环境。从发达国家创新区域发展的成功经验来看,软环境是创新和营商环境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营造出良好的软环境,才能达到吸引创新要素,实现人才和产业聚集的目的。美国的经济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就在经历一个持续不断的“软化”的过程,这不是政府调控而来,也不可能靠政府调控逆转,而是得益于软环境的营造。

雄安新区要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和新发展理念建设的示范区,必须在营造软环境上实现新的突破,提升其对软产业和创新人才的吸引力,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要构建创新创业

友好、宽松适度的法律环境。加大法制宣传和执法力度,对于恶化营商环境的各种行为和现象,如破坏市场秩序、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等行为进行严厉惩处,营造创业、创新友好的法律软环境。二是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服务既到位又不越位的政策环境。从工商、土地、户口、社保、人事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创新创业便利,在社会保险、子女就学、配偶安置等方面为创新人才给予优惠,营造企业创业和人才创新的良好政策软环境。三是建设风险投资等各类资本易得的融资环境。由政府出面,搭建产业、资本、人才之间的交流对接平台,为创新创业提供高效的资本支持,以及人才的交流合作环境。四是形成推动创新、鼓励交流、宽容失败的文化环境,以及健康、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为注重城市公共资源的整合,增加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科技馆等文化服务并向公众免费开放,提升文化品位。同时,要加强垃圾综合治理、污水大气治理、恢复城市自然生态,从各个方面打造创新创业企业和人才引得来、留得住、干得成的乐园。只有在一个智力资源充沛、便利交流、国际化风险资本云集、法律完备且对创新友好的软环境中,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创造者思维,创造出更多的软价值和新财富。

2. 培育软资源,提升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软资源,是指在软价值创造过程中使用的非实物资源,除传统的人才、科学成果、技术专利、资金之外,还包括知识产业的经典著作、文献档案、传播模式、影响力;文化娱乐产业的IP积累、明星、院线、体育俱乐部、赛事、口碑评论;信息产业的大数据、算法、互联网平台、社交网络;金融产业的信用、国际货币发行权、金融定价权;服务业的品牌、商业模式等。

进入工业社会后期,硬资源的重要性开始相对下降,软资源的重要性开始上升,后者逐渐成为新时代主导全球价值创造和财富流向的稀缺要素。其结果是,拥有软资源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越发达;拥有软资源越多的企业,竞争力越强。

为了在新时代软价值创造和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和主导地位,雄安新区应高度重视和积极引导软资源的开发。一方面,妥善处理软资源的保护与共享之间的关系。硬资源是专享的,而软资源往往是共享的,可以被不同的用户同时使用,因此软资源更容易被抄袭、盗用,在继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同时,需要大力推动建立市场化的软资源定价机制

和交易平台,鼓励软资源的有偿使用,合法共享。另一方面,正确认识软资源开发、加工、重复使用的新规律。就像矿藏等自然资源必须经过开采冶炼才会有用,大数据等也必须通过科学的加工整理才能成为有用的软资源,而一旦形成软资源,不但可以重复使用,而且会在重复使用中不断增值。因此,在软资源的开发过程中,要避免过度开发、反复扬弃,要更多地引导传承和形成经典。

3. 实施软就业,适应软产业的发展特点

所谓软就业,是指顺应软产业的财富创造和协作模式,打破了固定时间、固定场所、单一就业岗位等工作限制,注重激发创造性思维的新社会组织方式。软就业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企业的生产、经营、组织模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软就业不是传统的“朝九晚五”式的刚性化安排,而是适合自身特点、有利于激发创造性思维的个性化生产模式。软就业者有多重身份特征,一个人不再受制于单一企业劳动合同,可以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流行词汇“斜杠青年”就形象地描述了软就业的这一特点,如:杰克,天使投资人/软件专家/人像摄影师。这种多重职业身份的软就业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软价值创造能力。面对未来生产和生活的软性变革,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前提是聚集相关功能所需要人才,这就需要以软就业为依托,建立新的人才流动机制。

4. 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创造新的改革红利

房地产价格高企、经济发展超出资源的承载能力、教育和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等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成为目前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市场化改革后期阶段,发育基本完善的市场机制为商业模式创新创造了良好条件,各种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快速迭代将给我们带来无法想象的“新物种”。

然而,在市场化改革的后期,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也遗留下一些计划经济的“沙砾”——供给约束。探索如何消除这些“沙砾”,放松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尤其是探索如何放松土地、人才、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市场的供给约束,对于推动进一步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雄安新区如果能在要素市场改革方面有新突破,探索出新的模式,不但必将带来更大的改革红利,也会成为新时期改革的试验田,并为中国的深化改革做出巨大的贡献。

5.探索新经济城市的社会管理机制与政府职能变革

在软价值战略中,探索适应软价值时代的社会管理机制,如产权机制、融资机制、收入分配机制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为了适应新的产业和经济结构,政府的部门设置要从为工业生产服务向为软价值创造服务转变;政绩考核指标要兼容软环境优化程度等新指标;政商互动关系要从以招商引资为主要目的,向以软资源聚集为目标转换;而社保和人力资源服务体系则要适应软就业发展,如构建与软性就业相适应的就业统计方式,积极探索与软性就业相适应的新型就业引导模式,以及新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所带来的新社会问题等。

总之,雄安新区的设立和创新发展的,是新的时代背景下探索符合工业化后期、城镇化后期和市场化改革后期阶段新经济和新城之路的创举。掌握新时代软价值创造和实现的新规律,以软价值战略推动雄安新区创新发展,对于探索新时期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和可持续增长之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注释

①IPD(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产品集成开发)是一种跨部门合作的体系,是一种产品开发的理念以及模式。其IPD的核心思想包括:新产品开发是一项投资决策,产品创新一定是基于市场需求和竞争分析的创新,实现跨部门和跨系统的协同等。②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目标与关键成果法),是一套明确和跟踪目标及其完成情况的

管理工具和方法。OKR的主要目标是明确公司和团队的“目标”以及明确每个目标达成的可衡量的“关键结果”。

参考文献

- [1]滕泰.软财富[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
- [2]滕泰.软价值[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 [3]滕泰,刘哲.新经济城市、房地产发展的4S模式[J].中国房地产金融,2018(8).
- [4]滕泰,张海冰.抓住软产业发展机遇 推动经济稳定增长——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长期选择[N].经济参考报,2017-11-30.
- [5]滕泰,张海冰.软性制造 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N].经济日报,2017-12-12.
- [6]陈岩鹏.新供给学派创始人滕泰到底跟总理说了啥[N].华夏时报,2015-11-19.
- [7]滕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
- [8]滕泰.新财富论——新供给主义富民强国论[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
- [9]滕泰.区域硬发展离不开“软实力”[N].金融时报,2019-05-23.
- [10]滕泰,刘哲,张海冰.新红利——赢在下一个四十年[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
- [11]滕泰,张海冰.打造中国“硅谷”,雄安新区要向硅谷学什么[J].财经,2017(26).
- [12]滕泰,张海冰.软资源:抢占全球价值创造制高点[N].经济参考报,2018-03-21.
- [13]滕泰,刘哲.软就业:人工智能时代应对就业冲击之道[N].中国证券报,2017-12-23.
- [14]滕泰,范必.供给侧改革[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Promot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Xiong'an New Area with Soft Value Strategy

Teng Tai

Abstract: Xiong'an New Area was set up based on different industrial background, urban development background, reform background, which reflected th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st industrialization, post-urbanization stage, as well as the transformation direction of the fu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urban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new target of industrial selec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model of Xiong'an New Area in the soft value er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ft value and its law of creation and capitaliz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Xiong'an New Area should build a good soft environment in line with innovation, gather soft resources and soft industries, make full use of new modes such as flexible employment to attract innovative talents, explore the way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factor market, and explore the new social management model in the era of soft value. With the soft value strategy, the Xiong'an New Area may find new momentum and bright future.

Key Words: New Economy; Soft Value Strategy; Xiong'an New Area

(责任编辑:文 锐)

中国消费品制造业区域转移的特征研究*

刘云中 何建武

摘要:产业转移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格局的重要因素,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伴随着制造业空间结构的变化。研究消费品制造业区域转移的特征有利于分析产业特性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消费品制造业空间转移总体上呈现先向沿海地区集聚后向内陆地区扩散的特征,并遵循长三角—珠三角—北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的变化趋势。分行业来看,劳动密集程度高、集聚程度高的行业,其空间转移发生得也较早。

关键词:产业转移;区域发展;消费品制造业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1-0087-08 收稿日期:2019-12-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区域间产业转移”(7147305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国内区域分工与市场一体化研究”(71733003)。

作者简介:刘云中,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北京 100010)。

何建武,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北京 100010)。

一、引言

产业转移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格局的重要因素,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伴随着制造业空间结构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区域的非均衡发展,区域差距扩大,表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跨省人均GDP标准差由1989年的0.228上升到2005年的0.256,2005年之后区域差距出现转折性变化,由此前的上升趋势转为下降趋势,跨省人均GDP标准差下降到2008年的0.249,2012年又进一步下降到0.219。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总产值占全国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9年的33%下降到2003年的24%,此后该比重转而上升,2007年上升为26%,2012年上升为30%。

制造业空间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同步性,这意味着分析区域间产业转移对于理解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并对制

定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具有参考价值。区域间产业转移研究包含诸多内容,主要有:第一,区域间产业转移模式及路径研究。从区域的产业相对份额变化或者区域内发生的企业进入或退出等角度,研究产业在国内不同区域的变化。第二,区域间产业转移的产业特性研究。分析产业的区域间转移是要素成本敏感型还是贸易成本(运输成本)敏感型、是本地市场需求型还是外部市场需求型、是价值链紧密型还是价值链松散型,从而确定产业转移的特性。第三,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研究。不同的地方政府面临不同的约束和激励,我们可以简化地认为有两种类型地区,分别面临着结构优化和速度追求的激励,在较为正式的非合作博弈框架下,讨论地方政府的激励对产业转移的影响。

针对国内产业转移的早期研究主要围绕梯度转移展开,梯度转移的观点认为产业的区域转移应该按照中国经济总体布局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带顺序展开,但也有许多学者质疑梯度分工理论能否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对于指导产业转移实践的有效性,提出了反梯度理论(李国平等,2008)、推拉模型(魏后凯,2003)和网络型产业转移(赵张耀等,2005)等转移模式。随着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许多学者愈加关注“雁阵模式”理论,如蔡昉等(2009)分析中国不同区域间生产效率和单位劳动成本的差异,发现内陆省份比沿海省份拥有更高的TFP增长速度,因此提出中国可以通过地区间“雁阵模式”产业转移的方式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继续保持竞争优势。Zhang(2009)在研究资本在省际之间流动时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东部地区资本有向中西部地区流动的现象,这表明从资本视角的大国内部“雁阵模式”产业转移现象已经发生。曲玥等(2013)利用1998—2008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通过计量发现,2004年以前制造业一直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而在此之后集聚效果减弱,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认为“雁阵模式”在中国已经出现。大量研究表明,过去30多年国内产业主要处于不断向东部地区聚集的过程,但也有研究发现,以2004年为界,制造业集聚的拐点已经显现(范剑勇等,2013)。

尽管对于国内产业转移的研究已经较多,本文仍希望在以下3个方面有所增益。第一,针对目前主要是围绕工业或制造业区域间转移总体状况的分析,本文将重点分析消费品制造业的区域间产业转移,选择消费品制造业的原因在于消费品制造业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最先向市场开放的,市场发挥的作用比较大。第二,在细分产业的层面上,将更加有利于分析产业特性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市场影响较大的消费品制造业。第三,本文将分析1980—2012年消费品制造业的转移,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数据,可以更清晰地了解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变化情况。

二、产业转移的基本分析框架

从微观层面来看,产业转移反映的是厂商选址变化的过程。从传统的增长理论和贸易理论来看,影响厂商选址的主要因素是要素成本的差异,尤其是不可流动要素的成本。正是因为不同区域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了要素成本的差异,同时不同类型的产业或者是同一产品不同生产环节(或者是产品

生产价值链的不同部分)生产技术的差异决定了企业的最优要素组合的差异,进而厂商需要通过空间上的选址来促成要素最优组合实现成本的最小化。

从新贸易理论和空间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主要有市场规模和贸易成本。当贸易成本足够高(或者说足够抵消规模效应)时,地区之间企业的分布取决于各自的市场规模;而当贸易成本足够低时,规模效应(包括企业内、产业内和产业间的规模效应^①)的收益已经超过贸易成本,此时企业就会选择集聚,市场规模大的区域将受益。这里的贸易成本既包括物理运输成本,也包括制度层面的成本,如税收与补贴、区域保护与壁垒等。

一般来说,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要素的相对价格存在较大差异(见图1)。一方面,对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来说,由于产业发展的滞后以及较低的收入水平限制了人力资本的提升,存在大量过剩的非熟练劳动力,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很低,因而劳动力成本很低;另一方面,经济越落后的地区其资本品的价格越高,同时缺乏相应的专业技术人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不断提高,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②,劳动力的价格不断上升^③。与此同时,随着生产率的提升和技术、人力资本的积累,资本品和技术的相对成本不断下降。从长期来看,除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外,土地、环境等不可流动要素对企业选址、区域产业的发展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常,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土地的边际生产率越低、可用环境容量越高,因而土地成本、环境保护的机会成本也越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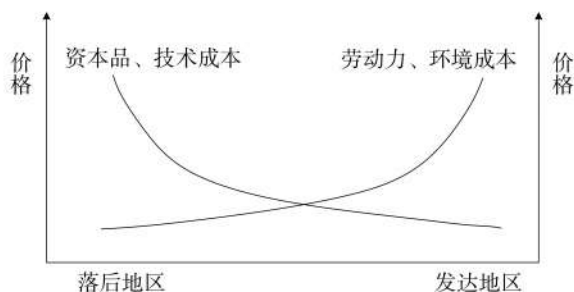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地区要素相对成本示意图

不同产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从要素的密集程度来看,可以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从产品的形态来看,有些行业产品是用于最终消费的,属

于消费品;有些行业则属于中间投入品产业或资本品产业。从可贸易程度来看,有些行业属于可贸易部门,有些行业则属于不可贸易部门,而且可贸易部门中对外依存度也存在很大差异。从产业分工位置来看,有些行业属于上游产业,如原材料的加工行业;有些行业则属于下游产业,如复杂制成品的生产行业。此外,随着产品复杂性的提高以及跨区域企业的推动,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不断发展和深化,产业内不同产品和同一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环节也可以表现出前面分析的不同特征。

当然,除前面两方面的因素外,需求侧的影响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封闭经济(或者贸易保护成本足够高)情况下显得更加重要。一般来说,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消费结构表现出一些普遍的规律,如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服务消费比重的提升等。这种消费结构的升级也是产业结构变化和企业选址的重要影响因素。

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供给和需求侧的微观要素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产业之间在技术水平、产品特征等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产业特征,两者之间存在优化组合和匹配的过程,而这一优化组合过程的变化决定了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表现出的不同特征。

因此,从空间和宏观角度来看,这种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就表现为产业的空间转移(见图2)。因此,一方面,区域自身供给和需求侧微观要素的变化决定着产业在空间转移过程中的角色;另一方面,产业特征的不同也决定着产业空间转移特征的不同,如转移的阶段和过程。

三、数据基础及观察指标

本文主要收集和整理 1980—2012 年 31 个省(市、区)27 个制造业部门的分行业数据,采用产业比重变化和产业集中度来衡量地区的产业相对转移状况和具体产业空间分布集中度的变化情况。

1. 数据基础

首先,收集和整理 1980—2012 年 31 个省(市、区)27 个制造业部门的分行业数据,所依据的数据来源主要有 3 种:第一,1980 年、1984 年和 1985 年的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5 年工业普查资料》,这也是目前能够找到最早的比较全面的分区域分行业的制造业数据,共 31 个制造业部门。第二,1987 年之后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其中 1988 年的《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包括 16 个制造业部门数据,1989—1997 年的《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包括 28 个制造业部门数据,而 1998 年之后的《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包括 20 个制造业部门数据。第三,在《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的基础上,本文通过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国研网数据库、WIND 数据库予以补充和扩展。其中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提供了 1999—2011 年 29 个部门的两位码制造业数据,其余数据则来自国研网数据库、WIND 数据库。将这 3 类数据进行整理合并从而得到 1980—2012 年^④的分区域分行业的制造业数据库。从指标的角度来看,目前主要收集了两个指标,分别是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由于 2007 年之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工业增加值,本文

主要采用工业总产值数据。

其次,参考蔡昉等(2013)的做法,将所有制造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根据 2008 年经济普查发布的分行业全部工业(含规模以上和规模以下所有企业)指标测算出分行业的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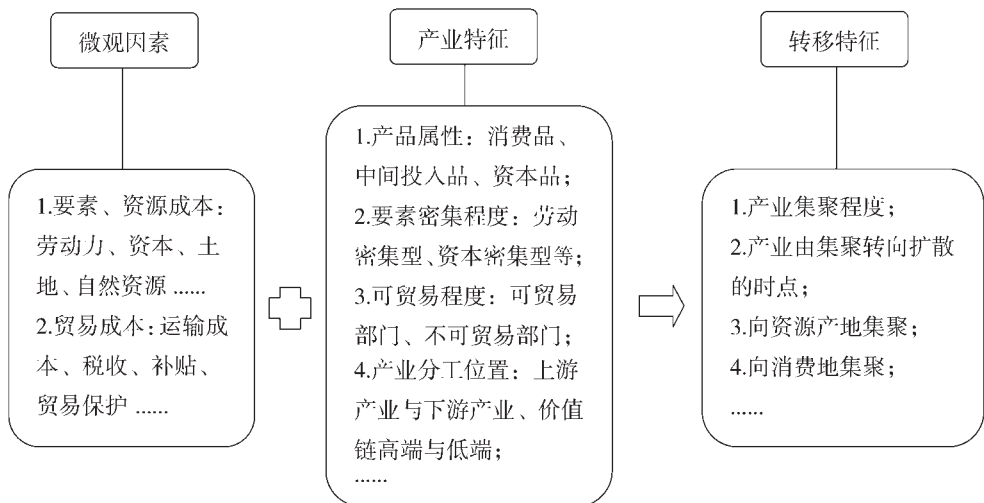


图2 产业转移分析框架

均固定资本,低于制造业平均值的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于制造业平均值的则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再次,按照27个制造业的制成品用途划分,可分为消费品制造业、中间投入品制造业和资本品制造业,其中的13个行业归为消费品制造业(见表1)。

表1 消费品制造业包含的国民经济行业

劳动密集型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家具制造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纺织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食品制造业
资本密集型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烟草制品业

2.观察指标

产业转移的研究方法和观察指标很多,既有直接方法,如产业重心分析法、产业比重变化分析法,也有间接方法,如优势产业分析法、产业集聚指数法等。本文主要采用产业比重变化和产业集中度两个观察指标。

第一,产业比重变化。该指标主要是通过计算各地区相应行业增加值占全国该行业增加值比例的变化来衡量地区的产业相对转移状况。

$$S_{ij}^1 - S_{ij}^0 > 0, \text{存在产业相对转入}$$

$$S_{ij}^1 - S_{ij}^0 < 0, \text{存在产业相对转出}$$

其中,0、1分别表示前后两个不同时间点, S_{ij} 表示地区*i*的*j*产业占全国该产业的比重。

第二,产业集中度。通过产业集中度指标可以清晰地看出具体产业空间分布集中度的变化情况。测量产业集中度的指标比较多,如熵指数、赫芬达尔系数指数、胡弗系数、EG指数和基尼系数等。本文主要采用CR指数,计算公式为:

$$CR_{kn} = \frac{\sum_{i=1}^n X_{ki}}{\sum_{i=1}^N X_{ki}}$$

其中, CR_{kn} 表示产业*k*在前*n*个地区的集中度, X_{ki} 表示产业*k*在地区*i*的工业增加值,*N*表示全部地区数。

四、中国消费品制造业的区域转移特征

消费品制造业呈现先集聚后扩散的趋势,2005

年以前产业转移以东部地区内部为主,2005年以后则主要向中部地区转移。以内需为主的消费品制造业和出口型消费品制造业表现出不同的转移特征。

1.消费品制造业空间转移的总体状况

消费品制造业空间转移总体上呈现先向沿海地区集聚后向内陆地区扩散的变化趋势,即消费品制造业首先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内部集聚,然后向北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转移和扩散。从整体的变化情况看,可以分成3个阶段。

第一,20世纪80年代,消费品制造业的空间布局没有大的变化,但区域内的产业转移较为明显。尤其是1988年以前四大板块的消费品制造业比重没有太大的变化,变化最大的是西部地区,其消费品制造业比重提升了1.6个百分点,而东北地区的消费品制造业比重则下降了1.5个百分点。这个时期各个区域内的产业转移非常明显,且这种转移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具体来看,上海是主要流出地,江苏、浙江、广东等则是主要流入地。1980—1988年,上海的消费品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下降了5.4个百分点,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消费品制造业第一大省下降至全国排名第4位;江苏、浙江的消费品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则都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江苏更是发展成为全国消费品制造业第一大省;广东的消费品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提高了2.5个百分点。

第二,20世纪80年代末到2005年,四大板块之间的集聚速度加快。这一时期,随着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消费品制造业的东部地区聚集度大幅提升。1988—2005年,东部地区消费品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提高了17.6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消费品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则分别下降了6.6个百分点、5.9个百分点和5.1个百分点。从行业集中度(Concentration Ratio,CR)来看,排名前5位省份的行业集中度(CR5)大幅提升(见图3),由1988年的43%提高到2005年的61.7%,且这些省份全部在东部地区,不过不同的是福建替代上海跻身前5名。从各省份相对份额的变化来看,产业转移的大致趋势是长三角—珠三角—北部沿海地区。

第三,2005年至今,集聚度大幅下降,开始向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转移。这一时期,产业集聚程度开始逆转,出现了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扩散转移的趋势。2005—2012年,东部地区消费品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下降了14个百分点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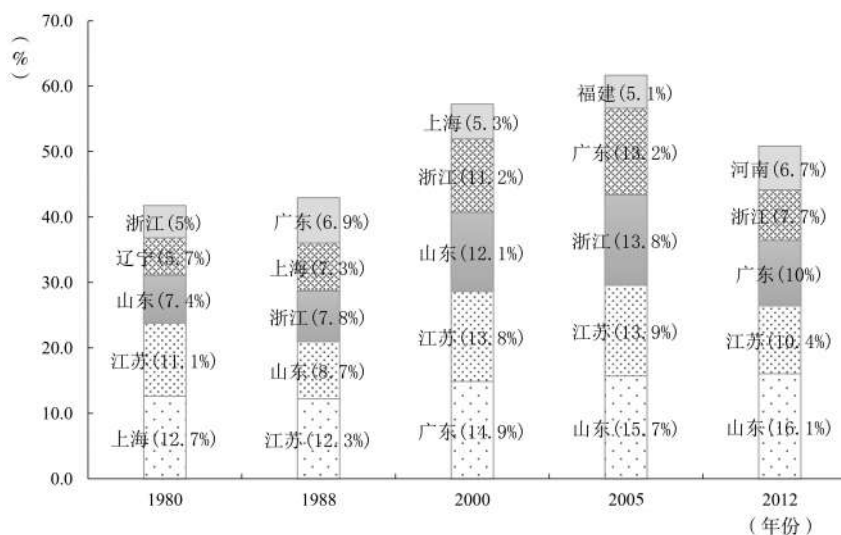


图3 1980年、1988年、2000年、2005年和2012年消费品制造业CR排名前5位的省份及其比重

2012年的比重基本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相当。与之相对的是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消费品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大幅提升,同期这两个区域分别提高了8.3个百分点和4.0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消费品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虽然也有提高,但幅度有限。从各省份额变化来看,河南赶超福建跻身前5位。除山西外,中部地区其他5省的消费品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提升最多的是湖北,其消费品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累计提高了2.5个百分点。另外,东北地区消费品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尤其是辽宁提

升了2.1个百分点。

2.消费品制造业分行业空间转移的特征

第一,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空间转移的时间也较早。尽管消费品制造业内部绝大多数部门都经历了先集聚后扩散的趋势,但这些部门之间在集聚程度和产业从集聚地区向其他地区扩散的时间点上存在较大差异。如文教用品、纺织服装制鞋业拥有很高的集聚程度,较早出现产业转移;造纸、食品加工制造业等集聚程度较低,则较晚出现产业转移(见图4)。从集聚程度来看,

文教办公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皮革羽毛和制鞋业、服装制造业以及纺织业出现了非常高的空间集聚程度,近十年来CR5都在70%以上。其中,文教办公和娱乐用品制造业集中度最高,近10年来CR5平均值达到85%,峰值年份甚至接近90%。同时从集聚程度的变化来看,除文教办公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外,这些行业的CR5都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其中皮革羽毛、制鞋业提升最多,其CR5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40%提升至2003年的将近80%,集中度翻了一番,近些年虽然有些下降,但仍达67%。与这些行业不同的是,造纸及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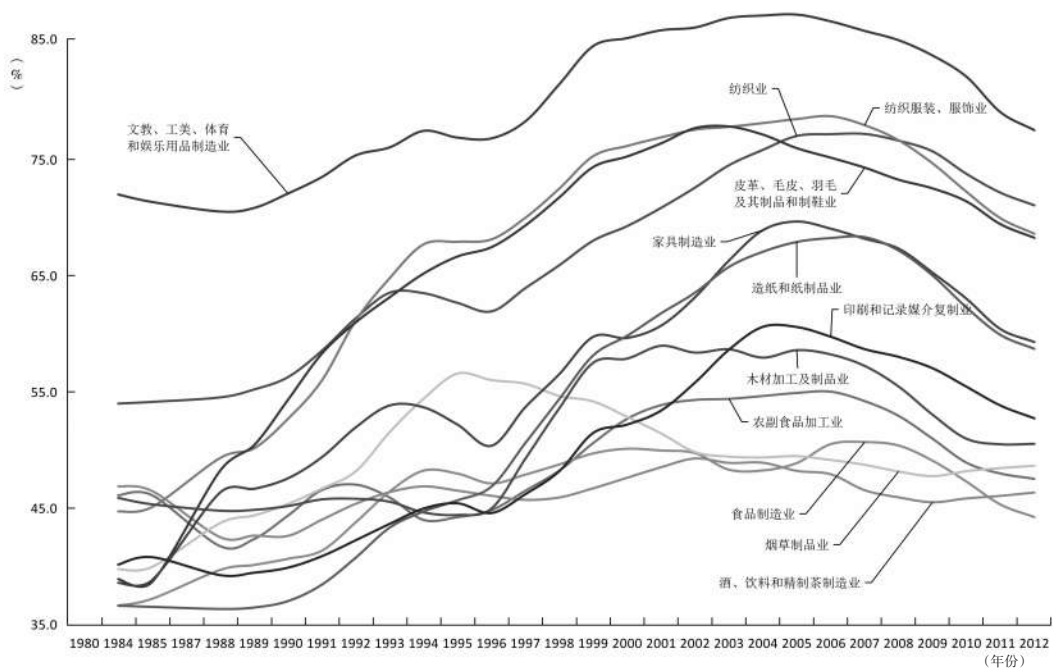


图4 消费品制造业各行业CR5变化趋势

注:图中CR5为三年移动平均数据。

复制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等行业集中度相对较低。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等4个行业的集中度最低,基本都在50%左右。而且这些行业还有一个特点,过去30多年行业集中度变化不是太大,特别是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第二,劳动密集程度越高、集中程度越高的行

业,越早出现空间转移。对比消费品制造业各行业的要素密集程度可以发现,自然资源密集程度越高的行业,区域集中度越低,如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与烟草制品业;除这些资源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外,其他的消费品制造业劳动密集程度越高,集中程度也越高,相应越早出现产业转移,如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在21世纪初集聚过程就出现了转折趋势(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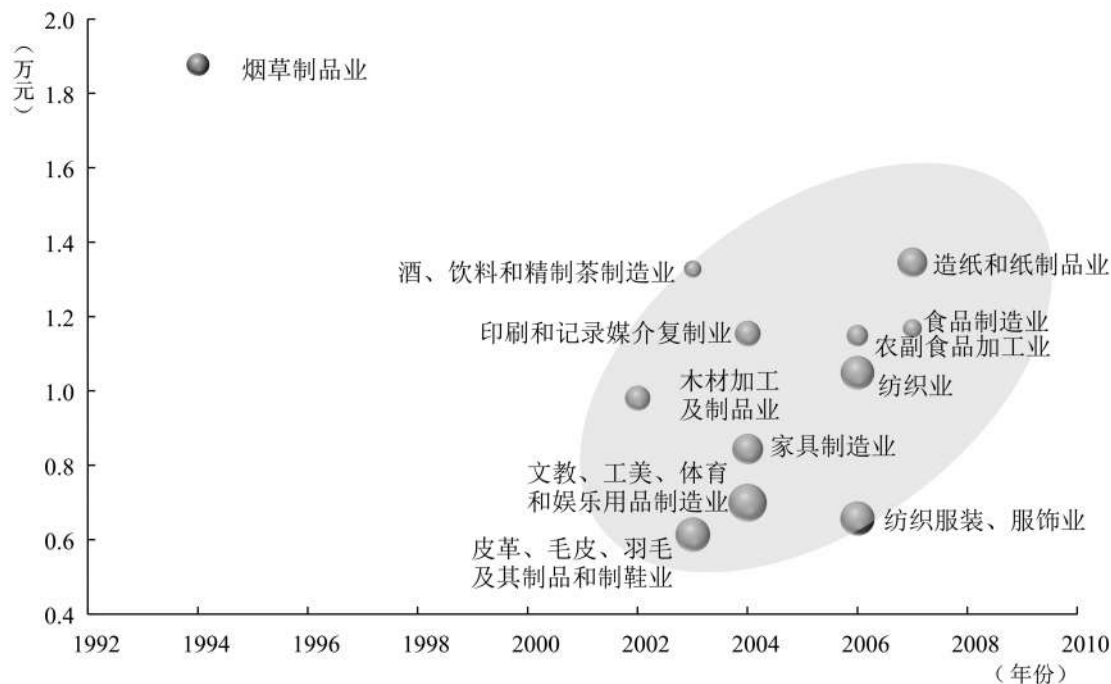


图5 消费品制造业分部门要素密集程度、CR5峰值出现年份

注:气泡大小显示CR5峰值。

第三,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消费品制造业向与沿海地区邻近的内陆地区转移。消费品制造业不同部门的消费市场对象有很大的差异。一方面,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以及烟草制品业等4个消费品制造业以内需为主,主要销往国内市场,这4个行业的平均国内市场依存度达89%^⑤;而其他的消费品制造业则主要销往国际市场,尤其是纺织服装、服饰业,该行业的国际市场依存度高达59%。消费对象的不同直接影响着行业的集聚和扩散过程,有着不同的集聚或扩散方向。下面以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为例,分析面向国际市场的消费品制造业的集聚和扩散转移过程。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的空间分布非常集聚,该行业20世纪80年代主要集聚在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之后进一步向东部地区集聚。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趋势有所改变,开始由长三角向环渤海地

区以及中部地区转移,这一期间长三角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占全国的份额下降了13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占全国的份额则分别提高了8个百分点和2.5个百分点。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福建是东部地区的一个特例。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福建的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趋势,即便是金融危机期间也没有改变这一趋势,其占全国的份额由20世纪80年代末的1%左右上升至近年来的接近9%。而且从图6区位商的数据来看,福建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的相对比较优势始终位居全国前5名之列。金融危机对其影响不是太大的原因在于,福建的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不仅依托国际市场,同样也依托国内市场,其产品销往国内其他省份的比重达到43%,超过了出口所占的42%的份额^⑥。福建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的情况说明国内市场对产业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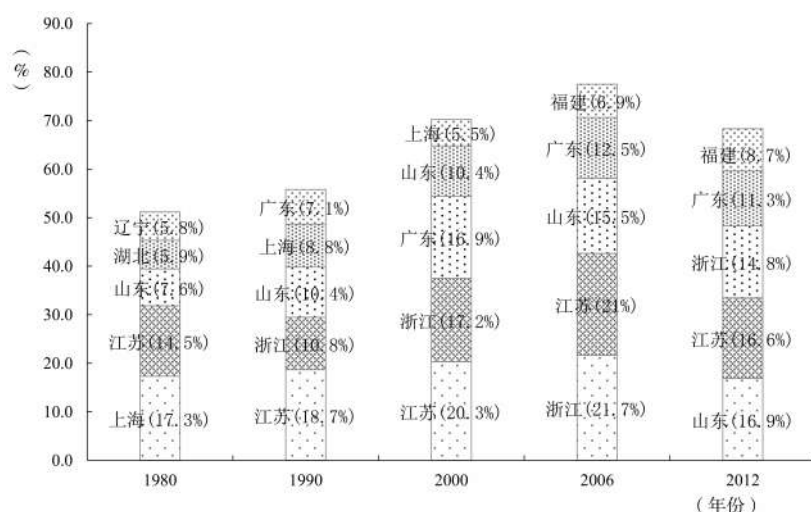


图6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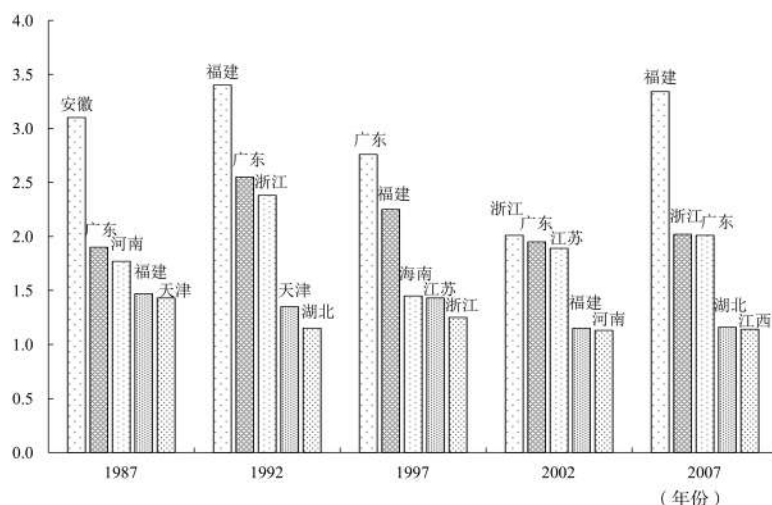


图6b

图6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CR5及区位商的前5名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区域投入产出表,作者计算。

布局的影响已经越来越重要,同时也说明产业内部价值链的升级对于保持产业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以内需为主的消费品制造业更多地向消费市场所在地和资源富集地区转移。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⑦与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的市场对象不同,国内需求占约90%。就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而言,产业空间格局的变化比较清晰。从区域布局变化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前没有大的变化,一直到2004年前后呈现出向东部地区集聚的微弱趋势,在之后又开始慢慢扩散。比较2012年和

1980年的区域分布状况,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如前所述,该行业主要是内需主导,因而与沿海地区的区位关系不是很密切,而且该行业的许多产品不适合较长时间的运输,因而跟国内市场的区位条件十分密切;另一方面该行业的产品大多属于资源密集型产品,有的产品以农作物作为基础原材料,因而与农产品生产发达的地区存在密切联系,有的产品需要独特的地理条件。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该产业相对比较分散,不太容易高度集聚,如图7所示其CR5都在50%以下;另外,其自然资源密集的特点使得其区位变化不大,区位商前5名在过去的30多年间都没有显著变化。从产业转移的趋势来看,主要还是向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部分省份转移,如近5年来,湖北和辽宁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占全国的份额分别提高了3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是中国的粮食主产区,属于原材料的来源地;而中部地区人口规模大、人口密度较高,恩格尔系数较高,而且距离东部地区非常近,因此属于消费市场所在地,且与主要消费市场紧密相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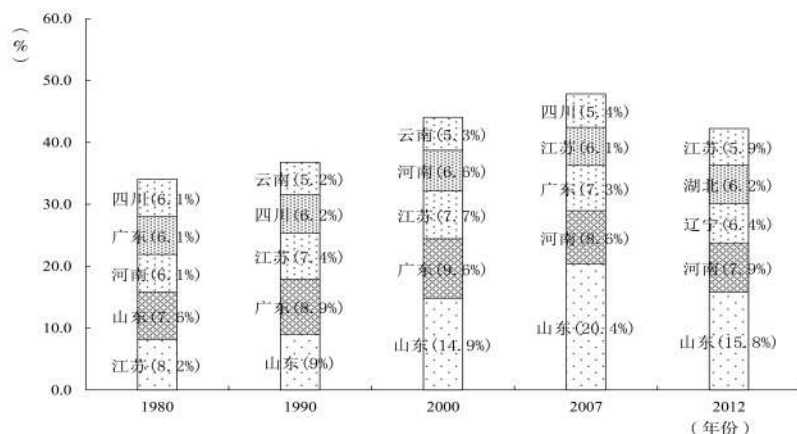


图7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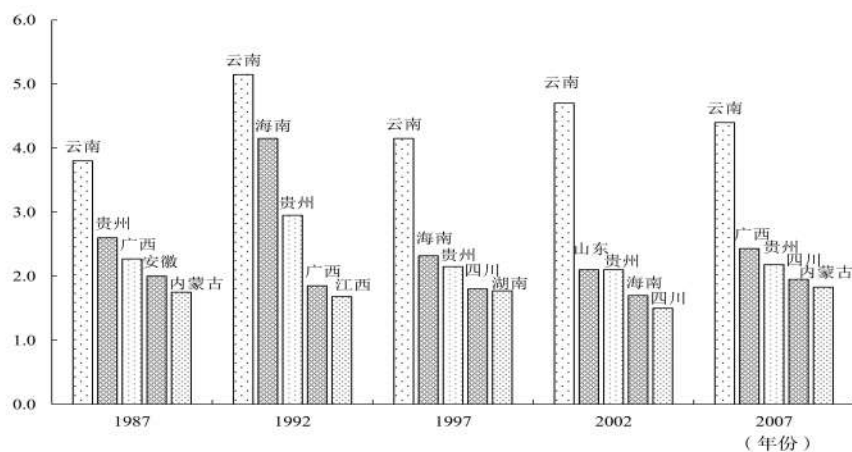


图7b

图7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CR5及区位商的前5名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区域投入产出表,作者计算。

注释

①产业内的规模效应称之为本地化经济,产业间的规模效应称之为城市化经济。②这正是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所揭示的内容。③斯托尔伯—萨缪尔森定理也从贸易的角度揭示了这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机理。④缺少1981年、1982年、1983年和1986年的数据。具体而言,就是将棉纺织业与纺织业合并为纺织业;将石油加工业和炼焦、煤气及煤制品业合并为石油加工与炼焦业;将橡胶制品业和塑料制品业合并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将普通机械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合并为机械设备制造业;将汽车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合并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经过归并整理最终得到了27个部门的制造业数据库。2013年的工业企业统计口径有较大变化,未纳入计算范围。⑤这里的国内市场依存度计算公式为出口/(国内最终消费+出口)。⑥这一数据是基于2007年福建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考虑到近些年国际市场的疲软,国内市场的份额会进一步上升。⑦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以及烟草制品业等4个消费品制造业统称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参考文献

- [1]范剑勇.产业集聚与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J].经济研究,2006(11).
- [2]范剑勇,赵沫,冯猛.进入退出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变迁[J].浙江社会科学,2013(4).
- [3]路江涌、陶志刚.中国制造业区域聚集及国际比较[J].经济研究,2006(3).
- [4]曲玥,蔡昉,张晓波.“飞雁模式”发生了吗?——对1998—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3(3).
- [5]石敏俊,逢瑞,郑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演进的区域分异与环境效应[J].经济地理,2017(10).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Transfer of Chinese Consumer Goods Manufacturing

Liu Yunzhong He Jianwu

Abstract: Industrial transfer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regional pattern. The change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pattern is accompanied by the change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transfer of consumer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helpfu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on industrial transfer. On the whole, the spatial transfer of consumer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rst gathering in the coastal areas and then spreading to the inland areas, and follows the changing trend of Yangtze river delta—Pearl river delta—northern coastal areas—central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 spatial transfer of industries with high labor intensity and high concentration degree occurred earlier.

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er; Regional Development; Consumer Goods Manufacturing

(责任编辑:张子)

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内部需求制约： 制造业消费阶段变化的影响^{*}

杨阔 汪艳莉

摘要: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后,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升级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全球经济复苏依旧乏力、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存在等外在因素造成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外部需求条件迅速恶化,因此内部需求成为制造业升级的主要市场保障。然而,制造业消费需求却发生了不利的阶段变化,即制造业消费增速呈现显著回落特征,从而对中国制造业升级构成制约。面对需求结构的较快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供给质量,以使供给结构调整跟上需求结构升级的步伐,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进而促进制造业消费需求增长。

关键词:中国制造业升级;制造业消费;阶段回落;制约机理;制约强度

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1-0095-08 **收稿日期:**2019-10-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十三五’时期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协同下的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研究”(16ZDA004)。

作者简介:杨阔,男,赣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经济学博士(赣州 341000)。

汪艳莉,女,赣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硕士生(赣州 341000)。

一、引言

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但经济下行、增长不稳、升级乏力的压力并未解除,在此形势下,中国制造业升级承担着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任。然而,发展阶段转变后,中国制造业升级正面临供给侧和需求侧多重因素制约。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制约因素研究总体较为缺乏,就主要文献来看,邓丽娜(2015)、吕永权(2015)认为关键、核心技术的缺失是制约制造业升级的主要因素;杨慧杰(2013)、窦争妍、高文书(2016)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以及回报率低下是制约制造业升级的主要因素;何骏(2016)则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了中国制造业升级。此外,高启明

(2013)分析了中国通用航空制造业的升级瓶颈,指出人才短缺、产品研发投入不足是主要制约因素;张偲、权锡鉴(2016)分析了中国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瓶颈,认为设计开发能力落后和高端配套能力薄弱是其升级的主要瓶颈;周学政、许晴(2016)研究了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困境,认为支持创新资源缺乏、管理水平不高、信息化程度低下等因素制约了其升级过程。国外相关研究主要以制造业“升级机制”分析居多。例如Gebreyesus & Sonobe(2012)、Kadarusman & Nadvi(2013)研究了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制造业升级机制;Takii(2011)、Anwar & Sun(2012)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视角下的制造业升级机制;Chen & Zulkifli(2012)、Liu et al.(2015)则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视角下的制造业升级机制。

文献梳理发现,现有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点不足:其一,明确针对发展阶段转变后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制约因素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其二,有限的制约因素分析多关注的是供给侧,显著忽视了需求侧制约因素分析,这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外部需求缩减、内部需求重要性提升的现实背景明显不符,亦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意——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不相符。其三,现有制约因素分析普遍缺乏系统性,对于制约因素的选择、分析与归纳带有明显的随意性,缺乏一个相对严谨而完整的理论、实证分析框架。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切入点:于需求侧,以制造业国内消费需求的阶段变化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制约关系为研究对象,遵循“制约因素甄别→制约机理分析→制约强度实证→制约缓解”的逻辑进路,展开理论、实证分析,并从分析结论中寻找政策抓手,提出缓解制约的政策思路与建议。

二、消费需求制约的甄别

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后,由于中国已处于工业化后期,重工业化进程已基本完成,大规模投资进程基本结束,以投资为主导的需求驱动已不可过分依赖。同时,受制于全球经济复苏持续乏力,国际市场需求依旧未能走出长期低迷的泥潭,而中美贸易摩擦更使中国制造业的外部需求雪上加霜,制造业出口需求显著下降(杨阔、郭克莎,2019)。此种形势下,新阶段中国制造业升级便需要内部消费需求保障,即制造业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然而,发展阶段转换后,中国制造业的消费需求增速却出现了明显的回落特征。

从中国制造业消费的增长速度维度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消费的阶段变化特征:发展阶段转换后,中国制造业的消费增速呈现出显著的回落趋势。具体来看,以1990—2017年为考察样本,以进入新常态的年份即2012年近似作为阶段转换时点,将前后两个阶段中国制造业消费增长率的长期波动状况绘制成图1。

首先,观察中国制造业消费增长率的波动特征(见图1)。在前一阶段,即1990—2011年,中国制造业的消费增长率基本处于高位波动,仅1998年、2001年、2008年出现负值;而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

即2012—2017年,中国制造业的消费增长率则完全降至低位区波动,分别为3.29%、1.41%、3.21%、1.43%、-0.09%、0.065%,平均增速仅为1.55%。由此可见,发展阶段转变后,中国制造业的消费需求增速下降之势显著。其次,考察中国制造业消费的平均增长率变化特征。经过计算,我们发现中国制造业消费的平均增长率由前一阶段的9.06%下降至现阶段(即2012—2017年)的1.55%,降幅显著。中国制造业消费增速的显著下降与现阶段制造业升级所需的内部消费需求条件相悖,无法满足新阶段中国制造业升级对于内部市场快速增长的要求,从而成为新阶段中国制造业升级所面临的关键因素制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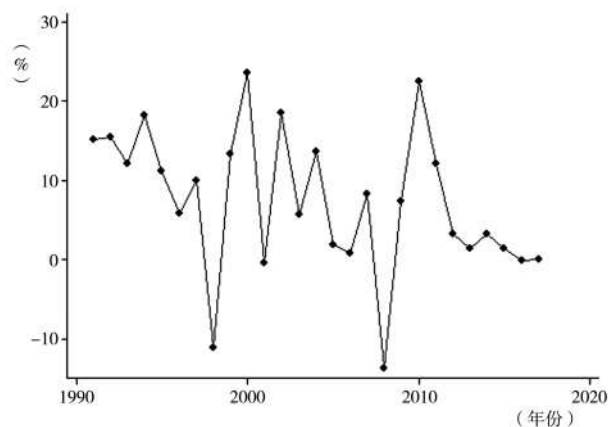


图1 1990—2017年中国制造业消费增速波动图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库(UNIDO)、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绘制。

三、消费需求变化对制造业升级的制约

按照学界对于产业升级内涵的界定,主要从两个维度把制造业升级区分为“制造业产业内部升级”和“制造业产业间升级”两种类型,其中“制造业产业间升级”亦称为“制造业结构升级”。通常使用以下指标进行测度:使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度量制造业产业内部升级水平,劳动生产率越高,表明制造业各细分行业内部升级的综合水平越高;劳动生产率增长越快,则制造业各细分行业内部升级越快。使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①的增加值在制造业总体中的占比来度量制造业产业间或结构升级水平,占比越大,结构越高级;占比提升越快,结构升级速度越快。

1.制造业消费增速回落对于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制约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在消费需求方面,伴随重化工业进程基本完成的则是高额的大众消费阶段的基本结束(Rostow, 1960)。通过对历史资料的考察发现,发展阶段转变后,中国制造业的消费需求增速出现了幅度明显的回落现象。结合中国制造业的消费增长率与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增长率的长期波动轨迹,具体考察发展阶段变化后制造业消费增速回落对于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制约关系。以1990—2017年为考察样本,以2012年近似作为阶段转换时点,将1990—2017年中国制造业的消费增长率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增长率的长期波动轨迹绘制成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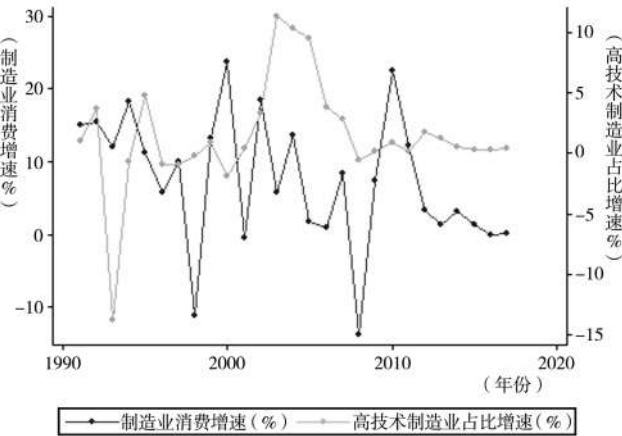


图2 1990—2017年中国制造业消费增长率与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增长率的长期波动图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库(UNIDO)、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整理。

结合图2,考察制造业消费增长率和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增长率的各自变化特征。图2中,1990—2011年,中国制造业的消费增长率基本处于高位波动,仅1998年、2001年、2008年出现负值。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即2012—2017年,制造业的消费增长率则完全降至低位区波动,分别为3.29%、1.41%、3.21%、1.43%、-0.09%、0.065%。可见,发展阶段转换后,中国制造业的消费需求增速回落显著。而由上文知中国制造业的消费平均增长率由前一阶段的9.06%降至现阶段的1.55%,降幅显著。继而考察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增长率的波动特点。如图2所示,尽管高技术制造业的占比增长率波动较大,但仍然可以看出,发展阶段转换前后两

个阶段的落差较为显著,尤其是在2001—2007年时段,高技术制造业的占比增长率明显高企。经过计算,我们同样可以发现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增长率的回落特征:高技术制造业占比的平均增长率由前一阶段的1.62%降至现阶段的0.75%,降幅显著。

接下来,考察制造业消费增长率波动同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增长率波动的相关性。从图2可以发现,在整个考察时间内,制造业消费增长率的长期波动与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增长率的长期波动之间总体上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尤其在2007年之后,二者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正相关;而在2007年之前,高技术制造业占比的增长率变化在总体上滞后于制造业消费增长率变化的1—3个年份,例如,制造业消费增长率在2000年出现下降,而高技术制造业占比的增长率则滞后到2003年才出现下降。这种波动滞后性主要是由市场信息传导、价格机制调节的滞后性造成,即市场消费需求的变化信息没有及时被生产者捕捉,以致产能和库存继续扩大,直至消费需求的变化被充分察觉为止。通过计算可以发现,制造业消费平均增长率的阶段回落与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平均增长率的阶段回落之间呈现出显著的一致性。故此,可得出如下结论:制造业消费增长率是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增长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二者的变化显著正相关;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制造业消费增长率的阶段回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增长率的阶段回落,导致阶段转变后制造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趋缓,从而对现阶段中国制造业结构快速升级构成制约。

最后,阐述制造业消费增速回落对于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制约机理。经济新常态之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用以完成工业中期阶段的重工业化任务,这主要依靠连续的大规模投资驱动,而投资驱动的重要动力则是重工业化进程中的高额大众消费运动。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上的高额大众消费运动主要表现为国民对于家用电器、计算机、通信设备和汽车、飞机等运输设备以及住房等耐用品需求的普遍、快速增长,且其中多数工业耐用品是属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这些耐用品的消费进一步引致相关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投资和生产。因此,高额大众消费运动或直接、或间接地拉动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投资与生产的快速增长,促使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快速提高,即制造业结构的快速升

级。然而,进入经济新常态后,消费方面进入追求生活质量的新阶段,工业品市场相对饱和,消费需求结构出现工业品需求比重逐步下降而服务性需求比重不断上升的重大变化,制造业消费需求增速随之明显回落,如图2所示,其均值由9.06%降至1.55%。制造业消费需求增速的显著下降便造成消费的快速增长对于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与生产增长的拉动机制严重削弱甚至中断,致使高技术制造业占比的增速随之显著下降,其均值由1.62%降至0.75%,因此阻碍了高技术制造业占比的快速提升进程,从而对现阶段中国制造业结构快速升级构成制约。

2.制造业消费增速回落对于制造业产业内部升级的制约

发展阶段转变后,通过对历史资料的考察发现:一方面,制造业的消费需求增速出现了显著回落;另一方面,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速度也出现了显著回落现象。对二者之间的因果相关性有必要进行实证考察。同样选择1990—2017年为考察的时间尺度,将1990—2017年中国制造业的消费增长率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长期波动状况绘制成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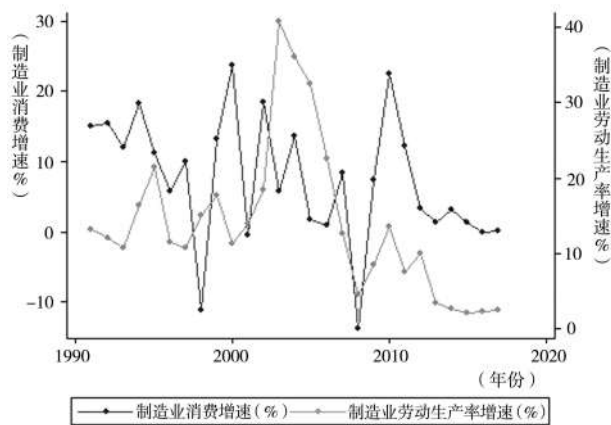


图3 1990—2017年中国制造业消费增长率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长期波动图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库(UNIDO)、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全球经济数据库(CEIC)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整理。

首先,考察制造业消费增长率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各自变化特征。如图3所示,就制造业的消费增长率波动特点看,1990—2011年,除1998年、2001年、2008年为负值外,制造业消费的增长率基本位于高位波动,大多数年份的增长率超

过10%;然而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即在2012—2017年,制造业的消费增长率整体上出现了明显下降。通过计算发现:制造业消费的平均增长率由前一阶段的9.06%降至现阶段的1.55%,下降幅度显著。就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波动特点看,如图3所示,在1990—2011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明显处于高位波动,仅2008年、2009年、2011年的增长率不足10%,其他年份的增长率均在10%以上;然而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即2012—2017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发生了明显回落,除了2012年的水平较高(9.91%)外,其他年份均大幅下降,分别为3.36%、2.65%、2.08%、2.33%、2.54%。而从均值的角度我们计算得知,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则由前一阶段的16.74%下降至现阶段的3.81%,降幅显著。

其次,考察制造业消费增长率波动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波动间的相关性。由图3发现,在发展阶段变化前后的整个考察期内,制造业消费增长率的波动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波动之间总体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其中在2007年之后,两者间的关联性表现为同步正相关。而计算结果也反映出制造业消费平均增长率的阶段回落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的阶段回落之间呈现出显著的一致性。由这种统计特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制造业的消费增长率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变化,且这种决定关系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性,因此,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制造业消费增长率的阶段回落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增长率回落,即导致新常态后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内部升级速度显著下降,从而对现阶段中国制造业产业内部的快速升级构成制约。

最后,对制造业消费增速的回落之于制造业产业内部升级的制约机理进行阐述。发展阶段变化之前,高额的大众消费潮引发了以制造业产品为主的工业耐用品消费的快速增长,从而决定了1990—2011年中国制造业消费的高增长率(均值为9.06%)。制造业消费的快速增长直接引致了电器、计算机、运输设备、通信设备等耐用品制造业投资与生产的扩大,创造出大量的就业与劳动机会,从而使得各类劳动者通过对新技术设备的学习和使用、分工与协作的不断加强,以及后续的“干中学”

过程而不断提高各工序、环节的劳动生产率。制造业消费的快速增长间接引致了对于相关投资品需求与生产的迅速扩大,这又在新的关联领域创造出大量的就业与劳动机会,从而在更广范围、更高程度上进一步提高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以上两个过程共同决定了前一阶段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其增速均值高达16.74%),体现着前一阶段中国制造业产业内部的快速升级。然而,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高额的大众消费潮趋于结束,工业品市场趋于饱和,制造业消费增长率因此大幅回落,这便造成由制造业消费的快速增长而诱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的所有直接和间接机制随之中断,从而导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显著下降。换言之,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制造业消费增速的回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制造业产业内部升级速度的明显下降,从而对现阶段中国制造业产业内部的快速升级构成制约。

四、关于制约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制造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内部升级的不同,以制造业消费量 *Consume* 作为解释变量,以制造业投资量 *Invest* 和制造业出口量 *Export* 作为控制变量,以高技术制造业占比 *HTMP* 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MLP* 作为被解释变量,所有变量选择1990—2017年即一共28个年份的样本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库(UNIDO)、全球经济数据库(CEIC)、《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通过构建回归估计模型,对制造业消费量 *Export* 的变化之于制造业升级的制约关系及制约强度进行实证考察。以下从两个方面展开具体分析:首先以高技术制造业占比 *HTMP* 作为被解释变量 Y_1 ,实证分析解释变量对于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制约关系;其次以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MLP* 作为被解释变量 Y_2 ,实证分析解释变量对于制造业产业内部升级的制约关系。

1.数据检验

为避免发生“伪回归”的现象,使用PP单位根检验法对上述5组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各

变量的Z统计量均大于10%的临界值,故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以上各变量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均是非平稳的。此时若不进行数据处理而直接进行回归,则可能发生“伪回归”的现象。避免“伪回归”的方法之一是对相关变量作一阶差分,先将其转化为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然后再进行实证回归。因此,需对各变量数据进行对数差分处理,然后再一次进行PP平稳性检验。对数差分处理后的PP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对数差分变量均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以上各变量的对数差分变量均为平稳变量,即出现“伪回归”现象的可能性极小,或实证分析所得结论具有较大的可信度,可采用对数差分变量的形式进行下一步的实证分析。

表1 各变量的PP检验结果

变量	Z(t)统计量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i>HTMP</i>	-0.246	-3.750	-3.000	-2.630
<i>MLP</i>	1.876	-3.750	-3.000	-2.630
<i>Consume</i>	-0.443	-3.750	-3.000	-2.630
<i>Invest</i>	3.720	-3.750	-3.000	-2.630
<i>Export</i>	2.761	-3.750	-3.000	-2.630

表2 各变量进行对数差分处理后的PP检验结果

变量	Z(t)统计量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Delta \ln HTMP$	-3.308	-3.750	-3.000	-2.630
$\Delta \ln MLP$	-3.759	-3.750	-3.000	-2.630
$\Delta \ln Consume$	-3.405	-3.750	-3.000	-2.630
$\Delta \ln Invest$	-2.968	-3.750	-3.000	-2.630
$\Delta \ln Export$	-2.790	-3.750	-3.000	-2.630

2.模型构建

计量模型设计如下:

$$\ln Y_t = \alpha + \beta_1 \ln X_{1t} + \beta_2 \ln X_{2t} + \cdots + \beta_n \ln X_{nt} + \mu_t \tag{1}$$

μ_t 为随时间变化的随机误差项, β 为待估参数, α 为截距项, $\ln X_t$ 表示 t 期影响制造业升级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ln Y_t$ 表示 t 期制造业升级的衡量指标。由于差分处理后的数据是平稳的,不存在时间趋势,因此实际参与计量回归的是变量的差分形式。把模型(1)转化为差分形式:

$$\Delta \ln Y_t = \alpha + \beta_1 \Delta \ln X_{1t} + \beta_2 \Delta \ln X_{2t} + \cdots + \beta_n \Delta \ln X_{nt} + \Delta \mu_t \tag{2}$$

在模型(2)中, $\Delta \ln Y_t$ 指的是被解释变量的对数差分形式,即 $\Delta \ln HTMP_t$ 和 $\Delta \ln MLP_t$ 。 $\Delta \ln X_t$ 指的是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对数差分形式,即 $\Delta \ln Consume_t$ 、 $\Delta \ln Export_t$ 、 $\Delta \ln Invest_t$ 。被解释变量分

别为 $\Delta \ln HTMP_i$ 和 $\Delta \ln MLP_i$ 时,把对应的回归估计模型分别记为模型1和模型2。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OLS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制造业消费变化对于制造业升级影响的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Delta \ln Consume$	0.436*** (2.64)	0.553*** (2.51)
常数项	-0.211** (-2.69)	-0.637** (-6.12)
R ²	0.735	0.624

注:**、***分别表示在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对应估计值的t统计量。

3.实证结果分析

从回归结果看,模型1、模型2中的 $\Delta \ln Consume$ 估计系数均为正值。这符合制造业消费与制造业升级之间的作用关系:制造业消费变化对于制造业升级表现为正向因果关系,即解释变量增长快则制造业升级快;反之,解释变量增长慢则制造业升级慢。由于发展阶段转变后,中国制造业消费增速呈显著回落特征,导致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增速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显著回落,从而对制造业升级进程构成制约关系。

具体来看,模型1、模型2中,解释变量 $\Delta \ln Consume$ 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436和0.553,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和1%。这表明,制造业消费量是决定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关键变量,且为同向因果关系:制造业消费的快速增长可以促进制造业产业间和产业内部快速升级;相反,当制造业消费增速出现大幅下滑时,则会对制造业产业间和产业内部升级进程产生制约作用,且制约弹性系数值分别为0.436和0.553。

通过计量分析,主要得出两个结论:其一,从定量层面证实了制造业消费量同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制造业消费增长越快,则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越快;反之,前者增长越慢,则后者提高越慢。其二,得出制造业消费阶段变化对于制造业升级的制约强度大小。发展阶段转换后,由于制造业消费增速显著回落,造成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显著下降,从而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间和产业内部升级进程构成制约作用,制约强度即为弹性系数值,分别为0.436和0.553,显著性水平均为1%。

五、制造业消费需求制约的缓解

通过理论、实证分析发现,发展阶段转换后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进程面临显著的消费因素制约。面对需求结构的较快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供给质量,以使供给结构调整跟上需求结构升级的步伐,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潜在需求转化现实需求,进而促进制造业消费需求增长。然而,这只是部分地促进消费需求增长,部分地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不可能引致制造业消费需求长期、快速增长,而消费需求的长期、快速增长则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制造业快速升级的必要市场条件。因此,应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以引导需求结构调整和快速升级,促进制造业消费需求持续扩大。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上进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思路是:通过深化需求领域的体制改革,引导需求结构由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持续提高居民的消费率、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以新的制造业消费增长带动新的制造业投资增长,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上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提供长期市场保障。

通过深化需求领域的体制改革,着重扩大国内消费,持续提高最终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构建以消费为主导的需求结构,能够最大程度上破除需求增速回落对于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升级进程的制约,为新阶段制造业的快速升级提供长期市场条件。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进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消费主导型需求结构,可考虑采用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保持宏观经济在中高速增长区间增长,以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税收体制改革,来促进高质量发展阶段居民收入水平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分别是国民素质(主要体现为人力资本存量)、GDP增长速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因此,应当主要围绕此三者制定有助于促进居民收入水平持续、快速增长的政策措施。具体来看,在国民素质提升方面,首先,应继续提高面向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持续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在GDP中的占比,使之尽快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其

次,应特别注重面向城乡普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鼓励并资助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同时探索由各级政府引导的多形式、多主体的社会人力资本投资机制。最后,应鼓励并资助个人或家庭层面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重点对关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或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执行补贴、资助政策,同时,对于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执行税收优待政策,以提高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

在稳定GDP增速方面,为了促进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主要通过系统性宏观调控措施,综合采取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倾斜性产业扶持政策和强制性产业撤让政策,来促进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尤其是促进以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培育和发展,以从根本上支撑和维持宏观经济增速长期稳定于中高速区间。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应当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把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向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方向变革,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阶段上向家庭部门倾斜的新型收入分配结构,以大幅提高新阶段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支撑新阶段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诉求。具体来看,在“国家—企业—个人”的收入分配三元结构中,应当通过深化分配体制改革,继续推进收入分配向企业和个人层面倾斜。其中,在个人收入层面,应重点促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所占比重。在具体举措上,可考虑探索建设新时代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同时对于工薪阶层的工资增速作出制度层面的基本规定,以保障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同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直接正相关。在此基础上,还应加快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与完善,持续扩大面向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工薪阶层的覆盖面积,并不断提高最低保障水平,以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对于个人收入增长的托底功能。

第二,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中高端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来促进高质量发展阶段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回升,最终实现居民消费率的快速、持续提升。根据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具有趋于递减的自然倾向。唯有当技术创新催生新的消费点或最终消费品时,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才会中断而重新回升至较高水平,消费

率随之显著提升,消费需求则随之显著扩大(杨阔、郭克莎,2017)。因此,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关键在于促进技术创新,进而推动产品、产业创新。在当前新一代科技与产业革命潮流下,先进制造业领域的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人工智能、新一代通信设备以及家庭居住、个人穿戴、医疗健康等新型智能硬件等中、高端制造业产品将成为未来新的消费增长点。因此,促进中、高端制造业的技术与产品创新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及消费率、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

第三,面对消费需求不断向高端化和个性化的方向升级,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制造业企业应针对消费需求变化的新动态,利用网络系统的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构建关于市场需求信息的数据库建设,涉及消费者需求信息的搜集、记录、整理、汇编和统计分析等,以把握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动向,促使潜在需求及时转变为实际需求。在以上策略的基础上,为鼓励制造业消费,还应辅之以针对特殊群体的消费信贷优惠或补贴政策,以及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例如,针对具有偿付能力或潜力的大学生群体、农民工群体、城市工薪阶层实行消费信贷优惠政策和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国内大市场。这些群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的最广大人民群众代表,也是未来国内消费需求借以扩大的最主要群体。

注释

①用化学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两类高技术制造业作为一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近似替代。根据世界银行给出的化学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制造业在ISIC3.0中的覆盖范围,这两类高技术制造业的范围基本覆盖了OECD对ISIC3.0界定的中高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高技术密集型行业。

参考文献

- [1]Anwar S, Sun S. Trade Liberalisation, Market Competition and Wage Inequality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J]. *Economic Modelling*, 2012,29(4):1268—1277.
- [2]Chen J E, Zulkifli S A M. Malaysian Outward FDI and Economic Growth [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2,65:717—722.
- [3]Gebreyesus, Tetsushi Sonobe.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Market Formation Process in Emerging Export Activity:

- Evidence from Ethiopian Flower Industry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12, 48(3): 335—348.
- [4] Kadarusman, Nadvi. Competitiveness and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Evidence from the Indonesian Electronics and Garment Sectors [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3, 21(7): 1007—1028.
- [5] Liu W H, Tsai P L, Tsay C L. Domestic Impacts of Outward FDI in Taiwan: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of Manufacturing Firms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15, 39: 469—484.
- [6] Rostow W 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 [7] Takii S. Do FDI Spillovers Vary Among Home Economics?: Evidence from Indonesian Manufacturing [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1, 22(2): 152—163.
- [8] 邓丽娜. FDI、国际技术溢出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研究 [D]. 济南: 山东大学博士论文, 2015.
- [9] 窦争妍, 高文书. 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制造业人力资本积累研究 [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6(3).
- [10] 高启明. 全球化条件下我国通用航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策略选择 [J]. 改革, 2013(6).
- [11] 何骏. 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产出效应的影响研究 [J]. 当代经济管理, 2016(8).
- [12] 吕永权. 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问题研究 [J].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15(3).
- [13] 张偲, 权锡鉴. 我国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瓶颈与升级路径 [J]. 经济纵横, 2016(8).
- [14] 周学政, 许晴. 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困境及对策研究——基于“中国制造 2025”的背景分析 [J]. 改革与战略, 2016(10).
- [15] 杨慧杰. 技术获取型 ODI 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D].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博士论文, 2013.
- [16] 杨阔, 郭克莎. 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外部需求制约: 出口阶段变化的影响 [J]. 区域经济评论, 2019(2).
- [17] 杨阔, 郭克莎. 结构跃变带来的新变化: 一个消费函数理论的新假说——“消费函数之谜”的破解 [J]. 经济学家, 2017(10).

The Internal Demand Restric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pgrading: Impact of Consumption Stage Change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Yang Kuo Wang Yanli

Abstract: After entering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rapid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the key to support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weakness of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e fri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worsened the external demand conditions for China's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which has made internal demand the main support. However, the consumption demand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undergone unfavorable stage changes, that is, the consumption growth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hows a significant drop characteristics, thus constituting a restrictive relationship to the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face of the rapid upgrading of demand structur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can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tential demand into real demand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then promote the growth of manufacturing consumption demand by increasing effective supply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supply, so that the adjustment of supply structure can keep pace with the upgrading of demand structure.

Key Words: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Manufacturing Consumption; Stage Decline; Restriction Mechanism; Restriction Strength

(责任编辑: 柳 阳)

基于专业市场的西部欠发达地区追赶效应研究*

高云虹 周晴

摘要:专业市场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市场交易能力和效率,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效率。以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反映经济效率,同时综合考虑多维要素对区域经济追赶效应的协同作用,使用2008—2017年除西藏之外的西部11省(区、市)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并与东中部地区对比可发现: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专业市场成熟度仍然较低,不利于区域内的资源配置与协调,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未能形成推动经济追赶的持久动力。因此,西部欠发达地区必须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地培育专业市场,从而提高市场交易能力和效率,加快对发达地区的追赶步伐。

关键词:专业市场;西部欠发达地区;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1-0103-08 **收稿日期:**2019—09—15

***基金项目:**2018年度甘肃省高等学校协同创新团队项目(2018C—19);2019年度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甘肃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作者简介:高云虹,女,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兰州 730020)。

周晴,女,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兰州 730020)。

一、问题的提出

专业市场是指以提高市场组织化程度,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为目的,在一定区域内由众多经营者交易某一类或若干类具有某种逻辑关系的商品,以批发为主或批零兼营,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的有形和无形相结合的现货商品交易场所。在中国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中,专业市场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分工深化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的集聚,进而提高集群内经济效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浙江省为例,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地方县市甚至乡镇的小企业集群生产模式,即若干中小企业甚至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单位在空间上集聚,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形成高度分工专业化的集群。

专业市场的发展之所以能够提高市场交易能力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提高区域发展效率,

主要在于:一方面,对商品的需求者而言,专业市场具有信息优势,如交易者和商品信息,有利于高效率寻找交易对象和信息,从而降低交易失败率。对中小企业而言,特别是对于资源能力有限且不能建立自己销售渠道的中小企业,专业市场有集聚本地和外地各种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的能力,企业可以在前向市场上进行低成本采购。同时,销售渠道的集聚与完善为企业节约了产品销售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专业市场作为一种高效的产品交易市场,还可以降低商品交易过程中的其他附加费用。专业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实现监管部门对市场监管的规模效应,实现规范化管理,从而降低监管费用。同时会控制和防范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带来的有失公允的交易行为,从而降低支付风险,提高市场交易效率。

2018年,中国西部11省(区、市)的GDP仅为184302.13亿元,占全国同期GDP总量的20.15%,仅

为东部地区的34.27%。西部欠发达地区能否借鉴发达地区专业市场发展的经验,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发展专业市场,通过提高市场交易能力和效率,从而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这对于加快西部发达地区的追赶步伐,实现后发赶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研究区域间差距形成的原因及其缩小路径的文献很多,且研究视角十分多样。一是基础设施视角。Démurger(2001)研究发现,造成中国地区间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的发展,沿海地区完善基础设施带来的辐射作用有利于内陆地区的发展。Perira and Roca-Sagales, Cohen and Morrison, Cohen从实证方面验证了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正溢出效应,即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降低地区间的运输成本和交易费用,提高交易能力,从而有利于两地间经济增长。金祥荣(2012)认为,提高落后地区的福利水平可以通过改善落后地区或者地区间的基础设施来实现,但若两地间的规模和基础设施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基础设施的改善可能会降低社会总福利。二是投入要素视角。杨刚强(2012)发现,差别化的土地政策有利于构建富有效率而又不失公平的区域发展新格局,从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樊士德(2013)通过研究劳动力外流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以及对劳动力流动者本身的福利效应,发现后发地区与中低收入阶层的发展和变化轨迹比发达地区更能验证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成果。孙军(2014)认为,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实现地区间的资源配置,但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效率高在流入地和流出地是不同的,这种差异造成了区域差距的不断扩大。三是产业转移与承接、产业集群视角。惠宁(2009)检验得出陕西省的经济增长更多依赖固定资产投资而不是专业化分工水平,但浙江、陕西两省的优势产业及其经济的发展,验证了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覃成林(2010)考察了广东通过产业转移解决其内部不平衡发展及区域差异不断扩大的问题。徐景峰(2010)通过对中国12个制造行业进行研究,得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目前还是主要依靠增加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而不是依靠产业集群的“外部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王坤(2011)认

为,中国的产业集群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未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三大区域产业集群的非均衡性特别是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区域创新力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从基础设施、要素流动、产业集群、产业转移与承接等方面研究了落后地区如何追赶发达地区以实现其跨越式发展。相对而言,从专业市场角度研究西部欠发达地区追赶效应的文献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基于专业市场的视角,考察其作用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原理,并运用2008—2017年除西藏之外的西部11省(区、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三、实证检验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目前实证研究中最常用的表示要素使用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指标。有学者使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原因分解为三个因素,即规模效率的改进、纯技术效率的改进和技术创新。这三个指标分别代表后发经济体技术追赶的技术引进阶段、消化吸收再创新阶段和自主开发阶段。基于此,本文选择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进步水平,对基于专业市场的西部欠发达地区追赶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1. 模型建立与变量选择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西藏数据缺失)与代表性,本文采取2008—2017年西部地区除西藏外1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考察西部欠发达地区专业市场发展的追赶效应,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见式(1):

$$\ln Y_{it} = \beta_0 + \beta_1 \ln Agg_{it} + \beta_2 \ln H_{it} + \beta_3 \ln RD_{it} + \beta_4 \ln FDI_{it} + \beta_5 \ln FT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Y代表被解释变量,以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由于研发资本投入或先进技术使用所带来的微观生产技术进步,二是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所带来的效率提高。本文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西部地区各省的TFP,其中,资本投入变量用永续盘存法计算的资本存量表示,数据处理过程参照张军等(2004);劳动投入变量用各地区年末从业人口数表示;产出变量用实际GDP表示。2008—2017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结果见表1。

Agg 代表核心解释变量,以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指标表示。本文采用王小鲁、樊纲等编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的分项指标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数据,同时借

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方法,2015年的数据使用2014年和2016年的算数平均值近似替代,2017年数据用2016年数据替代。一般情况下,该指标数值越大,表明该地区市场中的中介商和服务机构能够及

表1 2008—2017年西部欠发达地区11省(区、市)的全要素生产率

地 区 年 份	内蒙古	广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2008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009	1.108	1.08	1.119	1.094	1.10	1.027	1.089	1.031	1.002	1.064	0.999
2010	1.113	1.102	1.132	1.138	1.109	1.023	1.15	1.13	1.115	1.155	1.174
2011	1.10	1.045	1.136	1.107	1.111	1.038	1.128	1.092	1.091	1.115	1.086
2012	1.014	0.983	1.051	1.046	1.071	0.993	1.076	1.029	1.018	1.041	1.01
2013	0.951	1.017	1.03	1.015	1.031	0.982	1.048	1.006	0.993	1.011	0.978
2014	0.979	0.997	1.04	1.004	0.999	0.93	1.038	0.974	0.979	0.985	0.997
2015	0.992	0.986	1.031	0.978	0.982	0.918	0.986	0.898	0.959	0.988	0.928
2016	0.993	0.999	1.047	1.007	0.967	0.944	1.045	0.954	1	1.022	0.956
2017	0.903	0.978	1.037	1.041	1.009	0.98	1.105	0.997	0.984	1.042	1.058

资料来源:利用软件Deaper2.1运行整理。

时为企业提供市场的供求信息,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滞后性,同时把市场中的买方需求反馈给企业,使企业根据买方需求进行产业升级,达到买方和卖方之间供给和需求的匹配,即专业市场发展水平越高;反之专业市场发展水平越低。2008—2017年西部地区11省(区、市)的专业市场发展水平见表2。

H 、 RD 、 FDI 和 FT 代表控制变量,分别以人力资本水平、科技投入水平、外资投入水平、对外贸易水平表示。

对外贸易水平(FT)。 FT 用进出口之和占GDP的比重表示。与国内的企业相比,国际企业可以直

接与国际市场对接,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从而进一步提高产出效率。数据来源于历年各省(市、区)的统计年鉴。

人力资本水平(H)。人均受教育年限可以体现劳动力的质量,劳动力质量越高,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就越高,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技术能力。根据已有研究(徐现祥,2004;郝睿,2006;张学良,2012),本文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该指标。平均受教育年数 $H=6s_1+9s_2+12s_3+16s_4$, s_1 、 s_2 、 s_3 、 s_4 分别表示6岁及以上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初中文化程度、高中文化程度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

表2 西部地区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评分

地 区 年 份	内蒙古	广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2008	2.19	2.45	3.75	3.75	3.07	3.17	3.12	1.61	1.41	2.18	2.55
2009	2.21	2.48	4.08	4.06	3.10	3.23	3.24	1.63	1.47	2.31	2.59
2010	2.36	1.48	5.47	3.96	0.69	3.37	2.18	2.07	0.77	-0.2	1.04
2011	2.37	1.52	5.84	3.75	0.71	3.37	2.29	2.11	0.88	-0.41	1.04
2012	2.51	4.22	6.9	5.29	2.72	2.45	4.36	1.83	1.55	1.25	1.93
2013	2.59	4.32	7.28	5.43	2.85	2.51	4.73	1.92	1.51	1.41	2.1
2014	1.84	4.14	7.63	5.89	2.49	2.14	6.25	2.59	1.79	3.37	2.68
2015	1.885	4.075	8.05	6.305	2.21	1.89	6.925	3.265	1.8	3.45	2.72
2016	1.93	4.01	8.47	6.72	1.93	1.64	7.6	3.94	1.81	3.53	2.76
2017	1.93	4.01	8.47	6.72	1.93	1.64	7.6	3.94	1.81	3.53	2.76

资料来源:王小鲁、樊纲、胡李鹏:《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所占的比重。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科技投入水平(*RD*)。*RD*用各省R&D经费投入强度来表示,即各省R&D经费投入量与各省GDP比值。科技投入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生产技术的进步。数据来源于历年《科技统计年鉴》。

外资投入水平(*FDI*)。外资的引入一方面有利于更新企业的管理理念,另一方面技术的溢出效应可以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进而改善企业的生产效率。该指标用各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各省GDP的比值(投资额按美元的当年平均汇价折算)来衡量。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区)的统计年鉴。

2.实证检验与分析

使用似然比检验不存在时间效应,所以模型中没有加入时间虚拟变量。Hausman 检验拒绝了固定效应,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综上,本文采用不加入时间虚拟变量的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定性,采用多种不同设定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

表3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i>C</i>	0.047*** (3.84)	0.083** (2.45)	0.096 (0.57)	0.272 (1.59)	0.271 (1.55)
<i>lnAgg</i>	-0.021** (-2.01)	-0.025** (-2.22)	-0.024** (-2.02)	-0.047*** (-3.59)	-0.048*** (-3.74)
<i>lnFT</i>		0.013 (1.18)	0.013 (1.16)	0.018 (1.64)	0.012 (1.00)
<i>lnH</i>			-0.007 (-0.09)	-0.070 (-0.90)	-0.043 (-0.53)
<i>lnRD</i>				0.053*** (3.25)	0.039** (2.18)
<i>lnFDI</i>					0.015** (2.45)

注:括号中的数值是t统计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由表3可知,在设定(5)中,专业市场发展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0.048,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与预期结果恰恰相反。加之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程度和法制环境水平较低,反映出该地区市场中的中介商和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市场的供求信息存在不对称性或者滞后性,造成买方和卖方之间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联不密切,提高了交易成本,不

利于地区内部资源的配置与协调,制约了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对外贸易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跨国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与国际市场对接欠佳,对外贸易没有为其带来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显著提高,因而无法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显著促进作用。2008年,西部地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75年,2017年提高到8.83年。人力资本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存在反向作用,但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产生偏离,教育未能使人才红利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是人力资本变量的衡量也未能反映出人们“边干边学”过程中掌握的技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科技投入水平(*RD*)每变动1%,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039%,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表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科技投入发挥了较为显著的成效,提高了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从而提高了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对外资投入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015,且较为显著,体现了外商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直接投资可以带动地区经济增长。

四、各地区专业市场发展水平对比

近年来,中国专业市场成长迅速,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专业市场数量、营业面积和成交额等方面都有较大程度的提升。截至2017年,全国各类专业市场有3308个,营业面积21524.99万平方米,年成交额82413.26亿元,较2008年增加了近一倍。但不可忽视的是,各地区专业市场发展水平不一,存在显著区域差异。

1.专业市场发展现状

2017年,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专业市场基本情况如表4所示^①。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拥有的专业市场数量依次递减,东部地区拥有专业市场最多,为1963个,东北地区最少,为233个;专业市场年末出租摊位数方面,东部地区年末出租摊位数1217077个,是中部地区的3.70倍,西部地区的3.32倍,东北地区的6.71倍;专业市场营业面积方面,东部地区营业面积分别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3.77倍、2.90倍和10.85倍;专业市场成交额方面,东部

表4 2017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专业市场基本情况

	市场数量(个)	年末出租摊位数(个)	营业面积(㎡)	成交额(万元)
东部地区	1963	1217077	126463746	592275841
中部地区	583	329015	33516737	93920395
西部地区	529	366222	43616910	92665152
东北地区	233	181293	11652526	45271184

数据来源:《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2018)。

地区成交额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达到59227.58亿元,占全国专业市场成交额的71.87%,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则分别占到11.40%、11.24%和5.49%。从专业市场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专业市场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显著。

此外,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方法,本文选取专业市场数量(个)、专业市场年末出租摊位数(个)、专业市场营业面积(平方米)、专业市场成交额(万元)、人均专业市场成交额(专业市场成交额/人口数

量,单位:元/人)、单位专业市场成交额(专业市场成交额/专业市场数量,单位:万元/个)和专业市场成交额占GDP的比重7个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各地区专业市场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作为评价专业市场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数,得分越高,说明专业市场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反是。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7年各地区专业市场发展水平综合得分情况如表5所示。

根据专业市场发展水平综合得分,本文利用

表5 2008—2017年各地区专业市场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年份 地区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均值
北京	0.039	-0.040	0.002	-0.135	-0.002	-0.065	-0.024	-0.014	0.061	0.257	0.008
天津	0.759	1.144	1.270	1.096	0.385	0.625	0.102	0.007	-0.118	-0.176	0.509
河北	0.399	0.383	0.312	0.264	0.176	0.146	0.209	0.236	0.266	0.279	0.267
上海	2.058	1.912	2.113	2.007	2.814	2.490	2.406	2.488	2.370	2.294	2.295
江苏	1.810	1.607	1.532	1.700	1.472	1.580	1.717	1.536	1.662	1.914	1.653
浙江	1.916	1.869	1.671	1.758	1.386	1.584	1.798	1.854	1.907	1.821	1.756
福建	-0.247	-0.260	-0.271	-0.267	-0.278	-0.286	-0.281	-0.328	-0.331	-0.407	-0.296
山东	0.790	0.886	0.799	0.816	0.600	0.766	0.937	0.972	0.904	0.731	0.820
广东	0.371	0.291	0.313	0.270	0.124	0.089	0.149	0.135	0.102	0.044	0.189
海南	-0.912	-0.901	-0.844	-0.879	-0.734	-0.794	-0.726	-0.678	-0.654	-0.667	-0.779
辽宁	0.444	0.316	0.139	0.337	0.304	0.313	0.246	0.235	0.276	0.338	0.295
吉林	-0.415	-0.441	-0.461	-0.416	-0.359	-0.433	-0.411	-0.399	-0.429	-0.496	-0.426
黑龙江	-0.414	-0.319	-0.382	-0.451	-0.354	-0.417	-0.426	-0.427	-0.431	-0.446	-0.407
山西	-0.688	-0.740	-0.660	-0.709	-0.637	-0.673	-0.730	-0.722	-0.726	-0.723	-0.701
安徽	-0.348	-0.267	-0.239	-0.175	-0.185	-0.081	-0.175	-0.236	-0.222	-0.184	-0.211
江西	-0.241	-0.211	-0.385	-0.441	-0.373	-0.356	-0.374	-0.337	-0.251	-0.369	-0.334
河南	-0.360	-0.395	-0.321	-0.291	-0.207	-0.189	-0.092	0.007	0.023	-0.054	-0.188
湖北	-0.331	-0.271	-0.348	-0.374	-0.291	-0.314	-0.279	-0.289	-0.280	-0.291	-0.307
湖南	-0.225	-0.199	-0.196	-0.192	-0.171	-0.234	-0.266	-0.266	-0.261	-0.150	-0.216
内蒙古	-0.345	-0.445	-0.398	-0.428	-0.409	-0.492	-0.554	-0.521	-0.543	-0.521	-0.466
广西	-0.283	-0.298	-0.298	-0.301	-0.289	-0.310	-0.373	-0.431	-0.437	-0.404	-0.342
重庆	0.198	0.298	0.407	0.448	0.300	0.243	0.193	0.148	0.118	0.048	0.240
四川	-0.362	-0.310	-0.356	-0.294	-0.246	-0.160	-0.081	-0.392	-0.252	-0.185	-0.264
贵州	-0.368	-0.310	-0.487	-0.456	-0.413	-0.474	-0.448	-0.390	-0.318	-0.374	-0.404
云南	-0.478	-0.487	-0.272	-0.275	-0.347	-0.361	-0.344	-0.404	-0.448	-0.420	-0.384
陕西	-0.696	-0.712	-0.681	-0.651	-0.528	-0.583	-0.580	-0.478	-0.520	-0.381	-0.581
甘肃	-0.484	-0.453	-0.463	-0.458	-0.407	-0.426	-0.462	-0.487	-0.557	-0.617	-0.481
青海	-0.820	-0.822	-0.763	-0.763	-0.630	-0.749	-0.784	-0.645	-0.657	-0.660	-0.729
宁夏	-0.365	-0.412	-0.349	-0.387	-0.385	-0.350	-0.326	-0.321	-0.354	-0.308	-0.356
新疆	-0.404	-0.412	-0.385	-0.354	-0.312	-0.089	-0.020	0.144	0.098	0.108	-0.163

ArcGIS 自然断点分级法将专业市场发展水平划分为高(0.820001—2.295000)、中高(0.008001—0.820000)、中低(-0.580999—-0.008000)、低(-0.779000—-0.581000)四种类型。

由表5数据计算可知,2008—2017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专业市场发展水平得分均值分别为0.642、-0.326、-0.357和-0.179。可见,东部地区的专业市场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最低,地区差距明显。其中,上海市专业市场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均值为2.295,居于首位,浙江和江苏的均值分别为1.756和1.653,位列第二和第三,属于高水平类型,三省份均位于东部地区;专业市场发展水平属于中高类型的省(区、市)共有6个,其中,天津、河北、山东、广东4省位于东部地区,重庆位于西部地区,辽宁位于东北地区;17个省(区、市)属于中低类型,按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北京、新疆、河南、安徽、湖南、四川、福建、湖北、江西、广西、宁夏、云南、贵州、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甘肃,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各2个省份,中部地区5个省份,西部地区8个省区;低水平类型的有陕西、山西、青海和海南,专业市场发展水平最低,其中,有2个省份属于西部地区。

2.西部地区专业市场发展欠佳的症结分析

提起专业市场,“温州模式”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西部地区作为欠发达地区,其专业市场的成熟度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是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但在20世纪80—90年代,甘肃省临夏地区的专业市场发展一度繁荣,被誉为中国西部的“旱码头”。198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临夏考察时曾提出“东有温州,西有河州(临夏)”,临夏专业市场在当时的繁荣程度可见一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全国的专业市场迅速成长,各地涌现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专业市场,但临夏专业市场的发展却陷入了困境,落后于全国专业市场发展的脚步。“临夏模式”的发展困境,同时也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很多专业市场所面临的问题。具体来看,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缺乏产业集群的支持,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间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在专业市场发展较好的地区,通常有相应的产业集群与之形成良好的互动发展关系。专业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需要有一定规模的产品供给企业,即产业

集群的存在,产业集群可以为专业市场提供大规模、多样化、低价格的产品,提高专业市场的竞争力;而专业市场也可以凭借其自身的需求集聚效应和信息优势为产业集群提供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共享式的交易平台,从而带动和提升产业集群的发展。二者关系密切、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对比“温州模式”和“临夏模式”,虽然二者发展的初始条件基本相同,都是凭借个体工商户走南闯北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走以市场化推动工业化的道路。但不同的是,温州通过专业市场的发展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形成,产业集群反过来又为专业市场提供了支撑,“专业市场+产业集群”以及二者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温州模式”的亮点所在。而临夏专业市场的发展未为其带来产业集群,没有产业集群的支持,专业市场也很难持续繁荣。缺乏产业集群的支持,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间没有形成良好的协同互动关系,这不仅是“临夏模式”存在的问题,也是大部分西部地区专业市场发展中的共性问题。此外,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来说,由于存在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尚不完善、专业化分工不细致等一系列问题,产业集群的发展并没有同沿海发达地区一样发挥显著优势,从而无法对专业市场起到很好的催生和支撑作用。

二是西部欠发达地区未能充分利用和发挥其资源比较优势。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虽然缺乏产业集群的支持,但拥有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具有地区特色的专业市场。例如,西部地区可以凭借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游客,打造旅游业专业市场。云南鹤庆白族新华村,正是通过发展旅游业,为专业市场提供了客源和市场需求等初期条件,最终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银器专业市场;云南新平县的柑橘专业市场发展也同样是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资源优势,并以“褚橙”品牌为核心,借鉴专业市场的发展模式,在种植面积上形成规模化,在生产上进行标准化管理,在发展上走产业化道路,在经营上采取互利共赢的模式,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但是,就目前西部地区专业市场发展的现状来看,部分地区仍然无法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得天独厚的资源比较优势,甘肃、云南作为全国重要的中药材产区,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处于全国前列,但却未能形成同安徽亳州、河北安国规模相同的中药材专业市场。从整体上看,特色产业规模较

小,竞争力较弱,优势资源的开发多各自为战,缺乏合作以及统一的科学规划,无法发挥资源整合效应是西部地区发展特色专业市场存在的普遍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西部地区难以发挥资源比较优势,打造符合自身特色的专业市场。

三是西部欠发达地区专业市场的发展环境尚不成熟。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以及市场环境尚需健全。基础设施方面,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专业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专业市场的目的是提高市场组织化程度,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如果没有完善的交通设施为商品和要素的流通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以缩短流通时间,交易费用就很难降低,从而阻碍专业市场向外辐射和发展。西部地区由于地形等因素的限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较于东部地区比较落后,成为制约专业市场发展的因素之一。市场环境方面,以行业协会为例,西部地区缺少行业协会对专业市场的协助力量。行业协会作为沟通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主要起到两方面的作用:对内提供服务,制定行规行约,协调同行业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对外代表本行业全体企业的利益,向政府表达意愿。王小鲁等编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显示,2016年,在行业协会对企业的帮助程度上,全国平均水平为7.29分,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得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达到9.96分和9.00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得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7.18分和4.69分,西部地区最低。显然,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相对较少,同时由于受到现有体制的约束,已成立的行业协会也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从而导致西部地区行业协会对企业的帮助程度远远低于其他地区,制约了专业市场的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反映经济效率,同时综合考虑多维要素对区域经济追赶效应的协同作用,实证研究了西部欠发达地区专业市场的追赶效应,并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专业市场基本情况和综合水平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专业市场成熟度仍然较低,尚未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因此,西部欠发达地区必须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因地

制宜培育专业市场,从而提高其市场交易能力和效率,进而提升区域竞争力,加快对发达地区的追赶,实现后发赶超。

第一,西部地区各省(区、市)应充分认识和发挥本地区比较优势,对专业市场进行精准定位。因为西部各省(区、市)间的经济差距较大,现有资源禀赋各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各省(区、市)应以自身比较优势为依托发展专业市场,实现要素的充分流动,满足商品需求者对交易对象和信息的搜寻,实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间的合作,以降低生产和销售成本,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提高市场交易效率。比如,甘肃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孕育了丰富的农产品,如中药材、静宁苹果和马铃薯等,有着发展专业市场的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绵阳一直以来在国防军工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四川绵阳科技城“一核三区多园”的发展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有发展专业市场的政策比较优势。广西、贵州和重庆三地区均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可以合作发展旅游业专业市场。陕西的关中平原城市群,有着发展专业市场的技术和政策比较优势。同时,为将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效益,应充分考虑环境承载力限制,注重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高资源利用率,使专业市场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实现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后发赶超。

第二,加大政府支持并引导政策供给。要制定相关政策,保护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资源,为专业市场发展以及相关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同时做好发展专业市场的规划,尤其是协作区,进一步促进专业市场发展,实现专业市场的升级。此外,中介组织在提高专业市场区域竞争力、实现企业间合作与发展以及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也不容忽视。逐步推进专业市场体制改革,提高其知名度。在专业市场发展过程中,重视市场软条件,即以地区比较优势为依托打造区域特色品牌,提高专业市场的形象与知名度;积极鼓励并推进企业的转型升级,以增强专业市场的区域竞争力。同时可以以专业市场为支撑,沿产业链方向发展产业集群,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

第三,增加其他优质经济增长要素的供给。要高度重视中国西部地区的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推动以激发创新活力为核心的改革,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创新型人才,使人力资本红利得以充分发挥。

人才区位选择决定区域繁荣,而地方品质决定人才区位选择。因此,需要提升全要素品质,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打造优美建筑和生态环境。构建快速高效的信息网络,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破经济起飞瓶颈,充分发挥其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正溢出”。在增加科技投入的同时注重科技资本使用效率,使科技更有效地提高生产力,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以国家政策为导向,充分引进和利用外资,引进前沿技术以及改善自己的企业管理理念,以提高技术效率。

注释

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和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省。西部地区(西藏除外)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

参考文献

- [1]刘天祥.专业市场研究的文献综述[J].当代经济,2006(9).
- [2] Démurger S.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xplanation for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1,29(1).
- [3] PERIRA A M, O Roca-Sagalés. Spillovers Effects of Public Capital Formation: Evidence from the Spanish Region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3(53).
- [4] COHEN J P, P MORRISON.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terstate Spatial Spillovers, and Manufacturing Costs[J].Review of Economic and Statistics, 2004(86).

- [5]金祥荣,陶永亮,朱希伟.基础设施、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2(2).
- [6]杨刚强,张建清,江洪.差别化土地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与对策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2(10).
- [7]樊士德.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 [8]孙军,高彦彦.劳动力流动、增长极培育与区域协调发展——以江苏省为例[J].经济体制改革, 2014(2).
- [9]惠宁,谢攀.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9(6).
- [10]覃成林,梁夏瑜.广东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实践经验与思考[J].国际经贸探索, 2010,26(7).
- [11]徐景峰.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基于非平稳面板数据的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0(2).
- [12]王坤.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差异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12).
- [13]陈一博.技术创新中心变迁与技术后发国的追赶路径——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的检验[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33(7).
- [14]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
- [15]王小鲁,樊纲,胡李鹏.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16]徐现祥,舒元.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分布的演进(1978—1998)[J].经济学(季刊),2004,3(3).
- [17]郝睿.经济效率与地区平等:中国省际经济增长与差距的实证分析(1978—2003)[J].世界经济文汇,2006(2).
- [18]张学良.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吗——兼论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J].中国社会科学, 2012(3).
- [19]谢守红,周驾易.我国主要城市专业市场的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J].城市问题,2014(8).
- [20]王必达,赵伟.临夏模式:形成、发展与转型[J].经济地理,2005(5).

Research on the Catch-up Effect of Underdeveloped Regions of Western China Based on Specialized Market

Gao Yunhong Zhou Qing

Abstract: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pecialized market level is beneficial to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by improving the market transaction ability and efficiency, thereby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will be improved. With the catch-up effect being the reflection of changes in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in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multi-dimensional elements on the catch-up effect of regional economy, the author did research based on the sample data of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western China except Tibet from 2008 to 2015.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pecialized markets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of western China are less mature,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alloc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internal resources. It increases transaction costs and hinders the improvement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a lasting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growth have not formed ye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the specialized market according to its own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local conditions, so that market trading capacity and efficiency will be improves and the catch-up with developed regions will be speeded.

Key Words: Specialized Market; Underdeveloped Regions of Western China; Technical Efficiency

(责任编辑:文 锐)

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

姜长云

摘要: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是“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的基础工程。应该科学处理都市圈“中心化”“去中心化”的矛盾,坚持推进都市圈中心化提升和网络化发展并重的方针;科学把握“首位度”概念的内涵,警惕被曲解的“首位度”误导都市圈发展;构建运行有效、融合一体的都市圈协调发展新机制;注意培育都市圈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关键词:城市群;现代化都市圈;首位度;都市圈协调发展新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1-0111-06 **收稿日期:**2019-11-19

作者简介:姜长云,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所研究员(北京 10003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提高城市群质量,推进大中小城市网络化建设”。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要求,“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力”。但就总体而言,除少数发达地区外,中国大多数地区城市群的发展在总体上,处于雏形或框架构建阶段,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镇)之间的有机联系尚待健全,错位发展、分工协同、融合一体新格局尚待培育。与此相关的是,一个城市群往往包括若干都市圈,而都市圈作为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打造成富有创新力和竞争优势的区域空间单元。但在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过程中,仍有许多重要理论和政策问题亟待深入研究,本文就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中心化”“去中心化”的矛盾及其求解

迄今为止,关于都市圈的界定尚无统一标准。尽管如此,都市圈往往基于日常生活圈或人口通勤圈,由一个或一个以上核心城市同与其有密切联系

和一体化倾向的周边地区组成,这应是无疑议的。当然,这些周边地区既包括核心城市之外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城市(镇),也包括环绕在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发改规划[2019]328号)将都市圈界定为“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作为一种政府业务工作抓手和政策导向,在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过程中,我们不必过多地拘泥于对都市圈的概念界定是否精准,而宜本着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突出重点的原则,在尊重这一概念及其政策逻辑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影响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

无论对都市圈的概念作何界定,都市圈的发展都必然涉及如何科学处理核心城市和周边地区发展的关系问题;或者进而言之,是都市圈核心城市与都市圈内相关城镇、广域乡村腹地的关系问题。在讨论城镇化问题时,经常被作为议题的如何科学处理核心城市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核心城市向心集聚力和辐射带动力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也是都市圈发展中如何科学处理核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发展关系的问题。能否科学处理这一问题,关系到都市

圈的发展质量及其可持续性。

通常,在城市群形成的初级阶段,集聚是主要驱动力;在城市群的成长阶段,集聚与扩散共同构成主要驱动力;在城市群的成熟阶段,扩散是主要驱动力(肖金成,2013)。有的学者基于对欧、美、日等国家或地区都市经济圈发展历程的分析,将都市圈发展概括为5个阶段,分别是强核阶段、外溢阶段、布网阶段、整合阶段和耦合阶段(宋迎昌,2005)。那么,在中国现阶段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过程中,应该如何科学处理核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镇)、乡村地区的关系呢?

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的许多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作为都市圈的核心城市辐射带动力不强,仍具有较强的集聚经济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益,城镇化或都市圈的发展仍应处于以培育极化效应或强核为主的阶段;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应结合规划布局和政策导向的倾斜引导、公共资源配置的倾斜支持,着力推动优质资源、中高端要素和中高端产业向核心城市集聚,优先发展核心城市,加快都市圈“中心化”进程。待作为核心城市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顺应发展阶段转变,引导其强化对周边地区的扩散效应和外溢作用,着力增强都市圈核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近年来,在中国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许多大城市、特大城市虹吸效应过强,导致优质资源、中高端要素和中高端产业过度向核心城市集中集聚,挤压周边中小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发展空间,加剧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失衡问题,是部分中小城市或乡村地区走向衰败萧条的重要原因,因此城镇化或都市圈的发展也要注意规避“一花独放不是春”的问题;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当务之急,不是强化极化效应和聚集经济,而是要结合规划布局、政策导向和公共资源配置格局的调整,做好都市圈“去中心化”的文章,引导优质资源、要素和产业更多地向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流动,借此更好地支持周边地区发展,防止“大树底下不长草”;通过夯实中小城市(镇)发展基础,实现都市圈城镇体系“百花齐放春满园”。

应该说,前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各有其偏颇之处。实际上,二者都强调在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过程中,要通过规划布局和政策引导、公共资源配置的倾斜,实现预期目标。前一

种观点面临的问题是,有什么动力机制能够确保核心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和乡村地区有积极性先支持核心城市优先发展,待核心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加快自身发展?按照前一种观点的逻辑,倘若核心城市率先发展不成功,周边地区是否一直要等下去?怎么能保证周边地区共享发展成果,或有平等发展权?按照后一种观点,在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过程中,是否就不需要培育核心城市的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核心城市又有什么动力机制听任更多资源、要素和产业流向周边地区?按照后一种观点的逻辑,都市圈的发展很容易出现核心城市品质和发展能级不高、辐射带动能力不强的问题。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无法规避核心城市和周边地区在优质资源、要素和产业发展方面竞争有余、合作不足的问题,都难以形成都市圈核心城市与周边城镇、广域乡村之间的层次分工和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格局;也难以有效增进都市圈发展的关联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提升都市圈发展的整体质量、效益和创新力、竞争力。无论是按这两种观点中的哪一种,实现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都容易落空。

那么,如何协调前述两种观点的矛盾,推动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笔者认为,比较有效的途径是坚持推进都市圈中心化提升和网络化发展并重的方针,将推进都市圈核心城市增强向心集聚力和辐射带动力有机结合起来,将推进都市圈核心城市提升发展能级与加快构建大中小城市网络化发展的城镇体系、培育乡村振兴新动能有机结合起来。在推进核心城市内涵提升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打造都市圈梯级增长节点,推进城乡融合和以城带乡,加快构建由中心城市牵头、网络化发展的都市圈发展协调推进机制。

一是通过推进都市圈中心化提升,鼓励都市圈中心城市在推进集约型紧凑式发展和加快绿色低碳、智慧化转型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增强对都市圈内外优质资源、高端要素和高端产业的集聚力,进而增进都市圈中心城市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提升其发展能级、经济密度和对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引领能力。这一方面有利于解决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广域乡村低层次同质竞争的问题,规避因低层次同质竞争引发的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资源、要素和产业发展的虹吸效应;另

一方面有利于强化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产业链关联和梯度分工、错位互补、融合协作格局,增强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发展的核心主导作用和引领带动能力,为打造富有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的现代化都市圈创造条件。

二是通过推进都市圈网络化发展,培育以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核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网络化发展的城镇体系,加快构建极核化、组群化、网络化的都市圈发展格局,将都市圈内部层次不同、功能有别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打造成都市圈梯级增长节点。借此,可以为推进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升都市圈核心城市发展能级,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战略支撑,增强都市圈发展的抗风险能力。这也有利于将都市圈内部除核心城市外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打造成承接和中转放大核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的战略平台,有利于更好地发挥都市圈城镇体系对周边乡村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在此背景下,依托都市圈重大基础设施通道和都市圈内邻近城市之间的集聚—扩散效应,打造都市圈产业发展廊道和都市圈发展轴;在夯实都市圈梯级增长节点的同时,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强化都市圈内部发展的网络链接机制,增强都市圈整体功能,提升都市圈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水平。

三是通过推进都市圈中心化提升和网络化发展并重,有利于将推进都市圈核心城市提升发展能级同引导都市圈梯级节点城市向心发展结合起来,将都市圈核心城市增强对开放、创新的引领力与都市圈梯级节点城市做实对基层和乡村的带动力结合起来,将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同营造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功能城市(镇)间的分工协作、优势互补、融合协同格局结合起来。借此,以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镇)同城化、一体化发展为导向,更好地帮助都市圈核心城市扩大发展的腾挪空间,完善都市圈空间发展格局;也为培育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新动能创造条件,推动都市圈加快构建彰显生机活力的优质创业圈、富有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高效产业圈、宜居宜业宜游的魅力生活圈和长效普惠共享的便捷服务圈,增强都市圈在全国发展中的显示度、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警惕被曲解的“首位度”误导都市圈发展

许多地方在讨论都市圈发展的重要性时,都喜欢拿中心城市(或核心城市,下同)首位度说事,都市圈中心城市更是如此。似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提高中心城市首位度。这实际上是一种曲解甚至误解。

在区域经济学中,往往将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第一大城市规模占据绝对优势的现象称为首位分布,将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第一大城市与第二大城市人口等规模指标的比值称作首位度(魏后凯,2011)。首位度高,说明在该国或该地区发展中,人口集中于金字塔顶部中心城市(往往也是第一大城市)的程度高,体现了中心城市在所在国家或区域城镇体系中的相对主导程度。但是,中心城市首位度往往受到所在国家或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比如,山区相对于平原地区,前者中心城市的首位度低一些有其合理性。忽视这些条件或因素的影响,简单比较不同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容易夸大首位度指标的实际意义。

之前已有一些研究证明,只有在完整的城镇体系中计算和比较中心城市首位度才有意义,不加区分地按照行政单元计算中心城市首位度,并据此分析中心城市规模应该得到扩大或受到控制,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沈迟,2019)。通常,城市人口的集聚性及其需求的高层次、高密度,主要表现在城市的中心城区。由于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数往往小于该城市对应行政区的人口数,而且在不同城市中心城区人口数占对应行政区人口数的比重往往存在较大差别,计算中心城市首位度应该利用第一大城市与第二大城市的中心城区人口数进行比较,不宜采取两大城市所在行政区的人口数进行比较。

脱离了相对完整的城镇体系,不宜简单地进行中心城市首位度比较。如果一个省不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城镇体系,计算中心城市首位度也就没有太大意义。比如,山东至少存在着以济南为中心和以青岛为中心两个相对完整的城镇体系,用济南中心城区人口数与青岛中心城区人口数之比来衡量济南首位度,或者用青岛中心城区人口数与济南中心城区人口数之比来衡量青岛首位度,说明不了太多

问题。离开了北京和天津,河北省域城镇体系也不是相对完整的城镇体系,因此将河北第一大城市石家庄与第二大城市的中心城区人口数进行比较,据此得出石家庄首位度是高还是低,也没有太大意义。宁夏南北向长、东西向短,最南端的固原和偏北的银川应该不属于一个城镇体系,用银川中心城区人口数和固原中心城区人口数进行比较,充其量只能说明哪个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规模大。中心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或人均GDP之间,也不存在明确的一一对应关系。

近年来,许多地方在讨论都市圈发展的重要性时,往往把都市圈中心城市人口数和GDP等相关经济指标占全省比重,作为衡量中心城市首位度的指标。这实际上存在对中心城市首位度概念的延伸转化问题,有偷换概念甚至误读的嫌疑。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同一个省份未必属于一个相对完整的城镇体系,不宜简单地进行中心城市首位度分析。第二,城市首位度主要是所在城镇体系中第一大城市和第二大城市人口数之比,并非第一大城市相关指标与全省之比。

当然,借用城市首位度概念,将其延伸到省域、区域分析,而且将省会城市相关指标与全省比较,也并非一定不可以。比如,将省会城市人口数、GDP或其他发展指标占全省比重定义为省会城市在省域发展中的首位度,据此进行不同省份之间的比较,也谈不上有什么专业性的失误。但是,在这种概念内涵发生异化的前提下,按照异化前的首位度概念对异化后的首位度计算数据进行过多解读,必须谨慎防止误读。第一,相对于不同省份、不同省会城市的横向比较,这一指标在同一省份、同一省会城市的纵向比较更能反映对应省会城市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提升情况。第二,基于不同省份、不同省会城市的横向比较,据此得出省会城市规模应该得到扩张或受到控制的结论,往往是缺乏逻辑或不合理的。因为不同省会城市人口数、GDP或其他发展指标占全省比重大小,往往是特定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与省会城市应该得到扩大或受到控制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第三,在按照这种方法计算省会城市在省域发展中的首位度时,如果需要讨论的是省会城市作为城市的功能作用,那么与省会城市对应的人口、GDP或其他发展指标,应该采用省会城市中心

城区的对应数据,不宜采用省会城市与行政区概念相对应的数据。

近年来,许多地方为了强调培育都市圈甚至发展壮大省会城市的重要性,将城市首位度概念延伸转化或内涵异化为省会城市人口、GDP等相关指标占全省的比重,分别形成省会城市人口首位度、省会城市经济首位度的概念;再根据计算的省会城市首位度数据及其与其他省份省会城市首位度数据的比较,得出本省应该培育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并优先支持省会城市做大做强的结论。这种分析不仅偷换了中心城市首位度的概念,而且张冠李戴地把两个不相关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是经不住推敲的。

有的地方计算省会城市首位度时,不是采用省会城市中心城区的相关数据与全省比较,而是采用省会城市对应行政区的相关数据与全省比较。如按照这种方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相关数据计算,除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外,2018年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人口首位度,即省会城市人口占全省比重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前三强的分别是西宁、银川和哈尔滨,人口首位度分别为39.3%、32.7%和28.8%;人口首位度位居全国省会城市最低的3个省会城市分别是济南、南京和郑州,人口首位度分别为7.4%、10.5%和10.3%。2018年经济首位度,即省会城市GDP占全省比重位居全国前3强的分别是银川、长春和西宁,分别为51.3%、47.6%和44.9%;经济首位度最低的分别是济南、南京和呼和浩特市,分别为10.3%、13.9%和16.8%。从这种比较结果可见,省会城市首位度偏低或偏高,都很难说是好事或坏事。如果据此得出省会城市偏小、首位度偏低,应该扩大省会城市空间范围的结论,更是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要求坚持高质量发展、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和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的方向背道而驰的。按照前述概念内涵异化了的的首位度逻辑,如果将省会城市的区域范围扩大到全省,则省会城市的首位度都等于100%,显然这是毫无意义,甚至荒谬的。

三、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与 推进行政区划调整

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关键是构建运行有

效、融合一体的都市圈协调发展新机制,破除都市圈内部不同行政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以促进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镇)同城化发展为导向,统筹优化都市圈发展的空间治理体系和空间开发格局,在基于各自比较优势和空间关联科学选择都市圈内核心城市、梯级节点城市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推进构建核心城市引领、分工协作有序、轴带联动发展、网络链接有效的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借此,协同推进都市圈构建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和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推进都市圈培育体现现代化发展方向,统筹有力、竞合有序、错位协同、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在讨论都市圈发展和编制都市圈发展规划的过程中,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很容易成为广受关注的选项。有人认为这是都市圈发展的当务之急,寄希望于此解决都市圈核心城市腾挪空间不够、辐射带动空间不足、聚集效应不强的问题。有人认为都市圈发展需要理顺管理体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有利于解决在现有不同行政区之间缺乏统一协调的问题,完善区域治理体系和规划管控体系,规避区域之间恶性同质竞争问题。还有一些人虽然不认同推进行政区划调整是都市圈发展的当务之急,但也把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作为推动未来发展的重要备选举措。

但是,我们认为,推进行政区划调整,不应是构建都市圈协调发展新机制的重要选项,充其量只宜作为辅助措施。都市圈规划作为区域规划的一种重要类型,区域规划本身就是以跨行政区的特定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对象编制的规划^①,以贯彻实施重大区域战略、协调解决跨行政区重大问题为重点^②,这也决定着在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过程中,不宜把推进行政区划调整作为构建都市圈协调发展新机制的重要选项。在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过程中,固然需要提升政府规划和战略统筹力,推进都市圈内部跨行政区的政策协调和规划衔接;也需要促进都市圈发展更好地对接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提升开放合作水平、改革创新能级和发展品质品位,为更好地争取国家或省级层面的资金、资源、战略和政策支持创造条件。这些方面可通过扩大行政区划范围的方式实现,也可以通过推

进都市圈内部跨行政区深度合作、构建都市圈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方式实现。超越都市圈的省级政府也可以为提升政府规划和战略统筹力,以及对接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提供坚实支撑。

更重要的是,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应该成为市场主导、自然发展的过程,成为政府引导、高质量发展的过程^③。在此过程中,不仅涉及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镇)之间的关系,还涉及周边城市作为都市圈梯级增长节点城市与其周边亚区域小城市(镇)、特色小镇乃至广域乡村之间的关系。培育发展融合一体的现代化都市圈,要以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镇)、梯级节点城市与其周边亚区域一体化发展为基础,协调增强都市圈中心城市、梯级节点城市各自的向心集聚力和辐射带动力,以及都市圈整合发展能力和综合创新力、竞争力。因此,在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过程中,应该适度淡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理念,着力培育多元互补、刚柔相济、柔性适应、网络协同的现代治理理念,注意激发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通过多种方式参与都市圈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多关注培育都市圈融合一体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完善都市圈内部不同行政区之间,甚至城乡之间的协同、联动和整合发展机制。在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过程中,都市圈内部核心城市与梯级节点城市之间,核心城市、梯级节点城市与其周边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技术联系均存在逐步强化和深化的过程。撇开强调行政区划调整和行政区扩围的思路,用多元共治的理念培育都市圈协调发展新机制,有利于更好地顺应城镇化发展和都市圈演进规律,按照“政府推动,市场主导”和“融合互补,协作共赢”原则,引导都市圈发展的利益相关者更好地培育都市圈命运共同体意识,持续强化和深化前述经济、社会和技术联系,并深入推进要素市场一体化和营商环境建设,完善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形成推进都市圈融合一体化发展的“大合唱”。

构建都市圈协调发展新机制既要有战略思维,也要立足当前,脚踏实地,从小事做起,注意借鉴其他方面行之有效的经验。如推进大江大河流域治理甚至河长制等举措,也有诸多可供借鉴之处。有些地方在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过程中,推进取消都市圈内部的高速收费站,加强都市圈内外环线

建设,推进都市圈内部断头路、城际铁路和城市—机场快速通道建设,强化政策引导鼓励区域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引导国家级开发区(产业园区,下同)强化同省市级开发区的产业链关联,培育都市圈核心城市—梯级节点城市—小城镇—乡村地区之间的产业发展梯度和产业链、供应链关系,鼓励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甚至博物馆联盟等在推进跨区域合作中发挥作用,也是推进都市圈一体化、构建跨行政区协调发展新机制的重要举措。这些举措都有利于打破行政区经济,是推进行政区划调整难以根本替代的。当然,鉴于当前行政层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共政策调整和公共资源分配,建立高层级的都市圈发展领导小组和有效的都市圈发展组织支撑机制,对于构建都市圈协调发展新机制也有重要影响,对此也应给予重视。从长远来看,引导都市圈内部不同行政区之间、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深化换位思考,并顺应发展阶段转变循序渐进地推进都市圈建设,对于引导和凝聚社会共识、加快构建都市圈协调发展新机制也有重要意义。

在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过程中,如果疏于构建都市圈协调发展新机制,只是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推进行政区划调整或扩围上,很可能导致都市圈建设“台上称兄道弟,台下勾心斗角”,导致都市圈

内部不同区域之间“面和心不和”甚至“貌合神离”的格局。因为单靠行政区划调整,难以有效解决都市圈内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问题,难以有效培育都市圈内部多元利益主体,特别是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都市圈发展的内生动力,并有效激发其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也难以有效培育都市圈内部次级行政区层面参与都市圈发展的内生动力。

(本文是2017年入选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资助项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和跟踪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参见《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3号)。②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③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发改规划〔2019〕328号)。

参考文献

- [1]肖金成.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 [2]宋迎春.国外都市圈发展的启示和借鉴[J].前线,2005(11).
- [3]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Several Theoretical and Policy Issues on Fostering and Developing Modern Metropolistan Area

Jiang Changyun

Abstract: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modern metropolitan area is the basic project of “taking urban agglomeration as the main body to constru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urban pattern between large, medium and small cities and towns”. We should scientifically deal with the contradiction of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an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promoting the centralization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 We should scientifically grasp the connotation of the “first degree” concept and guard against misinterpreted “first degree” concept to mislead the development of metropolitan area. The key to cultivate and develop modern metropolitan area is to construct a new mechanism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etropolitan area with effective 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bu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 development.

Key Words: Urban Agglomeration; Modern Metropolitan Area; First Degree; New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Metropolistan Area

(责任编辑:晓 力)

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机理研究*

安树伟 张晋晋

摘要:城市功能包括产业发展功能、吸纳就业功能、公共服务功能、人口聚集功能。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本质上是在都市圈一体化过程中实现中小城市产(业)城(市)人(口)的高效融合。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是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的外部环境,产业发展是城市功能提升的原动力,城市升级是城市功能提升的动力保障,联动因素是城市功能提升的动力基础,城市功能提升的反作用力也会对各个影响因素发生作用。中小城市各项功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但产业发展功能和其他各项功能的前提,它们之间的协调性影响并决定中小城市整体功能的提升。

关键词:都市圈;中小城市;功能提升;机理

中图分类号:F26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1-0117-08 **收稿日期:**2019-11-05

***基金项目:**北京市属高校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支持计划“长城学者培养计划”资助项目“新型城镇化与产业集聚:格局、过程与机理”(CIT&TCD20180336)。

作者简介:安树伟,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70)。

张晋晋,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70)。

随着区域一体化深入推进,地域相近、功能互补的都市圈空间组织形式逐渐成为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载体。都市圈作为整体的地域空间经济系统,城市是经济体系中的单个细胞,都市圈建设将城市功能放在区域范围内进行研究,避免了单个城市功能的局限。在中国已进入都市圈化阶段的背景下,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成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关注的焦点之一。目前对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的机理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解释框架,在大力推进都市圈发展的今天,深入剖析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的机理,有利于促进都市圈内中小城市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一、研究综述

中国已经进入都市圈化阶段,都市圈内中小城市是提升城市化质量、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的研究热度随之兴

起。目前学术界主要围绕“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聚集”四大功能进行了针对性研究。

第一,产业发展对中小城市功能提升具有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产业发展功能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综合型研究,强调中小城市产业要全面发展。第二类是特色型研究,强调中小城市要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第三类是互动型研究,强调中小城市要与中心城市的产业互动、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做好中心城市的配套产业,增强不同等级城市的产业关联度,形成等级差异的城市产业链。

第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决定中小城市功能持续提升的关键。学者们普遍认为受制于行政等级、有限财力和较为薄弱的城市基础设施,中小城市公共服务能力与大城市存在较大差距。这些差距主要包括居民保险、公共交通、公共教育、保障性住房。公共服务职能对城市运行管理具有促进作用,城市公共服务领域应提倡为民服务,服务

内容应根据城市具体条件和市民公共服务需求来确定;政府应致力于提供市民满意的公共服务。

第三,广泛的就业机会能够增强中小城市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一是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增强中小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二是以新型工业化动力,提高中小城市人口吸纳能力。三是识别不同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大力发展吸纳就业能力比较大的行业。四是对不同地区吸纳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施差异化措施,为充分就业创造条件。

第四,人口集聚功能的研究是现阶段功能提升的热点。一类热点聚焦解决问题的对策,认为应着力增强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与聚集程度,提升对人口的支撑能力;以中小城市为突破口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民工的就地城镇化提供条件。另一类热点聚焦影响人口集聚的因素,从社会维度、个人及家庭维度和城市融入维度分析影响人口聚集的因素,认为应通过产业调整增加就业机会、技能培训实现职业提升、重构社区社会资本、营造城市融入环境等措施来增强县城城镇人口的聚集能力;另有基于产业视角从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转型匹配程度分析都市圈中心城市的人口有序转移,认为提升居民就业能力、协调城镇化发展以及促进劳动力市场完善与产业结构转型,能够更好地实现都市圈人口的有序转移。

然而,现有的研究存在两方面局限:一是研究范围侧重于广义上的中小城市,并未对都市圈内的中小城市和都市圈外的中小城市进行科学划分和区别研究,都市圈内外的城市功能提升的机理并不完全相同。二是研究视角主要着眼于城市单一功能提升。这种单一的分析视角在研究方法上对城市功能提升简便易行,但由于缺乏全局的思考,得出的结论有一定局限性。本文着眼于都市圈内部中小城市功能提升,运用相关理论分析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的机理。

二、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的外部环境

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既取决于中小城市自身发展的基础条件,也受制于它们所处的外部环境,而这种外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都市圈的发育程度。都市圈的产生是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都市圈的发展是中心城市在

自身发展壮大的基础上,与其他成员城市合作逐步形成完善的城镇体系和分工体系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实质上是由工业化和城镇化共同推进的。工业化直接带动产业发展,促进都市圈内城市之间形成有效的产业分工与协作关系网络,进而创造并吸纳就业。城镇化促进城市升级,在都市圈内表现为城镇体系的日趋合理与完善。都市圈内各城市在一体化过程中,都具有相互吸引和分工协作的趋势。但是,在特定范围内,核心城市具有增长极核的作用,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能力。都市圈内的中小城市不仅受到核心城市的强劲辐射,而且受区域内其它城市的发展带动,在都市圈内城市的交叉重叠辐射下,中小城市得以快速发展。

第一,都市圈一体化过程中,逐步形成完善的城镇体系,从而有助于城市功能的疏散与转移。城市功能提升是城市在一定城市体系中获得城市规模等级提升的过程,通过竞争机制,中小城市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吸引更多要素集聚,以期在城市体系中获得一个较高的能量等级。特大城市需要在追求更高目标的过程中,适度疏散本城市的部分功能,这个疏散过程需要一个向下的传导机制,即遵循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的空间位序,这样中小城市功能提升就获得了两方面的动力:一是自身的发展,二是高等级城市功能的疏散与转移。但是,城市等级体系出现断层,这种传导机制就会受到破坏,既不利于超大城市的发展,也不利于中小城市的功能提升。

第二,都市圈一体化过程中,城市之间形成网络化分工,合理的区域分工与贸易是城市功能提升的推动力。都市圈是一个开放系统,只有区域与区域进行交流才能体现出都市圈功能。都市圈内产业区域分工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在都市圈发育期,由于城市之间经济技术水平差异大,或者经济技术相当不发达,更多的是基于其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进行产业间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即部门专业化;在都市圈成长期,发达城市之间的主导分工模式是产业内分工,即不同区域都在发展同一个产业部门,但其产品种类不同,即产品专业化,可能是基于比较优势或者规模经济;在都市圈成熟期,可以实现产业链分工,虽然很多地区都在生产同一产品,但是各个区域按照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不同工序和

不同模块进行专业化分工,即功能专业化。但是都市圈产业协作方式并不会表现为完全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业链分工的绝对模式,更多的是三者的综合体现。实际上,随着都市圈的日益发展,产业协作方式更多地表现出产业链分工模式。总体而言,城市间产业流逐渐强化、城市网络逐渐形成,中心城市逐渐形成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高端服务业等为主的多样性产业,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也经历由多样性到专业化再到二者并存或交替主导的过程。在都市圈一体化过程中,通过强化都市圈产业分工的耦合效应,引导生产力布局优化和生产部门错位协同发展,促进大中小城市间实现全产业链式、水平和垂直分工融为一体的精细分工与合作,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并形成一批专业化功能城市,增强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功能。通过发挥都市圈要素流动的融合效应,建立区域一体化的要素市场,促进城际要素高效率地扩散和渗透,切实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功能。通过发挥都市圈成长过程中城市增长的共生效应,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结构,形成以核心城市为引领的城镇等级规模体系,实现都市圈内各城市共生共长,增强中小城市的人口聚集功能。

三、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的动力来源

都市圈一体化带来城市升级和产业发展,在发展中增强都市圈的集聚效应和整体竞争力,又进一步促进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的提升。此外,城市功能提升也受到变化的联动因素的直接影响,联动因素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公共服务、环境因素等途径,实现产业、城市、人口的协调发展,成为城市功能提升的动力基础(见图1)。

1. 产业发展是城市功能提升的原动力

产业发展既是城市的支撑力量,也是城市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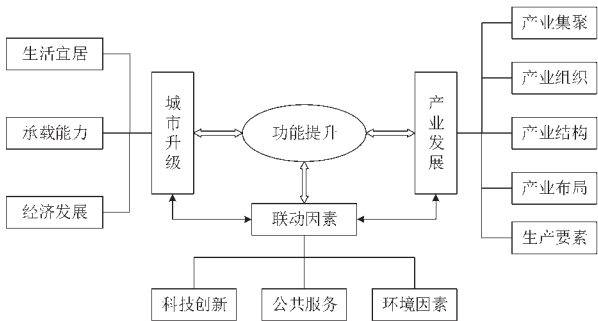


图1 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的动力机制

发展的方向。产业发展是以城市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积淀为基础的演变与升级,是促进城市功能提升的原动力。城市功能受到产业结构变迁的直接影响,其间接影响也在城市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得以体现。同时,产业发展对城市产业布局与城市整体建设提出新要求,在产业组织生产社会化的规模调整过程中,加强产业之间的有机联系,促进城市——区域的经济的发展。产业发展推动着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可以改变城市经济的粗放式发展方式,促使城市经济健康发展,有助于产业与城市的同步发展。产业发展带动上下游产业之间的纵横关系,以资源、技术、人居、环境等为表征促进城市经济各个方面的发展,产业以水平与垂直的空间运动影响着城市的分工与合作,表现为城市经济在农业、工业、服务业之间产业链的形成,推动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 城市升级是城市功能提升的动力保障

城市升级在经济发展、承载能力及生活宜居意义上是城市功能提升的动力保障。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各种物质产品与服务是城市功能提升的物质保障,也是城市与产业自我发展的动力保障,经济发展水平体现了一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对技术进步和政府财政收入都有重要影响。城市的生活宜居度通过消费来体现,消费作为生产最终的需求,其提升有利于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完成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在不断适应与满足消费新需求过程中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延长在生产和生活服务型产业发展上的价值链,开发新产品,把握市场变动趋势创造新供给,形成城市功能提升的动力保障。城市的承载能力必须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活水平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城市功能提升。

3. 联动因素是城市功能提升的动力基础

联动因素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公共服务、环境等因素改善人口与城市的协调程度,是城市功能提升的动力基础。第一,科技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动力。科技创新通过科学发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科技扩散与引进等路径,在城市——区域范围内形成科技增长极,降低产业部门的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促产品更新换代。科技创新推动了技术集聚、人才集聚及产业集聚。科技创新对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资本越来越复杂多变的产业发展有着直接影响。在产业发展越来越强调效

率化、柔性化、资本化、现代化的过程中,科技创新形成的各种便利的网络化交易方式可以降低成本,使得越来越注重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的产业迅速发展,增加了产业与城市的竞争力。第二,公共服务是沟通城市与产业发展的纽带。公共服务通过持续向城市各主体提供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优质的教育、医疗卫生、就业服务及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有效地联系起人口、城市、产业,促进城市有序发展。公共服务通过为人的生存、生活及发展等社会性的直接需求提供满足,成为产业与城市协调发展的互动支撑。第三,环境因素对城市功能提升有促进作用。市场环境、文化环境及生态环境等各类环境因素对城市的资源配置和产业发展都有直接影响,越是环境良好,越会吸引资金、人才和产业的集聚,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产业组织的规模效益,促进城市功能的提升。

此外,在各种要素通过内外力影响城市功能提升的同时,城市功能提升的反作用力也会对各因素发生作用。良好的产城人互动关系有利于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以城市承载能力为基础的合理城市规划,有利于遵循共生理念的产业升级与城市升级,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同时随着产城人的有机融合,公共服务也会进一步提升,有效地保障城市产业有序发展,降低风险出现的可能性,确保城市与产业健康协调发展。此外,都市圈作为一个整体,其中小城市功能的提升又会进一步增强都市圈的集聚效应和整体竞争力。

四、中小城市功能的互动机制

吸纳就业、产业发展、人口集聚和公共服务功能是城市功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四个组成部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机制。产业功能是城市功能体系的核心和根基,也是其他功能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公共服务功能为城市居民提供各项公共服务,关系着城镇化的质量;吸纳就业功能是城市健康发展的保障,为居民提供就业和稳定的收入;人口集聚功能是城市功能的建设目标和方向。这四项功能是城市应具备的基本功能,其中任何一项功能脱离了其他功能的支持与配合,就会削弱自身功能。因此,各功能要素必须相互促进、紧密结合,通过功能体系发挥整体作用。人口进入城市,

通过城市的产业功能、公共服务功能、吸纳就业功能的有机结合,解决人口在城镇的就业、生活、医疗、养老及文化等需求,实现居民的安居乐业(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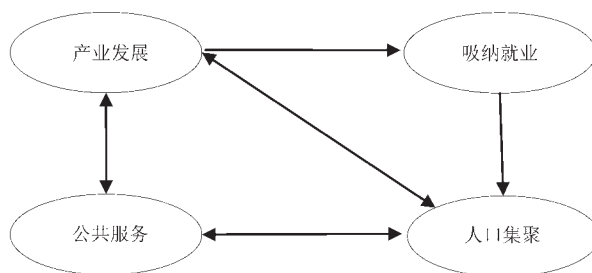


图2 城市功能相互作用机理

城市发展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实现产业发展、城镇建设与人口集聚的融合,是城镇化建设的根本。一方面,产业能创造就业机会。充分的就业机会,保障稳定的生活来源,城市人口才能安居乐业。另一方面,产业兴旺能更好地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人的问题。要确保人在城市里享受到较为优质的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最终要依赖于产业发展的支撑。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也需要相当规模的人口聚集。同时,产业聚集必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大批的劳动力,带来人口的空间集中和聚集。

人口集聚可以推动产业聚集,产业聚集的程度越高,经济会更发达,必然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口涌入,进而拥有更高的人口聚集力量,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小城市规模扩大及经济快速发展。产业发展反作用于人口集聚,从而形成聚集经济。人口聚集本身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容纳大量劳动力的生活性服务业,如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金融、物流、咨询等产业,必须依靠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形成有效需求以达到规模经济,进而促使公共服务的提升,形成良性循环。人口聚集对经济聚集的促进作用存在一个临界值,当人口聚集对经济聚集的促进作用达到最大之后,再推进人口聚集就不能有效地提高经济聚集水平,甚至会导致聚集不经济。即超大规模的城市虽然可以吸纳更多人口获得各种人口效益,但当城市承载过多人口时,这种人口效益对城市经济的提升存在局限性,有可能产生诸如环境、交通、治安等负外部性问题。

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可以改善居民生活质量,进一步增加城市对外来人口的集聚能力,人口的集聚又给城市带来更多劳动力,促进城市经济发

展。因此,政府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将是双赢,不但可以支持民生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功能,同时提高人口聚集能力,吸引外来人口集聚,特别是人才集聚,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人口的集聚也会带来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

五、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的阶段性的

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本质上是在都市圈一体化过程中实现中小城市产城人高效融合的过程。对于都市圈内中小城市而言,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发展阶段演变,即都市圈的成长过程,从萌芽期逐步发展到成熟期;二是城市功能提升,即中小城市四大功能的不断加强和完善(见图3)。这两个方向的相似之处是发展的递进性,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基础和起点,同时两者在时空上也具有同步性且彼此联系和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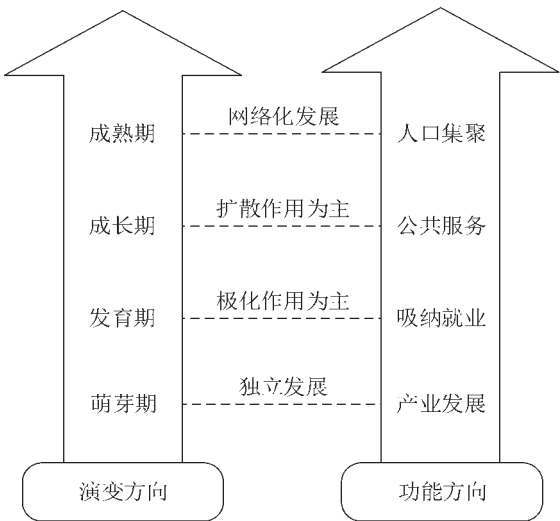


图3 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的阶段性的

1.萌芽期都市圈

萌芽期的都市圈,各城市处于离散阶段,城市规模较小,基础设施建设较差,城镇化水平较低,经济结构较为简单,各个城市之间由于缺乏现代化的联系方式,经济联系和社会交往较少,呈现独立发展的态势,都市圈整体发展十分缓慢。城镇体系极不完善,仅有一个中心城市且集聚作用有限,各城市孤立发展,中心城市主要通过利用自身优势,吸引周边资源和要素,以促进自身的成长和壮大。这样的竞争与发展将导致各个中小城市产业结构趋同。因此,在这一阶段的后期,会呈现出各个城市

竞争发展的格局。实质上,正是这种竞争发展为都市圈的培育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空间结构。这一阶段的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受限于自身经济体量,往往不具备吸引多元要素的条件,而是借助自身特色的要素资源促进城市功能提升。此时产业发展是城市功能提升的首要目标。

2.发育期都市圈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各种因素和多种推动力共同作用,各个城市快速发展,随着核心城市的发展和各个城市之间大型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建成,都市圈的空间结构基本形成。都市圈发育期,产业得到发展,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逐渐强化,扩散功能日益明显,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之间开始进行分工协作,基础设施建设强力推进,城镇体系加快发育但仍不完善,中国大部分都市圈都处于这一发展阶段。这一阶段都市圈内的中小城市专业化分工尚不突出,不具备形成相对优势产业的条件,但初步具备为中心城市产业发展提供配套产业的条件。其功能提升在于既要加强与中心城市的合作,利用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增强自身影响力;又要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细化职能分工和培育优势产业,增强产业竞争力,与中心城市协同发展推动都市圈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心城市可以带动中小城市产业发展,能够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有利于进一步提升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吸纳就业的功能。

3.成长期都市圈

当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极化作用就会逐渐转变为扩散作用,此时都市圈进入快速成长期,经济出现腾飞,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和吸纳就业功能进一步加强,为公共服务的提升创造基础条件。处于成长期的都市圈,其城市数量进一步增多,城市功能和结构体系逐渐成形,有一定的都市圈效应,但经济外部效应一般。中小城市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与中心城市产业协同发展。处于成长期都市圈内的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逐步改善,劳动力资源丰富,专业化生产潜力较大。同时,由于交通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也逐步向周围的中小城市扩散,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因素推动中小城市公共服务功能的提升。这一阶段的都市圈内的中小城市,一方面要接

受大城市功能的扩散与转移;另一方面各个城市之间要加强分工协作。

4.成熟期都市圈

都市圈城市化水平较高,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和网络化特征明显,城市之间形成了合理的产业分工协作关系,各个城市发展相对稳定。随着都市圈综合交通走廊的发展以及城市等级体系的出现,都市圈内城市间的联系已经不能满足都市圈整体发展的要求,需要在更大的空间背景下发展都市圈整体与外部的社会经济联系,这种网络化的发展联系成为推动都市圈向城市群演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个阶段,都市圈内各个城市都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核心城市具有最强的创新能力和潜力,与全球发达地区有着更通达、更集中的信息等资源联系,聚集着大量的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发展要素,既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先导,往往也是都市圈制度创新的推动者和组织者,促进都市圈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核心城市的创新通常是原有优

势的发展,是原有核心作用的强化,与整个都市圈在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上实现互补合作。正是因为具有突出的创新实力,核心城市才得以维持核心地位,增强竞争优势和辐射功能,不断扩大辐射半径,与更多的空间实体连为一体,在该阶段的中后期,都市圈已显露出城市群的形态。处于这一阶段的都市圈,其内部的大中小城市实现协调发展,都市圈公共服务一体化和中小城市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吸引人口向中小城市集聚,因此提升了中小城市人口集聚功能,使得城市间产业和人口联系频繁而紧密,都市圈功能体系的各个节点得以建立和打通,实现空间结构的网络化并日趋均衡和有序,都市圈发展处于一种动态演化的均衡状态。在发展中进一步增强都市圈的集聚效应和整体竞争力,进而促进整个都市圈城市功能的提升与发展。对于成熟期都市圈内的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的路径是充分利用核心城市的扩散效应,抓住机遇快速发展,推动都市圈演化为更高经济形态的城市群。不

表1 不同发展阶段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特征

发展阶段	城市化	基础设施	产业协作	功能提升路径
萌芽期	城市化率较低	基础设施较差	产业结构趋同	借助自身资源禀赋
发育期	城市化快速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强力推进	产业分工协作	借助自身发展,争取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成长期	城市化水平较高	基础设施完善,交通较为发达	分工协作日趋合理	接受大城市功能的扩散与转移,各个城市之间加强分工协作
成熟期	城市化水平高	基础设施一体化、网络化特征明显	网络化的分工协作关系	都市圈内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同发展阶段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特征如表1所示。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综合分析,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其外部环境是都市圈一体化,本质上是都市圈一体化过程中的产城人高效融合,在实践中也有其特殊的政策含义。

1.研究结论

第一,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本质上是在都市圈一体化过程中实现中小城市的产城人高效融合。都市圈一体化核心就是都市圈内城市间形成有效的产业分工与协作关系,产城人融合要求形成“城市——产业——人口”一体化体系。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既受到都市圈一体化过程

中各城市间内外效应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城市内部一体化体系中各因素的驱动与交互影响。

第二,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是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的外部环境,产业发展是城市功能提升的原动力,城市升级是城市功能提升的动力保障,联动因素是城市功能提升的动力基础,城市功能提升反作用于各个影响因素。中小城市各项功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产业发展功能和其他各项功能的前提,各项功能互有消长,它们之间的协调度影响并决定中小城市整体功能的提升。

第三,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都市圈,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的方向和路径各不相同。处于萌芽期的都市圈,中小城市主要借助自身特色要素资源发展产业,着重提升产业发展功能;处于发育期的都市圈,中小城市一方面要通过自身的发展来提高实力,另一方面要争取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着

重提升吸纳就业功能;处于成长期的都市圈,中小城市一方面要接受大城市功能的扩散与转移,另一方面各个城市之间要加强分工协作,着重提升公共服务功能,着重提升中小城市人口聚集功能,实现中小城市产城人融合发展。

2.政策含义

第一,都市圈及其广大区域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是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的重要外部环境。因此,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不能就功能提升而论功能提升,要促进区域的整体发展,形成“大中小城市、小城镇良性互动”的局面,这是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的重要前提。一是在新型城镇化和都市圈城镇体系塑造中,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应依据各自的人力资本、资源禀赋以及产业链确定不同的产业分工,形成空间经济合力和内聚力,实现不同城镇化体系的良性互动与均衡发展。二是加强都市圈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增强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以此提高中小城市的综合功能。三是以户籍制度为抓手推进都市圈内中小城市的功能协调发展。

第二,核心城市在都市圈发展中起到首位作用,应努力提升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注重从产业链、金融市场、产品和要素市场、营商环境、政府服务效率等方面,提高产业链分工、市场的成熟度和经济开放度,增强对中小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促进生产要素特别是科技要素和资本要素由核心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同时,产业发展是城市功能提升的原动力,要推进都市圈一体化,形成产业协作关系。打破都市圈内城市间行政壁垒、弱化政府因素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更深程度地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并以此促进要素在地区间自由流动,推进要素在空间上合理集聚,促进都市圈内产业协作。都市圈各个城市之间产业分工协作要突出产品专业化和功能专业化,形成错位竞争、链式发展的整体优势。

第三,公共服务功能是城市功能的重要方面,在吸引人口和劳动力集聚中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提升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功能。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转变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切实履行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合理安排民生保障的重点方向和供给方式,构建全覆盖、多层次的公共服务体系。明确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兜底

职能,推动标准信息公开共享,开展标准实施监测预警,有序调整公共服务标准水平。

第四,不同发展阶段的都市圈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的路径不同。对于萌芽期的都市圈,要促进大城市优先增长,集中力量建设都市圈核心城市,提高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对于发育期的都市圈,要科学把握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充分利用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梯度转移的过程,积极引导大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小城市适度转移,加强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载体的统筹规划和布局,以产业园区为重点打造一批承接产业转移平台。对于成长期的都市圈,重点是促进部分中等城市尽快成长为大城市,以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尽快进入成熟期都市圈。对于成熟期的都市圈,重点是提高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质量,增强人口聚集功能。

参考文献

- [1]贾晓华.强化中小城市的产业支撑实现城镇与产业的融合发展[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2(3).
- [2]张蔚文.政府与创建特色小镇:定位、到位与补位[J].浙江社会科学,2016(3).
- [3]盛世豪,张伟明.特色小镇:一种产业空间组织形式[J].浙江社会科学,2016(3).
- [4]冯奎,郑明媚.中外都市圈与中小城市发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
- [5]李学锋.中小城市综合承载力如何提升[J].人民论坛,2015(35).
- [6]方利君,熊琴.新型城镇化下苏南中小城镇交通发展模式研究[J].现代交通技术,2015,12(2).
- [7]辜胜阻,郑超.提升中小城市人口聚集功能的战略思考[J].现代城市研究,2013(5).
- [8]潘华.国外促进中小城市发展的政策措施[J].宏观经济管理,2015(1).
- [9]钟笃粮,郑明媚.城镇化进程中的都市圈与中小城市发展——2012中国城市发展论坛综述[J].现代城市,2012,(4).
- [10]任泽平.房地产周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1]冯刚.现代城市发展中的公共服务功能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0(2).
- [12]金南顺.城市公共服务的三个基本问题[J].城市问题,2005(6).
- [13]金南顺.城市公共服务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6.
- [14]许大明,修春亮.大都市圈中的小城镇发展研究——以哈尔滨大都市圈为例[J].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1).

- [15]任保平.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安都市圈的结构优化及其方略[J].人文地理,2007(5).
- [16]李伍荣,高静.发展服务贸易:吸纳就业的新途径[J].当代财经,2004(1).
- [17]吕忠伟.中国各行业吸纳就业能力的实证研究[J].兰州学刊,2006,152(5).
- [18]唐志丹,代凤美.中国各地区吸纳就业能力的综合评价与分析[J].辽宁科技大学学报,2011,34(3).
- [19]楼文高,胡伟华.基于投影寻踪分类技术的各地区吸纳就业能力综合评价[J].社会保障研究,2013(5).
- [20]肖敏杰.县域城镇人口聚集的影响因素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4.
- [21]安锦,薛继亮.基于产业视角的京津冀都市圈人口有序转移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2).
- [22]王方华,陈宏民.都市圈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 [23]陆大道.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 [24]DURANTON G,D Puga. From Sector to Functional Urban Specialization [C].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25]柯善咨,赵曜.产业结构、城市规模与中国城市生产率[J].经济研究,2014(4).
- [26]王缉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27]韦柳河.经济聚集与人口聚集的关系分析——以成都市为例[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3.
- [28]王娟.中国城市群演进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2.
- [29]廉军伟.都市圈协同发展理论与实践[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6.
- [30]张颖瀚,张超.大都市圈的成长阶段与动力机制[J].江海学刊,2006(1).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Function Promo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Metropolitan Area

An Shuwei Zhang Jinjin

Abstract: Urban functions includ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unction, employment absorption function, public service function and population gathering function. In essenc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unc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metropolitan areas is to realize the efficient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city and population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the process of metropolitan integrati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metropolitan areas is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unction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ity functions. Urban upgrading is the power guaran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urban functions. Linkage factors are the dynamic basis for the promotion of urban functions. The reaction force of urban function promotion will also affect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function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re interrelated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 but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unction is the premise of other functions. The functions have ebb and flow with each other.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m affects and determine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function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Key Words: Metropolitan Areas;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Function Enhancement; Mechanism

(责任编辑:平 萍)

社会资本驱动城市创新发展^{*}

李雪伟 方浩

摘要:促进城市创新发展是应对全球经济转型挑战,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社会资本作为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资源,近年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围绕社会资本驱动城市创新发展的主题,从回答什么是城市发展中的创新,什么是城市创新中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城市创新发展具有怎样的作用机制和怎样检验社会资本与城市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四个问题着手,对既有文献进行全面梳理。结果发现,尽管相关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分别对社会资本驱动城市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论述和实证检验,但仍然缺乏对两者更精细的关联分析与因果机制分析,应在理论、方法、指标测度等方面继续深化研究。

关键词:社会资本;创新;城市创新系统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1-0125-09 **收稿日期:**2019-07-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社会资本视角下特大城市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的机制与模式选择研究”(71774163);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项目(2019002)。

作者简介:李雪伟,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

方浩,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

一、引言

21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城市都正在经历着经济结构方面的重大转型。其中,三种形式的结构转型正在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的城市经济发展:一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口在地域间的大规模流动,新的城市体系正在形塑全新的城市网络结构;二是在广大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以及经济专业化分工所涉及的主要资源转变,将使大都市区(或区域)的规模和繁荣程度受到影响;三是所有类型的经济体都必须适应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的结构性冲击,包括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科技兴起、各个国家比较优势的调整,以及市场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事实上,在应对经济结构转型的挑战中,并非所有的城市都能够成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

动能。从美国著名地理学教授斯多波(M. Storper)等人对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实证研究来看,同样是以制造业和机械工程为经济增长点的两座传统发达城市,在新的发展形势下由于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战略,两座城市最终走向了相异的发展道路——旧金山进一步崛起,洛杉矶则陷入衰退。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已经由依靠传统的资本、劳动力等基础生产要素投入向倚重于知识、信息、技术、专业化、网络化的人力和社会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投入转变,而能否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已成为新经济时代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随着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如何全面提升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竞争力,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尽管国内许多城市纷纷倡导创新理念、发展创新经济、引进创新战略,但其是否真正具备应对经济转型挑战和区域激烈竞争的实力,仍然有待观

察。众所周知,创新型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包含着城市系统各种要素的创新,特别是要素之间的整合和协同;另一方面,创新本身又会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包括作为硬件的基础设施质量和作为软件的公共服务水平等。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不难发现,传统上,人们普遍关心城市创新环境的硬件建设,如住房、交通、研发设施等条件的改善,同时也不断努力提高促进城市创新的软实力,如投入、服务、金融支持等。然而,对于连接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社会网络,以及影响创新决策、投入和环境建设的规则、制度等社会因素,人们的关注度普遍不足。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资本理论在各研究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在学界层面探讨社会网络、文化、规范等与城市创新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这就为城市转型和城市体系重构路径选择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基于此,本文将社会资本驱动城市创新发展为主题,从回答什么是城市发展中的创新,什么是城市创新中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城市创新发展具有怎样的作用机制和怎样检验社会资本与城市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等4个问题着手,对既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同时对未来相关研究做出展望。

二、城市发展中的创新

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同时也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1912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得(J. A. Schumpeter)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率先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创新理论,并指出创新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的过程。自此之后,学界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便开始不断扩展和深化。总体来看,创新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分化到融合的发展过程。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学派:一个是技术创新学派,代表人物及理论为曼斯菲尔德(E. Mansfield)的技术模仿论、门斯(G. Mensch)的技术创新论、卡米恩(M. I. Kamien)和施瓦茨(N. L. Schwartz)的市场结构论;另一个是制度创新学派,代表人物及理论为诺思(D. C. North)的制度创新论、拉坦(V. W. Latan)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等。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经济进化论的主题下,创新研究路线开始

呈现出一定的融合和拓展趋势。同时,由于技术创造和组织创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也在这一时期被提出,并且在之后衍生出了宏观、微观和综合三大学派。

城市创新作为创新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现代创新理论的发展一脉相承。从技术创新学派的角度来看,城市创新是指在城市当中的所有企业、科研机构等单位有关技术的新构想,经过研究开发或技术组合,到获得实际应用,并产生经济、社会效益的商业化全过程活动,一般需要通过学习、模仿、竞争等方式实现;而从制度创新学派的视角出发,城市经济的增长往往与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密切相关,一般需要通过个人、资源合作性的安排和政府的安排来完成。之后,随着经济地理和区域科学的发展,国家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相继成为研究热点,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指出,城市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同样需要一个适用于城市的创新系统理论。基于此,赵黎明、隋映晖等较早提出了城市创新系统(city innovation system, CIS)的概念,并针对系统的主体、构成、作用机制、运行机制和影响机制等进行了论述。

首先,城市创新系统可以表示为城市创新的扩散效应和科技产业聚集效应的矢量集合,是一个独特的科技、经济、社会结构的自组织创新体系和相互依赖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在城市生产体系中引入新的要素,或者实现要素的新组合,就能够形成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网络体系,其目的在于推动城市新技术或新知识的产生、流动、更新和转化。其次,从城市创新系统理论中可以发现,由企业、政府、大学、科研机构 and 中介组织等主体构成的创新网络对于创新系统的运转至关重要,而通过有效的制度保障和社会规范,良好的创新文化和创新技术就会利用网络体系进行扩散,进而带动区域乃至国家的技术进步,这一观点也契合了创新理论从线性范式到网络范式的演进趋势。再次,需要强调的是,网络本身并不会产生创新行为,创新根本上还是由网络中的各个主体产生,但网络有助于知识和创新的传播,并且网络关系越强,系统创新能力就越大。

三、城市创新中的社会资本

随着城市创新研究的不断深化,企业运用长期

积累形成的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和共享资源等的无形资产,在与其他主体广泛交流、合作的过程中,不仅可以获得技术创新所需要的信息、技术、人才等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新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实际上,这一现象正是社会资本在城市创新中的具体体现——斯多波等人将其称之为关系型基础设施(relational infrastructure),但本质上仍属社会资本范畴。正是由于网络化关系对企业技术创新以及各参与主体知识的分享与扩散愈发重要,并且能够极大程度地决定城市的综合竞争能力,因此,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城市和区域创新的研究中,并对城市和区域创新系统中的网络关系进行分析。

自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 Bourdieu)正式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以来,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就存在着多种解释,如布迪厄从社会关系网络形式存在的角度,科尔曼(J. Coleman)从社会资源结构的角度,波特斯(A. Portes)从网络成员关系的角度,博特(R. Burt)从“结构洞”的角度,林南(N. Lin)从网络资源的角度,帕特南(R. D. Putnam)从社会组织角度,福山(F. Fukuyama)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等都分别对社会资本进行过定义。尽管概念类型多样,但从总体来看,社会资本都是一种存在于网络关系之中,并且能够被行动者投资和利用,以实现自身目标的社会资源——以信任为基础,以组织和关系网络为后盾。此外,社会资本的具体内涵体现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目前,在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都能够看到社会资本的身影,但由于各学科聚焦的问题在层次、范围、对象等方面差异显著,使得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展开测度、分析和解释的情境亦有所不同。城市创新体系作为一个由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和创新环境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其有效运转影响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但又离不开作为组织的主体之间的互动。因此,对于影响城市创新发展的社会资本,就需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同时融合多学科背景展开具体研究。

在城市创新系统中,创新活动是创新主体在一个特定区域空间中相互作用、彼此学习、相互促进的网络过程。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社会网络关系与社会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因而与城市创新系统的网络结构与创新环境具有交集。基于

这一视角,可以对城市创新中的社会资本进行一般性的定义,同时对其属性、类型、作用等作出进一步阐释。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并没有相关文献直接对城市创新中的社会资本进行界定。不过,如果把城市视为区域的一种表现形式,则可以借鉴区域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对城市社会资本的内涵进行阐释。表1是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从中可以看出,区域中的社会资本在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的同时,其关注范围更加聚焦、网络主体更加明确,且适用于城市层面的分析。基于此,可以把城市社会资本理解为一种存在于城市中的社会资源,是由城市中的企业、政府、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机构所形成的网络、信任和规范,能够对城市创新活动产生重要影响。

至此,我们已经对城市发展中的创新和城市创新中的社会资本概念进行了基本界定。笼统地看,城市中的创新就是创造并发展一个本地区内的新事物,可能是一件产品,也可能是一种服务或思维,通常以企业的产出为基准考察城市的创新能力。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在城市中亦有着特定的意涵和功能,尤其在对城市创新发展方面具有较为积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接下来将重点梳理有关社会资本影响城市创新的途径和机制的研究,同时介绍如何从量化角度对其关系进行测度。

表1 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涵义

学者	概念界定
黄栋、邹珊刚(2002)	一个特定区域内,企业与相关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外相关实体、群体之间的社会联系等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包括企业获取并利用这些关系来摄取外部信息和其他资源的能力总和
Tura & Harmaakorpi(2005)	一种类似于能力的资源,与我们能够做的事情紧密相连,而物质资本则更多地与我们拥有的东西有关。同时具有一种意向的特性,能够在不被刻意创造与观察时客观存在
丁焕峰(2006)	一个区域为了获得区域经济和社会持续的繁荣发展,提升区域内各个体和组织的竞争优势,更有利于从更高层次区域网络结构中获得稀缺资源,整个区域共同体所建立的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及规范
施建刚唐代中(2007)	一个区域内的社会网络中所负载的无形、生产性资源,能够促进社会行为者之间的合作,并使行为个体通过社会网络或其他社会结构中的联系获取利益
李安方(2010)	内生于区域社会发展之中的,对区域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社会关系网络、区域社会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区域身份认同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研究资料整理。

四、社会资本对城市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

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网络关系中的社会资源,既可以为个人所有并使用,也可以为团体所有并从中受益,因而不同的研究层次决定着社会资本不同的研究尺度。当前,围绕社会资本对城市创新发展作用机制的研究主要从3个层次展开:一是从宏观层次分析区域制度和文化的城市整体创新环境的影响;二是从中观层次分析城市内部的组织网络、关系、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三是从微观层次进一步将城市创新主体解构,通过研究构成组织的个人社会资本探究其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1. 宏观层次

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被称为嵌入结构的观点(embedded structure perspective),关注社会资本网络如何嵌入较大的政治经济系统或文化与规范系统。相应地,在城市创新的研究中,社会资本通常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以及积极的公共政策或制度。具体而言,区域内人们的普遍意识、心理中自觉和不自觉的某种特征和性格形成了城市的文化传统,城市的经济体制、市场机制、法律法规、社会诚信等因素则构建了城市的社会制度,二者相互作用,塑造了城市的社会资本。

城市文化作为区域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其中,创新文化和信任文化是影响创新活动最主要的因素。首先,创新文化包含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和创新氛围3个关键要素,其对城市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是一种非直接影响,即以无所不在的潜在社会影响力作用于区域创新活动的全过程,包括各个环节、各个层次和各个行为主体。在城市创新系统中,创新文化一方面以渗透的形式影响创新主体的最基本元素——“人”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也作用于企业的价值观、高等院校的环境、科研机构的科技群体精神、中介机构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以及政府的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能力。其次,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之一,也对城市创新产生重要影响,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激励创新活动的社会性,拓展城市创新的网络边界;二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城市的创新效率;三是强化城市创新体系的容纳性,更好地吸收外部资

源;四是促进城市技术创新扩散,促进知识外溢;五是增强城市创新发展的认同意识,提升城市形象。

城市制度主要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者同时存在且彼此依存和相容。传统的制度经济学主要将正式制度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但在社会资本中,非正式制度也十分重要。一方面,城市需要建立规范的法律、规章以及各种正式契约关系,另一方面,也需要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关系,而这往往也会形塑城市独一无二的创新环境。总的来说,城市制度对创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城市创新主体提供有效的创新激励结构,通过正式制度明确各创新主体的权责利关系,使其能够在相同的目标下共同行动,减少“搭便车”行为,降低“负外部性”影响;二是为城市创新主体提供稳定的创新运行机制,即制度越完善,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就越小,其中的创新主体就越能够在稳定和可预期的条件下投入到创新活动中。

综上所述,宏观社会资本对城市创新的作用机制可以简化为:区域内的文化和制度所形成的社会资本降低了组织之间的交易成本、信息搜集与整合成本、讨价还价成本与决策成本,同时也形成了有效的外部监督和合作网络,最终实现了创新。

2. 中观层次

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是结构的观点,关注网络形成的过程及分配结果,同时,所有以组织作为社会资本基本分析单位的研究亦属于该层次。在具体的城市研究中,学者们进一步聚焦研究视野,主要关注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

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内涵界定,现有研究主要延续了博特的观点,从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具体而言,企业社会资本又可以进一步从资源、能力和网络关系的角度分别进行界定,如盖比(Gabby)等人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有助于实现企业目标;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指出,企业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涉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周小虎和陈传明(2004)认为企业社会资本能够被企业所控制,并嵌入到企业网络结构中。当然,在管理学界,也有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结构性维度、关系性维度和认知性维度,从而进行内涵界定的研究,如纳哈佩特(Nahapiet)和戈沙尔(Ghoshal)。总之,企业社会

资本不是社会资本概念在企业上的简单套用,对其进行概念明确的目的在于,通过指标的量化更好地观察社会资本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地,企业社会资本对创新的作用机制是前者对后者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韦影(2007)基于吸收能力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强化联系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企业内外部的信任度,加强知识共享,努力提高社会资本结构、关系和认知维度水平,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而对于具体的作用机制,李海超和陈雪静(2015)则从创新观念、创新资源和整合能力3个方面分析企业结构维度、认知维度和关系维度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复杂影响机理,并形成了如图1所示的关系说明。之后,李海超和彭尔霞(2015)又延续已有研究,结合阿里巴巴的案例分折印证了企业创新活动需要社会资本的支撑,即企业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学习机制、风险控制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合作机制推动企业的创新发展。此外,也有学者基于复杂系统理论从更深层次探究社会资本深度与社会资本宽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但由于只是一种假说,缺乏相关的实证检验,因此作者强调还需做进一步分析。总之,学界在中观层次探究企业社会资本对创新发展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多,并且能够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检验相关假设。简单来说,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影响的作用机制是:社会资本使知识资源在企业创新网络中顺畅沟通、交流、扩散,从而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进程。

3.微观层次

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被称为嵌入自我的观点(the embedded ego perspective),主要关注个体通过包含自我在内的社会网络动员资源的潜力。相应地,在城市创新的研究中,学界主要把注意力聚焦在企业家身上,探究企业家个体及其所拥有企业家精神对创新活动的影响。

通常来说,企业家社会资本主要来源于企业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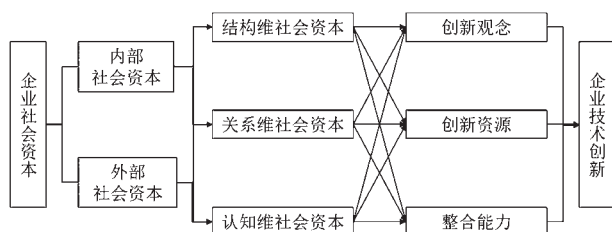


图1 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的社会网络关系(包括内部和外部),本质是建立互利共赢的具有信任和规范机制的共同体,并主要体现在企业家调动网络资源的能力。然而,由于企业家个体之间存在差异,这种通过网络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往往就会变得十分复杂,即一方面企业家自身所拥有的特征与资源会影响企业家社会资本,另一方面企业家与整个社会形成的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也会成为社会资本重要的组成部分。具体而言,企业家的个体特征主要是指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同时还包括专注度、分享意愿、承担风险意愿等特质,它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来源,卡利奥(Kallio)等(2010)称之为个人创造性社会资本(personal creative social capital)。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个人创造性社会资本在企业创新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这并不表明仅靠企业家个体行为就能实现整个城市的技术创新。换言之,由企业家群体所组成的企业家关系网络才是在整体上实现企业创新职能的关键,即企业家社会资本首先是一个体制化的关系网络,包括对内的组织网络、对外的关系网络以及企业家的个人网络(见图2),之后才能通过网络关系实现社会资本的生产,进而促成企业创新管理活动的开展。

企业家社会资本促进创新活动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企业家调动各种关系网络实现创新思想传播交流、获取外部创新资源以及发挥创新知识整合功能3个方面。在网络中,社会关系促进社会个体之间的相互学习,帮助将个人知识转化为集体知识,企业家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到有关创新的技术信息后,通常会基于个人能力判断是否具体实施某一创新设想;同时,企业创新所需要的资金、人才、技术等也需要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加以引进,这一方面需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做出敏锐的判断、决策和整合,另一方面也需要联系网络之间具备较高的信任和规范基础。否则,企业家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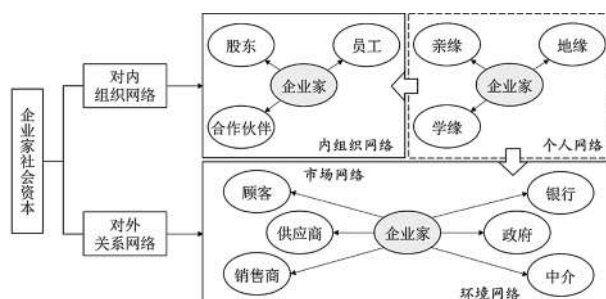


图2 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会资本就会对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如排斥圈外人、搭便车、压制人才、产生腐败等现象的发生就是消极社会资本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因此,对于城市创新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研究需要特别注意其两面性特征。

综合以上分析,基本明确了社会资本驱动城市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社会资本对城市创新发展总体上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同时两者之间具有大体上的因果关系,这也为学界进一步开展实证检验奠定了基础。

五、社会资本驱动城市创新发展的实证分析

总体来看,学界对社会资本驱动城市创新发展的实证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在研究方法和测量指标选取上也大多是基础性研究。其中,城市创新测度指标的主要来源有三种,最常用的是专利申请数量;城市社会资本测度指标根据研究层次不同,差异性相对较大。此外,在数据获取上,学者们主要使用统计年鉴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

1. 城市创新指标测度

目前,衡量城市创新能力的指标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分别为单一专利数量、城市创新综合指标值和企业创新产品研发率或销售额。其中,前两类主要从整体或宏观层面综合衡量城市创新能力,后一类则主要用于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城市产业或企业创新能力评价。

首先,单一专利数量主要指城市每年的专利申请数量或专利授权数量。格里利克斯(Griliches)指出,尽管专利数据不能全面反映城市的创新能力与创新质量,但由于与城市创新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因此在没有其他更好指标的情况下可以被用于衡量城市的创新能力。此外,对于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授权数量的差异性,学者们普遍认为,前者受到来自授权机构的审查约束相对较小,时效性和可获得性也相对更高,因而在实际研究中更具普遍适用性。在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可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专利检索系统获取。其次,城市创新综合指标值是指运用与城市创新相关的若干变量构建一个综合指数进行打分来评价城市的创新能力。如周晶晶和沈能(2013)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环境和创新资源作为衡量城市创新能力的指标;曾婧婧和周丹萍(2019)选用

《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能力报告》中的城市创新指数来衡量城市创新能力等,都是基于这一思路。不过,由于各个指标选取的主观性较强,此种方法往往难以推广到普遍研究中。最后,在中观和微观层次的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会使用企业的创新产品销售额及其在总销售额中的占比、新产品研发速率及成功率、创新人员占比等来衡量产业的创新能力,这种方法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较少被用于衡量城市的整体创新能力。

2. 城市社会资本指标测度

社会资本的有效测量始终是困扰学界的一大难题,这主要与社会资本的概念过于抽象、内容相对宽泛有关。在城市创新研究中,由于社会资本进一步被分为了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次,因此对该指标的测量就变得更为复杂多样。不过整体来看,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一般相对固定,通过相关的统计年鉴即可获取;中观和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相对灵活,主要在参考已有成熟量表的基础上,根据实际研究需要进行调整。为了便于进一步展示具体情况,本文根据已有研究制作了城市社会资本测度指标说明(见表2)。

3. 测度模型及检验结果

在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城市创新作为因变量的条件下,哪些指标会在何种程度上对城市创新发展产生影响,这是实证检验关注的重点内容。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具体的实证检验,一是考查社会资本对城市创新发展的直接影响,测度模型有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面板Tobit模型、非线性模型等;二是考查社会资本对城市创新发展的间接作用,测度模型有中介效应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等。从检验的结果来看,无论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已有研究都能够验证社会资本对城市创新发展具有正向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也不排除一些特殊情况下的负向影响,如企业家社会资本与自主创新能力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说明,任何资源的获取都是有成本的,过多的社会资本反而会束缚创新的发展。此外,由于各研究所使用的测度指标不同,因此在具体的检验结果上仍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差异,如有的检验发现规范维度对城市创新具有正向影响,有的则为负向或不显著影响等,这都说明相关研究仍有较大的讨论空间。

表2 城市社会资本测度指标说明

层次	作者	测度指标	数据来源
宏观 层次	赵万掌(2011)、 毛良虎等(2017)	结构维度:社会组织数量 认知维度:城市化水平	中国社会组织网、《中 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裴成轶(2018)	信任:劳资关系、家庭关系 网络:互联网普及率、电话普及率、社会组织数量 规范: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辖区社区文化活动室个数、社会捐 赠教育经费	《劳动统计年鉴》《民 政统计年鉴》、EPS全球 统计数据平台、国 家统计局等
	赵雪雁等(2015)	无偿献血率、信任度、社会组织密度	中国输血协会、张维 迎等发布的中国大陆31 个省市自治区信任加权平均 值、《中国统计年鉴》
	马茹(2017)	信任维度:劳资关系和谐度(GDP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数的比值) 信息交流维度:互联网普及率	《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 劳动统计年鉴》
中观 层次	韦影(2007)	结构维度:联系的频繁程度、联系的密切程度、联系对象的数量(外 部)/联系所花费的时间(内部) 关系维度:合作中损人利己趋向、真诚合作、信守诺言 认知维度:网络联系因有共同语言能有效沟通、联系中存在相似的价值 取向(外部)/联系中拥有一致的集体目标(内部)	自主设计量表获取调 查数据
	林筠等(2011)	企业社会资本量表、企业间合作量表、产学研合作量表	自主设计量表获取调 查数据
	王国顺、杨昆 (2011)	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外部社会互动、基于认知的信任、共同语言 企业内部社会资本:内部社会互动、基于情感的信任、共同愿景	自主设计量表获取调 查数据
微观 层次	陈爽英等(2010)	政治关系资本:是否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协会关系资本:是否参加行业协会 银行关系资本:民营企业资金借贷来源	第七次全国民营企业 抽样调查
	吴俊杰(2013)	企业家技术社会资本、企业家制度社会资本、企业家商业社会资本	自主设计量表获取调 查数据
	王涛(2016)	企业家曾在其他企业(非金融机构)任职高管的次数 在行业协会任领导职务的等级 企业家曾在政府单位任职情况 企业家曾在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任职情况 企业家是否曾在科研院所等技术中介机构任职 企业家是否获得过科技进步奖励或相关荣誉	CSMAR 中公司治理数 据库、上市公司官方网 站、百度搜索引擎

六、总结与思考

当前,创新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尤其在全球经济面临重大转型的背景下,只有打破组织与技术的边界,整合创新要素,促进组织间的学习,建立广泛的地区性协同创新网络,城市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发挥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基于这一背景,本文以社会资本驱动城市创新发展为主题,通过梳理已有文献,依次回应了开篇提出的4个问题,全景展示了既有研究的综合图景。总体来看,学界对城市创新发展的研究相对充足,对社会资本的关注程度亦与日俱增,只不过在将两者整合起来,探讨社会资本对城市创新发展影响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具体而言,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区域与城市研究之间的边界模糊。如前

所述,尽管探讨社会资本对城市创新发展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但讨论前者对区域创新作用机制的文献却并不缺乏。只不过在进一步分析相关研究所使用的概念、数据之后,会发现学者们对区域的界定十分模糊,其用于测度区域创新发展的指标也多为城市数据。从普遍意义上看,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国家当前重点推进的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城市作为区域的基本组成单元,其发展质量才是决定区域整体水平的关键,尤其在中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下,探讨社会资本对城市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优化城市创新系统中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网络连接,往往更具基础性和先导意义。

第二,社会资本与城市创新之间更精细的关联及其发生作用的因果机制研究仍不充足。尽管学界十分关注社会资本对创新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但

相关分析却多为理论上的逻辑推演,并且带有较强的主观判断性,缺乏更为精细的关联及因果机制分析。并且,随着研究层次由微观向宏观过渡,学者们对两者之间作用关系的阐述就会越发模糊,这也同定量研究多集中在微观、中观层次的现象相契合。此外,在城市创新系统研究中,目前还普遍缺乏对企业之外的组织及个人社会资本的关注,如科研机构、政府组织及其构成人员的社会资本对城市创新发展同样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却鲜见对其的分析与实证检验。

第三,对城市社会资本的测量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社会资本尽管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对于其测量问题,学界却始终存在争议。从现有研究来看,越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往往越容易测量,一般通过问卷形式就可实现对网络、信任、规范的操作化。然而,对于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却很难找出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如现有的社会组织数量只能反映出登记在册的正式组织情况,而对于数倍于正式组织的草根组织来说,却无法有效衡量。实际上,研究往往需要着眼于对城市整体层面社会资本的关心,因此如何更有效地测量宏观社会资本仍然需要继续加强相关研究。

总之,社会资本驱动城市创新发展在理论、方法、实践等层面都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和创新空间,今后的相关探讨亦不妨针对上述研究不足进行拓展和深化。

参考文献

- [1] 艾伦·J·斯科特.浮现的世界:21世纪的城市与区域[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7.
- [2] 迈克尔·斯多波,塔纳·奥斯曼,托马斯·凯梅尼,等.城市经济的崛起与衰落——来自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经验教训[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8.
- [3] 胡树华,牟仁艳.创新型城市的概念、构成要素及发展战略[J].经济纵横,2006(8).
- [4] 尤建新,卢超,郑海鳌,等.创新型城市建设模式分析——以上海和深圳为例[J].中国软科学,2011(7).
- [5] Amonarriz C A, Iturrioz C, Narvaiza L, et al.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Creative Social Capital and its Institutionalization [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19(1).
- [6] 李文军,齐建国,等.创新驱动发展:理论、问题与对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7] 代明,殷仪金,戴谢尔.创新理论:1912-2012——纪念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首版100周年[J].经济学动态,2012(4).
- [8] 赵继军,胡兆霞.城市创新系统的结构与演化——基于代理的建模[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1).
- [9] 王永康.论沿海开放城市创新系统建设[J].中国软科学,2002(11).
- [10] 倪鹏飞,白晶,杨旭.城市创新系统的关键因素及其影响机制——基于全球436个城市数据的结构化方程模型[J].中国工业经济,2011(2).
- [11] 丘海雄,谢昕琰.企业技术创新的线性范式与网络范式:基于经济社会学视角[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6).
- [12] 肖冬平,王春秀.社会资本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
- [13] 燕继荣.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14] 燕继荣.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投资——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理论解释[J].天津社会科学,2010(3).
- [15] 李石.解释力:基于社会资本的模式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 [16] 施建刚,唐代中.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区域创新网络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07(5).
- [17] 刘伟.社会资本与区域创新:理论发展、因果机制与政策意蕴[J].中国行政管理,2018(2).
- [18] 王丹阳,张冰,王裕.区域文化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影响机制及对策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6(5).
- [19] 曹琪格,任国良,骆雅丽.区域制度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J].财经科学,2014(1).
- [20] 李海超,陈雪静.社会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5(6).
- [21] 王涛,陈志军.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
- [22] 唐勇.社会资本对创新型产业集群企业持续创新影响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6.
- [23] 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中国社会科学,2000(2).
- [24] 周小虎,陈传明.企业社会资本与持续竞争优势[J].中国工业经济,2004(5).
- [25] 韦影.企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基于吸收能力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7(9).
- [26] 李海超,彭尔霞.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以阿里巴巴为例[J].当代财经,2015(5).
- [27] 焦少飞,张宏涛,张伟.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及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一个述评[J].科技管理研究,2010(6).
- [28] 王勇,周振.论社会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J].技术经济,2006(7).
- [29] 张素平.企业家社会资本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内在机制研究——基于资源获取的视角[D].杭州:浙江大学,2014.

- [30] Kallio A , Harmaakorpi V , Pihkala T .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Social Capital i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he Case of the Lahti Region in Finland[J]. Urban Studies, 2010(2).
- [31] 惠朝旭.企业家社会资本:基于经济社会学基础上的解释范式[J].理论与改革,2004(3).
- [32] 曾婧婧,周丹萍.政府创新投入和城市规模等级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J].城市问题,2019(5).
- [33] 马静,邓宏兵,蔡爱新.中国城市创新产出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来自285个城市面板数据的检验[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7(10).
- [34] 李培楠,赵兰香,万劲波.创新要素对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科学学研究,2014(4).
- [35] 方然.“社会资本”的中国本土化定量测量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36] 赵万掌.社会资本对我国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1.
- [37] 毛良虎,姜莹.社会资本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的影
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7(4).
- [38] 裴成轶.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共同前沿DEA和面板Tobit模型[D].杭州:浙江财经大学,2018.
- [39] 赵雪雁,李文美,等.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J].干旱区地理,2015(2).
- [40] 马茹.社会资本对中国区域创新的影响分析——基于空间知识溢出视角[J].软科学,2017(2).
- [41] 林筠,刘伟,李随成.企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2011(1).
- [42] 王国顺,杨昆.社会资本、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2011(5).
- [43] 陈爽英,井润田,龙小宁,邵云飞.民营企业社会关系资本对研发投资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0(1).
- [44] 吴俊杰,戴勇.企业家社会资本、知识整合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11).

Social Capital Drives Urban Innovation

Li Xuewei Fang Hao

Abstract: Promoting urban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achieve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urba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social capital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in recent years. Focusing on the theme of social capital drives urban innovation, this paper have tried to answer the four questions of “What is innovation in urban development” “What is social capital in urban innovation” “How does social capital play a role in urba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How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urban innovation” by making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literatures.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related research has systematically and empirically tested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capital-driven urban innovation from the macro, meso and micro levels,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more detailed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causal mechanism analysis. It is suggested that relevant research should continue to deepen in terms of theory, methods, and indicator measures.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Innovation; City Innovation System

(责任编辑:齐 双)

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路径研究*

曹允春 刘芳冰 罗雨 赵冰

摘要:临空经济区拥有“空港+口岸+航权+跨境+保税+自贸”等叠加优势,是推动进口和出口、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贸易和产业协调发展的创新示范区,与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思路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临空经济区高质量开放发展要深度对接国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系统部署,抓住自身核心要素,把握要素的作用机理,在强化空港国际枢纽功能、加速国际国内要素集聚和流动、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壮大跨境电子商务、探索建立空港型自由贸易区(港)、聚焦开放型临空产业体系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

关键词:机场;临空经济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开放型临空产业体系

中图分类号:F74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1-0134-11 **收稿日期:**2019-11-20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青年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HEYP5024)。

作者简介:曹允春,男,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天津 300300)。

刘芳冰,女,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研究中心硕士生(天津 300300)。

罗雨,男,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研究中心硕士生(天津 300300)。

赵冰,女,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研究中心讲师,博士(天津 300300)。

习近平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提到,“我们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一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遥相呼应,其目的均为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合作,打造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开放型经济强调把国内经济和整个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尽可能充分地参与国际分工,其最主要特征是要素、商品与服务可以较自由地跨国界流动,从而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和最高经济效率。

临空经济依托机场发展,是快速配置全球优质资源要素最为有效的方式,不仅为区域经济提供了快捷的交通运输方式,更是区域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快速通道,助推企业跨越地理空间界限,最大限

度地利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以及“走出去”开拓全球市场,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2015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国民用航空局联合下发《关于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临空经济区建设应提升开放门户功能,建设富有活力的开放新高地,辐射带动区域发展。在内外因素的共同驱动下临空经济区必然成为区域对外开放的新动能。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实践也证明,以临空经济区为战略支点构建“空中丝绸之路”,能够不断拉近与世界的距离,促使资金、物质、知识、信息、人才等资源要素快速流动,实现从物流合作向枢纽建设、航线拓展、产业培育、金融创新、经贸交流、人文往来等领域全方面突破。因此,在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背景下,临空经济区需要立足自身优势,把握开放新时代的战略机遇,探索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模式,充分发挥临空经济区的比较优势

和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区域对外开放的门户。

一、文献综述

临空经济区是依托机场资源的新兴高端区域发展模式,国内外学者关于临空经济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临空经济区的内涵、发展机制、发展评价、产业特征与布局、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融合发展等方面,对中国临空经济区的建设与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然而,临空经济区作为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的一种新型经济开发区,现有文献对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研究尚属空白,只有对研究区域开放发展的相关内容时,部分文献提到围绕机场建立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区(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还有部分学者研究了和临空经济区密切相关的航空口岸、航权及服务业的开放问题。

目前,与临空经济区相关的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区(港)等的研究已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主要聚焦二者在临空经济区对外开放中的功能定位、发展模式和作用等方面。综合保税区通常被认为是最为开放的发展平台,有利于吸收优质资本、扩大对外贸易(邱焱林,2017),作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自由贸易区是向外界展示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能突破现有开放平台的制度约束,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跃升(屈军等,2018;彭羽等,2018)。近年来,“自贸区+空港”为临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通过建设航空枢纽基础设施、临空产业链、口岸体系、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等实现机场与自贸区的良性互动,促进临空经济区的产业培育和对外贸易,使临空经济区向更高层级迈进(王淑云,2016;张蕾,2018)。相比之下,跨境电商领域的研究较为集中,主要围绕跨境电商如何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以及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临空经济区构建开放型产业体系的促进作用等方面展开。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跨境电商是对外开放的新窗口,提供了一种开放、多维、立体的多边经贸合作模式,促进了多边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企业间的互利共赢(徐松等,2015;韦大宇等,2019)。同时,在临空经济区建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可以实现跨境电商信息流、资金流、物流“三流合一”(任露,2015),推进中国航空物流业开拓市场空间,打造全产业链体系,实现国际优质经济要素聚集,

通过供应链的打造积极融入到全球化的专业分工协作体系中(葛利红,2016)。

对临空经济区内航空口岸和航权的研究集中于对开放型经济的影响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利用航空口岸,将临空经济区发展成物流园区、贸易中心等各种外向型经济活动高度集中的区域,可以站在全球产业发展制高点,助推临空产业链的延伸,促进外向型经济要素高效配置(曾小舟等,2013;王韬钦,2017)。同时,以第五航权开放作为契机,加快机场配套设施建设,打造临空经济区对外开放平台,形成国际重要门户枢纽,能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王伟,2019)。对于临空经济区具体产业对外开放的研究,近几年的焦点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上,服务业扩大开放是将开放型经济和服务业嫁接在一起,即“服务业双向投资+服务业贸易”(贾璇,2019),服务业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改革服务业相关政策、降低服务贸易和投资壁垒以推动服务要素跨国流动的过程(樊瑛,2012)。为促进服务业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有学者认为国家应找准服务贸易的重点部门和领域,尝试扩大开放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促进外商投资企业与中国企业开展研发合作(李连友等,2019),也有学者提出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可以以示范区、示范园区等示范点为依托,探索“产业开放与园区开放相结合”的开放创新模式(贾璇,2019)。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学者缺乏对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对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关键要素的研究也较为缺乏,对各要素的作用机理缺少深入分析,不足以指导临空经济区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伴随着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程的深化,临空经济区已成为地区布局对外开放的重点区域,发展临空经济深度融入国际市场已成为不少城市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因此本文从临空经济区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契合性出发,分析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内涵,梳理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体系框架及关键要素,并提出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推进路径。

二、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内涵

作为一种特殊的区域经济形态,临空经济区的

开放发展符合开放型经济的基本发展特征,作为区域对外开放的“门户”,临空经济区的开放发展也需要从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视角来考量。因此,为了准确界定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内涵,首先必须了解开放型经济的基本特征以及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思路,分析临空经济区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的优势与作用,进而厘清二者的内在逻辑联系,以求准确勾勒出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之要义。

1. 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探索与实践

对开放型经济的理论研究始于西方经济学,亚当·斯密(1776)提出的绝对成本论、大卫·李嘉图(1871)提出的比较成本论、瑞典经济学家赫歇尔与俄林提出的H-O理论(利用生产要素禀赋情况来解释国际分工)等,都证明只有实现经济开放才能够利用自身优势参与到国际贸易分工,体现了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思想,国际投资理论和国际金融理论也为开放型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开放型经济已经是一个规范的概念,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一国或地区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要素、商品与服务可以较自由地跨国界流动,从而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和最高经济效率。

中国学者对开放型经济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分别从参与国际分工、国内经济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联系、生产要素在不同空间上的流动等多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发展开放型经济是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形成内外联通的双向资源要素通道,打造一个既有“引进来”又有“走出去”的开放型经济系统,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利用资源,拓宽发展空间。中国基于理论基础对开放型经济进行了多层面对实践,在不同阶段下通过经济特区——海关特殊监管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等开放平台,不断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力推的一项重大改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通过“优化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大幅放宽市场准入”以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举措,推进范围更大、领域更宽、层次更深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是中国新一轮更高水平开放的重要节点,提出扩大市场开放、完善开放格局、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多边合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五大举措,成为中国进一步探索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

方向。

从中国对开放型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可以总结出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思路:第一,重塑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整合利用全球的人才、技术、资金等高端资源要素,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主导作用,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攀升。第二,主动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坚持多边贸易体制建设,提升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企业通过经贸合作平台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加快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开放,着力提升消费引领力和全球消费资源配置力,融入国际高端商品消费链。第三,培育科技创新前沿阵地。推动创新资源配置、创新服务、创新平台等领域的全球化,激发创新活力,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深入国际高端技术创新链高端环节。第四,建设高标准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有序放宽市场准入,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实现与国际经济和规则融合。第五,拓展开放发展战略空间。打造全面开放格局,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培育内陆地区开放增长极,建设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打造制度型开放载体。

2. 临空经济区与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契合性

基于航空快速运输的优势,利用机场的产业聚集效应,促使资金、物质、知识、信息、人才等高端资源要素向机场周边地区集中,在机场周边形成了航空核心产业、航空关联产业和航空引致产业等航空相关的临空产业集群,这种新兴的区域经济形态称之为临空经济。临空经济区则是以临空经济为基础,以机场及周边地区为发展空间,以临空产业为核心的一种特殊经济园区。临空经济区与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思路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以国际枢纽机场为基础动力的经济区域,临空经济区的资源要素流动具有天然的开放性、国际性、创新性特征。机场和航空运输的网络型组织形态构成了临空经济区经济活动空间联系的基础,以网络化、全方位的航线强化了地区和国际市场的航空联系。借助航空运输的巨大空间辐射能力矫正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时间和空间扭曲,

驱动资源要素、产品等远距离、跨区域流动和全球配置,既可提升企业产品对全球市场的速达性,也可为企业所需各类资源要素的快速集聚与扩散提供实现平台和网络渠道,有效促进了资源要素与产品的流动和配置效率,形成以空港为核心的高端资源要素“流量空间”(如资金流、物质流、知识流、信息流、人才流),使得临空经济区一方面连接全球经济,另一方面连接区域经济,成为全球资源要素流动集聚的核心节点。航空运输外向性和网络性在促进各类资源要素和商品跨区域流动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知识及技术更大范围的溢出。大量高素质人才资源、技术资源以及科技研发机构等在临空经济区迅速增加,使得临空经济区在培育创新活力、创新成果转化、深入国际创新链高端环节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第二,作为机场所在区域资源空间价值的集中表现,临空经济区独特的产业集群成为全球产业链配置的重要一环。临空经济区依托航空运输全球易达性和快捷高效的绝对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聚集了一批具有明显技术偏好、时间偏好和空间偏好的产业,具备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生产效率高、时效性强等特点。这些产业均侧重于对内和对外两个市场,涉及货物、人员、资金和数据跨境流动需求较多的外向型高端产业,例如航空物流、航空保税维修、新一代信息技术、国际转口贸易、跨境电商、离岸研发、数字服务等。这些产业集群的形成并不是众多产业的随机、机械聚集,而是全球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以及供应链本地化、区域化、碎片化的结果,属于高度开放的全球性产业,可以带动相关产业链条快速发展,推动临空经济区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其技术偏好性也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拉动临空经济区的技术升级,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推动产业、产品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成为全球高端产业链配置的重要一环。

第三,作为“临空+自贸”的叠加区域,临空经济区是地区探索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先行区。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都把创新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优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临空经济区建设的重要着力点。纵观国内已有的自由贸易区实施范围,上海浦东临空经济区、北京大兴临空经济区、西安空港新城、成都双流临空经济区、天津空港经济区、昆明空港经济区等临空

经济区的部分重点区域被纳入国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自由贸易区“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政策支撑,临空经济区可以从空港的“边境开放”进一步向“境内开放”拓展、延伸和深化,探索与国际标准经济规则相接轨的基本制度框架和行政管理体系,从而构建制度创新高地,成为区域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制度之源。

3.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内涵

综合以上分析,临空经济区与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契合性主要体现在资源要素聚集能力、全球产业链配置能力以及开放型制度创新能力等方面。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内涵也主要由航空港、流动要素、能动主体、产业体系和体制机制五个方面组成。航空港指机场和服务配套设施,是临空经济区的“边境开放”要素;流动要素主要指“五大流”,包括资金流、物质流(货物和航空器)、知识流、信息流、人才流,在空港的作用下这些要素均带有开放性、国际性和创新性;能动主体是指临空经济区内存在的各个行为主体,包括企业、服务机构、科研机构及地方政府,是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执行者;产业体系是指临空经济区中的相关产业聚集形态,是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对象;体制机制主要指临空经济区的优惠开放政策、合作机制、开放平台、资金扶持、管理体制和人力资源等,是临空经济区的“境内开放”要素。

因此,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内涵可以表述为:临空经济区通过强化以空港为核心的全方位立体化设施网络,提升境内市场与境外地区的联通程度,在势差效应的作用下形成要素流量(资金流、物质流、知识流、信息流、人才流等)的双向循环,使临空经济区成为全球资源要素统筹配置的节点,并在开放合作新机制、新政策、新平台的作用下推动流量产业化,最终形成面向全球集高端制造、国际贸易、投融资和高端服务于一体的开放型临空产业集群,把临空经济区打造成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国际商品消费链和国际高新技术创新链的开放型区域经济系统(见图1)。

三、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系统结构

系统结构是指构成系统的具有一定功能的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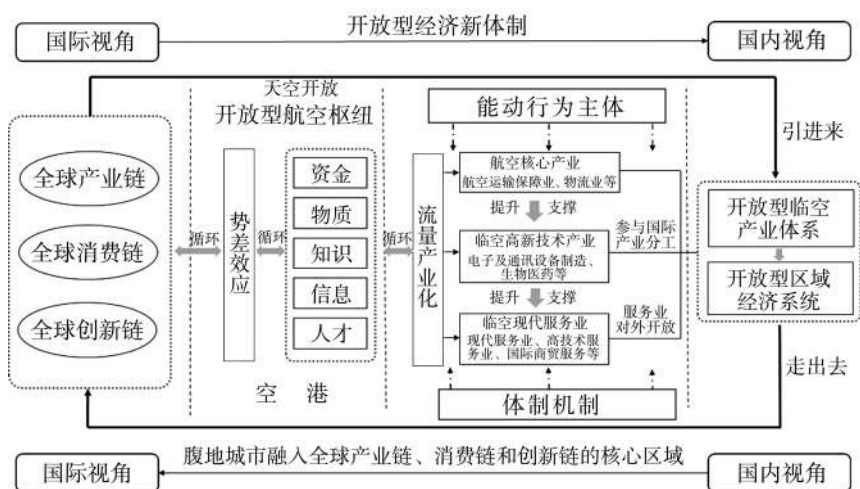


图1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内涵

素(或子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的总称。从临空经济区的发展内涵可以看出,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本质是构建开放型临空产业体系,进而形成开放型区域经济系统,根据各要素在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中的作用,本文把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系统结构分为开放发展条件、开放发展载体、开放发展加速器和开放发展结果4个部分(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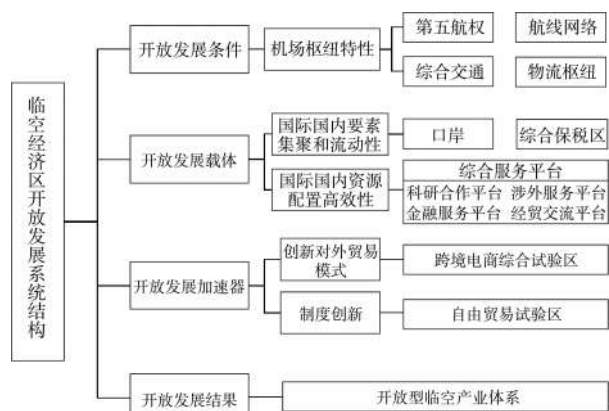


图2 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系统结构

临空经济区的开放发展条件是指机场拥有的枢纽优势,具体表现在第五航权的开放性和航线网络的通达性所带来的资源要素,并通过综合交通和物流枢纽实现高效集散。开放发展载体是实现国际国内资源要素集聚、有序流动、高效配置的平台,通过口岸和综合保税区来实现进出口功能优化,推动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并借助综合服务平台来实现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开放发展加速器是提升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能级的契机,通过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多边贸易平台,创新对外贸易模式,同时借助自由贸易区实现制度创新。开放发展的结果是资源要素在以上三部分有机作用下流量产

业化的最终形态。综上,临空经济区“空港+口岸+航权+跨境+保税+自贸”6大关键要素是其开放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临空经济区构建开放型产业体系,融入全球国际高端产业链、高端产品消费链、高端技术创新链,提升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地位的必然选择。

1. 机场的枢纽特性

在临空经济区AIC系统(空港—产业—空港城)中,机场是临空经济区发展的基础性动力,藉由机场的建设、运营、壮大,才使区域具备了发展临空经济的基础条件。同样,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基础条件就是具有功能布局合理的国际航空枢纽,多元立体的国际航空枢纽是国际国内要素聚集和流动的先导。一个机场的枢纽特性主要体现在网络通达性、运营规模、要素集散能力等方面。

第一,航线网络的全球通达性是机场枢纽特性的关键衡量指标。航线网络的通达性包括较大的国际航线业务规模和国际枢纽机场的通达性,是临空经济区联接世界各国的运输大通道,可以从物理上把国内市场、国际市场有效地衔接在一起,反映了临空经济区可以链接的国际市场范围。从全球枢纽机场的航线网络布局和业务比重来看,伦敦希斯罗、德国法兰克福、荷兰阿姆斯特丹、巴黎戴高乐、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大型国际枢纽机场的国际航线网络规模较大,部分机场的国际航班份额超过80%,具有较高的通达性和开放度。提升机场的全球通达性应以航权开放为重要突破口,开展对外航权谈判,拓展国际航线,尤其是利用好第五航权。第五航权作为最具经济实质意义的航权,可以使航空运输资源最大化地受到市场配置,提高航空运输供给的多元化、便利化,形成更加开放的、良性的航空运输供给市场,将带来更多客流交汇和货运集散,促使机场成为国际航线中转站,对临空经济区外向性流量的导入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要素快速集散能力是机场枢纽特性的集中体现。航空枢纽作为资源要素的集散中心,一方面各种外源性(国际性)资源要素要通过机场进入临空经济区;另一方面临空经济区的资源、半成品、

产成品要从机场分散运往其他地区,强化机场的快速集散能力尤为重要。开放型临空产业体系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要素,众多产业和产品对时间有天然的高度敏感性,如能以最快的速度满足顾客需求,就能获得时间效益,提升综合竞争力。依托航空枢纽和区域综合交通体系,建设辐射区域更广、集聚效应更强、服务功能更优、运行效率更高的综合性空港型物流枢纽,优化全球供应链体系,提供国内国际航空直运、中转、集散等航空物流服务和铁空、公空等联运服务,为集成电路、生鲜产品、商务会展、医药产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提供高效便捷的物流服务,增强服务开放型经济的能力。

2. 国际国内要素聚集和流动能力

机场的枢纽特性为资源要素的聚集和流动提供了交通基础,但在全球要素分工的条件下,开放发展的水平和层次取决于临空经济区能够聚集全球要素的质量和层次,空港口岸开放度和综合保税区是凸显要素高效流动聚集效应的重要抓手,对全球高端要素和创新性要素的吸引和聚集有重要支撑作用,能提高要素聚集的规模、质量和效率。

第一,空港口岸开放度。口岸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其开放度主要体现在口岸的功能结构和通关环境上。航空运输承载的往往都是高附加值货物,而与航空高附加值货物直接相关的就是空港的进口指定口岸,如肉类、水生动物、冰鲜水产品、药品、种苗以及整车、钻石、国际邮件经转等特殊商品进口指定口岸。完善的口岸结构可以提升空港的开放要素集聚效应,推动地区外贸转型升级,如郑州机场已拥有进口水果、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冰鲜肉类、澳洲活牛、国际邮件经转等6个指定口岸,成为国内进口指定口岸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内陆机场。此外,航空物流具有安全、快捷、高效等诸多优势,能否把这些优势变为现实,助推资源要素快速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口岸的通关环境和通关效率。中国口岸通关涉及多个部门,如航空公司、海关、检验检疫、货代等,通关流程环节多、手续复杂,环环相扣,任何环节出错,都可能影响要素流动效率。其中,海关作为同各主体协调配合的核心单位,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创新通关便利化业务,能够解决各相关部门和企业的实际问题,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第二,综合保税区。综合保税区是开放型经济

的重要平台,对发展对外贸易、吸引外商投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体现一个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程度的风向标。临空经济区可以依托航空枢纽“便捷通畅、高效安全”的国际立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使得机场口岸作业区和综合保税区无缝衔接,实现口岸物流和保税物流协同,理论上在机场口岸区和综合保税区只进行一次清关,可以省去货物转关运输流程,缩短货物通关时间。更重要的是,通过保税区独特的政策优势,临空经济区可以利用航空口岸继续深化“边境开放”的发展模式,打造加工制造中心、研发设计中心、物流分拨中心、检测维修中心和销售服务中心等,提升国际高端要素聚集能力,也可以围绕通关便利化、货物进口保税政策、贸易便利化政策等领域展开创新,实现要素的便捷快速流动。

3. 国际国内资源高效配置平台

临空经济区发展开放型经济,需要构筑起与世界全方位、多层次的连通格局,如果说航空枢纽的通达性作为开放的“硬联通”,实现国际国内资源高效配置的开放平台则成为对外开放的“软联通”。例如,以科研合作平台、涉外服务平台、金融服务平台以及经贸交流合作平台等多样化创新性综合服务平台来承载开放发展需求,加快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循环步伐,推进以创新发展提质增效为核心的资源高效率配置模式。

科研合作平台统筹利用国际国内资源,实现全球人才、资金、信息等创新链核心要素高效配置,使临空经济区由被动承接转型为创新驱动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是实现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动力支撑,根据Setterfield提出的路径依赖演化模型,临空经济区被动的承接技术引进模仿形成了“暂时均衡”的状态,需要不断通过内生创新打破这种平衡(见图3)。科研合作平台一方面可以吸引大型国际企业、国际知名院校和科研中心在临空经济区内合作共建实验室和科技合作基地,整合国际科研人才等资源;另一方面能通过知识产权与研发体系本地化来实现技术引入,加速科技成果与国内优质资源的对接落实,将临空经济区打造成为离岸研发的创新基地,支撑高科技产业的聚集,拓展开放发展的产业空间,推进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资源高效率配置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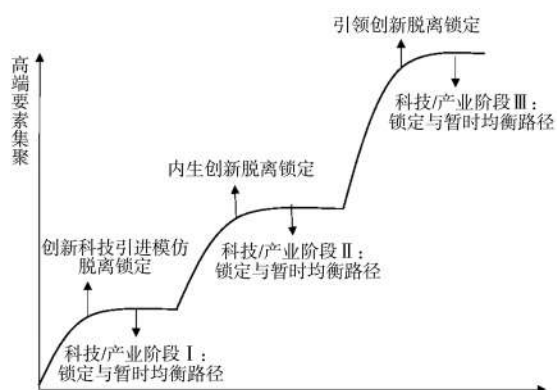


图3 临空经济区创新驱动路径依赖演化模型

涉外服务平台主要对涉外服务资源进行整合配置,为外商提供“一条龙”服务。涉外服务能力是评定临空经济区国际化程度的主要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外开放的水平,近年来中国许多城市纷纷依托自身特色,推进涉外服务模式创新,完善涉外服务机构、创建服务载体和平台。上海专为德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建立了“德国中心”,上海德国中心整合了多项服务,并以此成就了“办事捷径”的理念,被誉为设在中国的“德国之家”。此外,南京的“海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杭州的“欧美中心”,重庆的“涉外商务区”等均依托涉外服务功能的集成,成为当地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临空经济区可以对接涉外服务需求,通过整合集聚各部门涉外服务功能,建设专业程度高、服务层次高、集聚效率高的“国际会客厅”。

金融服务平台通过统筹资金和金融服务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客户需求,助力企业“走出去”。依托全球化网络、综合化平台以及专业化产品优势,为企业定制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整合融资、结算、担保、汇率和利率避险工具等资源优势,为企业国际活动提供高效、便利、集约的金融支持,形成全业务流程的金融服务。临空经济区通过整合境内外市场资源,进一步探索产融结合新形式助力金融服务平台建设,实现产业的深度融合,提升资源配置能级,助力产业开放。

经贸交流平台指为国内外企业提供的经贸、管理、技术交流平台,包括多样化会议论坛和国际会展等。交流合作论坛既能为双方企业、学界、政府的互利合作搭建交流平台,也是统筹各方资源,推进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探讨共同合作做大“蛋糕”的务实举措。定期举办交流合作论坛便于双方构建长期稳定、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建立健全沟通

协调机制,推动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的深化合作、资金融通,促进协调联动发展。国际会展主要聚焦展示、交易商品和服务,交流文化和理念,是国际合作的综合性公共平台。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例,在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区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集国家展、企业展等(服务展示平台)和国际经济论坛(对话平台)于一体,集中展示各国发展成就、营商环境和特色产业,企业也可以展示商品、技术和服务,从而实现“买全球、惠全球”。

4.新型对外贸易平台

在开放型经济中,对外贸易是最直接最重要的载体,它体现为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形成和确立各类进出口商品的市场布局。互联网时代,跨境电商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新动力和新趋势,已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业态模式,是国家或区域外贸创新发展的新亮点、转型升级的新动能。依托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构建一个服务于跨境电子商务的生态系统,是构筑临空经济区跨境电商产业链,创新对外贸易的重要手段。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将重新建立起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多边贸易平台,对于外贸企业来说是一种新型的全球贸易平台,为企业提供多边贸易模式,以供应链的形式带动传统外贸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此外,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建设将推进对外贸易普及化、碎片化发展,使国内消费者参与跨境消费普及率明显提升,引领区域消费,融入国际消费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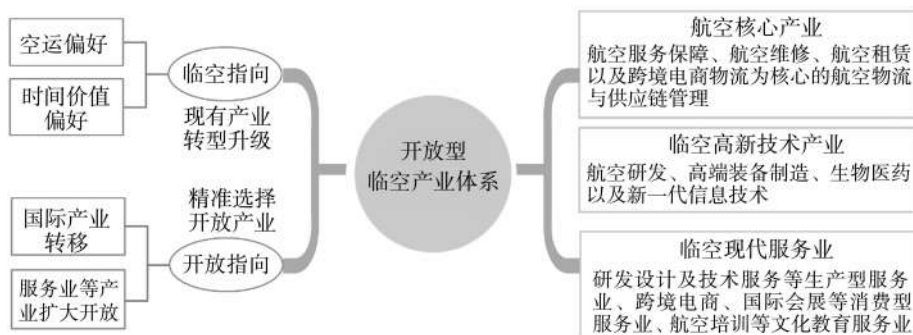
5.开放型体制机制

自由贸易区为临空经济区探索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提供了契机,使临空经济区从传统的“边境开放”向“境内开放”拓展、延伸,将提升临空经济区对外开放能级。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是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的需要。从企业的角度看,跨国公司希望在规则和制度方面和境外市场实现相容,以满足其统筹全球价值链、整合和利用全球要素“无缝对接”的需求升级,从资源要素的角度看,高端和创新型资源要素对制度环境所决定的交易成本等更为敏感,必须依托高标准的开放型制度来吸引高端要素集聚。在2019年新增的6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河北、云南、黑龙江等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方案》均提到需要加强临空经济区与自贸试验区的改革联动、发展联动,其中大兴机场自贸片区将探

索建设高度开放的空港型自由贸易区。从国外临空经济区的发展经验来看,“自由贸易区+临空经济”的发展模式被多数国家采用。世界上典型的空港型自由贸易区爱尔兰香农自由贸易区、新加坡樟宜自由贸易区、迪拜机场自由贸易区、韩国仁川自由贸易区等均在高效便捷的航空物流基础上建成,从而逐步吸引航空关联产业并引导产业入驻到自由贸易区内,使得临空产业利用自由贸易区自由开放的环境、优惠的政策以及制度创新拓宽发展空间。总之,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可以为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带来更大程度的制度创新和贸易便利化政策支持,推动企业利用自由贸易区平台在全球化中参与国际分工并获取竞争优势,扩大临空经济区对外开放程度,实现内外经济联动。

6. 开放型临空产业体系

开放型临空产业体系是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最终表现形式。临空产业在机场附近的集聚是与全球资源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分不开,因此具有高附加值、高航空依赖度以及强外向性的特点。临空经济区的开放发展就是要遵循全球产业分工、聚集理论“分工—贸易—开放—集聚”的逻辑链条,根据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和中国产业开放政策,选择适合对外开放的临空产业,提升产业开放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从而带来外向型产业的聚集,培育面向全球市场、资源全球配置的开放型临空产业体系(见图4)。如1959年成立的——世界上第一个临空经济区爱尔兰香农地区,在自由贸易区和临空经济区的强势带动下,逐步沿着农业经济——加工生产型经济——服务产业型经济——知识型经济的路径发展,实现了从封闭的农业经济到高度开放的知识型经济转变,成功实现了整个地区产业的升级和开放。



第一,航空核心产业集群。由航空运输活动直接带来的航空运输保障业和航空物流业是临空指向性和开放性最强的产业。航空运输保障业的开放发展中,一些位于产业链低端的航空组装、航油供应等产业将逐渐弱化,重点聚焦航空保税维修、航空器材交易、航空租赁等产业。航空物流业是机场货运区货运服务功能完善和产业空间的拓展,具有极高的临空指向性,重点发展跨境电商物流、国际中转物流与航空快递、冷链物流,拓展供应链管理和物流金融等业态。

第二,临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临空科技创新产业已成为临空经济区的核心竞争力,是临空经济区利用外溢的信息、知识及技术等创新资源,不断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嵌入产业链高端环节的重要途径,具体包括航空研发、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新兴产业。如仁川自由经济区松岛新城通过集聚大量高科技研发中心(包括生物医药研发中心、高科技半导体材料研发中心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以科创基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

第三,临空现代服务业集群。机场的可达性和信息要素集聚能力将对知识密集型、信息密集型现代服务业产生强大吸引力,临空经济区应打造成为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高地。从国内临空经济区的产业发展来看,临空型高端服务业可分为生产型服务业、消费型服务业和文化教育服务业。生产型服务业属于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包括研发设计、总部经济、金融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外包服务等技术服务。消费型服务业以对外贸易和对外经贸合作来推进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包括跨境电商、国际会展、健康医疗等,尤其是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可以促进中小微企业参与全球贸易,拓展国际市场,改善

中国企业和产品在国际分工和价值链中的从属地位,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和消费链。文化教育服务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通过文化教育服务业吸引国内外航空教育科研资源,提供专业的教育培训,推进国际科技和文化交流,提升临空经济区的全球高端人才聚集

能力,形成人才势差,从而吸引更多海外高素质创新人才,链接全球创新资源。

四、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推进路径

临空经济区作为地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创新示范区,将极大地提升区域对外开放能级。根据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内涵和系统结构,各地临空经济区管理机构应强化顶层设计,结合区域资源禀赋,有序完善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要素系统。

1.完善国际航线网络,建设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第一,以连接全球重要枢纽机场为重点,完善通航点布局;争取第五航权开放试点,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航空公司开辟航线;政策上引导国外航空公司执飞国际航线,推进空中互联互通,形成覆盖全球的国际客货运航线网络;加强空域协调和空管协作,提高空域资源使用效率。第二,以国际化立体综合交通枢纽为特色,以完善航空物流生态系统为核心,以国际要素的大聚集、大流通、大交易为目标,以空港物流基础设施、多式联运体系、智慧空港物流等为关键配置点,建设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支持国际航空货代企业在临空经济区设立分支机构,培育基地货运航空公司,与国际主要枢纽机场合作,成立机场货运联盟;着力解决多式联运阻碍,围绕机场加快建设便捷顺畅的空铁、陆空联运设施,打造一体化多式联运信息共享平台,强化国际枢纽功能。

2.强化口岸和综合保税区建设,加速国际国内要素集聚和流动

第一,扩大口岸竞争优势,根据需要申建肉类、生鲜水果、药品、汽车整车、邮政国际邮件经转等功能性口岸,不断完善口岸结构;提升口岸服务功能和效率,加快与国际口岸运营体系标准和运作模式对接,提高口岸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提升口岸物流效率。第二,加强空港型综合保税区建设,紧紧围绕国际航空枢纽和临空经济区产业特征,丰富拓展综合保税区业务类型,在发展保税物流、保税仓储、保税加工、保税商展等基础上,挖掘综合保税区“免证、免税、保税”的政策优势,打造临空特色鲜明、监管创新、功能完备的综合保税区。第三,提升人员和货物流动便利化程度,利用好免签政策的同

时,在临空经济区设立签证服务平台,为区内人员来往量身打造签证便捷服务,完善签证制度,在政策和制度层面保证人员来往便利化;以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为牵引,加快货物通关制度改革。

3.建设四大服务平台,全面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率

第一,探索开放式离岸创新平台,建立离岸创新新机制,着力提升对全球创新资源的整合利用能力。支持跨国公司在临空经济区设立研发分支机构、实验室,加速聚集国际研发中心和高端人才,创新国际科技合作机制;探索国际科技和创新合作的新机制,创新海外预孵化、到岸再孵化、加速器产业化等推进措施,形成精准高效对接海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新模式;促进离岸创新科技成果转化,通过临空经济区促进国际科技成果与国内、业内专业资源对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水平;完善创新人才引进机制,建立人才引进柔性机制,完善外籍人员管理制度,设立签证绿色通道,以强大人才优势提升临空经济区开放发展的核心优势。

第二,完善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搭建企业“走出去”的最佳桥梁,在临空经济区建设投融资基础设施,在产业项目合作中形成“贸易+产能+金融”的全方位、多领域、立体化合作格局;通过积极引入跨境金融服务机构,实现产融结合、境内外联动、区内外联动、本外币联动,利用跨境融资、跨境并购、跨境资产转让、外币资金池等创新产品,在支付结算、投融资、资管、资金、跨境交易等方面为外向型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第三,搭建国际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平台。以扩大经贸投资为重点,深化人文交流为纽带,与亚太经济圈、欧洲经济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合作备忘录;以贸易投资洽谈会、经济合作论坛、全球招商推介会等形式确定双方定期沟通机制,并根据企业需求举行金融推介会、电子商务推介会、旅游文化推介会等,为合作双方政、企、学界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在经贸沟通的同时,完善文化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机制,多形式助推国际文化交流,搭建文化展示交流平台,办好临空文化会展、博览会等品牌文化活动,深化文化交流。

第四,完善涉外服务能力,以涉外服务综合体为平台,将外事签证服务中心、文化教育旅游中心、外事服务中心、涉外生活服务中心等功能聚集起来,重点培育服务于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的会计、

审计、信贷、法务、保险、信息、监管等领域的知识型营商服务机构,为企业和人员提供“一站式”国际化服务,满足临空经济区高端产业的国际化需求。

4.壮大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对外贸易模式

依托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创新对外贸易模式,全面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业务,打造临空经济区开放型多边贸易市场。在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上“率先起跑”,聚焦“网上丝绸之路”建设。通过积极引进国际知名品牌商、电商平台企业和物流集成商,双向设立国际商品展示交易中心、海外仓,建设双向跨境贸易平台和电商综合运营中心,积极承办跨境电商全球会议,拓展跨境电商多渠道运营模式。创新“互联网+全渠道”的业态模式,紧抓跨境电商贸易和跨境电商物流两个体系,构建跨境电子商务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圈,积极推进跨境电子商务领域关检融合。申建跨境电商特种商品进口服务试点(如进口药品监管服务试点等),复制推广“1210保税模式”,致力于解决税收、结汇、征信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参与制定跨境电商国际贸易和规则体系,推动跨境电子商务模式和标准体系向国外延伸,规划建设中外跨境电商综合产业园,形成生产制造、平台营销、金融信保、仓储物流、综合服务为一体的跨境电商生态圈。

5.探索建立空港型自由贸易区(港),打造对外开放制度高地

自由贸易区是中国推进对外开放的新途径以及“新名片”,自由贸易区与临空经济共有的全球化和外向性特征使得两者具备联动发展的基础。要积极争取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建立相应的容错机制,大胆试验,打造具有空港特色的内陆自贸开放高地。对于未批复自由贸易区的临空经济区,要增强同自由贸易区在制度、功能、产业、平台方面的联动发展,积极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功经验,加快制定《临空经济区产业准入和注册登记的指导意见》,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完善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对于已批复自由贸易区的临空经济区,要抓住契机,突出“临空+自贸”特色,探索空港型自由贸易区(港)发展新模式,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制定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建立同国际投资和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打

造国际标准的营商环境和公平高效的市场环境。

6.聚焦开放型临空产业体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

第一,加大企业市场开拓力度,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推进“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鼓励临空经济区内企业深耕亚洲、东盟和欧盟等传统市场,并大力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美洲、非洲等新兴市场,找准关键领域,积极“走出去”,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构建与韩国仁川自由经济区、新加坡临空经济区、迪拜临空经济区等“一带一路”沿线临空经济区的全面合作平台和机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尤其是民航科技产业合作,从构建跨国产业链的视角规划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园区,为临空经济区企业“走出去”打造国际产能合作海外承接平台。

第二,推动航空制造及保障业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开放合作,取消飞机行业外资限制,引进航空发动机总装、机载系统和关键零部件等外资项目;建设面向全球的飞机维修基地,引入外商设立独资飞机维修企业,在保税中心、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开展保税维修业务,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海关特殊监管区探索开展“两头在外”的航空器材包修转包流转试点,大力支持飞机维修企业承揽境外航空器材包修转包修理业务;也可根据企业需求打造航空器材展示交易中心,加快推广航空器材共享保税试点。

第三,深入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依托临空经济区的国际门户枢纽作用,把握世界经济服务化大趋势,围绕国际会议会展、国际贸易、教育、健康医疗、休闲娱乐等领域,实施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的服务业对外开放。如在国际教育服务方面,吸引国内外航空科教资源,发展国际教育服务,建设航空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在医疗健康方面,有序引进国际优质医疗服务资源,鼓励引导境外资本参与临空经济区医疗服务供给和运营,在临空经济区设立合资医院、康复医疗中心、重症疗养中心、售后服务中心等,同时依托空港全球可达性的优势,探索建立外国人来华就医制度等。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EB/OL】. http://www.xinhuanet.com/2019-11/05/c_1125194405.html.

- [2]曹允春.临空经济区:空中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J].区域经济评论,2015(5).
- [3]邱焱林.充分利用武汉新港综保区新平台 打造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J].港口经济,2017(5).
- [4]屈军,刘军岭.我国自贸港区建设路径研究:国际经验与启示[J].海南金融,2018(4).
- [5]彭羽,沈玉良.全面开放新格局下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目标模式[J].亚太经济,2018(3).
- [6]王淑云.空港型自由贸易区建设及金融发展的经验与启示[J].青海金融,2016(12).
- [7]张蕾.世界临空型自由贸易区发展模式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18,27(6).
- [8]徐松,张艳艳.应将跨境电商建成“中国制造”出口的新通道[J].经济纵横,2015(2).
- [9]韦大宇,张建民.中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成果与展望[J].国际贸易,2019(7).
- [10]任露.跨境电子商务对临空经济区的影响分析[J].企业导报,2015(22).
- [11]葛利红.跨境电商环境下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的研究[D].南昌航空大学,2016.
- [12]关勇军,瞿旻.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研发投入预算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6).
- [13]曹允春,何仕奇,赵冰.临空经济区“港—产—城”一体化发展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16(4).
- [14]杨娟,王芳,王巍.天府国际机场大通关体系规划方案研究[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9,41(1).
- [15]SETTERFIELD M. Rapid Growth and Relative Decline Modeling Macroeconomic Dynamics with Hysteresis [M]. London:Macmillan, 1996.
- [16]卜海.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研究——基于东部地区对外贸易的视角[C]//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研究报告(2014)11.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2015,10.
- [17]赵冰,曹允春.基于产业转移的临空产业选择研究[J].商业研究,2013(2).
- [18]金真,许刚,张砺文.空中丝绸之路与跨境电商发展新机遇——“第三届中国国际航空物流发展大会2018”综述[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8,36(4).
- [19]KASARDA J D. From Airport City to Aerotropolis [J]. Airport World,2001,6 (4).
- [20]DAVID G. Developing Measures of Airport Productivity and Performance: An Application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Transport Research, 1997,33(4).
- [21]曹允春.临空经济演进的动力机制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9(5).
- [22]曹允春.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临空经济形成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9 (2).

Ope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Airport Economic Zone

Cao Yunchun Liu Fangbing Luo Yu Zhao Bing

Abstract: With the superposition advantages of airport, port, navigation right, cross border e-commerce, as well as bonded zone and free trade zone, the airport economic zone is a an innovative demonstration zone to promote import and export, commodity and service trade, b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which highly coincides with the basic idea of the new system for an open economy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open economic system, it should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within core element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opening-up of airport economic zone. Furthermore, effectiv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orderly to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hub function, accelerate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lement agglomeration and flow, as well improve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resources, focusing on boosting cross-border e-commerce, developing airport Free Trade Zone (port) and promoting the open airport industry system.

Key Words: Airport; Airport Economic Zone; the New System for an Open Economy; Open Airport Industry System

(责任编辑:平 萍)

【区域开放与合作】

航空航天产业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机理与路径研究

李艳华 严丹

摘要:在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尤为重要。航空航天产业作为高科技产业的高端代表,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效应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我国主要地区的数据实证研究体现了航空航天产业在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显著效果。为充分发挥航空航天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作用,需要从开放式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点线面产业整体推动、高技术集群治理、航空军民融合及商业化等几个方面着力推进。

关键词:航空航天;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机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F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1-0145-08 **收稿日期:**2019-09-15

作者简介:李艳华,女,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天津 300300)。

严丹,女,中国民航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生(天津 300300)。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演进的能力高低决定了经济发展质量的优劣,经济结构优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经济结构优化的实现又离不开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产业的高级化。

区域作为产业的空间载体,作为一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单元,在国家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背景下,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自然会突出表现出来,起到示范引领作用。那么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哪些方面体现和衡量呢?李佐军(2018)认为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可基于主体的角度从创新型经济主体和具有竞争力经济主体的比重、中高端产业或高附加值产业的比重、本地

市场规模和本地产品进入外部市场的规模等方面衡量。促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要促进区域创新型经济主体的增加,促进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发展,加快中高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

随着我国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国产大飞机C919成功首飞,航空航天产业凸显其重要的军事、政治和国家战略价值,并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航空航天产业作为高科技产业的高端代表,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技术、资本、人才、规模、层次、军民融合、产业链、产业关联等多方面高端特征,从已有文献来看,航空航天产业已经成为很多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型战略型产业,并且站在技术创新的制高点上,其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目前从理论上说明航空航天产业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机理的研究较少,如何提升、路径怎么样,还分析得不够。揭示这一机理,指出发展路径,对于找准航空航天产业引领区域产业升

级的着力点,充分发挥航空航天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作用,有一定帮助和参考。本文深入分析了航空航天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中所起的作用,并提出了航空航天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路径和机理模型。利用近年的航空航天产业数据对全国各主要省份航空航天业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现状进行分析,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二、航空航天产业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机理

在产业经济学看来,每个产业都会对经济增长形成或大或小的直接贡献,这种直接贡献可以反映为一个产业的产出对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直接贡献。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影响又可采取不同的统计方法来加以确认;从现代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看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来自资本积累、劳动力增长和技术进步。本文在吸纳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航空航天产业特征,切中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通过机理分析,提出航空航天产业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机理模型。

1. 机理分析

第一,通过技术效应提升。技术先导带动区域研发能力提升。航空航天业是一个多学科、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领域,集电子、机械、光学、材料、信息、生物学、激光学和管理学于一体。众多顶尖制造技术水平一般首先应用于航空航天产业,而后向各领域扩散。航空航天设备零件的主要结构特征是薄壁结构、强度高、形状复杂且要求成形精确,这就要求在新型复合材料的应用和成形加工方面取得一定突破。此外,飞机和各种航空器的制造涉及的零部件数量多且尺寸大小不一,差别较大,工作量大且精度要求高,装配较为复杂,这就需要一种自动化程度高、精度高、灵活通用的装配新模式。这种高要求使得航空航天产业一直站在人类科技的制高点,催生了很多首创技术和首创产品,引领其他产业的技术发展,具有技术先导性和技术引领作用。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就是以要素投入为主更多地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上来,并且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因此,航空航天技术先导带动区域研发能力提升就是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同时,因为具有技术先导性,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过程始终都需要大量的高端技术人才、科研装备和科研投入。而正是这些方面的巨大需求,往往会促进其所在区域的高新技术研发能力迅速提升。

技术转化促进区域装备制造业发展。航空航天产业是典型的军民融合产业。最先兴起于军事领域,随后不断成长和成熟,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技术逐步军转民用,发挥其更大的社会功能。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既包含功能的转化,也包含技术的转化。确切地说,技术转化在促进整个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航空航天产业已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包括设计研发、整机及零部件制造、维修服务、航空航天物流、人才培养、会展博览等,是钢铁产业、铝业、钛合金、化工材料、复合材料、数控机床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等高新技术的集合。一直以来,飞机制造业就以其强大的产业扩散效应而被誉为“世界工业之花”。它覆盖了机械、电子、材料、冶金、仪器仪表、化工等几乎所有的工业门类,涉及空气动力学、人机工程学、系统工程学、项目管理等数百种学科,很多新型材料和电子产品技术通过技术转化被引入其他制造行业,促进了很多产品的功能、技术和品质的跨越性升级,甚至催生了大量的新产品和新技术,为区域制造业带来了转型和升级,促进了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质量。

技术扩散带动周边产业发展。航空航天产业的技术广泛性使得其技术创新不会局限于某个领域,而是横跨很多领域。航空航天技术在高铁、汽车等交通部门地面设备产品和复合材料、机械、发动机等非航产品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20世纪,航空方面重大发明创造,如雷达、喷气发动机等都广泛用于其他领域。跨领域合作催生了这种跨领域的技术应用和创新,众多技术就会通过人员流动和技术流动等方式进入其他行业,进而推动技术的分解再融合,促进周边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日本曾作过一次500余项技术扩散案例分析,发现60%的技术源于航空工业。

第二,通过产业结构效应提升。根据产业结构升级理论,航空航天产业对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主要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方面来分析。

产业结构合理化。航空航天产业作为高端制

造产业,其上游有材料制造产业、电子产业等一系列为其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和电子技术的产业,在下游,有一系列与运输、通信、旅游和娱乐产业密切相关的拓展产业,实际上包含了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由于其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技术结合能力,航空航天产业可以通过横向拓展、纵向拓展以及综合拓展来增加产业链的长度、宽度和厚度,带动自身及相关产业向前发展。区域航空航天产业链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地方航空航天企业数量和就业人数的增加以及区域高技术产业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并且因为其高科技、高资本密集而形成了航空航天维修、航空航天物流、航空航天会展以及航空租赁、航空保险、航空培训等上下游生产性服务业,从而通过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实现区域产业结构的转换与升级,使区域的高科技产业占比和现代服务业占比提高,促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

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高度化是资源配置不断优化过程,也是产业技术水平、产业规模、产业效益等各个因素全面提升的过程。首先,航空航天产业本身就是一个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其次,技术密集性、知识密集性、人才密集性、国家战略性等一系列产业特质使得航空航天产业能够吸引很多外部高端人才、技术、资本的流入和政策的偏向。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所带来的高级人才和顶尖技术,不仅能够促进本产业的技术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同时还能通过技术转移、技术扩散等利用相关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技术水平、产业规模和产业效益等方面改善传统产业,从而提高整个地区产业结构的档次,这也是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方面。

第三,通过经济效应提升。航空航天产业所具有的出口导向性、高投入产出比和较高的产品附加值等特点使其能够从出口贸易、产值贡献和税收贡献三个维度直接贡献于区域经济的GDP、出口贸易额度和政府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带来经济总产出的增加,进而以此为支点,刺激、撬动区域经济发展。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的长短不同和投资建设周期不同,航空航天产业对于区域经济的直接贡献也可以分为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所谓短期效应,主要是一些生产周期较短的小件航材和器件的生产企业,它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投产,较快地

产生经济效益,贡献于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长期效应则是由那些整机或整件生产企业带来的。由于设备复杂,占地面积大,生产工序冗长,所以需要很长的建设周期和生产周期后才能实现成本回收和盈利。据牛津研究院有关航空业发展促进数据显示:全球每年航空运输业可直接提供550万个就业机会,并创造4250亿美元的国民收入。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民用飞机销售额每增长1%,GDP就增长0.74%。另有研究表明,向航空工业每投入1万美元,10年后就可以产生50万—80万美元的收益。美国航空工业产品的销售在贸易净进出口方面做出了显著的积极贡献,并带动了产业聚集地西雅图的区域经济发展。法国的图卢兹、巴西的坎普斯更是由于航空产业的聚集提升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竞争力,成为国家的“竞争力极点”地区,实现了规模经济和品牌效应。

2. 三大效应耦合提升的机理模型

根据以上分析,航空航天产业主要通过技术、产业结构和经济三种效应密集作用于区域经济,从而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同时,这三种效应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相互作用、彼此联系、耦合发展、螺旋推进,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进而改变整个区域的经济大环境,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其机理模型如图1所示。

科技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决定性因素。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使了生产要素从低效生产部门向高效生产部门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创新资源的空间重置又对技术创新的产出产生影响,从而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技术创新之间是螺旋上升的关系。经济效应可以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补助等多种方式反作用于航空航天产业,促进集群内技术水平和产业集聚质量的提升,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二者共同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三者之间耦合促进,螺旋上升,形成巨大的效应合力,从而形成规模经济,形成成本和产量的匹配优势,形成对其他地区进入航空航天产业的进入壁垒,形成区域产业的品牌效应。同时,这种合力通过各层级元素的不断扩大,形成波纹效应,增强区域产业话语权和产业对外影响力,带来政策倾向和国家支持,进而促进该地区航空航天产业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的提升。这些元素恰恰是带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因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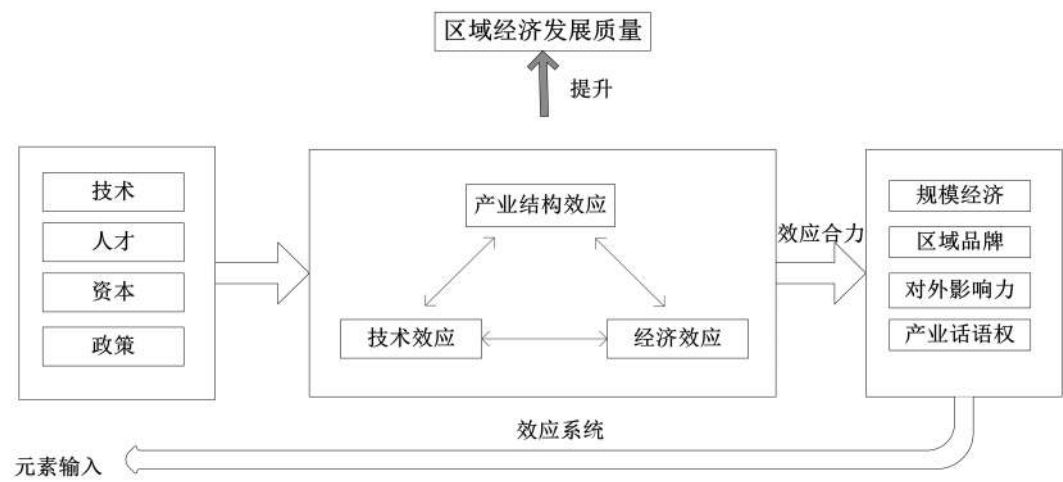


图1 航空航天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机理模型

反过来又促使区域经济的高端要素聚集,使得地区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区域技术水平得以升级,从而提升地区经济发展质量。

三、全国主要省份航空航天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航空航天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可以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全国主要省份航空航天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程度的现状进行分析。

1. 指标选取

根据以上机理分析,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上下游关联产业数据统计部分缺失,为了更有比较性,选取了以下8个关键要素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航空航天产业拉动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指标

准则层	序号	指标层
总体带动效应	X ₁	航空航天企业利润总额(亿元)
	X ₂	航空航天产业总资产(亿元)
	X ₃	航空航天企业个数(个)
	X ₄	航空航天产业就业人数(人)
局部带动效应	X ₅	航空航天产业研发机构数(个)
	X ₆	航空航天产业R&D人员数(人)
	X ₇	航空航天企业专利申请数(项)
	X ₈	航空航天产业发明专利数(项)

2. 样本的选择及数据的收集

本文选取了2016年全国24个省份,包括北京、天津、陕西省等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良好的省份作为样本,剔除了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等发展成果

不显著的省份,避免0值对于实证研究结果的影响。所有数据均来源于《2017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采用SPSS21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在规定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下提取主成分,分析航空航天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3. 影响因子的处理

由于各标量度量尺度不统一,首先进行标准化处理。经过数据检验(如表2所示),KMO值=0.669>0.5, Bartlett球形检验 P=0.00<0.05,这意味着原始数据是相关的,检验通过,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

表2 KMO和Bartlett的检验结果

KMO和Bartlett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Kaiser-Meyer-Olkin度量	0.669
近似卡方	258.930
df	28
Sig.	0.000

经过计算,本文提取了航空航天产业对于经济发展的因子的3个主成分(如表3所示)。3个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92.679%>85%,表明这3个主成分代替原指标的可靠性为92.679%,能够较为完整地提取指标数据的信息。

经过正交旋转,得到旋转成分矩阵,与3个主成分的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如表4所示,其反映的是每个特征值具体的载荷量。

通过横向比较初始因子在各主成分中载荷的大小,提取了每个主成分所包含的原始变量,可以将8个指标明显地分为3组(如表5所示)。

第一个主成分贡献率达到68.693%,其中航空

表3 解释的总方差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百分比 (%)	累积(%)	合计	方差的百分比 (%)	累积(%)	合计	方差的百分比 (%)	累积(%)
1	5.495	68.693	68.693	5.495	68.693	68.693	3.433	42.907	42.907
2	0.990	12.378	81.072	0.990	12.378	81.072	1.995	24.940	67.847
3	0.929	11.607	92.679	0.929	11.607	92.679	1.987	24.832	92.679
4	0.442	5.522	98.201						
5	0.059	0.736	98.937						
6	0.052	0.653	99.590						
7	0.021	0.261	99.851						
8	0.012	0.149	100.000						

航天企业个数、航空航天就业人数、航空航天研发机构数、航空航天R&D人员数在因子1上具有较高的载荷。航空航天企业数量和就业人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地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而航空航天研发机构数和R&D人员数量的增加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投入产出比，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而使区域产业结构更加高度化。所以我们将第一个主成分对应于产业结构效应。

表4 旋转成分矩阵

	成分1	成分2	成分3
航空航天企业利润总额(亿元)	0.142	0.937	0.257
航空航天产业总资产(亿元)	0.481	0.825	0.167
航空航天企业个数(个)	0.869	0.396	0.212
航空航天产业就业人数(人)	0.826	0.367	0.316
航空航天产业研发机构数(个)	0.862	0.178	0.158
航空航天产业R&D人员数(人)	0.863	0.095	0.405
航空航天企业专利申请数(项)	0.194	0.217	0.937
航空航天产业发明专利数(项)	0.468	0.242	0.825

说明：提取方法：主成分；旋转法：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在 5 次迭代后收敛。

第二个主成分贡献率为 12.378%，航空航天企业利润总额、航空航天产业总资产在因子 2 上具有较高的载荷，集中体现为航空航天产业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带动效应，对应于直接经济效应。

第三个主成分贡献率为 11.607%，航空航天企业专利申请数、航空航天产业发明专利数两个指标在因子 3 的载荷较高，集中体现为航空航天产业的技术提升作用，对应于技术创新效应。

4.全国主要省份航空航天业对区域经济的影
响程度

通过 SPSS 软件操作的结果，我们可以计算出每个省份的综合得分并进行排名(如表 6 所示)。

从表 6 可以看出，综合得分最高的是陕西，广东、天津、四川和北京则紧跟其后。而广西、山西、云南则排名靠后。综合排名与 F1 排名较为一致，这是因为 F1 所代表的产业结构效应贡献率较大。就实际情况而言，陕西是军工大省，也是航空航天产业大省，发展航空航天产业的时间相对较长。此外，陕西拥有全国四分之一的航空专业人才，并且作为我国大中型飞机设计、研发、试飞、生产的重要基地，拥有

表5 主成分结果分析

序号	因素变量	主成分1 产业结构效应	主成分2 直接经济效应	主成分3 技术创新效应	共同性
X1	航空航天企业利润总额(亿元)	-0.264	0.686	-0.018	0.963
X2	航空航天产业总资产(亿元)	0.011	0.516	-0.179	0.939
X3	航空航天企业个数(个)	0.315	0.041	-0.171	0.957
X4	航空航天产业就业人数(人)	0.266	-0.007	-0.061	0.917
X5	航空航天产业研发机构数(个)	0.389	-0.127	0.170	0.799
X6	航空航天R&D人员数(人)	-0.336	-0.249	0.062	0.918
X7	航空航天企业专利申请数(项)	-0.244	-0.071	0.708	0.962
X8	航空航天产业发明专利数(项)	-0.061	0.103	-0.520	0.960
	特征值	5.495	0.990	0.929	
	解释变量量(%)	68.693	12.378	11.607	
	累计贡献率(%)	68.693	81.072	92.679	

大量航空产业资源，其航空产业总量、航空科技创新能力均为国内翘楚。所以，其航空航天产业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具有较为显著的提升作用。表 6 中陕西的直接经济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得分为负

值，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省份的直接经济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均处于正负临界值 0 点上下，且大部分处于 -1 和 1 之间，这是因为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的产业结构效应较为

表6 全国主要省份航空航天产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程度排名

省份	产业结构效应F1	直接经济效应F2	技术创新效应F3	综合得分F	排名
陕西	18.19182	-1.45133	-0.60674	13.21392	1
广东	5.255489	1.529901	3.161559	4.49559	2
天津	5.181051	3.95648	-1.53109	4.177087	3
四川	5.342349	-0.00816	-0.50773	3.89509	4
北京	4.144185	0.126527	-0.05702	3.081436	5
辽宁	4.033684	-0.82065	0.293576	2.916883	6
江苏	4.197261	-0.75678	-1.66587	2.801337	7
贵州	3.578005	-0.72341	0.555356	2.624901	8
河南	1.186639	-0.01769	0.80009	0.977345	9
上海	0.236455	0.186759	0.063239	0.208129	10
黑龙江	-0.94605	-0.34235	1.534509	-0.55483	11
湖北	-1.16926	-0.00663	0.177004	-0.84538	12
湖南	-1.90532	-0.08038	0.120008	-1.40794	13
河北	-3.1805	-0.30316	-0.18196	-2.42067	14
江西	-3.31099	-0.43256	0.024653	-2.50881	15
山东	-3.51889	-0.29715	-0.26191	-2.68069	16
安徽	-3.89951	-0.20123	-0.3413	-2.95993	17
福建	-4.18553	0.14704	-0.39456	-3.13207	18
浙江	-4.13852	-0.27842	-0.30673	-3.14307	19
甘肃	-4.88599	0.006034	-0.21593	-3.64773	20
重庆	-4.94271	-0.06936	-0.16773	-3.69381	21
广西	-5.05831	-0.02436	-0.17713	-3.77465	22
山西	-5.05522	-0.08397	-0.16259	-3.7785	23
云南	-5.1501	-0.05515	-0.15171	-3.84362	24

直接,由于航空产业生产周期和研发周期较长,前期生产和研发投入大,收益低,创新成果少,直接影响其直接经济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虽然,广东的大型航空产业经济园区主要是珠海航空产业园,但是已经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航空产业)示范基地。截至2017年年末,园区累计引进航空类项目超70个,并与广东省科学院合作成立了航空航天装备研究所,自主研发能力较强。园区内的龙头企业中航通飞公司研制了全球最大水陆两栖飞机,并于2017年12月24日首飞成功,这是与C919大型客机和运-20大型运输机并列的“国家三个大飞机工程”之一,因此广东航空航天产业整体的技术效应较强。天津滨海新区航空产业集群由于空客A320总装线、中航直升机和彩虹无人机等项目入驻使得其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迅速,直接、间接地带动天津经济发展。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则坐落于上海,拥有国产客机C919总装生产线,目前C919已经有24个公司的800架订单,产业前景非常可观。而四川、辽宁、贵州和黑龙江分别拥有大型国有军工企业成都飞机工业有限公司、中航沈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和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这些大型企业和集团的入驻推动了区域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并进一步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排名靠后的甘肃、广西、山西、云南几乎所有得分均为负值,航空航天核心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作用较弱,提升空间巨大。

四、航空航天产业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路径建议

根据实证分析,航空航天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有一定促进作用,尤其是陕西、广东、天津、四川等地,航空航天核心产业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同时也可以看到,综合得分为负值的也很多,航空航天在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方面还有一定的空间。

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航空产业园区共有84个,以航空制造业为主导的制造型园区占据主流,共计44个,占全部园区数量的52.38%;但总体情况如上面实证结果,技术创新效应弱,航空核心技术和专利水平低,几乎每个地区航空产业都规划为全产业链,并规划宏大的经济规模,和短期内可观的经济产值,缺乏投入和培育周期的基本规划。一些地方盲目攀比,无底线招商,给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国际输出项目留下了可乘之机,非常不利于航空航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攻关。航空航天器的关键基础材料零部件缺少,无法形成有竞争力的高端产品和系统设备,关键技术“卡脖子”,“缺芯”“少核”难发展,军工航空项目和民用航空需求难以形成合力,一些地区乐于招商,只顾产值,荒于内功,缺乏搭建管用的创新平台,导致产业基础薄弱。区域经

特有规律创新发展路径。

1. 构建开放式区域创新体系

航空航天业作为一个高端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要更好地发展技术先导作用,带动区域研发能力提升,通过技术转化促进区域装备制造业发展,并通过技术扩散带动周边产业发展,不是短时期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单靠几个企业就可以实现的,需要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来支撑技术效应的传递。创新体系需要创新环境、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合作机制。综合来看:(1)政府在体系中对航空航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起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政府要建设良好的人才流动平台和流动机制,推动人才横向流动,促进以人为载体的技术和知识等创新资源的流动。此外,政府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创新主体的利益,规范创新行为,制定激励措施,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不缺位不越位,确保在宏观指导基础上企业是创新的主体。(2)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要在研发的上下游与高校、科研机构密切合作;高校和科研机构处于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上游,是产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智力资源提供者,要通过与企业的合作,推动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实现技术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和产业化。(3)着力建设金融机构、律师机构、孵化器等中介部门和社会组织。加拿大蒙特利尔成为世界航空城市中亮丽的名片也和该区域拥有4所知名航空航天类大学及国际民航组织(ICAO)、国际空运协会(IATA)、航空公司电信和信息服务(SITA)等社会组织密切相关。(4)加强创新系统的开放性建设。由于航空航天产业是国内外模块化分工合作,一个完整的航空航天产品往往需要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国家参与研发与制造。区域创新系统一定要容易对接国际优质资源,打造系统的开放性。在实践中更需要关注的是对内开放,在国内侧重打造本地区的优势航空航天产业链环节,错位发展,互补配合,不盲目追求单个地区的航空航天“全产业链”,从而形成各地区具有自主技术优势的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合力,形成更大区域的“拳头”,这也是当今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背景下增强航空航天产业核心技术发展的关键。

2. 推动点线面产业整体发展

航空航天产业要实现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高端化带动,并实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从

整个国家层面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核心技术必须要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近年来,我国部署了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并且已经部署的项目和新部署的项目要形成梯次接续的系统布局,从而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协同攻关,为攀登战略制高点、提高我国综合竞争力作出重要战略布局。航空发动机被作为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是很有战略意义的实现“点的突破”的战略布局。作为地区经济而言,培养发展诸如中航动力、中航动控和航天科技等航空航天龙头企业,利用龙头企业发展壮大而形成的产业磁力,能够完善企业上下游配套,形成航空航天产业线的延伸。当然,航空航天产业链很长,线的延伸不必在一个地域形成。在拉长产业链的同时逐渐形成产业宽度和产业厚度,通过点线面整体推进,深度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从而不断打造中国的航空航天竞争力极点地区。

3. 增强高技术集群治理能力

航空航天产业属于科技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正确处理其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的关系,合理设计投资要素的利益分配和创新要素的利益分配,对提升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非常重要。从我国已有的80个航空产业集群区来看,要集中优势资源形成产业合力。航空航天产业园区不能遍地开花,另外,也不能过度重视投资项目的利益分配和GDP的考核认定。如果侧重短期快速的经济产值和税收、就业,就难以营造对航空航天核心技术埋头攻关的产业氛围。从治理和考核指标来说,如果对引入多少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引入多少科技研发机构,以及引入多少本土化的研发机构等没有考核的政策导向,航空航天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区域带动作用就会明显降低,就难以培育出对国家具有长期深远影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对航空航天高科技产业集群遵循规律,提升分阶段、分产业类型的治理能力的考核就非常重要。

4. 加大军民融合及商业化力度

2016年以来,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而航空航天产业领域是军民融合的主阵地和试验场,包括航空航天的研发制造领域和航空航天的技术服务领域,从服务领域来看,全国已有、正在运行的军民合用机场64个,民航与空军初步建立了“联修、联保、联管”机制,逐步形成了军民合用机场资源共享、

信息互通、保障力量方面深度融合的良好局面,改变了过去长期以来军民航标准体系不一致,包括飞行区技术标准、地面运行保障标准、场道除冰雪标准、飞行间隔标准都不一致的状况。航空航天产品的研发制造的军民融合虽然有一定进展,但是在技术转化、商业运行、普遍推广和经济效益带动方面还是有很大的、进一步推进的潜力。航空航天产业的军民融合可以在装备融通、标准融通、人员资质融通等方面推进,降低军民航的切换成本,增强航空航天产业对区域经济的技术辐射、产业提升和经济拉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刘晓旭.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六个维度[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12).
- [2] 李佐军.推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J].区域经济评论,2018(1).
- [3] 秦臻,秦永和.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以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为例[J].中国软科学,2007(4).
- [4] 胡红安,李洋.我国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因素分析——以西部航空航天制造业集群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8).
- [5] 苏宁,盛亮.浅析航空航天领域的关键制造技术[J].科技成果纵横,2012(4).
- [6] Nadvi K, Halder G. Local Cluster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Exploring Dynamic Linkages Between Germany and Pakistan[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05, 17(5): 339—363.
- [7] 谭崇台.影响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要素——基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历史考察[J].宏观质量研究,2014(1).
- [8] 张久台.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 [9] 谷建全.科技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J].区域经济评论,2014(3).
- [10] 赵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否促进技术创新效率?[J].科学学研究,2018(2).
- [11] 张文敬,张一欣.中山开放式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J].科技管理研究,2014(24).
- [12] Watanabe C, Kishioka M, Nagamatsu A. Effect and Limit of the Government Role in Spurring Technology Spillover—A Case of R&D Consortia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J]. Technovation, 2004, 24(5): 403—420.
- [13] 李艳华,陈萍.世界航空制造产业国际转移的新趋势及我国承接转移的关键对策[J].经济问题探索,2008(12).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Improv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lity by Aerospace Industry

Li Yanhua Yan Dan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lit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s the high-end representative of high-tech industry, aerospace industry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effect. The significant effect of aerospace industry in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demonstrated through the data of major regions in China.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aerospace industry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promote such aspects as the construction of ope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overall promotion of point-line-plane industry, high-tech cluster governance, aviation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Key Words: Aerospa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Mechanism; Path

(责任编辑:柳 阳)

【区域开放与合作】

内陆城市空港经济发展的瓶颈与策略

——以洛阳空港区为例

肖若晨

摘要:随着中国开放经济的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内陆经济崛起成为重大新特征,并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内陆区域中心城市是内陆经济崛起的极核,加快开放,发展内外源相结合的空港经济,培育投资与创新相结合的增长动力,是内陆区域中心城市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发展重要途径。洛阳作为典型的内陆区域中心城市具有区位优势独特、民航发展步入快车道、产业集群优势明显、产业转型步伐加快和历史人文底蕴深厚的特点,但也存在着综合交通枢纽网络没有形成、机场规划建设标准与航空枢纽定位相差甚远、机场管理体制不顺、港区管理体制不顺、创新驱动不足等瓶颈。顺应规律,提高枢纽定位;纳入各级战略规划,提高建设标准;提高空港产业集聚区战略定位,培育临空经济增长极;强化组织领导;扩大“洛北空港新区”管理权限;提升规划和建设水平;开展精准招商;强化政策等是提升经济开放水平的有效选择。

关键词:洛阳空港区;物流中心;临空经济增长极

中图分类号:F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1-0153-04 **收稿日期:**2019-10-27

作者简介:肖若晨,女,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郑州 450008)。

在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内陆经济崛起成为重大新特征,并对未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内陆区域城市作为内陆经济崛起的极核,要创新开放模式,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内陆地区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实现赶超跨越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洛阳是典型的中部内陆城市,也是河南副中心城市和“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不沿边也不靠海的洛阳空港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对洛阳空港区经济发展的瓶颈与策略进行研究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一、洛阳空港区现状的分析与判断

洛阳空港区覆盖孟津县麻屯、常袋两个乡镇,

17个行政村,总人口31038人。规划面积为12.86平方公里。目前,建成区面积达8.9平方公里。截至2018年年底,入驻企业共计599家,营业总收入150.74亿元,主营收入为146.8亿元,就业人员为1.4万人。其中,116家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现产值114亿元,主营业务收入110.3亿元,利润8.3亿元,上缴税金2.10亿元。集聚区产业类型以机械加工和装备制造为主导,企业占比达65%以上,初步形成中上游产业链。集聚区共入驻工业企业312家,其中,从事机械零部件加工企业134家,装备制造企业97家,建材企业19家,耐火材料加工企业15家,食品生产企业13家,其他工业企业34家。归纳起来,洛阳空港区发展具有以下优势。

一是区位优势独特。洛阳空港区是豫西、晋南、陕东唯一的集航空、地铁、高速、国道、省道、城市干线于一体的地空联运综合交通枢纽。洛阳

空港区地处洛阳孟津县南部,南靠洛阳主城区,北临孟津县城和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风景区,地处洛阳“四纵四横一机场”交通网络的核心地带。其中,“四纵”是指洛阳空港区东西紧挨宁洛高速和二广高速,连接南北区域,中间王城大道和地铁二号线将洛阳空港区与洛阳市中心区、火车编组站、高铁站贯通;“四横”是指横贯空港区的连霍高速、G310国道、连天线和机场大道,构成连接黄河生态经济带和陇海线的东西交通大动脉;“一机场”是指洛阳北郊机场。洛阳空港区拥有国家一类航空口岸,国内通航城市18个,国际通航城市2个,基本形成覆盖东西南北主要城市的航线网络。洛阳空港区南侧紧邻市区北外环路(原310国道),宁洛高速南北贯通,集聚区内新310国道、连霍高速横贯东西,小浪底专用线纵向穿过集聚区中部,机场路横向成为南北两区分界线;距离洛阳货运编组站6千米,机场路往东与王城大交汇直达洛阳老区、新区、龙门站并与南环路相连,小浪底专用线往南直接到达洛阳涧西工业区。拟建的地铁3号线和城市六组团轻轨联通市区及相邻区县。

洛阳北郊机场于1986年开工兴建,1987年9月26日正式通航,是河南重要的空中交通枢纽、豫西地区重要的民用机场,是国家一类航空口岸,目前通航26个城市,基本构建起了覆盖东西南北主要城市的航线网络图。洛阳北郊机场常年担负着郑州、西安、太原、南阳、武汉等机场的备降航班保障任务。2008年,洛阳北郊机场改扩建工程启动,2010年4月新候机楼投入运行。2018年7月,洛阳北郊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启动,工程包括航站楼改造、延长跑道、飞行区等级提升至4E级,扩建完成后航站楼面积将达到10万平方米。

二是民航发展步入快车道。2018年,洛阳北郊机场旅客吞吐量131.51万人次,同比增长48.7%,增速位居全国前列,比全国平均增速高出38.5个百分点。2012—2019年,洛阳北郊机场旅客吞吐量平均增速为23%,比全国平均增速高出12.3个百分点。

三是产业集群优势明显。洛阳空港区现已形成机械和装备制造产业较为成熟的下中上游产业链,集聚一批品牌企业,新材料产业业态发展迅速。从铸造、锻造到农机、汽车、工程机械、矿山设备零部件加工,到农机、工程机械、矿山设备、制冷设备生产组装等,形成较为成熟的产业基础和产业

链条。隆华节能是中国著名的环保节能装备制造,国润新材、耿力机械、三杰热电、鸿元轴承、诚冠自动控制、凯众科技、联创锂能等一大批创新型企业快速崛起,新材料企业呈现出快速集聚的态势。

四是产业转型步伐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不断完善营商环境,出台一系列配套扶持政策,大力培育创新型龙头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目前,洛阳空港区拥有上市企业1家,上市公司分支机构4家,“新三板”“四板”挂牌企业各两家,高新技术企业23家,省备案科技型中小企业82家,拥有院士工作站两个,省市级工程中心(实验室)、企业研发中心和技术中心53家,拥有中国驰名商标3件、河南著名商标12件、国家专利近700项。

二、制约洛阳空港区发展的瓶颈分析

洛阳空港区经过20余年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对于促进洛阳的发展、提升其副中心城市地位乃至促进河南的开放发展等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城市区域竞争愈发激烈,洛阳空港区在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体制、创新动力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瓶颈制约,需要认真探讨、分析和加以解决。

一是综合交通枢纽网络没有形成。尽管洛阳空港区是豫西、晋南、陕东唯一的集航空、地铁、高速、国道、省道、城市干线为一体的地空联运通道,但是“铁公机”多种交通方式之间缺乏连接,综合交通枢纽缺乏规划,建设明显滞后。洛阳空港区缺乏与“一中心六组团”之间的快速通道衔接,缺乏与高铁、城际、轻轨、地铁网络之间的衔接融合。

二是机场规划建设标准与航空枢纽定位相差甚远。目前,洛阳北郊机场的飞行区等级为4D级,机场跑道为2500 m×45 m,与4E、4F、3800 m×60 m更高等级尚有较大差距。不具备大型客、货机起降必需的机场条件,明显制约了航空枢纽和临空经济的发展。洛阳机场属于一类口岸,但属于二级机场,不相匹配。洛阳机场客货吞吐量太少。截至2018年,洛阳机场旅客吞吐量131.5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339.13吨,保障航班11890架次,旅客吞吐量排名位居全国第81位,与国家设置临空经济示范区要求1000万客运量、10万吨货邮量指标相比差

距较大。目前洛阳机场规划建设标准太低,不适应洛阳副中心城市和洛阳都市圈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全国性重要交通枢纽建设要求。

三是机场管理体制不顺。洛阳机场属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洛阳分院,机场是其下属机构,最重要的用途是教学和飞行模拟,非客货运,这与航空枢纽承担的角色存在矛盾。

四是港区管理体制不顺。现有洛阳空港新区管理机构是科级单位,属于事业单位体制,难以协调行政资源,航空港涉及麻屯、常袋等多区域,联动区域包括西工、涧西、老城等市区,孟津县政府和航空港管委会都难以实现资源联动高效发展,难以形成合力。

五是创新驱动不足。洛阳航空港产业基础虽然成熟,但是经过30年的历程,大多数处于转型期,高端产业布局不足,人才链、资金链、创新链融合不足,缺乏机制、平台和体系,导致洛阳航空港发展临空经济缺乏高端产业支撑,基础薄弱。受到经济形势和环保政策的影响,部分企业经营面临人才、资金、市场和技术的难题。在产业转型的攻坚克难关键时期,人才引进、市场探索和技术创新体系支撑能力不足,致使定期的人才引进计划和重点项目引入机制滞后,集聚区发展处于被动地位。

三、洛阳空港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建议

结合上文对洛阳空港新区的现状、特点、瓶颈等方面的分析,下面对洛阳空港新区的发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立足全局长远,提高战略定位

顺应规律,提高枢纽定位。立足战略全局,提高洛阳航空枢纽和空港产业集聚区的战略定位。顺应城市群“双中心”与“双枢纽”协同发展规律趋势,随着中原城市群由区域级城市群升级为国家级城市群,未来将进一步升级为世界级城市群,郑洛“双枢纽”格局将成为必然。因此,中期来看,将洛阳航空港定位为国家区域航空枢纽,长远来看,定位为国际航空枢纽。“洛北空港新区”定位为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纳入各级战略规划,提高建设标准。建议将洛阳国家区域航空枢纽纳入国家民航“十四五”发展规划,将郑洛“双枢纽”纳入中部地区“十四五”发展规划、河南“十四五”发展规划、“一带一路”或空中丝

绸之路规划。按照4E级双跑道标准加快推进洛阳机场改扩建工程及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网络体系建设,预留第二条跑道空间建设用地。

提高空港产业集聚区战略定位,培育临空经济增长极。航空枢纽的定位决定临空经济区的定位,依托国家级航空枢纽可以布局临空经济集聚区。因此,应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依托洛阳国家区域航空枢纽升级“洛北空港新区”的战略定位,加快建成国家区域航空枢纽和航空物流中心、中原城市群和洛阳都市圈重要开放门户、郑洛一体化核心增长极、高端临空产业基地、生态智慧空港新城。推动洛阳航空枢纽、空港产业集聚区与洛阳市“一中心六组团”、洛阳都市圈、郑州大都市区、中原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带动郑洛一体化和同城化。

2.理顺管理体制,强化组织实施

强化组织领导。建议成立“洛阳国家区域航空枢纽”建设领导小组(或洛阳临空经济示范区创建领导小组),具体负责航空枢纽、综合交通体系、空港产业集聚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由洛阳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部门参加,强化责任分工落实,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解决有关重大问题。组建洛阳机场投资运营公司,可以考虑加入河南省机场集团,委托管理。

扩大“洛北空港新区”管理权限。按照权责统一、精简高效的原则,进一步完善空港集聚区与麻屯镇“合二为一”的行政管理体制,按照省级产业集聚区的有关政策规定,提高“洛北空港新区”的行政级别,按副县级或正县级配置,直属市委、市政府,由孟津县代管,赋予县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权限,在行政审批方面部分赋予省辖市管理权限。

提升规划和建设水平。重视规划编制前的战略研究,尤其是亟待开展航空枢纽、综合交通体系、临空产业、生态体系等专项研究。在战略研究的基础上抓紧编制“洛北空港新区”新一轮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控制性详规,加强基础设施规划、产业规划、生态规划和拆迁安置等专项规划。空港产业集聚区的顶层设计由洛阳市委、市政府统一决策部署,孟津县具体负责规划、建设、管理,明确责任分工,完善工作机制,有序推进规划落实,打造精品工程。统筹洛阳空港投资有限公司和洛阳机场建设开发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提升投融资开发平台功能,基础设施建设要适度超前,优化开发时

序,构建政府投资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的多元投资机制,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及综合开发。

3.创新招商机制,制定配套政策

开展精准招商。整体策划推介“洛北空港新区”,瞄准建设国家级枢纽和千亿级临空产业集群,依托重点板块和特色产业园区,策划一批招商大项目,招大引强,沿链引进,集群承接,鼓励战略投资者参与重点板块连片集中开发。建立健全招商引资准入机制、评价机制,实施重大项目洽谈、审批、开工建设和运营的全方位服务保障制度。对新设和引进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的总部企业和重大项目,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给予综合性优惠政策。编制定向招商手册,制定近期重点项目招商计划和工作台账,围绕主导产业展开招商活动。

强化政策支持。优化发展环境,鼓励先行先试,纳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新片区,复制其开放创新政策,复制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政策,制定一揽子扶持政策,加大财政、税收、土地、金融、投资、产业、环保等政策扶持,倾斜支持

临空产业重大项目。加大对引进基地航空公司、开辟新航线、物流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制定支持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财政政策以及住房、就医、子女入学的绿色通道政策,引进一批高端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参考文献

- [1]张娜.基于扎根理论的航空港经济区发展影响因素研究[J].长春大学学报,2019(1).
- [2]杨大风.金融支持视角下的郑州空港区发展研究[J].决策探索,2019(2下).
- [3]陈萍.内陆开放型航空港:基于要素流动的空间效应[J].区域经济评论,2013(3).
- [4]高友才,汤凯.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阶段性耦合发展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7(6).
- [5]吴亚平.航空港经济区发展政策探讨[J].中国民用航空,2014(1).
- [6]曹允春.临空经济:速度经济时代的增长空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The Bottleneck and Strategies of Inland City Air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Take Luoyang Airport Area as An Example

Xiao Ruochen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pen economy in China and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pattern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and the rise of inland economy has become a major new feature, which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sustainabl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regional central city of the inland is the core of the rise of the inland economy. Accelerating the opening-up, developing the airport economy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ources, and cultivating the growth power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are the important ways for the inland regional central cities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opening-up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Luoyang as a typical inland regional center cit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ique lo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advantages, rapid development of civil aviation, obvious advantages of industrial cluster, accelerated pace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but there are also bottlenecks, such as the lack of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hub network, the far difference between airport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standards and the positioning of airport hub, the unsmooth airport management system, the unsmooth port management system and lack of innovation drive and so on. Conforming to the laws and improving the positioning of hub, incorporating into the strategic planning at all levels and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standards, improving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airport industry cluster area, cultivating airport economic growth pole, strengthening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expanding the management authority of “Northern Luoyang airport new area”, improving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level, carrying out precise investment promotion, strengthening policy support and so on are the effective choice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economic opening.

Key Words: Luoyang Airport Area; Logistics Center; Airport Economic Growth Pole

(责任编辑:柳 阳)